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梁凯音　主编

www.euibe.com

清华大学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梁凯音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分析，提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具体介绍了世界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重点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与未来。作为教材，本书结构合理，条理清晰，适合大学本科学生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梁凯音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2-22992-6

Ⅰ.①当… Ⅱ.①梁… Ⅲ.①国际政治—高等教育：远距离教育—教材
②经济—世界—高等教育：远距离教育—教材 Ⅳ.①D50②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5576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责任校对：王荣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30　**印张**：17　**插页**：1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定　　价：00.00 元

产品编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远程教育系列教材

编审委员会

名誉主任 刘　亚

主　　任 谢毅斌

副 主 任 仇鸿伟　李福德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立非　王丽娟　王淑霞　刘　军

刘传志　张凤茹　张新民　沈四宝

沈素萍　吴　军　邹亚生　陈　进

杨言洪　杨晓军　冷柏军　李柱国

李家强　郑俊田　胡苏薇　赵忠秀

赵雪梅　曹淑艳　韩　风　彭秀军

P REFACE

总　序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函授教育；第二代是广播电视教育；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基础的第三代现代远程教育应运而生。到目前为止，教育部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高校共67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远程教育学院（简称"贸大远程"）是在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2002年3月正式成立的。

现代远程教育作为新生事物，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学习习惯、获取新知的途径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何在网络时代打造学习型社会，构筑终身教育体系，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为此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在网络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贸大远程始终坚持依托学校的整体优势和特色，坚持知识的内在逻辑性与职业、行业市场需求的统一，坚持开展面向广大在职人员的现代远程教育，逐步形成了独具我校特色的"7＋1"学习模式（即网络课堂、网上答疑、课程光盘、教材资料、适量面授、网上串讲、成绩检测，以及第二课堂活动），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2003年起，贸大远程连续3年蝉联新浪网、择校网、搜狐网和《中国电脑教育报》联合评出的全国"十佳网络教育学院（机构）"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荣获国家级奖项，"商务英语"等7门课程荣获北京市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精品课程"称号，另有10余门课程在全国性的远程教育课程展示会上获得大奖。

几年来丰富的现代远程教育实践和教学经验积累，为我们出版配套的贸大远程系列教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普通高等学校的现有教材并不完全适合远程教学，市面上真正用于现代远程教育的成规模的网络教材还不多见，与网络课件相配套的系列教材更是寥寥无

几，因此为接受远程教育的莘莘学子专门设计符合他们需要的教材已成为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

基于以上原因，贸大远程按照学校一级教学管理体制，本着为社会、为学生服务的宗旨，致力于教学质量的保证和提高，特聘请了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金融学院、国际商学院、英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学院的优秀教师，以目前开设的两个学历层次的7个专业为依据，以现有的导学课件为基础，编写了这套远程教育系列教材。本套教材共分为外语、经济贸易、工商管理、法律、金融与会计、行政管理、综合7大系列，全面覆盖两个学历层次7个专业的上百门课程。为了打造贸大远程优质教材品牌，我们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计划3年之内全部出齐。

本套教材在策划编写过程中，严格遵循现代远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与教学客观规律，充分考虑到远程学生在职和成人继续教育业余学习的实际情况，专门为远程学生量身定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本套教材的编写具有如下特点。

一、在教材体系和章节的安排上，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在对内容深度的把握上，考虑远程教育教学对象的培养要求和接受基础，其专业深度比本科有所降低，基础面相对拓宽，不是盲目将内容加深、加多，而是做到深浅适中、难易适度。

二、在每章开篇给出明确的学习目标与重点难点提示，涵盖了教学大纲的重点或主要内容。相对于传统的学校教育，远程教育更倚重于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控能力。明确的教学目标有利于学生带着任务有目的地学习。同时，教材充分考虑到了学生学习时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他们以提示和建议。由于本套教材的作者都是经过挑选的、具有长期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且大多数作者都来自远程教学的第一线，是远程网络课件的主讲老师，能够为学生提供比较丰富的、切中要害的问题解答，从而使远程学生在学习时少走弯路。

三、在章后和书后分别设置"同步测练与解析"和"综合测练与解析"栏目，涵盖了各章及本书的重要知识点，并给出了详尽的参考答案，对难题还进行分析点评，列出解题思路与要点，更加方便学生自学。测验是检验教学目标是否达到的有效手段。远程学生是在虚拟的网络课堂上课，远离教师，处于相对独立的学习环境；教师不能通过直接交流了解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学生也由于与教师、同学之间的分离，无法判断自己的学习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教材中设置了大量自测自练题目。旨在通过这种自测自练方式，积极引导学生及时消化和吸收所学知识，不断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阶段性检查学习效果，全面复习和掌握所学知识，综合评判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巩固最终学习成果。

四、考虑到有些专业课程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性，在教材的编写上也力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案例的引入。尽可能安排一个或多个案例，并进行详细的分析讲解。旨在通过案例教学，对课程重点、难点进行深化分析和实际操作训练，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强化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

在本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业界专家学者的真诚理解与支持，得



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在此向他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在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和“十一五”期间，相信本套教材的出版，必将是全国远程教育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衷心祝愿现代远程教育在建立学习型社会、构筑终身教育体系的进程中，在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向现代化大教育形态的历史转变中，迈出更大更坚实的脚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远程教育学院院长

谢毅斌

2006年7月于北京

前　　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地球上各个国家的生活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使国际生活成为各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国际生活整体中生存与发展的主权国家和其他重要力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不断发展,都必须不断扩大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成员的良好关系。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迅猛发展,使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并存共处、共同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同时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处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抓住机遇,谋求利益,增强影响,不断吸取世界文明的发展成果,在外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研究和认识国际生活,全面正确领会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国际战略理论,增强国际意识,掌握分析国际生活的原则和方法,认识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明确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大学生的重要任务之一。

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它独特的结构和存在形式,有它由各种国际因素而组成的体系。这种国际社会体系不是世界政府控制下的社会系统,也不同于各个国家的内在的社会系统。从基本层次上说,国际经济生活和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是国际社会产生发展的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使整个世界经济生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使主权国家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

环境，融入到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在国际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联系日益具有国际意义，从而使世界政治问题和政治交往成为必然伴随的现象，成为与世界经济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国际社会生活的因素，并由此派生出国际文化生活及其他领域的生活现象。

本书是以研究国际经济和政治生活为基础，以研究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对外战略为核心，特别注重研究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生活的变化，力图探讨国际社会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分析和探究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规律，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国际社会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使学生从全局角度了解和把握世界的概貌，了解国际社会组成因素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本书为学生了解和研究国际生活，了解和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及其主要国家集团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切入点。

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下述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介绍“当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帮助学生了解当今世界的概貌和国际社会生活的现状；第二，分析“当今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帮助学生认识国际社会各种角色以及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因和基本特点，认识影响国际社会生活的内在因素，把握国际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三，探讨“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向是什么样的”，帮助学生在把握国际社会生活规律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以历史的眼光研究世界的走向，寻找解决国际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迎接面临的挑战。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本书将介绍和分析当代国际社会生活的宏观图景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综合性和政策性，是学生们学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一本重要读物。

根据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特点：本书首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情况入手，着重介绍和分析国际社会活动的角色和国际格局的基本情况，勾勒出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框架和生活面貌。其次重点介绍和分析国际舞台上的几大重要力量，研究其经济与政治的现状和对外政策、对外活动的特点，分析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对国际生活的影响，阐述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共同性任务，分析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学习了有关著作和文献，并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指导、帮助和支持，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撰稿人是：王志民（第一、二章）、李景瑜（第三章）、魏范强（第四章）、梁凯音（前言、第五、八章）、李小圣（第六、七章）、王晓梅（第九、十章）。全书由梁凯音主编和统稿。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 ONE

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经济全球化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世界经济的形成以及战后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了解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演变和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基础是各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认识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区域经济合作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历史潮流。理解经济全球化会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又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重点与难点

-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并行发展。经济全球化又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起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都在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
- 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世界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经济的形成标志是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的出现、世界货币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演变,美国的霸主地位逐渐丧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呈现三分天下的局面。"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但经济全球化进程又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它极大地促进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都在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正在全面积极地参与和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格局

(一)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世界经济是指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国家集团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运动的经济有机整体,反映的是在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国际交换关系。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将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通过国际间的商品流通、资本的国际流动、劳务的跨国交换、技术转让等多种形式和渠道联系在一起。

世界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18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60 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使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各国商品交换和世界市场随之出现,经济活动逐渐国际化,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殖民体系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美少数国家扩展到全世界,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世界经济的形成标志是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的出现、世界货币的产生。

国际分工是社会分工超出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分工。18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60 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使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逐渐脱离本国的基地,社会分工迅速向国际领域扩展,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或多或少地纳入到国际分工之中。由于广泛采用机器技术,世界划分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两大区域,同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西欧国家迫切需要到海外去寻找原料、粮食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它们通过"自由贸易",用商品甚至以武力开拓市场,由此形成了工业欧美—农业亚非拉的"垂直分工体系",即原来一国范围内的城市和农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分工演变为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的分工,以及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国同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农业国之间的分工。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经济上把世

界各国联成一个无法分割的世界体系。

世界市场是在世界范围内商品交换的场所或领域。国际分工是产生世界市场的基础。有国际分工，就产生了交换的需要，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交换以实现各个国家的需求。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往来奔走于全球各地，冲破一道又一道的民族闭关自守的屏障，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到世界市场。19 世纪出现的世界市场，主要是商品市场，它以英国为中心，这是由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所决定的。随后，法、德、美等国的经济实力急剧增强，世界市场进入追求平均利润或不大稳定的超额利润时期。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市场既包括商品市场，也包括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这种现象遍及全球，无所不包。垄断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稳定的超额利润。这一时期，少数大垄断资本集团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向海外，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进行国际剥削，从而出现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建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

世界货币是超出国家界限在世界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和交换媒介的货币。世界市场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形成世界货币体系。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它们在商品流通、资金流动、劳务交换等活动中形成复杂的债权和债务关系，这就要求各国货币以一定的比价进行兑换、结算和储备。世界货币体系常常为一个或几个经济强国所支配，这些国家在国内以黄金和白银为储备，发行流通的纸币，并以此作为世界货币的实体形式，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不同程度发挥着和金银相同的储备作用。世界货币的出现，促进了世界经济联系的扩大与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列强迫使其他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货币依附于本国货币，实现货币制度的统一，因而世界货币也成为这一时期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工具。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的出现、世界货币的产生，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推动着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随之出现。随着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遂呈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并存和竞争的局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发展到 90 年代末，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 30 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所占比例高达 75%，而美国独占 26.6%，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 3 万多美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1951—1981 年，苏联工业产值增长 12 倍，年均增长 8.5%，国民收入增长了 8 倍多，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相当于美国的 31%，发展到美国的 67%；工业产值由相当于美国的 30%，增长到美国的 80%；农业产值由相当于美国的 70%，增长到美国的 85%。但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使其未能把握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

在世界大战危险明显减少，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了适合国情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随着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获得民族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195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9.1%提高到16.5%。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抓住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渐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然而，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贫困现象进一步恶化，成为最不发达国家。

“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知识经济革命兴起，发达国家开始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主要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转变为主要对科学技术、信息和人的素质的依赖。随着新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知识经济背景下出现了诸如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开发、合成材料、宇航、核能等一批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将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时，知识经济革命实际上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浪潮。主要发达国家逐渐将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信息平台，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协作关系更加密切，摆脱了“冷战”框架束缚的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迅速发展。

战后世界经济与战前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1. 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跨国公司进入迅速发展期，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很强的科技开发能力，通过直接投资，建立海外子公司，实现企业内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协作，开展全球性经营，聚集各类生产要素，形成了开发、生产、销售的国际网络，以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组织生产，使其国际化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由1970年的7 000家，发展到2001年的65 000家。跨国经营与跨国投资已经控制了世界经济的主要方面。据统计到1999年底，跨国公司依仗其雄厚的财力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商品贸易的50%～60%，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技术专利的80%。跨国公司把世界经济的各个不同环节连结起来，国际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在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更多地体现在拥有高水平的跨国公司上。

2. 国际贸易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达到空前水平，不仅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而且明显高于同期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世界货物贸易的出口额从20世纪50年代初



的每年 500 亿美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5.1 万亿美元，2003 年全球贸易额达到约 7.5 万亿美元。信息革命推动了贸易手段的革命，网络技术特别是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常用手段。据世界贸易组织 1996 年年度报告统计，1990—1995 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 1%，而同期国际贸易的年均增长率却达到 6%左右。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充分发挥了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3. 各国普遍开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

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开始了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改良，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如建立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实现企业管理体制的社会化和民主化，通过提高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来调整所有制形式，以及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等，暂时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经济管理体制，国有经济的地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特别是市场体制方面进行了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优越性，从而大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4. 国际经济组织发挥稳定的协调作用

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扮演着世界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和协调者的角色。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趋势下，逐渐形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度化的大国协调机制。此后，全球性和地区性协调机构以及双边谈判和定期协商机制，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协调机制。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贸易保持着年均 7%的增长率，特别是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要求在更广和更深层次上规范世界贸易。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此外，遍及全球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些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等，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也对协调区域经济活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常常受到大国意志的支配和现存国际经济规则的制约，但是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防范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世界经济格局是指活跃于世界经济领域的国际经济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结构和态势。世界经济格局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基础是各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世界经济格局较之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各种经济力量的消长和对比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冷战”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战后初期到70年代初，美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德、日、意沦为战败国，国土被盟军占领，其海外的殖民地、市场、投资丧失殆尽。英、法等国经济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元气大伤。社会主义苏联也遭到了严重损失。只有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急剧膨胀，在战后初期的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54.6％，对外贸易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32.5％，黄金、外汇占有额为74.6％。美国正是凭借着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战后世界经济领域的。

第一，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取得世界经济霸主地位。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美、英、法、苏、中等44国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定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人事权和投票权，从而控制了这两个世界性的金融机构。将美元和黄金挂钩，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和操纵国际货币金融的工具。1948年生效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补充，为美国确保经济领域的霸权起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也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实施"马歇尔计划"、"道奇路线"和"第四点计划"。美国为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西欧作为盟友，同时美国也需要一个广阔自由的欧洲市场。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从1948—1951年，美国向西欧17个国家提供了13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又为日本制定了"道奇路线"，向日本提供了大量贷款和援助，加快了日本的经济恢复，为美国控制日本奠定了基础。1949年1月，美国提出了"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即"第四点计划"。美国通过对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实现了对所谓共产主义影响的遏制。

第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1948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严厉管制对苏联的物资输出。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成立了旨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禁运的物资分为尖端技术产品、军用武器装备、稀有物资三大类共几百种。1951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巴特尔法案》(统称《禁运法案》)，规定凡"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质者，均被剥夺接受美国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的权利。

战后初期美国依靠迅速发展的经济、科技力量，通过一系列的战后安排及其对外政策，把战前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统一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美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主。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欧亚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它们相互支持与合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经济实力明显



增强。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的钢铁、石油、水泥、化肥等 20 多种主要工业产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大多数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因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生产力尚不发达，加之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封锁，使其对外贸易落后，导致对苏联的依赖严重。1949 年 1 月，它们在莫斯科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整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力量，抗衡美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一时期，虽然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

2. 第二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末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70 年代初的美元危机、石油危机，促进了世界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下降，随着欧共体和日本经济的上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绝对优势下降到相对优势。美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出现了经济停滞、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美国的钢产量由 1948 年占世界钢产量的 61.6%降到 1976 年的 25.8%；石油产量由 1950 年占世界产量的 55%下降到 1976 年的 18.6%；汽车由 1948 年的 83.8%下降到 1976 年的 31.9%。1971 年，美国出现战后第一次贸易逆差。此后，除个别年份外，贸易逆差一直居高不下。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80 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13.5%；1985 年，外国拥有的美国资产超过了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

欧共体和日本成为两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西欧和日本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恢复了经济。自 50 年代中期，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下，西欧和日本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英、法、德三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 1948 年的 19%上升到 25.6%；出口贸易由 17.8%上升到 30.2%；黄金外汇储备由 7.3%上升到 28.8%。西欧于 1958 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以联合谋求发展，增强了与美国竞争的实力。1979 年欧共体国民生产总值达 23 800 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美国，出口贸易额为 5 711 亿美元，是美国出口额 1 786 亿美元的 3 倍多。1979 年正式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日本自 1955 年经济恢复以后，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其 60 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位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首，达到 11.3%。1968 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此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也在增长，但经济体制僵化问题逐渐暴露。这一时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65—1980 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6.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4%，总体发展速度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联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虽然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加之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严重制约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发展中国家经济呈上升趋势。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的相继独立,发展中国家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经济力量,经济快速发展。虽然70年代后期,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发达国家。1965—1980年,其经济增长率为6%。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额由1970年的565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5 671亿美元,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由1970年的17.9%上升到1980年的28.1%。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维护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任务,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建立了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77国集团"多个区域性与全球性的经济组织。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现象,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腾飞,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行列。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新兴力量。

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使国际分工不断扩大和深化,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①最早对"全球化"②的经济内涵作出解释的是T. 莱维。他在1985年发表的题为"市场的全球化"论文中用"全球化"的新观念形象地概括了世界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国际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大规模地扩散"③。

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在相当长时期内世界大战尤其是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已很小。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作为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定位的基础,这又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安全环境,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以电子计算机、

---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文版,45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② Roland Robertson(1992),Globalization,London:Sage,p. 2。而1961年的Webster中首次出现了globalization一词。

③ 马来西亚民间学术机构"第三世界网络":《第三世界复兴》1996年10月,参见江时学《何为"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动态》,1997。



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平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国际分工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客观上要求各国在资金、技术、劳务和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国际间的联合，共同开发市场。信息技术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络把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支出，使得企业组织跨国生产成为可能，同时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马克思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①

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国际经济和国民经济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逐渐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与此同时，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知识经济革命悄然兴起，人类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时期——即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知识和信息成为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提高了经济竞争力，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从现阶段看，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基本特征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江泽民指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投资方式和国际分工的变化，加速了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全球化。"②因而，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

1. 国际分工的变化引起了生产的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不同于前两次的产业层次上的垂直分工和部门行业分工，而是企业内部的分工，因而跨国公司充当了这种世界性生产网络的核心和纽带。跨国公司实行的全球经营战略，是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基础和巨大推动力。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推动着生产要素在全球性范围内自由流动，促进经济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重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依靠自己的产业、产品优势和效益优势，通过在国外设立子公司，以获得适应自己需求的资源为目标，开展全球性经营，聚集各类生产要素。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跨国公司呈迅速膨胀和扩散之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7年世界上的跨国公司有53 000家；1999年就达到63 000家，设立分支机构70万个；21世纪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61页、6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1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初，跨国公司已增加到65 000家，国外子公司85万个。跨国公司为了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还大力推进研究开发国际化，在国外设立研究开发基地，聘用国外科技人才，与国外科研机构合作，把其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到不同国家，充分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以实现其成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①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将更多地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2.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导致投资的全球化

跨国公司既是全球性生产网络的核心和纽带，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的信条是：哪里有利润，就在哪里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规模陡然剧增，跨国公司进入了全球化经营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企业安身立命，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因而跨国投资和生产就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带动了高新技术的流动，促进了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直接导致了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全球化，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新态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87—1992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流入额为1 735亿美元，随后几年持续增加；1993—1999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流入额达到4 450亿美元；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3 880亿美元，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年全球并购规模达到3.5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虽然此后几年国际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其直接原因是全世界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以及美国发生"9·11"事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投资的发展趋势，更不可能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2006年，国际直接投资便上升到1.42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好转、跨国公司赢利增加、跨国并购的增多以及投资者信心的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将进一步加速。国际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将直接引起全球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扩展。

3. 生产的全球化直接引起贸易的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消费的全球化即贸易的全球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公司企业都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通过国际贸易争得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有利地位。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全球贸易在1990年以来保持了年均7%的增长率，2000年的增长率高达12%，2001年以后世界贸易增长速度虽略有下降，但世界贸易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势头并没有改变。2004年的增长率高达9%。与此同时，跨国公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司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东道国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 1/4，1995 年为 1/3，1999 年达到 46%。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生产的主角，而且成为世界贸易的核心角色。根据服务贸易有关协议显示，有近 60 个国家签署了电信自由化协议，承诺在 2000 年取消 200 种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同意自 1999 年起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原来规范世界贸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已经难以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世界贸易不再局限于商品和货物贸易范畴，已经扩展到服务及生产要素等方面，世界贸易组织便应运而生。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推动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促进构筑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进一步推动了贸易全球化的发展。

4. 投资的全球化必将推动金融的全球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际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投资的全球化必将导致金融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深层次发展。金融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多元化和更有效率的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越来越按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生产和贸易，各国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1991—1996 年间，各国实施了 500 多项放松外资管制的措施，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游资也随之增多。在未来 20 年里，工业化国家老龄化程度将继续加深，各种投资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随之高速增长，形成充裕的资金供给。外汇市场是最富流动性的市场。外汇市场交易 50%以上是跨国交易。1973 年，每天的外汇市场的交易额只有 150 亿美元，1998 年就上升到约 1.5 万亿美元，2007 年更高达 3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每日 GDP 的近 30 倍。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货币在不同程度上可兑抽象。特别是信息革命引发的计算机网络普及，将全球金融市场连成一体，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为巨额国际游资寻找到增值的途径。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也将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1994 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特别是 2008 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金融风险失控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引起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1995 年 11 月，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讲话指出："世界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世界贸易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长幅度。科技革命正在向各行各业渗透，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加快。"[①]第三代领导集体在

①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5-11-20。

对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总体形势把握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1]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由于各国自身经济利益不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形态各异,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亦不尽相同,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动力和程度相差极大,因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较量竞争的曲折过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绝不是一条没有曲折的直线,现在是这样,以后也将是这样。

(二)区域经济集团化势头强劲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开展的各种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活动,成为有关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的迅猛发展,趋利避害、趋福避祸,几乎成为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如此迅猛发展,存在着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

1. 全球性的多边合作机制无法满足所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需求

从现阶段发展看,经济全球化通常是以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基础,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规则为标志,促进全球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而区域经济合作则以双边或地区性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以区域范围的市场及其运行规则为标志,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步履艰难且旷日持久,迫使一些国家另辟蹊径,通过涉及国家少、见效快的区域经济合作来实现经济全球化短期内难以达到的目标,以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的诸多全球性多边经济贸易谈判的失败(特别是从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谈判失败到2003年墨西哥坎昆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失败),都反映出全球性多边自由贸易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难以有所作为。而地区经济合作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比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更现实、更强劲,双边或区域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从而能使相关国家共同受益。特别是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也促使一些国家不得不寻求通过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来规避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合作对区域内国家实行优惠的差别待遇,甚至排他性的特征日益明显,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迫于竞争的需要,也希望参与到区域经济合作之中,因而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兴未艾,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区域经济合作既是各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相邻国家为减缓经济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合理选择。

---

① 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11日),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1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 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已经成为部分国家经济开放的标志和对外施加压力的手段

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虽然有不同的要求和利益差别，但是它们的目的基本一致，即为经济的长期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都试图向外部世界展示本国的贸易自由化体制及改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从而达到改善其贸易条件，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强化竞争，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等长期目的。墨西哥自 1994 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在对外贸易上获得飞速发展。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目的之一是使其在欧盟的支持与援助下迅速摆脱经济上的落后局面。而有些国家将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当作一种手段，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多年来，美国试图通过签署双边或者地区性贸易协定，采取分化手段，拉拢一些发展中国家，允许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而为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设置障碍。这种施加压力的方法严重地冲击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机制。

3.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本国和本地区贸易与投资的发展

各种数据表明，全球贸易的增长大部分源于各种业已形成或正在建立当中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贸易的增长。2000 年，仅发生在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中欧自由贸易区和安第斯共同体六大区域贸易集团内部的贸易量，就已占到世界贸易总量的 36%。全球贸易中半数以上是在各种区域经贸安排的成员之间进行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可以产生“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作用，即由于取消内部关税和其他限制，致使区内交易成本降低、价格下降，从而使区内贸易增长。以自由贸易区（FTA）为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就是内部开放市场，相互提供优惠。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由于其在贸易优惠方面的排他作用，特别是区域内外的差别待遇，必然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没有开展区域贸易合作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极大压力。2002 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高额关税，却对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区别对待。通过联合来取得集团优势以增强自身实力。2001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达成协议，决定 2010 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直接效应的影响，2002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比上年增长 32%。

4. 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合力作用使其成为能够左右地区经济乃至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和修改旧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成为各国趋利避害，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中之重。而单个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影响十分有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已经充分显示其影响力，其作用越来越大。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较小范围内，各国的呼声更容易得到尊重，这种呼声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全球谈判中得到放大。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也在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区来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正是由于其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对国际经济规则制订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如果不借助于区域经济合作这种团队的力量，单个的国家就难以对世界经济事务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影响。欧盟和日本影响力的差别就是明证。日本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它的影响力远不及欧盟，根本原因就是欧盟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联合为一个整体后在经济实力上就大大超过了日本，在国际经济事务问题上的发言权也远远强于日本。由于欧盟在市场规模上已经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在制定国际经济游戏规则方面，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强国也不得不尊重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的利益。在20世纪末"欧洲统一大市场"形成之际，美国已经感到其面临的压力，因而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应对其面临的挑战。而目前欧盟的"东扩"计划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发展为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将出现新一轮的竞争。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客观趋势，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超大经济体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将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区域经济是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强产品竞争力。区域性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必将加速资本的相互渗透，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分工，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然，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有矛盾的一面。许多国家把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作为抵制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一种应对措施。单个国家的确无力阻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借助区域性经济合作的集体力量，既可以减轻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又可以使其利益最大化。从经济运行规则看，区域性经济合作具有排他性，其内外有别的政策常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合作无疑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有消极影响，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抗衡和矛盾。但是，区域性经济合作也具有开放性的一面。区域性经济合作并非只着眼于地区性的自给自足，而是要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经贸活动中，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致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往往高于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因此，从长远来看，区域经济合作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还将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最终会成为加速经济全球化的步骤和途径。

如今，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为代表的一批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排在世界GDP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亚洲的日本(第2位)、中国(第6位)、韩国(第11位)和中国香港(第28位)、中国台湾(第19位)未参加自由贸易协定。由于香港、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没有与他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只有日本、中国和韩国。在WTO的140多个成员中，90%以上国家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正在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之中，按照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进



行平等的贸易往来，但这绝不意味着能够在多边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显著，在历史文化、政治倾向上各不相同，经济贸易往来的新进展，特别是新的规则出台都需要一个讨价还价的漫长过程。各种区域经济合作或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是有发达国家参加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已经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构成严峻的挑战。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参加国却有地域相邻、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大、文化背景相似等多方面的共同点，共同的经济发展使它们走到一起，所以它们相对于世界性经济组织在机制上更灵活，合作的愿望更迫切。即使经济比较落后的非洲大陆也成立了以经济融合为目标的非洲联盟，其目的是实行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

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是苏联东欧国家于 1949 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之后，欧共体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开始走上区域经济合作的道路。20 世纪 70 年代，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开始建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90 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欧洲联盟成立，特别是欧元出台，把区域经济合作推向高潮。2002 年 7 月，非洲联盟的成立则标志着非洲大陆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更高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区域经济合作、跨区域经济合作、次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遍布世界各地，形成了一个以各个区域为活动范围和联系主体的经济网络。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 2004 年 1 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已达 293 个。

欧洲联盟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是从煤钢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欧洲统一大市场使欧盟内部的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在快速流动与交流中实现了优化选择和配置。1999 年欧元出台，2002 年欧元取代欧元区各国货币，成为欧元区唯一货币。欧盟的超国家力量，在经济上表现出欧盟统一市场的透明性、竞争性与流动性，在文化心理上体现了欧洲的统一形象。欧盟委员会报告指出，自 1993 年欧洲统一大市场建立到 2003 年的 10 年来，欧洲统一大市场使欧盟的国民收入增加了 8 770 亿欧元，创造了约 250 万个就业机会，并使欧盟的年经济增长率增加了 1.8 个百分点。截至 2007 年底，欧洲联盟发展到 27 个国家，占欧洲国家的大多数。扩大后的欧洲联盟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5%，经济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总面积将达到 400 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 5 亿。欧盟将继续朝着全方位一体化推进。

美国和加拿大于 1988 年 1 月通过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1994 年 1 月墨西哥加入。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将逐步取消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关税及投资障碍。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由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94 年 12 月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确定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时间表。在美国的倡导下，与会成员国一致商定要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逐步向南扩展，计划于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即美洲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北起阿拉斯加、南到阿根廷，包括除古巴之外的 34 个美洲国家。该贸易区人口近 8 亿，国内生产总值 11 万亿美

元，将超过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占全球总产值的1/3以上，贸易额占全球的1/5以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不仅会左右西半球的贸易、就业和投资，而且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于1989年。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首次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APEC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形成了高官会议—部长级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三个层次的决策机制。其宗旨和目标是："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内贸易壁垒。"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由成立之初的12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1999年的21个国家和地区。据2001年APEC秘书处统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1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42.2%，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8.3%，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7.5%，APEC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搞立法式的规定，不推行一种模式，任何方案和动议都必须经过成员国一致同意。1994年11月，印尼茂物会议决定在成员中分两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将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于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2001年上海会议重申贸易投资自由化决心，并发表《数字APEC战略》，意在亚太地区创建数字化社会。

2002年7月，由53个非洲国家成立的非洲联盟是与欧盟类似的非洲主权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以"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作为发展战略，这是一个庞大的一揽子计划，涉及非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展目标明确而具体，是对非洲发展道路的新探索，为非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勾画了宏伟蓝图。这一计划如果得到有效的执行，将较好地整合非洲大陆的资源、人力、资金和技术，加强非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非洲联盟拟以非洲现有的数十个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为基本框架，通过逐步缩小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加强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来推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非洲联盟的方案对于非洲未来发展是一次重要尝试，是非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为防止被"边缘化"而采取的新对策。

2001年11月，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召开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第五次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东盟十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将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中国总理朱镕基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谈判于2003年启动，2004年6月结束，2005年1月正式开始双方的关税减让计划，2010年将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国内生产总值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1.2万亿美元的经济区，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首次参加的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也将是我国参加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后未来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对我国乃至对世界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大潮，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推



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为本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有益环境。

三、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此，我们必须客观地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既不能主观地全面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对所有参与的国家和地区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发达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时期内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但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同样激烈且亦有胜负，甚至不可避免地引起国际经济关系的新调整。

经济全球化的起步和加速发展是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本背景基础上开始的，因而发达国家捷足先登，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等先机。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发达国家主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它们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占据着资本、技术、信息及科技人才的优势，主导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现行的以发达国家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而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是当今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基本依据。因而，西方发达国家是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部分发达国家极力推行贸易自由化，试图打破所有对其不利的贸易壁垒，开辟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市场，这实际上是向世界推销它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目的是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将贸易自由化的重点放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上，这是发达国家最有竞争力的强项，它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却不遗余力地采取保护政策。美国于 2002 年 12 月 2 日在世界贸易组织召开的市场准入谈判小组会议上，提交了在 2015 年以前取消所有工业品和消费品关税的提案，以期从它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最大收益。而美国自身不仅在 2002 年增加农业补贴，保护其农产品市场，还提高了部分钢铁产品进口关税。欧盟也明确表示，在 2006 年以前不准备就其公共农业政策下的农业补贴问题采取实质性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继续成立新的国际经济组织，签订新的国际经济协定，建立国际信息网络，巩固和加强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它们还试图将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推向全球，以谋求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霸权，按照它们的意志建立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从表面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游戏规则下竞争，在形式上似乎是完全平等的，而形式上的平等却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在平等竞争旗号下掩盖其经济、金融、技术的霸权主义，实行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贸易战略，妨碍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经济。由于经济科技水平的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优势上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家经济安全亦受到威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

政府对本国经济干预的权力被弱化，许多弱小国家无力阻挡国际垄断资本对民族经济的冲击，民族产业不断被跨国公司挤垮和吞并。

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其发展进程绝不可能以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为转移。长远看，面临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从更广和更深层次上分析，发达国家依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必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造成冲击和震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下的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本标志的，但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这种产业转移却使其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直接后果就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10 余年的经济停滞。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实，致使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商品输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实际上等于把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机会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其直接结果就是减少了发达国家内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降低了他们的经济待遇，因而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已经成为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生产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特别是贸易的全球化已经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市场空间的扩张也是有限的，这不仅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竞争的白热化，而且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对外贸易，发达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同和相似的内涵，互补性差，激烈竞争在所难免。美国曾多次指责日本和欧盟树立贸易壁垒，要求它们开放市场，并试图启动所谓“301 条款”对日本进行调查。欧盟也曾以美国对国内企业的税收减免保护上诉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曾于 2002 年 8 月 30 日作出裁决，允许欧盟对美国产品征收 40.43 亿美元惩罚性关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日、欧主要资本主义的贸易纠纷不断，汽车战、香蕉战、钢铁战频繁爆发。江泽民指出：“全球市场、资金、资源的争夺矛盾更加尖锐，世界范围的贸易竞争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越来越激烈。”①

第三，经济全球化不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使其更加激化。虽然发达国家目前更多的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是发达国家中出现的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放大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新表现。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形成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之上，适应了资本追求利润向全球扩张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获得更

---

①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7 年 12 月 9 日)，载《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14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多的超额利润，同时又造成了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失业或工资待遇下降，这才是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国际资本主义把资本的吸血管伸到全球，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得自己免于死亡。吸血虽然见效，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毕竟是扬汤止沸的短期行为。它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①]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将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将面临在世界范围内生产的盲目性等更多的矛盾和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又一次充分暴露。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而且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②]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边界消失、资本的国籍失去意义，更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有没有民族资本、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不是掌握在国外垄断资本手里变得无足轻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弱势地位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初期难以同发达国家一样享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曾深刻地阐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南北发展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场所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跨国公司不仅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产业（包括矿藏、能源及高新产业），而且还将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难以抵挡跨国公司的冲击，甚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难以调控跨国公司操纵下的经济活动，更难以阻止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等和受剥削的地位。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反对并否定全球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批评"全球化为穷国带来了灾难"。[④]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全球化是一个骗

---

① 《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载《求是》，2001(3)。
②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8-11-09。
③ 江泽民：《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载《人民日报》，2000-09-08。
④ 《经济参考报》，1999-07-23。

局。”[1]墨西哥一家媒体撰文，把全球化称为“新帝国主义”。文章认为“新帝国主义”有两只手：一只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只手是世界银行。新帝国主义“要为各跨国公司组成一个国际大商会……全世界都要被置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2]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在一个不能打破贫困周期且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中，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联合国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14％和出口市场份额的18％。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表的2002年度《人力发展报告》指出，最富有国家与最贫困国家收入之间的差距在1920年是35∶1；1975年是45∶1；1992年是75∶1；2001年是100∶1。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已经是最贫困的20个国家的37倍。20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仅20余个，而今天已增加到49个。非洲7.3亿人口中，就有54％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每天不足1美元，有15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使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使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胡锦涛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发展息息相关。没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发展和平等参与，就没有世界共同繁荣，就无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3]

虽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挑战，但是，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客观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中国家中有两类经济、技术和发展战略不同的国家——一类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及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在综合国力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实力，拥有一定数量科学技术人才，在某些领域内已经取得相对优势，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有可能赶上或超过某些发达国家；另一类国家是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自身发展水平、国力所限以及起点较低，或者是发展战略失当等主客观方面的缘由，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依然处于“中心—外围格局”分工的末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其一，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将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融合，使部分国家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如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由世界古典文明的边缘奇迹般地变成了世界近代文明的中心；而以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在经济上已经沦落到三流国家的水平，但是借欧美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之机，引进了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几乎全部的技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

---

① 原载美国《洛杉矶时报》，1999-02-16。
② 原载墨西哥《至上报》，2000-05-25。
③ 胡锦涛：《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在第六十四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09-25。



国;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依靠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实施“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其二,只有综合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具备崛起的比较优势。仅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例,中国、印度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经济回旋余地大,适应性强。它们不仅拥有较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深受跨国公司青睐,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而且有广阔的市场和一定数量的高科技人才,只要自身发展战略得当,其他力量难以撼动其根基。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印度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更重要的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环境。

其三,只有具备较强科技力量和发展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发挥后发优势。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又为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基础和设施比较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赶超机遇。原因主要有:(1)研究开发成果全球共享以及科学技术的溢出和扩散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种重要现象。跨国公司生产的国际化推动了研究开发的国际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以市场换技术”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流动。产业转移意味着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技术转移中受益。(3)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参加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中国的航空航天和生物工程、印度的软件产业、巴西的航天技术等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业。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和潜力,难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崛起。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后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高水平发展的工业经济,就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农业人口为主和文盲比例较大的现实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不具备一定科技水平和人才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试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发展高新技术,以实现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三)国际社会反全球化运动的形成及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较量竞争的曲折过程。列宁曾指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不是辩证的,不是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的同时,国际社会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4 年。1994 年 1 月 1 日,就在美、加、墨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的当天,被誉为“格瓦拉第二”的印第安人领袖马科斯,发动了“萨帕蒂斯塔运动”,向墨西哥军发动进攻,誓死捍卫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权利,由此吹响了“反全球化”的号角。从 1999 年 11 月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开始,凡是召开世界性

①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2 版,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的国际经济会议，场外到处都有情绪激昂的反全球化的抗议人群。反全球化的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出现过人员伤亡。

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导致部分人群利益受损。具体的冲突与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南北国家之间包括发达国家内部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反全球化的基本动因。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了世界的财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都能平等地从全球化中受益，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收益甚微。工业化国家与30多个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4倍。过去30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从25个增加到49个。目前，占全球人口1/5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2%，全世界仍有10亿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全球化同样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和其内部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化"(Third worldization)的问题，即在原来的"第一世界"就出现了贫困化与边缘化(尽管此种贫困与边缘化不能与穷国相比)。作为全球化最大牟利者的美国，也正是西方国内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反全球化"声势最浩大的地方。

第二，缺乏监管的国际游资和跨国公司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使世界经济孕育着极大的不稳定性。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结束了政府主导下的依靠跨国公司进入与贸易带来的经济奇迹，凸现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打击了东亚国家参与上述全球化的积极性，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亚洲型反全球化运动的爆发。跨国公司几乎主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民众生活。有些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政府提出过高要求，如东道国不答应，他们以撤资相威胁，跨国公司的资产转移定价策略也严重损害了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德国《明镜》杂志有生动的描述："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①

第三，全球环境污染和文化利益受损。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同时，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濒临枯竭等全球性问题也随之突出，并已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占90%，另有2 500万人农药中毒，500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一些环境主义者为此而强烈地反对全球化。文化冲突主要发生在中东国家，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完全恢复伊斯兰的正统信仰。在生活上以端正社会风气、净化教徒心灵为己任，禁止饮酒、吸烟、音乐和舞蹈。在政治上主张政教合一，推行百分之百的伊斯兰化。他们的核心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始宗旨，要建立由宗教学者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

反全球化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反全球化的内容、形式及程度

① 汉斯·彼得、马丁等：《全球化陷阱》，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上是不一样的。欧洲、北美的反全球化现象最为突出。法国的反全球化带有反对美国霸权、维护法国文化传统的倾向。英国的反全球化更多涉及全球化中的自由民主问题、市场与社会问题、政府干预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在美国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都非常积极。美国反全球化人士显然更关注劳工权力、医疗保健、环境、就业、移民等问题。拉美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活跃的。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强烈的反对 IMF 和本国政府对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的活动。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深受影响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全球化倾向，它们将一切不满和愤怒发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

反全球化运动的目的不是真正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的不公平问题。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 2000 年发表的《千年报告》中对反全球化问题所支持的那样："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①]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是全球化自身带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而形成的一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运动是一种松散的、阵营庞杂的社会反抗运动，在组织上、战略和战术上无法保持统一和稳定，无法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归根结底，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绝不会因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而停止其进程。

（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江泽民总结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所以逐渐落后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②]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但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如果把握得当，经济全球化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又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第一，参与经济全球化，可以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即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及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论断。在当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决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为我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人均占有资源极少的国家，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又决定了我国是一个资源消费大国。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安全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消费的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是经济全球

---

① 安南:《我们:联合国人民》，联合国(中文版)，2000-04-03。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93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一项重大战略选择。我国蒸蒸日上的贸易大国地位，意味着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深，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特别是一些国家反倾销以及其他贸易壁垒，又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我们要抓住贸易全球化机遇，实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以适应我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了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形成了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一次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机电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纪之交，我国又面临着向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国际产业大转移无疑将猛烈推动和加速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我国淘汰那些不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行业和企业。外国直接投资将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它们将直接参与改造我国仍有潜力的传统产业，新一轮企业兼并即将开始。抓住这一机遇，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程度上参与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去，不仅可以实现我国的传统产业的升级，而且将有力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发挥后发优势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之中，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一切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东西。列宁指出："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①]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吸引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仅以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软件产业为例，2004年，中国信息产业规模已达2.65万亿元人民币，信息产业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中国软件产业的规模则仅占信息产业的8%，为此，我国政府提出将从六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软件业的发展：一是努力完成《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并研究制定软件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二是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继续为软件出口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坚持鼓励吸收外资的方针，继续鼓励外商加大对软件产业的投资；四是积极培养和引进人才，推动企业加强技术创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五是坚持实施大公司战略，重点扶持有核心竞争力的软件企业；六是深化改革，鼓励竞争，促进软件企业加强管理，加快体制创新。

第四，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趋利避害，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构建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就是要利用区域经济合力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规避对外

---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

② 江泽民：《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1997年10月24日)，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2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开放的风险，扩大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成为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受益者。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趋势的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合作已经突破传统的“区域”框架。20世纪90年代后，又出现了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中日韩—东盟“10＋3”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式。为了适应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我国已经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同时，我国正在积极建立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那样的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我国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采取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这样既可以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区域贸易协定，也可以建立跨洲的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道路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判断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①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既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参与经济全球化，将对我国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首先，经济全球化在短期内将直接冲击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对于刚刚走进市场经济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仅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而且不具备规模效益优势。在尚不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条件下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从规模上看，中国大型企业的年销售总额与世界级跨国企业相比差距很大，中国前500家企业的平均销售额还不到世界500强的5％。从产品开发方面看，中国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在产品的性能、质量等方面均不能与跨国公司相提并论，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富有在世界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经验，而中国企业特别是还处于改革进程中的国企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以优厚的待遇吸纳优秀人才，其竞争力大大超过国内民族企业。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竞争加剧，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大幅裁员，以提高经济效率，加之我国每年1 0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人口，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这不仅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应对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保证自身的经济安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虽然已经30多年了，但是党和政府一直坚持我们的对外开放一定要适合国情，绝对不能超越我们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们也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有其盲目性的一面。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市场更复杂，更难以调控。如果我们开放过快，极有可能受到破坏性力量的攻击。目前，国际金融资本的巨额流动和金融投机活动的庞大规模，远远超出一般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抵御能力。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或潜在的危机对仍然处于国际分工中下端的中国经济造成极大威胁。经济全球化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特别注意掌握好对外开放的

---

①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8-12-19。

节奏、领域和政策，根据本国的独特条件，发挥本国起主导作用的制度优势，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

再次，不利于防止两极分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必然发展影响到各国国内，影响或加剧各国国内的两极分化。印度与中国在人口、历史、资源及发展速度等方面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世纪之交，印度经济增长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印度的高科技特别是信息产业已经在世界软件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2004年印度大选中，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却在被其神话般地誉为“大放光芒”经济形势下被选民抛弃了，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80%的民众未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3.5亿印度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度“泥块”战胜“鼠标”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江泽民提出：“我们应该全面审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加强对这种进程的正确引导和管理。”[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共同富裕。我们需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实现赶超战略。我们必须注意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趋利避害，借鉴其他国家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的教训，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

本章小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呈现出多方面的新特征：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国际贸易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各国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改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发挥着稳定的协调作用。“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经历了从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和70年代初至80年代世界经济多极化方向发展演变的两个阶段。“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向着全球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但经济全球化进程又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极大地促进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都在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正在全面、积极参与和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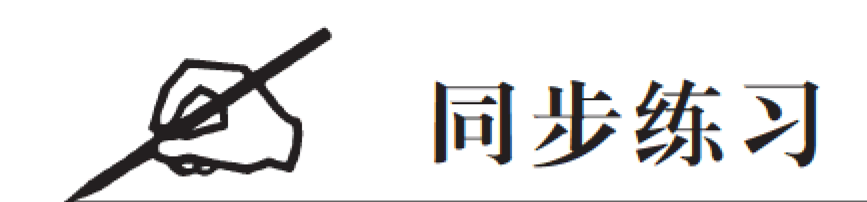
重要概念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格局　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集团化　国际经济组织
布雷顿森林体系

① 江泽民：《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1997年10月24日），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2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和理解世界经济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基本标志?
2. 如何认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进程中的地位?
3.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4. 试分析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联系。
5. 试分析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影响。
6. 试分析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世界经济是在社会发展到(　　)。

A. 奴隶社会出现的　　B. 封建社会出现的

C.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　　D. 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

2. 世界经济格局的核心内容是指(　　)。

A. 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和支配世界经济的权力分配状况

B. 各国的经济实力

C. 世界经济体系

D. 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

3.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形成的标志(　　)。

A. 经互会的成立　　B. 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

C.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D. 斯大林"两个平等市场"理论的发表

4. 美、日、欧三足鼎立局面出现于(　　)。

A. 20 世纪 40 年代　　B. 20 世纪 50 年代

C. 20 世纪 60 年代　　D. 20 世纪 70 年代

5. 以建立没有贸易壁垒的世界市场为宗旨的是(　　)。

A. 世界银行　　B. "77 国集团"

C.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D. 世界贸易组织

6. 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最终崩溃于(　　)。

A. 1960 年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

B. 1968 年美国实行“黄金双价制”

C. 1971 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

D. 1973 年美国第二次宣布美元贬值

7.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是(　　)。

A. 主权国家　　B. 世界经济组织　　C. 跨国公司　　D. 地区经济集团组织

8.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

A. 有一定联系,但从长远看是相互对立的

B. 有一定矛盾,但从长远看是相互促进、并行不悖

C. 无矛盾,完全一致

D. 无联系,平行发展

9. 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是(　　)。

A. 最大限度地追求国际高额垄断利润

B. 推动经济全球化

C. 促进各国经济合作

D. 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化、分化

10. 在区域经济集团组织中,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　　)。

A. 东南亚国家联盟　　B.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C. 北美自由贸易区　　D. 欧洲联盟

11. 亚太经合组织的性质是(　　)。

A. 超国家一体化组织　　B. 关税同盟

C. 自由贸易区　　D. 地区经济论坛

12.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　　)。

A. 国际经济旧秩序　　B. 强权政治、霸权主义

D. 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　　C. 军备竞赛

13. 确立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地位的是(　　)。

A.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B. 布雷顿森林协定

C.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D.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14.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创立的时间是(　　)年。

A. 1989　　B. 1990　　C. 1991　　D. 1988

二、多项选择题

1. 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下列内容(　　)。

A.《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协定书》　　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C.《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　　D.《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E.《欧洲复兴方案》



2. 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加强经济贸易合作的主要措施是(　　)。

A. 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B. 提出“莫洛托夫计划”

C.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签订一系列双边的友好互助条约

D. 共产国际

E. 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

3.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有(　　)。

A. 无歧视待遇原则
B. 最惠国待遇原则

C. 国民待遇原则
D. 贸易自由化原则

E. 公平、平等处理贸易争端原则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巨大的经济优势来夺取世界经济霸权,采取的措施有(　　)。

A. 在国际金融领域,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B. 在国际贸易领域,成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C. 通过经济援助,实现其对西欧、日本经济上的控制

D. 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法在经济上控制不发达的受援国

E. 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

5.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　　)。

A. 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B. 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形成

C. 苏美两极经济格局
D. 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形成

E. 美国一家独霸世界经济

6. 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

A. 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

B. 引发了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

C. 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D. 加剧了国际经济竞争

E. 科学技术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较量的核心

7. 当前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点在于(　　)。

A. 争夺人才
B. 发展战略武器

C. 维护经济安全
D. 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

E. 进行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

8.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它们主要是(　　)。

A.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同时,又带来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问题

B. 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造成结构性失业,加速了社会的分化

C. 资本的国际化是现代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但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烈，南贫北富的鸿沟加深，又是资本主义不可解脱的矛盾

D. 跨国经营的发展在极大地扩展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又造成经济失控现象，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E. 根本问题还是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不可克服

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出现既斗争又联合的态势的原因是(　　)。

A. 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跳跃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B. 争夺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的斗争尖锐化

C. 资本和生产的国际化增强了它们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和利益上的共同性

D. 通过国际间的对话、谈判和政策协调，消除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E. 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相互交织，日趋激烈

10. 当前，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主要表现在(　　)。

A. 科技革命、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升降，从而影响到世界政治的发展

B. 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实现的结果往往导致政府的更迭，从而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影响

C. 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

D.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

E. 经济安全成为一国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答案：

单项选择：1. C　2. A　3. A　4. C　5. D　6. D　7. C　8. B　9. A　10. D　11. D　12. A　13. B　14. A

多项选择：1. ABCD　2. ABC　3. ABCDE　4. ABCDE　5. ABD　6. ABCDE　7. ACDE　8. ABCDE　9. ABCDE　10. ABCDE



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与世界多极化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世界政治的形成以及战后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认识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时有表现，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不可避免，世界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理解世界多极化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体现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利益。

重点与难点

- 两极格局时期的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
- 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世界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世界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 世界多极化趋势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符合时代潮流，体现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确立了两极格局，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关系开始了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多极化趋势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符合时代潮流，体现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在“一超多强”的力量对比态势下，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不可避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时有表现，世界多极化趋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推进世界多极化，为中国的发展赢得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一、世界政治与世界政治格局

（一）世界政治的形成和发展

世界政治是国际行为体在政治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它主要包括各国对外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国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与合作、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与民主、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与演变等方面。

世界政治的基础是世界经济，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基础，以争夺和瓜分世界为原始动力，最终形成于帝国主义列强将世界瓜分完毕。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政治的形成。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使工厂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导致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社会化大生产导致社会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和民族经济的狭窄范围，各国经济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也日益广泛，世界政治开始形成。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殖民体系已形成，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由此形成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加剧，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政治逐渐形成。

世界政治行为体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世界政治的走向。世界政治行为体是指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影响和作用的一系列实体。世界政治行为体可以划分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是世界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截至 2004 年底，联合国共有 191 个成员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主要有三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行为体必须具备四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254～25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素，即定居的居民、固定的领土、健全的政府和完整的主权。国家行为体由于拥有主权而成为具有严格组织结构和完全独立自主的重要行为体。在当今世界，主权国家的国家权益都是对等的，各国处理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关系，必须以主权为依据。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①]是一个国家的固有属性。主权原则是当今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任何破坏主权原则的行为，都是对国际法的践踏和国际基本秩序的挑战。

非国家行为体是指除主权国家以外的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职能作用的政治、经济实体。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发展的产物。非国家行为体以主权国家为基础，根据国家的需要而产生。非国家行为主体大致可以区分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三种基本类型。国际组织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其政府、政党、民众和团体基于特定的目的，以一定的协议或法律形式而设立的组织机构。它主要分为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或民间组织）两大类。跨国公司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分支机构或控制子公司的国际垄断组织。长期以来跨国公司一直被视为一种单纯的经济实体而不包括在国际政治的视野范围之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迅速发展，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非国家行为主体的重要特征是参与国家事务的间接性、对外行为的跨国性和职能作用的协调性。

战后世界政治酝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战胜国意志取向所决定。美国参战最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小，而收益最大，在战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中实力最强，因此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的意志。美国在参战前就已考虑和研究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1939 年 12 月，罗斯福下令成立“和平与改造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为美国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什么“基本原则”。1941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又设立了一个由国务卿赫尔任主席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各种方案。1943 年 4 月，罗斯福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发表了《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放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透露了把苏、英纳入三大国“合作”、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该文提出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组建一个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二是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很大，但却以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出现于世界舞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国合作”主要是以与苏联合作为出发点。苏联对战后世界的打算是，恢复苏德战争前已经取得的领土和权益，在欧洲和远东建立苏联的安全利益范围，争取更多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扩大苏联的影响，使自己成为主宰世界事务的大国之一。二战后的英国，在实力和影响上已大大下降，但它试图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影响，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于

①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6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等地举行了若干重要会议，就战后世界安排达成了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协定，奠定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础，为战后世界秩序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新蓝图。其中尤以雅尔塔会议最为重要，因此新的世界格局又有所谓“雅尔塔体系”之称。

战后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国际行为体数量增多，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国际行为体主要有两类即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对外关系、国际贸易以及宣战、媾和等基本上都是在不同国家政府之间进行的。二战后，国际行为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多。

首先，国家行为体快速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殖民体系瓦解，大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成为主权独立国家；二是国家分裂增加了主权国家数量，如 1971 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苏联解体后分为 15 国，南斯拉夫一分为五，1993 年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而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主权国家只有 50 多个，当今全世界已经发展到近 200 个国家。

其次，非国家行为体急剧发展。由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世界政治的发展亦越来越复杂。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角色，但是世界政治的参与者已不仅是国家和政府，还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是指那些主权国家之外的、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经济实体。它们的种类繁多，包括国际组织、种族集团、宗教组织、生态组织、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等。其活动领域极为广泛，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国际组织。据国际协会联盟 2000 年度报告，政府间国际组织由 1954 年的 118 个发展到 2000 年的 6 556 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由 1954 年的 1 008 个发展到 2000 年的 45 647 个。国际组织是跨国界的多国联合机构，是联系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对抗，三类国家竞争与共存

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的发展就一直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相联系。19 世纪的世界政治主要表现为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20 世纪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二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组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遏制、封锁和包围的政策。美苏两大集团的对抗是“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不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试图依照自己的理想和意志重新安排国际秩序，这就使得美苏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较量和竞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外交上均以意识形态划线，成为战后两大集团对抗的主要根源之一。

随着战后一系列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之外的一种新兴力



量即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崛起，改变了战后世界力量的对比，是对美苏主导下两极制格局的有力冲击。第三世界通过参与和建立全球性与区域性合作机制，协调立场、商讨对策，逐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美苏两大集团紧张对峙的形势下，第三世界选择了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政策，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3. 两大集团既斗争又妥协，既对抗又对话

雅尔塔体系本身是美、苏、英等大国之间妥协的结果。随着战后世界政治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全面对抗在雅尔塔体系内逐步展开。这种对抗在军事上直接表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和对峙。这种对峙不仅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的发展走向，而且曾使两个超级大国走到了战争边缘。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抗，整个世界一度面临着核战争的危险，但危机最后以妥协方式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开创了美苏关系既对抗又对话，既斗争又妥协的新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虽然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异常激烈，但是双方的对抗又与缓和相伴随。这一时期，美苏两国首脑多次会晤，双方签订了两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反弹道导弹条约，长期酝酿的欧安会得以召开。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美苏首脑、外长会晤以及多次军事领导人频繁会晤，达成了中导条约、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协定、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等。“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既非战争亦非和平的对抗和竞争状态，致使美苏两国及两大集团之间多次爆发危机，但最终没有从“冷战”走到“热战”，这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形成的缓和与对话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4. 军备竞赛激烈，形成对抗均势

美苏军备竞赛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冷战”实际上是除军事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冷战”时期之所以没有发生世界大战，正是因为美苏及其两大集团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形成了一种均势。1953 年，美国在军事上制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即削减常规兵力，大力发展核武器和战略空军，以核威慑支持其霸权地位。为了应付美国的核威胁，苏联提出了“火箭核战略”，重视发展核武器，准备打核战争。在“冷战”时期，美苏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拥有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库。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苏两国共拥有 5 万多颗核弹头，总当量达 260 亿吨，大约相当于世界上人均承受 5 吨 TNT 当量的核威胁。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这场竞赛恶性循环，加剧了双方的“冷战”对抗，同时也形成了“恐怖平衡”局面。这种状况促使美苏建立一种核武器控制机制，使它们长期对抗但始终不敢兵戎相见，致使“冷战”最终以无世界大战而结束。

（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及其演变

世界政治格局指在全球各种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国际行为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比较集中的表现形式。迄今为止，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四次变革，即欧洲 30 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格局时期；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格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格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时期。一般情况下，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是导致世界政治格局变动的直接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各国政治力量对比，而且导致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 战后初期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两大阵营开始“冷战”，两极格局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时的共同敌人消失，美苏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1946 年 2 月，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提出了“遏制”理论，认为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对立，美国必须以武力为后盾，遏制苏联。“遏制”政策为“冷战”的发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46 年 3 月，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顿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铁幕演说，呼吁美、英合作，共同对付苏联威胁，成为“冷战”发动的信号。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把世界划分为“自由制度”和“极权政体”两个阵营，美国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开始同苏联展开全面对抗。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破裂，“冷战”全面展开。1948 年，“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逐渐把西欧纳入“冷战”轨道。1949 年 4 月，美国主导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西欧、北美纳入其所谓“集体防务”体系。北约的成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正式形成。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从 1947 年夏天开始，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7 年 9 月，成立欧洲 9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要求欧洲共产党团结起来，互通情报、协同行动。1949 年 1 月，苏联又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 6 国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便相互提供经济援助，交流经验。之后，阿尔巴尼亚、东德、蒙古、越南、古巴也先后加入。1950 年 2 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了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1955 年 5 月，苏联与东欧 8 国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与北约对抗，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至此，经过近十年的过渡时期，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以太平洋两岸两个超级强国为中心，以欧洲为重点，亚太为侧翼，辐射全球的两极世界政治格局最终形成。

随着两极格局的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进入“冷战”状态，其基本表现形式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第一，政治上表现为两面旗帜的斗争。帝国主义阵营打着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号，支持反动独裁政权，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民主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则高举和平民主大旗，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第二，经济上表现为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早在 1947 年，美国就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949 年又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长期化、制



度化;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彼此合作,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开展与西方的民间贸易。

第三,军事上表现为全面“冷战”和局部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美国强化北约,重新武装日本和德国,在军事上援助各反共政府,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则通过加强华约及欧亚国家间的联系,援助各国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就是两大集团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局部战争中的交锋。

第四,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20 世纪 50 年代初,从艾森豪威尔开始的历届美国政府,都竭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阵营则采取措施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①

2.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两大阵营分化,第三世界崛起,两极格局受到冲击

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力量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发展变化,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苏在两大阵营内部的绝对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加上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第三世界的崛起,两极政治格局开始受到冲击。

(1) 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

苏联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建设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老子党及大国沙文主义意识恶性膨胀,甚至以霸权主义政策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冲突。1948 年,苏联操纵欧洲 9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迫使其他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一切关系。1956 年爆发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 1968 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都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日趋紧张的集中表现。中共与苏共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以及和平过渡理论等方面存在分歧,但苏共却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58 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拒绝。为了报复中国,1959 年及之后的短时间内,苏联单方面撕毁有关援助中国的一系列合同,给中国的建设造成极大困难。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展开大论战,直至 1969 年 3 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两党、两国关系中断,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分裂。

(2) 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

美国虽然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行为(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干涉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使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进入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对美国的独立和离心倾向日益明显。20 世纪 50 年代,西欧开始走上一体化道路。1959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主张以法德为轴心实现西欧联合,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1960 年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对美国的态度更趋强硬,拒绝美国以“多边核力量”计划把法国核武器纳入美国控制的北约体

① 参见冯特君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11～12 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系的企图。1966 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还将北约理事会、美国驻法军队和军事设施赶出法国。1969 年 10 月，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提出“新东方政策”，开始缓和与东德和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关系。日本则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推行“多边自主外交”，改变以往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资本主义阵营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直接导致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

（3）第三世界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已经有 104 个国家获得独立。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它们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相互支持，走上了在国际范围内联合的道路。1955 年 4 月，29 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亦称“万隆会议”。会议提出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原则和世界政治旧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1961 年 9 月，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召开了有 25 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宣告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1964 年成立的“77 国集团”，则突出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为争取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的重大努力。第三世界的崛起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

3.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美苏全球争霸加剧，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美苏之间的对抗和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1973 年至 1975 年，美国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入“滞胀”时期。而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较快，苏联借此机会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逐渐取得了与美国在核力量上的大体平衡。1972 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数量达到 2 167 件，美国战略核武器数量为 2 185 件。苏联视欧洲为战略重点，集中了 4/5 的地面部队、3/4 的空中力量和中程导弹，形成了在欧洲的军事优势。同时，苏联极力扩大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和影响。1975 年介入安哥拉内战，1977 年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获得红海沿岸阿萨布、马萨瓦等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苏联在亚洲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并于 1979 年亲自出兵侵略阿富汗，使其侵略扩张达到顶峰。

1981 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执政。里根提出“扩军抗苏”、“重振国威”的口号，制定了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方针，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以取得对苏优势。里根政府还于 1983 年 3 月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试图通过掀起新一轮大规模军备竞赛，从经济上拖垮苏联。在国际上，美国加强与西方盟国的协调，增加了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还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全面实施对苏遏制。这一时期，由于自身固有的体制弊端使其经济增长下降，苏联综合国力衰退，加上军费开支巨大的负担，在与美国争霸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

1985 年，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他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思想，引起苏联国内的思想混乱，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在国际上，苏联主动甚至无原



则地寻求与西方国家的缓和。从1985年11月美苏首脑日内瓦会晤到1990年赫尔辛基美苏首脑会晤，美苏在5年里时间里共有8次首脑会晤，46次外长会晤和多次军事领导人会晤。苏联实行全面战略退缩，与美国达成了中导条约、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协定、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等。美苏还就阿富汗、柬埔寨、安哥拉等地区冲突和东欧各国国内民主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苏联的对外政策直接影响到东欧国家的稳定。1989年，东欧国家政局开始动荡，戈尔巴乔夫决定甩掉包袱，不再为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而增加负担，而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采取政治经济手段来迫使东欧、苏联发生演变。仅半年时间，东欧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华约于1991年3月解散军事机构，7月1日正式宣布解散。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格局宣告结束。

苏联的改革，不仅未能扭转局势的恶化，反而造成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分裂倾向日益上升。1991年挽救联盟解体的"8.19"事件失败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91年12月，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布苏联不复存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将停止其存在。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政治格局的终结，世界进入重新确立新的政治格局的时期。

二、单极图谋与多极趋势的较量

（一）美国的"单极世界"的图谋

美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目前的世界政治格局的过渡时期里的确处于优势地位。美国依仗其强大的实力，谋求建立美国"领导世界"的单极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仍然处于超强的地位。

第一，美国拥有超一流的经济实力，短期内尚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抗衡。美国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时间里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加快发展信息技术，从而使其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略有上升。美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近1/3，相当于排行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美国是第一生产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一技术大国。200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10.5万亿美元。仅2002年与2001年相比，增长值(即创造的新财富)就达3 000亿美元左右。美国主导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同时，美国又以新经济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虽然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打击很大，但美国仍然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挑战美国的实力。

其一，美国的强大科技实力和发展后劲不可低估。支撑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0年之久的动力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经济的主体作用还远未发挥出来。美国的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

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虽然美国经济不时会遇到经济衰退的问题，但由于美国具备良好的创新制度和创新机制，美国经济仍有后劲。美国在全球信息技术产业投资占30%以上，美国还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里占有领先地位。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仍将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态势。

其二，美国仍然是经济全球化主导者和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基本特征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美国不仅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占据着资本、技术、信息及科技人才的优势，还在一定意义上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各种对冲基金、控制国际经济组织，并以此来主导制订和推行较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游戏规则。美国还通过某些保护主义措施，合法与非法地占有了别国的财富，客观上也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增长。

其三，美国金融体制缺乏监管，却将风险转嫁世界各国。一方面，美国的风险投资机制是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基础。美国每年研究与开发的投资都在2 000亿美元以上。据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和《研究与开发杂志》发表的年度报告，2002年，美国公司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为1 94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美元转化成为其他国家和企业（主要是创造价值国家和出口资源国家）外汇结余；然后再用美国房地产吸收这些流动性，本质上就是将全球美元货币财富转化为美国国民财富，特别是通过出售国债将美国的经济风险分散给其他国家。因而美国经济虽然可能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但同时美国也有力量拉其他国家与其“同舟共济”。

第二，美国建立“单极世界”图谋已久，主导世界事务是其既定战略。美国的综合国力首屈一指，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方面，还是在文化、外交等软实力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美国正是利用在力量对比时的有利地位，实现其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政府打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旗号，为“冷战”后世界确立一套各国共同遵守的、由美国掌握并根据美国利益进行评判的国际安全行为规则。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将“恢复国内经济”和“重振美国”作为中心任务，同时提出了“一个目标”（美国领导地位）和“三个支柱”（经济安全、军事实力、民主和人权）的对外战略总构想。为此，美国把伊朗、伊拉克、朝鲜、古巴等国称为“反民主国家”（克林顿的继任者布什在2002年又将伊朗、伊拉克、朝鲜定性为“邪恶轴心”），要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制裁等各种方式，以压促变，甚至不惜动用武力。1999年3月24日，美国联合北约一些国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狂轰滥炸，并于5月8日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是美国破坏国际秩序和践踏国际法的一次重要表现。同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新干涉主义”的演讲，露骨地表达了美国可以无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预的单边主义。

小布什是21世纪上任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布什处处以“美国第一”为原则，推行其单边主义政策。美国不顾其欧洲盟国的反对，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9·11”事件，迫使美国加大本土防范，寻求同其他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但美国不仅没有改变追求世界领导权的单边主义目标，而且美国决心用强力手段排除其称霸世界的一切障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说：“由于美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它应在世界上维持其军事优势，并阻止其他国家挑战它。”①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立即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试图打破条约对其发展军备的限制，以便名正言顺地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9·11”事件后，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增强，美国政府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美国借“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其同情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憎恨，以反恐为名进行了一场不对称的单边主义战争。美国不顾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机构要求对伊武器彻底核查的要求，甚至不顾传统盟国德国、法国的坚决反对，将反恐战争扩大化，于2003年3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伊拉克战争”本身就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导致联合国对伊的武器核查进程因战争中断，是对联合国正常活动程序的破坏，是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严重干扰。

第三，美国坚持“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有新表现。“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昔日强大对手的制约，仍然以“冷战”时期对抗的思维模式定位自己。为此，美国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几种类型：一是在相当程度上追随美国政策的近亲盟国，如日本；二是美国的盟国或准盟国，但与美国有明显的战略分歧，外交上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印度、埃及等国；三是被美国视为非敌非友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国；四是被美国列为敌人的国家，如朝鲜、伊朗、古巴、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美国从寻找敌人的“冷战”思维出发，将其视为敌人的国家称为“邪恶轴心”，并要对这些国家实施所谓“先发制人”的打击。“先发制人”战略已经成为21世纪美国一项重要战略。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就是对国际恐怖组织、窝藏恐怖分子或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以及拥有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敌对国家”、“无赖国家”实现先发制人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靠军事打击不仅难以根除，而且单凭美国提出的理由对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破坏，把世界引向失控，严重地威胁了世界和平。

“冷战”后，美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诉诸战争的次数是最多的。美国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屡屡得手，强化了美国的单极意识，直接干扰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特别是美国发动的“先发制人”的“伊拉克战争”，不仅直接表现为西方同盟体系的分裂，而且由于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破坏了现存的国际体制。相对于多极化趋势那样倾向于政治解决，主张单极世界的美国以武力解决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言，已经造成伊拉克国内局势在某种程度上的失控。在美

---

① 中国新闻网，2002-09-27。

国的主导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断东扩，并提出所谓“新战略概念”，美日两国的双边同盟关系也进行了重新定位，《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其防卫范围。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试图再次挑起军备竞赛。虽然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对中国定位由“战略竞争者”转为“建设性合作者”，但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近年来，美国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8个国家战略报告均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潜在的战略威胁力量。2002年3月，美国媒体披露的国防部秘密文件，赫然将中国等7个国家列为核打击对象。2005年2月，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举行了“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公然把台湾海峡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日美仍然坚守“冷战”时期形成的所谓日美同盟关系，并以“冷战”思维遏制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完成背离了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潮流。

（二）推动多极化政治力量的成长

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根本动因取决于各主要政治力量的消长而导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①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反对建立单极世界，并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推动世界多极化的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已经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

1. 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将是制约“单极世界”的重要力量

虽然美国和欧洲大国是传统的盟国关系，但欧洲的联合趋势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如今欧盟已经发展到27个国家。欧盟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原本就与美国不相上下，扩大后的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5%，欧盟作为第一大经济实体的地位更加稳固。欧盟目前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试图实现政治经济的全方位一体化。21世纪的第一年，欧盟成立了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担任主席的制宪委员会，该委员会已经制定出欧盟宪法草案。欧盟正朝着扩充至全欧洲的“大欧洲”前进，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联邦制的欧洲。走上了一体化快车道的欧盟提出要做多极世界中“强有力的一极”，对本地区乃至世界事务拥有发言权。欧盟先后制定了《跨大西洋纲要》、《亚洲战略新构想》和欧洲安全事务构想。当前，美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矛盾。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欧经济摩擦不断发生，香蕉之战、钢铁之战、转基因食品之争，争执不休。在政治上，欧盟不同意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欧洲坚决反对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主张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欧盟决定成立快速反应部队无疑将削弱北约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美国不愿意看的。

---

①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003 年 2 月，法国、比利时、德国三国第一次在北约内部否决了因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而保护土耳其的“默认程序”，[①]是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强有力的制约。虽然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程要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欧盟要在政治上“以一个声音说话”尚需时日，但欧盟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制约已经成为现实。2003 年 3 月，欧盟内部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问题上就出现明显分歧，致使美国在只有英国等极少数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日本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一直不满意“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现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就制定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力图摆脱被美国控制的阴影，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者，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也多次明确表示，不会接受未来世界是“美国领导下的‘一极’世界”的主张。日本不甘心在地区事务中与美国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因而不断向美国争取平等的伙伴地位是日本的斗争策略。虽然十余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但日本却试图以发展军事来达到其政治大国的目的。尽管如此，日本仍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每年的军费开支近 5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日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军事强国。日本还积极参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2000 年 12 月 25 日，日本内阁出台了 2001—2005 年国防预算，计划出资 2 240 亿美元采购武器装备。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和军事强大的国家，一方面给地区和平与世界安全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也成为在亚太地区牵制美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2. 俄罗斯仍是具有超强军事实力的国家

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并继承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是唯一能够摧毁美国的核大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要恢复苏联时期的大国地位尚需时日。世纪之交，普京接替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走上了复兴之路。2001 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增长率高达 5.6%，是当年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工业基础雄厚，具有极大经济发展潜力。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调整了对外战略，实施全方位的对外战略。普京在 2003 年 5 月 16 日向联邦议会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 2010 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同 2000 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消除贫困。俄罗斯将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跻身经济发达、有影响的世界强国之列。[②] 俄罗斯还提出了明确的追赶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在 21 世纪头 10 年，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7%～10%，再过 15 年，使俄罗斯的 GDP 达到英国或法国现在的水平。俄罗斯主张政治多极化，以政治大国的面貌出现，积极参与国际重大问题的处理。俄罗斯是目前唯一能够在军事上制约美国的国家。1999 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俄罗斯出台了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构

① 所谓“默认程序”，是《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款，属于北约秘书长的特权之一，即如果成员国在设定的最后期限内没有就某个议案提出异议，北约的最高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将视其为默认。

② 参见《俄 GDP 十年内要翻一番》，载《人民日报》，2003-05-17。

想和军事学说，突出了优先发展和运用核遏制力量的重要性，放宽了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和范围。1999 年 10 月，俄罗斯制定的《俄联邦军事学说》指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两种趋向的相互对抗。"2001 年 7 月，俄罗斯与中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认为应以中俄关系为基础、为先例，为建立一个稳定、民主、不对抗、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2004 年 12 月 24 日，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表示，俄罗斯将在核武器技术上、而不是在战略武器的规模上与美国保持同步。"长远来看，俄罗斯不仅要同美国保持'核平等'，而且也要与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保持平等，"伊万诺夫说，"我对此毫无怀疑。"① 俄罗斯强大的常规力量特别是庞大的核武库，是制约"单极世界"的基础。

3. 中国的崛起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政治上，中国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作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积极发展与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推进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2001 年 7 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为本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还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中美日三边学术研讨会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进程。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强有力的推动者。经济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08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4 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达到 25 616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 1.95 万亿美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之一，2008 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923.95 亿美元。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最前列，是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中国还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国家。中国曾在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表明中国已经以负责任的大国融入世界。中国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枝独秀，成为克服危机的重要力量和最大的信心来源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 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比 2000 年翻两番，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获得极大的提高。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具备了在高技术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中国的崛起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

力量对比决定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走势。从政治影响角度分析，美国、欧盟、俄国、中国和日本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从军事角度分析，美国和俄罗斯是超一流的军事强国；

① 《俄国防部长：俄罗斯将与美国保持"核技术平等"》，中国新闻网，2004-12-24。



从经济上分析，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三大经济实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从综合国力角度分析，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种实力对比的基本态势表现为“一超多强”。“一超多强”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仍是多极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对比架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就军事讲，今天的世界是单极，是美国占绝对优势；但就经济而言，则已经是多极化；而就政治而言，早就已经是多极化的世界。[①]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也认为：“当代国际政治不适合上述三种模式（单极、两极、多极）中任何一种，它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系，即一个超级大国与若干大国并存的单极＋多极体系。”[②]单极与多极的较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是以后较长时期内国际政治领域里的主要矛盾。

（三）世界多极化的客观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了两极政治格局的终结，世界政治进入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世界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种力量对比较量的直接结果。目前，世界政治格局转换的过渡期尚未结束，但多极化趋势已经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任何旨在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都不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基本依据如下：

1.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

世界经济是世界政治的基础，世界经济的发展决定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着世界政治格局内部结构的调整与变动。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③]经济全球化把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带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结果，对超级大国以实力和强权推进单极化无疑起到牵制作用。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在当今科技发展与经济实力特别是综合国力竞争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取得全方位的优势。美国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首屈一指，但英、法、德等欧盟国家及日本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仍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国政治地位与国际影响发生变化，在未来多极化进程中有所表现。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产生一系列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必须遵守的国际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具有普遍约束力，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国际规则而一意孤行。经济全球化还加快了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而世界经济多极化必然推动世界政治的多极化。世界经济多极化出现于“冷战”时期，曾对两极制政治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冷战”

---

① 佐佐木优：《伊拉克战后美国力量的前景——五位著名专家的美国政治理想》，载[日]《世界周报》，2003-05-20。

② 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双月刊1999年3～4月，亨廷顿：《正在形成的另一种世界秩序》，载[泰]《曼谷邮报》，2001-01-28。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6～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后这种经济多极化的趋势不仅没有改变，而且通过区域性经济合作进一步向前发展。作为多极经济格局中一极的欧洲联盟，不仅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国际组织在世界经济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其相应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还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要求各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并更多地采取合作与协商的方式，这种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与协商的做法客观上有利于更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展现实力，将有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

2. 多样性文明是构建多极化世界的社会基础

世界各国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存在着多样性和差异性，各民族人民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多样性文明是世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因此不可能只有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道路和一种价值观念，其发展走向不应是单一模式下的单极化世界。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①由超级大国操纵国际事务和少数大国瓜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国际经济政治运行规则应该是多样性文明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并体现多样性世界的包容性。即使认定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亨廷顿也表示：“我所期望的是，为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②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文明的多样性造就了多样性的世界。多样性的世界必然要求适合多样性文明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运行规则和管理机制，从而使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得到尊重和体现。如果“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③ 世界多极化是世界多样性在国际政治中的集中反映，而单极化则是对世界多样性的否定，必将引起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给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危害。多极化的世界能够包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和信仰的国家共处共存，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3. 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多极化进程

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国际上的事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④ 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

---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4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第三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707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④ 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演讲，载《人民日报》，2001-11-06。



小、贫富、强弱，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都拥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都没有干涉他国内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特权。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的基本趋势。世界多极化的实质就是追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世界政治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相辅相成，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首先，世界政治多极化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世界多极化是对两极和单极世界的否定。世界多极化趋势下，世界上存在多个对全球性事务或地区性事务有影响的力量中心，各力量中心之间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更不是相互争夺霸权，而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国际问题的处理更多地采用各国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方式，而不是由个别超级大国或国家集团说了算。而各力量中心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注意争取更多中小国家的支持，照顾到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其次，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基本保证。国际关系民主化是由强权政治的国际关系走向平等协商与合作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建立各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平等协商与合作的有效机制，以实现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由各国合作应对。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建立在国际关系民主原则基础上的，这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平等身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从而为多极化世界的构建创造条件。

4. 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对单极化倾向产生制衡作用

大国关系是影响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国关系的变动必将引起世界政治格局变动。“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分化组合，经历着重大而深刻的调整。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大国关系的调整朝着建立伙伴化方向发展。美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美国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法国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中国与日本共同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美国与俄罗斯也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日本与俄罗斯建立了“和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欧盟与俄罗斯建立了“伙伴关系”。到 1998 年，中、美、俄、日、欧洲等多边间有史以来首次全面达成建立“伙伴关系”的共识，从而确立了大国关系的非敌对性战略定位与基本框架。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不仅体现在双边关系上，而且更多地反映在多边关系上，使大国间伙伴关系纵横交错，网状交织。

大国之间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世界政治力量深刻调整的结果，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江泽民曾从三个方面阐释这种伙伴关系：其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其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其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的，更不是为了谋求霸权。[①] 大国关系重大而又深刻

① 《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载《世界知识》，1997(23)，5 页。

的调整，本身就是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多极化的发展。大国关系的伙伴化，也使得大国之间彼此牵制，相互借重，保持着相对均衡态势。从深层次分析，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目的是弥合因“冷战”后共同敌人消失所导致的独立意识和离心倾向，使其传统的联盟关系得以延续。中、俄、欧建立伙伴关系，是因为它们有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共同主张和决心。美、日建立全球伙伴关系，无疑是美国试图通过日、美安保体制，继续保留它在亚洲的存在，而日本则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地位，实现其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总体来说，这种新型的大国伙伴关系对单极世界具有制衡作用，有利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均衡化和各大国的主体化，是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5.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求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诸多问题也上升到全球层次。贫富两极分化、南北差距扩大、恶性竞争加剧、严重的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疾病蔓延、毒品泛滥等问题，直接影响世界和平及各国的经济发展。这些纷繁复杂问题的解决，由一个超级大国或少数几个强国来完成，显然是不可能的。全球性的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和解决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多极化世界有利于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多种力量在平等互利条件下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协调行动，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① “冷战”结束后，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发生。② 军事等传统安全因素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增添了变数。突如其来的“9·11”事件，给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造成猛烈冲击和深远影响。③ 仅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难以完成国际反恐大计，建立国际反恐联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多边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也促使大国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积极变化，进而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调整产生影响。

联合国为主要代表的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解决和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舞台。联合国不仅在环境问题、难民问题等人类生存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协助各国制定和执行许多经济发展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提供直接经济援助。联合国还在解决地区冲突与维护世界和平，以及核军控和裁军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它曾于1992年通过《禁止化学武器条约》，1995年决定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重要的是，联合国

---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 《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新华网，2000-10-16。

③ 《论9·11事件与国际安全大计》，载《人民日报》，2002-09-11。



的现有运行机制牵制了霸权主义行径。美国1999年绕过联合国悍然轰炸南斯拉夫，2003年又未经联合国授权攻打伊拉克，但是它最后又不得不回到联合国框架内，共同解决善后问题。联合国在成立国际问题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作用的加强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它的发展进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漫长、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出现反复”。[①] 目前，世界虽已形成多种力量中心，但各种力量中心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还很不平衡，相互间的关系还在不断调整之中。“一超多强”的态势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一方面，相对于两极制格局中美苏及其两大集团的两极来说，目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中的“极”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呈现出“一超多强”中的“强”不仅难以对“一超”形成强有力的牵制，而且在某些国际问题上的表现是忍让多于合作。面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压力，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利益已经出现分化态势，在国际舞台上的合力作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建立多极化格局的保障机制尚未形成，世界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过程。绝大多数中小国家都反对建立单极世界。近年来，大国合作已经成为制约“单极世界”的基本力量。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都在为推进世界多极化共同努力。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法、俄、中三大国的频繁接触并协调意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和俄罗斯还发表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单极与多极的力量对比短期内还难以形成一方压倒一方的态势。

第一，新旧格局的交替是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这次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与以往的世界政治格局变动不同，是世界政治和平发展的结果。通过和平方式确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要通过各国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来实现，这取决于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世界虽已形成多种力量中心，但各种力量中心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还很不均匀，相互间的关系还在不断调整之中。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相对稳定局面的形成，尚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整。

第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美国凭借其强大经济力量和无人匹敌的军事优势，极力阻止出现任何可能对其地位构成挑战的世界大国和国家集团，这是对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的极大阻碍。美国政府推行单边主义，推出“新干涉主义”理论、“先发制人”战略等，破坏国家主权原则，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于1999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试图以武力构建单极世界。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单边主义，虽然不可能改变世界多极化的客观趋势，却在干扰多极化发展进程。

第三，国际政治旧秩序仍然阻碍世界政治多极化的重要因素。“冷战”虽已结束，但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冷战思维”、“西方联盟”、黩武主义等故伎重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依然相当猖獗。国际社会围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十分复杂。

---

①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4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张以实力为基础，全盘否定现有国际秩序并建立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目前霸权主义的制约力量尚未整合起来，多极化政治格局的保障机制远未形成，强权政治时有表现。世界多极化将是一个漫长的曲折过程。

三、多极化趋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世界多极化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又是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基本保证。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还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体现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利益。

（一）多极化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国际上的事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① 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1. 世界政治多极化，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世界多极化是对两极制和单极世界的否定。两极制或单极世界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现。超级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超一流的军事优势决定世界事务，争夺世界霸权，其实质是控制与被控制、操纵与被操纵的不平等关系，不能体现民主原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世界政治多极化表现为世界上存在多个对全球性事务或地区性事务有影响的力量中心，多个力量中心之间不是互相对立，更不是互相争夺霸权，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国际问题的处理也多采用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方式，不是由一个国家说了算，也不能由极少数的超级大国或国家集团主宰。各个力量中心为了能在相互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倾听国际社会的意见，更要注意争取更多中小国家的支持，照顾中小国家的利益。世界多极化还将促使中小国家的外交回旋余地增大，中小国家还将通过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或全球性国际组织发挥作用。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力量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少数大国说了算的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各国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机会。世界多极化有力地推动了各主要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贯彻民主原则，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关系逐渐趋向平等、民主。世界多极化趋势已经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它将不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

2.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基本保证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由强权政治的国际关系走向平等协商与合作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基础之上的，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与经济全球

① 《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演讲》，载《人民日报》，2001-11-06。



化进程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一致的。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基本保证。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各个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提供了一个平等协商与合作的有效机制，即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是国际关系民主原则，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国际关系民主化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平等身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有利于多极化世界的构建。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没有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问题就难以处理，世界也难以发展。平等协商与合作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两极制和单极世界违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是不能得逞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否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事务中贯彻民主原则，有利于体现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平衡发展，也成为推进多极化发展的强劲动力。

（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①] 未来世界格局是多极制还是单极制，不取决于某些国家的一相情愿，真正取决于是否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全世界的民心所向。

1. 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世界格局作为一种均势结构而言，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提出过“多极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和“单极稳定论”三种论点。“两极稳定论”不适合于当今世界，“单极稳定论”实际上是为单极格局进行辩护的“霸权稳定论”的翻版。它们认为，霸权国家负有维持世界和平，促进稳定和防止战争的责任，其他国家只需服从霸权国家的领导，便无需为自身的安全担忧。而目前的现实表明，一方面，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单独承担维护全世界和平的实力；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现代民主制衡的原则。如美国国内实现“三权分立”，讲求分权与制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典范，而试图建立单极世界，不受任何制约，实际上又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就连“霸权稳定论”的始作俑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也认为，英国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表明，霸权体系由于受到种种挑战而趋向不稳定。而“多极稳定论”认为，在战争与和平或国际关系稳定性的基础上，由于多极格局具有权力分散性和民主性、结构上的开放性和平衡性、结盟所带来的灵活性以及它可以造就平衡者的角色等优点，特别是在促进和维持国际关系均衡方面具有独到之处，所以它的作用是肯定的，影响是正面的，多极格局对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具有积极价值。

“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

---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全”。[①] 世界多极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上的事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事情，应当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国际社会应当承认和尊重这种世界多样性的现实，求同存异。各国有权自主选择最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如果国际事务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来主宰，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是有害的。单极世界的直接表现形式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稳定的根源。

2. 世界多极化有利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昔日强大对手的制约，仍然以“冷战”时期对抗的思维模式定位自己，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三种类型：在相当程度上追随美国政策的近亲盟国、美国的盟国或准盟国、被美国视为非敌非友的国家和被美国列为敌人的国家。

美国是“冷战”后解决国际问题诉诸战争的次数最多的国家。由于当前世界上存在着对霸权主义的制约力量，致使“美国不得不重新寻求联合国的道义援助和安理会新的决议支持，不得不向大大小小的各种盟友提出多种援助要求，不得不放下超级大国的架子来与法、德、俄等大国改善前一段相当紧张的关系，不得不有所收敛一度极其嚣张的单边主义霸道政治”。[②] 虽然美国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以强权的姿态，废除维持“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军事平衡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撕毁《京都议定书》，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这些举动也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曾激起了全球 60 多个国家、600 多个城市的 1 000 万人的反战大示威，其单边主义被不少国家的民众视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尽管在一些问题上独断专行，但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因而单极图谋不可能阻挡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历史潮流。

3. 多极化趋势下的共同发展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是制约战争的有利因素。1988 年 12 月，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③]“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发展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地区冲突此起彼伏，造成世界的不安宁。多极化发展趋势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时代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责任，解决现已存在的债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南北对话，还必须加强南南合作。2003 年 6 月 1 日，胡锦涛在出席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解决全球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

---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135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② 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4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3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28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键所在。只有实现全球协调、平衡、普遍发展，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起发展本国经济的主要责任。但发展中国家条件差、底子薄，往往难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它们的困难，提供必要的支持，增强它们自我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发达国家要承担应有的义务和责任，进一步开放市场，取消贸易壁垒，切实履行在增加资金和技术援助、减免债务等方面的承诺。"[①]

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反对和根除国际恐怖主义。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犹如恶性膨胀的毒瘤向全球蔓延，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而发展不均衡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是国际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经济根源。打击恐怖主义，仅靠某个国家的单边行动是不可行的，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加强国际反恐合作，集合世界的反恐力量，对国际恐怖主义实行有效打击。同时还必须做到标本兼治，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是彻底铲除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途径。所以，世界全面和平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多极化背景下加强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三）推动多极化发展进程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至少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不能忽视，一是多极化符合世界潮流，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客观趋势；二是多极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我们对多极化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出发点，否则，多极化就是一句空话。

1. 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认识过程

最早提出世界多极萌生的政治家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 年 7 月 6 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讲话中提出未来世界将出现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五大力量中心"。

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 年 4 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第六届特别联大发言中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了全面阐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了当时的世界以美、苏两极为主，多极出现、并存的现实表现，实际上是对世界多极化端倪的一种特殊表述，是对世界格局理论的贡献。

世界多极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实际上是在"冷战"后才出现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 28 字战略方针应对变动的世界，准确地把握了"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势。1991 年 3 月，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年，国际风云骤变，持续了 40 多年的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时期。一年来，美苏关系缓和，军事对抗减弱，世界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1992 年 4 月，江泽民就指出："近年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具有最深远影响的是苏联解体。这是第二次世

① 胡锦涛：《推动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载《人民日报》，2003-06-02。

界大战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它标志着两极格局已经结束，世界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国际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分化和组合已经开始。”[①]1994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再次作出“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明显增强”的判断，同时强调“世界并不安宁，一些地区局势动荡，甚至战乱连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90 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与大国开始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新形势，党和政府更加坚定地相信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1996 年 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提出了“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新的格局日渐明朗”。[②] 1996 年 12 月 2 日，江泽民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发表演讲指出：“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为重要特征的多极化趋势，犹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③] 1997 年 4 月 23 日，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演讲再次指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内，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地在加速发展。”[④]与此同时，中俄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共同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⑤]

1999 年 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轰炸南斯拉夫，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凸现美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图谋仍缺乏强有力的制约，但是多极化依然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1999 年 5 月，江泽民讲话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⑥] 2000 年 12 月 11 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 21 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⑦] “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实施其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发动“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追求世界霸主地位的欲望，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更加曲折。200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但是，单边主义倾向有新的发展，局部冲突不断，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给各国人民带来严

① 江泽民：《在日本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民间组委会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1992-04-08。

②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96-03-19。

③ 《人民日报》，1996-12-03。

④ 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载《人民日报》，1997-04-24。

⑤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单行本，46～4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⑥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15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⑦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18～519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峻的挑战。”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多极化认识进一步理性化，其基本判断就是：单边与多边、单极与多极、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反复的，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将是未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世界发展的基本态势。

中国对世界多极化内涵认识不断深化。中国是唯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当今世界上扮演着特殊角色。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不仅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面旗帜。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多极制格局是世界各个中心力量相互平衡形成的一种均势。所以，提到多极化，人们就认为是现有世界大国追求共同主宰世界的一种要求。这不符合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理念，更不利于团结中小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②中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其内涵不仅应该与传统关系理论所讲的多极化不同，也必须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多极化不同。中国倡导的多极化的核心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应该将它视为一种崭新的追求，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时代的追求，一种谋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多样化的国际关系格局，一幅生动和丰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画面”。③ 未来的多极制格局下，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都拥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都没有干涉他国内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特权。

世界多极化趋势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邓小平曾讲过：“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④1992 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机遇。”⑤“21 世纪头 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⑥从世界政治的发展看，“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力量在大转折、大动荡后开始走向相对的和平稳定。虽然局部冲突、小规模军事对抗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9·11”事件之后，非传统安全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反对恐怖主义成为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合作的基本取向。此时，中国国家利益中的首要利益已经是经济利益。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发展经济成为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使得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将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将更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

---

① 国务院研究室编：《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3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②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50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③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207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36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⑥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单行本，1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中国国情与推进多极化的抉择

对外战略必须与综合国力相一致。正确认识国情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础。中国最大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对内对外战略都不能超越这个阶段。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强调："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①]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与"唱衰中国论"、"中国崩溃论"相继流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杰拉尔德·西格尔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他认为，不管是作为市场、作为强国，还是作为思想的源泉，中国地位都被夸大了。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个掌握了外交表演艺术的二流中等强国(Middle Kingdom，Middle Power)。……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即使不是无足轻重，最多也只是个"小伙伴"，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市场，中国被夸大了；在军事上，中国也是二流军事强国，对西方的挑战，根本不能和苏联相比，而更像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伊拉克；在政治上，中国目前处在意识形态真空状态，当年老式的毛泽东主义还曾经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灯塔，但是中国现在照亮不了任何国家；在国际文化上，中国的影响力也很小……[②]到底中国算不算一极？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③]

经济上，中国属于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的 GDP 名列世界第三，但人均 GDP 却排名在一百名左右。就此而言，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有分量的一极任重而道远，而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特别是中国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 GDP 早已排名世界第二，经济年均增长在大国中名列第一，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09 年中国出口贸易排名世界第一，实现了"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共赢"，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政治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资产。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莫里斯曾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④]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为对外战略的基本宗旨，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10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参见段霞著：《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146 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35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④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力量之一》，新华网，2005-01-01。



国和国家集团结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军事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任何此种行为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性核反击。”[①]中国的核武器数量虽不多，却是世界上除美俄外第三个拥有射程 1.2 万公里的洲际导弹的国家。

中国是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一极世界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中国不具备改变现存国际格局的能力。根据 1998 年美中综合国力测算，如果把美国的综合国力定值为 1，中国相应的则为 0.25。即使中国综合国力的年增长速度为 7%，美国为 3%，中国与美国的绝对差距也要从 15 年开始才能逐渐减少。[②] 中国无疑是具有极大潜力的一极。

3. 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推进多极化发展进程

“多边外交”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所参与的外交行为或活动。[③] 参与多边机制有助于减轻单边主义对我国的战略压力。“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它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美国一些势力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的霸道思维及单边主义，不仅导致国际战略格局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衡，甚至造成大国关系紧张，也使相当大范围的和持续的不安情绪加剧。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布什政府处处以“美国第一”为原则，推行其单边主义政策。美国不顾其欧洲盟国的反对，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试图打破条约对其发展军备的限制，并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而多边机制不仅可以缓解这种紧张，而且可以制约单边主义的蔓延。一般来说，小国或实力较弱的国家在多边外交活动中受到的压力小，活动余地比较大。多边外交的特征就是议程较为明确，讨论的和活动的具有较大的公开性，参与各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毕竟有限，所以应该尽可能多地通过参与多边外交活动，调整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大国的关系，减少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多极化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反对单边主义，阻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形成国际局势中相对制衡的格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④]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中国积极重视支持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利用联合国舞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000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倡议并促成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发表了会晤

---

① 《2000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新华网，2000-10-16。
②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载《国际资料信息》，2000(7)。
③ 楚树龙：《多边外交、范畴、背景及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0)。
④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8-12-19。

文件，表达了五个常任理事国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的决心。联合国的现有运行机制牵制了霸权主义行径。虽然美国 1999 年绕过联合国悍然轰炸主权国家南斯拉夫，以及 2003 年未经联合国授权攻打伊拉克，但是它最后又不得不回到联合国框架内处理善后问题。这说明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现有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还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促进国际合作。中国已经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裁军活动，推动国际裁军进程，多次提出关于裁军和常规裁军提案。1992 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积极支持世界各地区建立无核区的合理建议和主张。2003 年 6 月，中国参加了在吉隆坡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非典型肺炎会议。2005 年 1 月，温家宝总理又出席了在雅加达召开的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中国为受灾国家提供数量可观的援助，充分展示了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形象。美国在海啸灾难发生后，决定单边行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四国“核心集团”(成员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试图主导赈灾行动。不过，由东盟主导的峰会却后来居上，比“核心集团”更快地发挥了作用。这迫使出席峰会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不得不即席宣布，解散集团，回归到联合国框架之下。①

本章小结

“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基本上是围绕着“雅尔塔体系”演进的，并呈现出四个特点：国际行为体数量增加，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对抗，三类国家竞争共存；两大集团既斗争又妥协，既对抗又对话；军备竞赛激烈，形成对抗均势。与此同时，两极格局经历了三个发展演变阶段。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两级格局解体后世界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政治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重要概念

世界政治　世界政治格局　国际行为体　世界多极化　一超多强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国际关系民主化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

① 吴俊刚：《谁说小国无外交？》，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01-12。



2. 试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3. 试分析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4. 为什么说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5. 如何认识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的曲折性?
6. 为什么说推进世界多极化是中国的战略抉择?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世界政治的形成是以(　　)。

A.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　　B. 世界文化的发展为前提的

C. 世界经济的形成为前提的　　D. 世界殖民战争开始为前提的

2.“冷战”正式开始的标志是(　　)。

A. 北约的建立　　B.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C. 乔治·凯南“遏制”理论的提出　　D.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3. 战后导致两极格局形成的基础是(　　)。

A. 维也纳体系　　B.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

C. 凡尔赛—华盛顿秩序　　D. 雅尔塔体系

4.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起因于(　　)。

A. 华约和北约的建立　　B. 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

C. 美国发动的“冷战”攻势　　D. 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

5. 20 世纪 70 年代苏美争霸的态势是(　　)。

A. 苏联采取攻势,美国处于守势　　B. 美、苏互有攻守

C. 美国采取攻势,苏联处于守势　　D. 美、苏关系全面缓和

6.“冷战”后,国际格局发展最基本的特征是(　　)。

A.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加猖獗　　B. 社会主义国家力量遭到很大削弱

C. 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　　D. 总体趋势缓和,但动荡因素很多

7. 两极格局终结的标志是(　　)。

A.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B. 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C. 经济互助委员会终止　　D. 美国实力相对衰落

8. 以下重要事件中直接导致雅尔塔体系瓦解的有(　　)。

A. 苏联全面改革　　B. 两德统一

C. 欧洲联盟建立　　D. 美国提出“超越遏制”战略

9. 国家间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主要基础是（　　）。

A. 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相近

B. 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相同

C. 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

D. 经济相互依赖

10. “冷战”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最基本的特点是（　　）。

A. 社会主义国家力量遭到很大削弱

B. 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

C. 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在日益下降

D.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

11.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经常建立“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　　）。

A. 结盟关系　　B. 军事集团关系

C. 对立关系　　D. 既非对立又非结盟的关系

12. 两极格局终结，世界进入格局转换的新时期，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 新科技革命对世界格局的巨大影响

B. 作为两极格局基础的雅尔塔体系不得人心

C.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发展成为国际主要潮流

D. 世界主要国家实力的消长和力量对比的改变

13. 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是（　　）。

A. 民族分裂主义　　B. 极端主义

C.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D. 新干涉主义

14.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世界政治格局转换的最鲜明特点是（　　）。

A. 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后发生的　　B. 美国战胜苏联的结果

C. 和平条件下苏联一极的崩溃　　D. 多极格局已在旧格局中发育成熟

二、多项选择题

1. 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　　）。

A. 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础

B. 世界经济格局制约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

C. 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充当主角的国家力量的消长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

D. 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取决于各国军事力量的强弱

E. 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2. 雅尔塔体系的形成（　　）。

A. 体现了少数大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宰

B. 打破了世界殖民主义的体系
C. 标志着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开始
D. 奠定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础
E. 改变了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
3. 两极格局的重要特点有(　　)。
A. 政治上表现为两面旗帜的斗争
B. 经济上表现为封锁与反封锁
C. 军事上表现为全面对抗和局部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
D. 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E. 文化上表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
4. 两极格局终结的标志是(　　)。
A. 苏联的解体
B. 美国霸权的衰落
C. 东欧的剧变
D. 德国的统一
E. 华约的解散
5. 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是(　　)。
A. 世界政治在多极化趋势中曲折发展
B. 大国关系进行深刻调整
C.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作用不断加强
D. 国际局势总体缓和、局部动荡
E.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6. 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特点(　　)。
A. 多极格局已经形成
B. 多极化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一种定势
C. 多极化正朝着牵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方向发展
D. 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E. 多极化在全球及地区、在各个领域都有发展
7.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主要表现在(　　)。
A.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B.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不断加强
C. 局部冲突和战争趋向缓和
D. 和平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
E.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占据主导地位
8. 霸权主义的主要表现是(　　)。
A. 自诩本国社会制度最优越,强迫别国接受本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

B. 任意干涉别国内政
C. 凭借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到处侵略和颠覆其他国家
D. 以反倾销为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E. 提出普世价值观

9. 联合国的主要作用表现在（　　）。
A. 推动核军控和裁军　　B.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C. 建立世界政府　　D. 推动非殖民化
E. 解决世界的民族、宗教冲突

10. 20 世纪 90 年代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是（　　）。
A. 大国之间纷纷建立各种伙伴关系　　B. 不对抗
C. 不针对第三国　　D. 首脑外交空前活跃
E. 不结盟

答案：

单项选择：1. C　2. D　3. D　4. C　5. B　6. C　7. A　8. B　9. C　10. B　11. D　12. D　13. C　14. C

多项选择：1. ABC　2. ABE　3. ABCD　4. ACDE　5. ABCDE　6. BCDE　7. ABCD　8. ABC　9. ABD　10. ABCE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把握时代主题的特征；全面理解把握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做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科学判断；正确理解为顺应时代潮流，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方针。

重点与难点

- 时代，是依据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而划分的具有一定特征的历史时期和阶段。
-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科学判断。
- 和平与发展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 为顺应时代潮流，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方针。

时代主题问题是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大问题。关注时代变化、分析时代特征、把握时代主题、顺应时代潮流，是一个国家制定正确的内政外交方针的重要思维出发点。邓小平同志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阐述了关于时代主题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这一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为中国政府进行一系列外交政策调整，提供了国际形势分析方面的重要理论依据。深入理解并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科学观点，是我们正确地认识国际形势、更好地理解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思想基础。

一、时代主题的重大转换

（一）时代和时代主题

1. 时代的内涵

时代，是根据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划分的具有一定特征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人们常常依据不同的考察标准、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时代”这个概念，如根据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不同而划分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根据军事武器和技术的不同而划分的“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热核武器时代”等；根据生产主导经济类型的不同而划分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地分析形势、确定任务、划分营垒、制定战略、拟定政策、规定部署的客观依据和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在关于时代的理论中，有一个“历史时代”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严格的科学规定和既定标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转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这样一个观点：“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时代”，指的是人类历史上的大时代，即按“社会经济形态”所区分的时代。这种“时代”概念，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提出理论、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依据。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共产党人的战略都是以他们对当时历史时代的科学判断为依据的。这样，便有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时代的概念。

一定的历史时代，还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再划分出不同的时代阶段或历史时期，也可以叫做“小时代”。例如，资本主义时代，可以划分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等。这里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其演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列宁对时代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划分过时代，提出过“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等重要概念。

2. 时代主题的内涵

时代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能够反映时代的基本特征、体现世界基本矛盾、显示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并预示时代发展总趋势的时代核心问题，是各国政府制定发展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时代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世界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时代主题也会发生变化。

（二）20 世纪以来时代主题的转换

20 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发生重大转换，由 20 世纪初形成的“战争与革命”主题逐渐转变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和平与发展”主题。

1. 20 世纪前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阶段存在着三大矛盾，即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将导致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以便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争夺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帝国主义战争一旦发生，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引起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普遍兴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指出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内容。

列宁关于时代的论断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特征和社会基本矛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到验证。20 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随之而来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和欧亚一系列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分崩离析。这种战争与革命的因果效应说明了列宁关于时代论断的客观性和正确性，“战争与革命”主题也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政党对世界的基本认识。

2. 20 世纪后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出现

20 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都具有了与 20 世纪前期明显不同的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呈缓解状态，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在全方位的竞争过程中走向协调与合作，军事对抗现象日益减少，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呈现相对稳定状态；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而成为历史，代之而来的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这样，时代特征发生了变化，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逐渐消逝。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科学地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成为新时期我党把握时代主题的理论依据。“和平与发展”很快以党的正式文件的形式被确认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共“十三大”报告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中共“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共“十六大”报告再次确认：“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时代观的转变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使中国的发展进入重大转折时期。

邓小平理论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观点，包含以下基本要点：

第一，和平与发展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不会爆发。发展是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首要任务，是世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我国应当顺应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尽快发展。

第二，和平与发展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尚未解决，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世界的首要课题。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基本动力。

要正确理解上述两点，应避免两种错误认识：一是把时代的主题误认为是时代本身。时代主题，就是时代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和决定时代发展主要趋向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才以“时代主题”的科学阐述，对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的认识加以概括。它表明，和平与发展指的是时代主题而非时代，是当今时代亟须解决的两大问题，是必须高度关注的时代发展趋向。二是误认为和平与发展两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时代主题”即当今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科学定位已经表明，那些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的既存现实，正像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那样：“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综上所述，世界矛盾冲突不断，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3.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原因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两次世界大战使各国人民遭受了惨烈的劫难，使世界各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整个欧洲及西亚、非洲和远东抛进了硝烟和死亡的阴影，15 亿人卷入战争漩涡，3 000 多万人伤亡，无数的财产受损；第二次世界大战，61 个国家和地区参战，17 亿人卷入战争，9 000 多万军人和平民在战争中伤亡，经济损失高达 4 万亿美元。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财富和资源而发动的世界战争，给许多国家经济社会造成极其巨大的破坏。世界各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留下的深



刻教训，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互为敌手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力均衡局面和全球战略部署的受挫，使得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核武器力量的均势，出现足以毁灭对手乃至全人类的“核恐怖均衡”。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发展升级，使得军事大国的全面战争成为足以毁灭人类的行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特别是有势力可以发动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都不敢先动手。于是，现代武器的发展便带来了一种与其研制和生产的直接目的相反的效果：制约战争。此外，在全球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力量的制约下，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难以完成，都不敢发动大战。这样，两个超级大国打不起来，世界大战也就不会爆发。

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程度进一步加深，出现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世界经济中的多层面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绝大多数国家把寻求用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矛盾问题作为处理国家间矛盾和纠纷的首要选择。

第四，战后新科技革命的爆发，使得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国际竞争的重点逐渐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依靠科技经济手段实现强国、富国，增强国际地位，成为众多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全局性的问题，成为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在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下，发展问题关系到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关系到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繁荣，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4.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进入 21 世纪，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在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动辄进行军事威胁和武力干涉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世界上战火频频，依然不太平；在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状况下，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国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影响和平与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传统安全威胁有了新的发展，某些大国依然积极扩军备战，国际军事力量对比失衡加剧，民族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引发的激烈武力冲突旷日持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特别是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成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危害的一大国际公害。

面对这种复杂局势，和平与发展是否还继续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存在？中共“十六大”报告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综合判断国际形势现状和走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今的国际形势呈现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总态势。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作出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是：

第一，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因为如此，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各国人民针对某些强权力量发动的战争、

乃至针对本国统治者的战争行为所发动的反战浪潮规模越来越大，针对恐怖主义袭击所发动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日益不得人心。

第二，世界多极化的新发展，使各种国际力量不断分化组合，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军事集团对抗局面消失，使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之间逐渐形成制约关系。世界走向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当前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集中力量增强综合国力，把握时代机遇加快发展步伐，依然是各大国的政策取向。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依赖更加明显，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机遇，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条件，也使得世界各国更加明确认识到必须携手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平等、互惠、共存、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第四，维护世界和平的主体力量依然在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图强，共同抵御大国主宰世界的图谋和行动，积极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主宰世界、任意摆布别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时代主题的主要内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问题已得到解决。国际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的任务依然很艰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过 120 多次较大的战争，死亡人数约 1 200 万。近年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世界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

（一）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和平与发展互为条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要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

1. 世界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前提条件

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因为发展必须有和平环境，各类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的艰巨任务，没有和平作为前提是无法完成的。霸权主义的军备竞赛、地区争夺、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消耗的巨大财富，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从反面也证明了这一点。

2. 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

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因为发展可以密切各国间的联系，缩小各国经济差距，削弱超级大国的垄断地位，制约超级大国争夺霸权和世界战争的爆发。相反，贫穷落后往往引起社会动

荡，成为诱发战争的因素。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强大，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

3. 在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中，发展问题占有更重要地位，是核心问题

当今世界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南北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南北矛盾的加剧会危及世界稳定。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只要世界上3/4的人口不摆脱贫困，就不可能有持久稳定的和平，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因此，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二）影响世界和平的消极因素

世界和平问题，指的是维护当今世界的总体和平局面，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维护局部的和平，减少或消除影响局部和平的各种消极因素，从而为消除世界大战的隐患、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创造条件。

影响世界和平的消极因素主要是：

1.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破坏世界和平、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

“霸权主义”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原意是指个别大的城邦对其他较小城邦的支配和控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霸权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霸权主义特指一些强国凭借军事实力及其他实力蹂躏别国主权，对别国进行干涉、控制，甚至统治，力图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称王称霸。强权政治，指的是有些国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崇尚实力、迷信强权，在国家利益上追求超越合法主权利益的强权利益。强权政治是霸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把强权政治应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是霸权主义。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事实说明，霸权主义是世界动乱的根源。两次世界大战后超级大国和某些地区强国发动的大大小小的侵略战争和武力干涉都是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

“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表现，依然是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根源。某些国家大肆鼓吹“新干涉主义”，妄图建立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世界，竭力推行单边主义，四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化、局势紧张。

2. 军备竞赛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

军备，是国防的主体。军备建设，是主权国家国防建设的基本内容。但是，军备建设并不等于军备竞赛，二者不是相同的概念。所谓军备竞赛，一般是指奉行对外进攻性军事战略的国家之间，为完成整体战略部署，相互针对自己的“敌手”或“潜在敌手”而进行的针对对方的军备水平，力求在军备水平上超过对方，以谋求在相互间战争中获得武力优势的扩军备战行动。这种互为敌手、互为目标的军备建设，表现为力图超越对方，从而使武力不断升级的“竞赛”。军备竞赛是一种恶性循环，武力的不断升级，不会使进行军备竞赛的国家安全感上升，恰恰相反，它导致的是进行军备竞赛的国家的受威胁感升高，造成对国家间的和平、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一旦军备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或者因某些特殊原因一方先发制人地发

动战争,则和平无法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40 多年当中,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进行着无止境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两国所存积的核武器合起来,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火力的一万倍。在很长时间内,地区性的军备竞赛也一浪高过一浪,一些国家、国家集团的敌对性不断升高,造成地区局势的严重动荡。军备竞赛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同时也是传统的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思维的产物。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苗头,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世界各国军费投入一路攀升,2000 年以后,主要军事大国军费迅速增长,有的军费开支已经超过“冷战”时的最高经费额度。美国 2004 年国防预算总额高达 4 880 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2005 年比上年增长 3.4%。俄罗斯联邦 2005 年度国防预算比上年增加 27.6%,达 179 亿美元。日本 1991 年至 1995 年防务预算高达 1 720 亿美元,年增长率达 3%,并大量进口高技术武器,使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武器进口国。日本防卫厅提交的总额 450 亿美元的 2005 财年国防预算申请,比 2004 财年增长 1.2%,这是日本国防预算自 1997 年以来的最高幅度增长。

更令人担忧的是,太空军备竞赛已成为军备竞赛的热点。美国企图打造“太空帝国”,成为一手遮天的“太空霸主”。目前,美国正在启动新的太空军事计划,计划将全球定位卫星系统都部署在太空中,组成一支规模庞大的“太空舰队”,用于破坏和攻击敌对国家的卫星。俄罗斯已经组建了独立的航天部队,法国、日本、印度、以色列等国也纷纷加快空间技术的发展步伐。印度计划未来 4 年将飞船送入太空。导弹防御系统初具雏形,美国总统布什 2001 年宣布的美国国家反导系统计划规定,美国将系统研制各种反弹道导弹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天基武器系统,目前导弹防御系统初具雏形。日本、英国等一些国家也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宣布将发展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

核军备势头难以遏制,美国要“对现有核力量进行改进、升级”,“发展下一代核武器”。俄罗斯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明确宣布保留实施“先发制人”核突击的权利。俄罗斯正在开发小型、快速、准确和高机动的核武器。这种新型战略导弹却能在 8 马赫的高速飞行中实现在外层空间和同温层之间的“胡跑乱窜”,这将是战略导弹发展史上的“革命性的变革”。美国和俄罗斯两个核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已被其他国家效仿。一些地区性大国也在大力发展核武器或核武器技术。新型智能武器迅猛发展,常规武器智能化已成为军备竞赛的一个新特点,也是武器研制的制高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量新概念武器会不断出现和应用于战争。这些新概念武器具有完全不同的杀伤和破坏机理,它不以大规模杀伤对方人员的生命为目标,而是通过使对方的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丧失作战功能,或通过改变敌国的生态和自然环境来达成战争目的。军事发达国家向热点地区的武器倾销急剧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正重点开发隐形飞机、空间系统、精密传感器、精确制导武器等先进技术武器。

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武器交易总额有所下降,但由于战争热点地区对武器的客观需求,以及西方国家通过向热点地区不同力量销售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影响该地区的力量对

比，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自身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一方面，一些大国在发展尖端武器装备的同时，将淘汰下来的陈旧武器装备向热点和其他一些地区大量倾销。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向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第三世界国家从国外采购的军火70％以上来自美国，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50场地区冲突中，美国向其中的45场冲突的交战一方或双方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国、俄罗斯和一些西欧国家为了在减少国内武器采购和削减本国军备的同时，维持现有军工企业运转并从出口武器中谋利，大力支持本国的军火工业扩大已有的国际武器市场和寻求新的国际市场。美国1990年武器出口为185亿美元，1991年猛增到600亿美元。俄罗斯也重返军火市场。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向战争热点地区倾销大批的先进武器，有可能打破热点地区力量的平衡，引起新的军备竞赛，造成该地区的紧张形势。

3．传统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是引发国家间武装冲突、局部战争、影响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局部性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边界争端、领土争议、利益冲突大量发生，构成一种特殊的难以“痊愈”的“冲突综合征”。这种战乱、紧张和动荡，虽然是局部的，但始终如杂草丛生，呈纷乱之势，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4．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成为不可掉以轻心的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当今世界安全面临“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状况的总体判断。传统安全威胁，是指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和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也包括伴随国家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资源纠纷、意识形态的对立等因素。按照威胁程度的大小，传统安全威胁可以分为军备竞赛、军事威慑和战争三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区别于人类社会出现的新安全威胁，人们开始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遇到的安全威胁，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信息安全、疾病蔓延、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等新安全问题，都属于非传统安全威胁范畴。非传统安全问题有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和动态性等四个主要特性。当前，最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各种恐怖主义事件，它们严重威胁全人类的安全，已成为一大国际公害。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积累，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控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最终走向以传统军事手段解决的道路。

（三）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

发展问题，指的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物质文化繁荣。当前，世界的发展问

题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1. 南北问题更加突出,南方国家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南北之间的差距已由贫富差距扩大为包括数字鸿沟在内的多种差距。富的国家越来越富,穷的国家越来越穷。据有关资料介绍,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贸易量、私人储蓄的80%以上集中在最富裕的1/5人口中。发达国家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往往是绝对失业,失业的人数以亿计,并正在向10亿计发展,每3个人当中就有1个失业。发达国家,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广泛应用,家庭电脑已广泛普及,但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还不知电脑为何物。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报告,2001年,29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净流出达到30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02年度最不发达国家报告》说,全球最贫穷的49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状况继续恶化,每天生活费用不到1美元的人数达3.07亿人,到2015年会增加到4.2亿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与最贫穷国家收入之间的差距在1920年是35∶1;1975年是45∶1;1992年是75∶1;2001年是100∶1。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世界上约有1/4的人口缺乏足够的食品,约有10亿人挨饿,约有15亿人缺医少药,约有13亿人没有清洁的饮水。这些人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约有1/3的人生活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

2.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已成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突出课题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改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发展。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世界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造成一种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并将更进一步地加深这种联系。日益明显地改变传统的国家关系,对世界各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使一些国家、各地区经济运行的风险增大,使世界上的社会分化加剧,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对此,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更加重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3. 环境和生态成为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制约条件

由于长期过度的索取,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已经严重不足,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世界森林面积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每年平均减少940万公顷。中国、蒙古等国的沙尘暴一次次敲响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警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

4. 科学技术成为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和制高点

如何引领、适应科技发展的潮流,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发展课题,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前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中,科学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物质科学的研究,生物工程技术、信息



技术、宇宙科学、地球科学等的发展，科技知识空前快速地生产、传播和转化，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愈益紧密。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正在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特征。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

（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途径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二者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将是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它需要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和全新的视角，寻求一种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思路与途径。

1. 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注重解决南北问题

南北问题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更反映了二者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因此，研究和平与发展问题，就要研究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有效途径，这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的需要。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空前的机遇，但是其“双刃剑”效应在世界贫富分化问题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为此，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有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改善南北关系，并针对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均等现象，提出实现南北国家“共赢和共存”的主张，促使全球化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2. 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

世界多极化是对单极世界的否定，世界上存在多个对全球性事务和地区性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中心，有利于对大国霸权图谋的遏制，在国际事务中更能够体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国家的利益，体现民主原则，因而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与稳定，这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倡导建立多极化的重要原因。多极化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客观进程，是必然趋势，但是在推进多极格局的有效机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对霸权主义的制约力量有时还显得比较脆弱，多极化进程还会出现某种反复。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推进世界多极化也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取向。

3.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向以独立自主、平等参与和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民主型国际关系转化的过程。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贯彻民主原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民主化与体现和平、平等精神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关系向民主化的迈进，有利于最终结束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促进联合国作用的加强和地位的

改善;而联合国作用的加强则有利于维护各主权国家的权益,使广大中小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更多的体现。由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否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否定国际政治中以实力确定权利的不平等关系,因而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平衡发展。

4. 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

世界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发展道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多样性既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进步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要求各国遵循一种发展模式和一种价值观、融入统一的社会制度和文明之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各种文明各有所长和特色,无优劣等级之分,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相互沟通和借鉴。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文明间的关系,对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5. 树立追求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

传统思维模式下的安全理论和安全途径已不适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促进各国的共同安全,中国政府以新的视角审视安全问题,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安全理论,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互利、共赢,各国以相互平等的地位,通过合作安全实现普遍安全。合作安全是"冷战"后出现的新的安全模式,它是以追求共同安全利益为目标,寻求确立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安全机制。

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一)国际旧秩序及其特征和实质

1. 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以国际政治格局为基础的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行为规范、原则及相应机制的总体框架。国际秩序主要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和制约,一定历史时期的国际秩序是以该时期的国际格局为基础的。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动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冲击,引发重建国际秩序的斗争。

国际秩序的建立和更迭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从近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已建立过三次国际秩序。

第一次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618—1648 年欧洲 30 年战争后,交战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各国实力,确定其势力范围和政治地位,并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缔约国协议承诺一致对付违反协议者,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和实施集体制裁的新秩序。

第二次是维也纳秩序。1815 年,欧洲国家通过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均势格局,确立了所谓"正统主义"原则和大国协调制度,被推翻的欧洲各国封建王朝统治

秩序重新确立。

第三次是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需要重新调整关系和分配权力，于是在召开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建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帝国主义强权为特征的“新秩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强权政治构建秩序，欧洲战胜国的利益得到充分考虑，达成的一系列条约具有苛刻性和掠夺性，无视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在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下，国际力量对比态势有两点与以往明显不同：一是美国和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近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欧洲列强争霸天下的局面，被欧、美、亚列强争霸所取代；二是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尽管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很稚弱、帝国主义力量居主导地位，但毕竟在国际关系中注入了新的力量因素。

2. 国际旧秩序

不同历史时期建立的国际秩序都曾对国际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与“国际新秩序”相对应的所谓“国际旧秩序”，一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格局，争霸世界几百年的欧洲列强在战争中受到极大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代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力量的英、美、苏三国领导人聚会雅尔塔，协调盟国最后战胜法西斯的步骤，并对战后世界做出新的安排。会议期间，三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同时就建立和维护战后秩序达成协议，建立起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约 60 年的历程。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国际秩序也在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国际政治秩序，以西方为主导的现象依旧，不平等的国际运行规则继续作用于各个领域，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没有改变。因此，我们称其为国际旧秩序。

（1）国际经济旧秩序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确立的。其主要内容和特征包括：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经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和货币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及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构成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大国欲支配世界的经济基础和有力工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长期拥有全部表决权的 20% 以上；在世界银行，美国占特别提款权的 25%，具有最大的表决权；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减让强调的是“互利”，而实际上受益最多的是发达国家。

（2）国际政治旧秩序

国际政治旧秩序从本质上讲是旧殖民体系的产物，但是它没有随着旧殖民体系的崩溃而消亡，也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退出舞台。“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霸权及形成的相应国际运行机制构成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国际秩

序的基本特征是：大国推行强权政治、支配国际事务、插手地区事务、干涉他国内政。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组建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划分势力范围、组织“大家庭”和联盟体系，确立国与国之间的领导、支配与服从、顺从的不平等关系，并形成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使超级大国的霸权欲望空前膨胀。因此，国际政治秩序不仅继续以强权政治为特征，表现为超级大国追求霸权、热衷干涉，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哲学，而且表现为超级大国奉行单边主义，无视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地位，破坏国际法准则，甚至凭借军事实力扩展势力范围，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

国际旧秩序显然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经济上，在国际分工、贸易往来和资金分配中存在明显的国际剥削现象，南北经济关系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更加悬殊；政治上，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以大压小；恃强凌弱，广大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有限，声音弱小；军事上，大国干涉主义加剧地区冲突，助长了军备竞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文化上，西方国家强行将其价值观念和文化向外扩展渗透，侵扰他国利益，危害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总之，国际旧秩序的本质特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质是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实质是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由于国际旧秩序是在两极格局对峙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雅尔塔格局的彻底崩溃，欧洲政治版图的剧变，国际旧秩序已不能适应国际格局转换时期的巨大变化。因此，改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迫切要求。

（二）世界主要力量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冷战”结束后，建立国际新秩序已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以什么为准则、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上，世界各主要力量的认识、倾向、着眼点是不同的，因此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有很大差异，南方和北方国家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相当激烈。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由一国或少数国家集团主宰世界，还是各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各国的发展模式是多样化还是只能“西化”；是坚持主权高于一切、不可侵犯，还是主张“主权有限”；是实现共同发展，还是把自己的繁荣建立在别人的贫穷之上。

1. 美国的主张

美国力求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两极格局的解体和美国超强地位的保持使它认为全面实践其主张的时机已经到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于 1990 年明确提出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宣称美国要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没有谁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克林顿政府继续重申这一立场。其中心思想是：在当今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运



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巩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从实力出发，承担对世界的领导责任，按照美国的设想构筑国际新秩序。而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以反恐划线确定敌友的做法，是对建立美国构想的世界新秩序的具体实践。与此同时，美国思想界、理论界为适应美国的政治需要，相继出台“相互依存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新帝国主义论”等学说，为美国主张的国际新秩序提供理论依据。

美国关于新秩序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发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为此，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起“带头作用”，在西方世界起“核心作用”，对盟国安全起“保护作用”。第二，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大力推进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全球化进程。第三，加强同西方盟国的合作，利用联盟关系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继续影响盟国的对外政策，使其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扩展计划，同时要让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使美国在财力、物力和国际舆论上不陷入被动。第四，组建新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安全体系，消除危及美国利益的各种威胁，有效借助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推进北约东扩、深化美、日军事合作、组建国际反恐联盟等，都是其构想与政策的具体体现。

2．日本的主张

日本主张建立以美、欧、日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它希望抓住世界格局转换的历史机遇，彻底改变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与其经济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政治角色，加快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成为在未来新秩序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力量。日本主张在多极化世界中体现日本的地位和作用。日本政府认为：第一，西方大国应当是建立新秩序的共同力量，要建立以美、欧、日对话与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日本应当作为支撑国际秩序的一极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要为建立“冷战”后国际新秩序发挥创造性作用。日本迫切希望实现国际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彻底摆脱战败国的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大国的决策地位。第三，鉴于本国的经济走势和政治影响力，首先把构筑新秩序的着力点放在亚太地区，谋求取得亚太新秩序的主导权。

3．西欧发达国家的主张

西欧发达国家在建立新秩序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各国都主张建立一个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多极体系下的国际新秩序。它们反对一国领导世界，要求在国际新秩序中分担领导责任。这些国家强调，欧洲不仅在世界经济领域中要发挥中心力量的作用，而且要成为世界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它们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建立新秩序中的作用。

西方大国之间关于建立新秩序的主张也存在明显分歧。各国都力争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占据与其实力相称的位置。美国企图建立由它领导的国际新秩序，以美国独霸天下的单极世界政治体制取代昔日以两极对峙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德、日不甘受制于人，都想依仗经济实力确立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成为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极；英、法等国则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大国作用。其中，日、欧国家的主张，有其共同之

处，这就是防止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主张建立由大国相互制约、合作主宰的世界格局，在美、欧、日共同主导下确立国际新秩序。西方国家的构想不尽相同，然而有一点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将多样化的世界“规范化”，建立西方化的国际新秩序，以体现西方国家的最大利益。

4. 俄罗斯的主张

俄罗斯明确表示致力于建立民主的多极化国际新秩序。在力求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中，它反对一国独霸世界，认为尽管美国在当今世界占有明显优势，但是建立单极世界的安全体系是不可能的，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003 年 5 月，普京在与胡锦涛主席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两国主张“应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建立多极、公正和民主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指出，实际上建立多极化国际新秩序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9·11”事件表明，美国无法单独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所以，建立民主的多极化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将在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5. 发展中国家的主张

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有着改变国际旧秩序的迫切愿望。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便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决议和宣言，确定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60 年代，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但是国际旧秩序严重阻碍着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1964 年“77 国集团”发表联合宣言，指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为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表达了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国际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愿望。1973 年，第 4 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这一概念。次年 4 月，联合国第 6 届特别会议在“77 国集团”的推动下，专门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由此形成了指导发展中国家联合行动、为建立新秩序而共同斗争的纲领。两极格局结束后，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在第 46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它们表示，建立新秩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责任，而是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等各国的责任。应当在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而不是依据大国主宰世界的实力地位建立国际新秩序。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第二，改变世界经济中的生产、消费和贸易格局，保证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的控制，并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活动；第三，主张加强南南合作，特别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积极参与南北合作，促使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第四，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使发展中国家能更充分、更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第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和在联合国的发言权。

6.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中国一贯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体现了对各国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的尊重；对各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及模式的尊重；对世界多样性的尊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具有针对性强、适用性强、影响力强、生命力强的显著特点。邓小平早在联合国第 6 届特别大会上，就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立场和主张作了阐释。20 世纪 80 年代末，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多次阐明对局势的看法，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他同来访的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在谈话中讲到，过去的国际政治是霸权主义，是集团政治。集团政治本身就不平等。经得起考验、能够维持和平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反复阐明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立场。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时发表讲话，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明确提出五点主张：第一，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第二，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第三，建立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第四，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第五，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1999 年 3 月，江泽民指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应当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

2002 年 5 月，江泽民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 35 届年会上具体阐述了中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政策主张：努力建立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贸易体制，鼓励各种经济要素合理有序流动，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平等发展的权利；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加强国际开发机构的资源转移职能，促进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合理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合理分享。

党的“十六大”报告针对 21 世纪国际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认识，第一次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四个方面全面而完整地提出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观点和立场，阐明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和指导原则，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进步与发展，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赏和支持。

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基于对世界形势变化趋势的战略分析，基于对当今时代主题内涵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理念，并把它作为21世纪新阶段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方针。

1. “和谐世界”新理念的提出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

2005年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讲话，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和谐世界”理念正式向国际社会全面表述，中国向世界传递了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信念。

2006年6月15日，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把本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

2006年6月17日，胡锦涛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所有亚洲国家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

2006年8月21—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被正式确立为21世纪新阶段我国外事工作的大政方针。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外事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6年11月4日，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中国和非洲国家携手并肩、昂首阔步，为实现中非发展，为造福中非人民，共同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6年11月18日，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题为《推动共同发展 谋求和谐共赢》的讲话，提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太大家庭”。

2007 年 6 月 8 日，胡锦涛出席在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一道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宣告：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 “和谐世界”新理念的基本内涵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胡锦涛 2005 年 9 月 15 日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所作《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了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构想。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安全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平等协调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决；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文明对话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3. 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1）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

中国主张，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加强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中国认为，经济全球化应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者愈

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要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和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充足、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环境。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努力普及全民教育,实现男女平等,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发达国家应该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广泛开展南南合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国将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中国认为,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要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4)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

中国认为,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权威必须得到切实维护。

中国主张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联合国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增进广大会员国团结。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通过改革安理会,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改革涉及各国利益,应该充分协商,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5)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2008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讲话。胡锦涛强调,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



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均衡性，就是要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胡锦涛表示，中国主张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2009 年 4 月 2 日，胡锦涛在伦敦举行的 20 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讲话时，提出进一步坚定信心、进一步加强合作、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反对保护主义、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五点主张。讲话特别提出，应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扎扎实实推进改革，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创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本章小结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世界和平是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重要概念

时代观　时代主题　和平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思考题

1. 怎样理解时代主题的内涵？
2. 为什么说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3. 如何理解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4. 如何认识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5. 为什么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6. 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的异同和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7. 如何理解我国关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当今世界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　　）。

A.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B. 维护联合国的中心地位

C. 建立国际新秩序　　D. 和平与发展

2. 国际旧秩序的主要特征是（　　）。

A. 强权政治，霸权主义　　B. 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

C. 穷国越来越穷，富国愈来愈富　　D.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统治地位

E. 对话与合作

3.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是（　　）。

A. 独立自主原则　　B.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D. 所有国家一律平等

E. 联合国的积极作用

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局部战争主要发生在（　　）。

A. 欧洲　　B.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C.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D. 亚、非、拉地区

5.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性文献之一（　　）。

A.《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　　B.《世界第三理论》绿皮书

C.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D. 不结盟理论

6. 当今,南北关系的实质是(　　)。
A. 和平问题　　B. 发展问题　　C. 战争问题　　D. 革命问题
E. 生态问题

二、多项选择题

1. 两大主题提出的科学依据是(　　)。
A. 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
B. 引发战争的因素在减少
C. 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问题
D. 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E. 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
2. 谋求世界共同发展的途径主要有(　　)。
A. 推动南北对话,改善南北关系
B. 加强南南合作
C. 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D.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E.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国际经济旧秩序主要体现在(　　)。
A. 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
B. 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
C. 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D.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协调机制
E. 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限制石油产量而导致石油价格上升
4. 当前建立国际新秩序应当强调(　　)。
A.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
B.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C. 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D. 树立新安全观
E. 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体制
F.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5. 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因为(　　)。
A. 它是一个既简明又比较完整的体系,有很强的科学性
B. 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
C. 多极化的趋势和多样化的世界决定了国际新秩序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D. 它已经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可
E. 它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

答案：

单项选择：1. D　2. A　3. B　4. D　5. A　6. B
多项选择：1. ABCD　2. ABC　3. ABCD　4. AEF　5. ABCDE

第四章

CHAPTER FOUR

全球性问题与新安全观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二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而滋生的全球性问题，以及由全球性问题而引发的人们关于安全问题的重新思考，把握非传统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的异同，重点把握中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

重点与难点

全球问题冲击下安全观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两极格局终结以来，随着时代的历史性变迁，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猖獗、毒品泛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艾滋病的蔓延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冲击下，人们的安全观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中国在探索有效治理全球性问题途径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安全问题，调整安全观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安全观。

一、文明的演进与全球性问题

任何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因此，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新事物、处理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具有重大意义。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出现，现已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问题与时代的历史性变迁密切相关，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文明的演进

二战以后，人类社会文明正在经历着重大变化，归结起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大规模的、十分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历史上的全球化始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时期，它是与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质是西方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和阶级中心论。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全球化所追求的目标与价值是反全球、反人类的。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人类社会兴起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当代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地域和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代全球化承认超民族、超国家的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在审视和处理问题时开始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全球化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全球化加强了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国在政治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为解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提供了某种政治机制与可供选择的途径；促进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培育着更为博大、理性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就负面影响而言，全球化首先导致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使主权国家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的主权都被不同程度的削弱；全球化在一定时期还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与矛盾，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全球化使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加深，这增强了各国发展的脆弱性，一国发生危机往往很容易波及他国甚至整个世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动荡就是例证；全球化还孕育和催生了全球问题，使全球问题相互纠结、异常复杂，给各国的发展带来挑战。

其次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知识社会，社会生活的信息化与知识化预示着新时代的来



临。信息化为人类交往活动提供了新的手段。人们可在互联网上交谈、漫游、搜集信息资料、参与经济管理活动等,信息化使整个地球已经变成一个便于人们沟通与交往的村落。所谓"全球一村"、"地球村"等提法正是世界被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写照。知识化则赋予知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展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诱人前景。正如美国系统哲学家 E. 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所说:"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权威之类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含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信占优势为标志。"[①]也就是说,信息化与知识化提供了人类大变革的物质与技术前提,它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球问题的出现既与信息化、知识化带来的物质技术的进步有关,也与人类对以往社会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的错误认识有关。

再次,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文明转型。文明转型是人类社会转型中层次最高、时间跨度最大的转型,它是人类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类已经历过两次大的文明转型:即从原始文明转向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再转向工业文明,而现在我们正在从工业文明转向新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它把人类社会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状态,但工业文明又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这些弊端主要有:工业文明中的现代化发展观把经济的基础作用与经济至上、经济第一相混同,坚持片面的、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观,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经济主义;快速的经济增长又同片面地追求物质享受相联系,而忽视了人的精神追求,导致人的异化;现代化发展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征服、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并引发了资源与环境危机。这些弊端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已无法超越,而它们又威胁到既有的文明成果和人类的发展,所以文明的转型势在必行。

由人类社会的发展危机所引发的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人类社会正面临的第三次文明转型,成为全球问题得以提出并日益受到关注的文化底色。20 世纪出现的诸多思潮,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生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它们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反省工业文明,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更是鲜明地树起挑战现代主义的大旗,成为推动文明转型不可忽视的力量。至于当代人类社会将转向何种文明,过去曾有"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信息文明"和"知识社会"等提法,而可持续发展也许是更好的概括,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文明转型的本质,即从不可持续转向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它包括生态的可持续、实践的可持续以及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等。当前,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概念的认同还是在实践的推进上都取得很大进展,成为人类的共同选择。

---

① 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6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二）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

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诸如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信仰危机等。这些全球性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和挑战性等特征。

全球性问题是时代的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信息化、知识化是全球性问题的物质技术前提，而人类文明的第三次转型则是全球问题的文化底蕴。当今时代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大都缘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涉及各个领域，主要有战争与和平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毒品、艾滋病、道德失落、全球性金融危机等。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在当今世界尤为突出，它们暴露出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间的紧张关系。

1.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但真正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大规模破坏则是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之后。数百年来，人们忽视生态环境问题，直到“冷战”结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陷于重大危机之中，已构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威胁。

（1）全球呈变暖趋势。现代工业和交通的发展，需要大量燃烧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这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氮等温室气体增多，从而导致地表气温升高，产生“温室效应”。据预测，人类若不及时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在不久的将来，全球气温可能上升 2℃～5℃，而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温度变化和雨量变化，也可以使气候带分别向两极移动数百公里，从而对陆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2）保护生命的臭氧层正在遭到破坏。臭氧是氧的三原子同素异形体，主要存在于地球上方 25～40 公里间的大气同温层。同温层臭氧相当于一个自然过滤器，它能够吸收和阻拦对生命有害的太阳短波紫外线辐射。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由于空气中的氯化物急剧增多，臭氧层随之受到破坏。破坏臭氧层的氯化物主要来源于空调设备的制冷剂、喷雾剂的气溶胶和塑料产品的发泡剂等。臭氧层的破坏，将使地球表面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增强，从而对地球上的生物造成极大的伤害。

（3）森林资源被过度利用。在公元前 7000 年，地球上几乎 2/3 的陆地覆盖着森林，而现存的森林还不到陆地面积的 1/3。据统计，全世界的森林现在正以每年 1 700 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其中大都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温湿地带，而位于这些地带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森林的骤减不仅将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和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而且也使大量的物种濒临灭绝。

（4）土地退化、沙漠化现象严重。由于自然力的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土地大面



积退化和沙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据统计，二战后，全世界约有 12 亿公顷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而联合国在 20 世纪 70～90 年代三次对全球沙漠化形势的评估结果表明：沙漠正在向人类逼近。目前，全球约有 36 亿公顷的干旱土地受到沙漠化的直接危害，占全球干旱土地的 70％。而受沙漠化威胁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的直接结果是粮食的供给不足和饥民的增多。

（5）淡水资源匮乏。据统计，现在世界上有几亿人得不到安全饮用水，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有 5 000 万儿童死于受污染的饮用水。水质的污染大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大量的工业废物倒入江河海洋，农田流失的肥料和农药进入河流湖泊，地面上倾倒的有毒废料渗入地下水或地表水等，这些都严重污染着人类有限的淡水资源，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

（6）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生物的多样性是指物种、遗传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它是种内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生物学复合体系。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产生、进化和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拥有的不可复得的自然遗产。但由于人为因素，地球上的物种日益减少。据统计，目前世界平均每天有 100 多个物种消失。照此速度，在今后几十年中，地球上将有约 100 万个物种濒于灭绝，这将进一步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

由上可见，生态环境问题发展到今天，已不再是小范围和局部性问题，而是带有全球性的问题了，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构成现实威胁。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挑战，人们开始从新的理论高度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环境问题开始作为“安全”的范畴出现。目前，“环境安全”这一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主要是由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决定的。

首先，环境安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在环境问题中，有些问题如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等，可对整个人类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这是因为大气层和臭氧层构成人类活动所依赖的自然支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而这一环节一旦被破坏，其影响不可能局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是全球性的。

其次，环境问题可能引发国际争端，甚至导致战争。二战结束后，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国际争端屡见不鲜，如美国的工业烟尘飘到加拿大，曾造成加拿大境内上空酸雨浓度增加，这使两国间产生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法律诉讼。而海湾战争的根本动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

最后，环境恶化常常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二战后，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后果的直接承受者，这直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进而也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非洲一些国家的骚乱大都是与恶劣的环境以及贫穷落后搅在一起的。

为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世界各国不断加强环保领域的合作。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1972 年 6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呼吁各国都来重视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而“环境外交”的积极开展则是“冷战”结束后出现

的一种国际新现象。“冷战”后，人们的目光已开始从单纯治理工业污染等小范围的问题，转向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性的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并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一是世界性的环保机构和国际会议越来越多。早在1972年联合国成立环境规划署的时候，全球只有美国、日本和瑞典等少数发达国家设有环保机构，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设有环保机构。此外，一些世界性的环保组织也相继出现，并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有关环保问题的国际会议不断增多。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召开了第二次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是有史以来在解决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方面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和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国际盛会。中国派代表团出席了这次盛会。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协调立场和行动，并先后召开了数次环保会议，这不仅维护了自身利益，而且也为国际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

二是环保产业成效显著。环保产业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大气污染的综合治理、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垃圾的回收利用等一切有利于清洁环境的技术和产品。在环保领域，美、英等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当然，人类目前所付出的努力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相比还很不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治理环境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突出矛盾，这有待于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协调，以便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

三是环境立法纷纷出台。“冷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逐步加强了环境立法，相继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在国际上具有环境法性质的文件也纷纷出台，这些文件包括国际组织决议、政府间宣言、地区和全球公约等，就其内容来看，这些文件涉及环境问题的方方面面，这为各国做好环保工作以及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2. 不宣而战的特殊战争——恐怖主义

除环境问题外，恐怖主义问题也较为突出。“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非传统安全因素开始取代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中，恐怖主义尤其值得人们关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爆炸事件已使人们感到恐怖主义正像幽灵一样在地球上游荡，有些恐怖事件所造成的恶果甚至不亚于一场低烈度战争。

恐怖主义是指为达到一定目的，采用暗杀、绑架、劫机、制造爆炸事件等极端手段进行破坏、报复和讹诈，以造成社会恐怖的犯罪行为的总称。恐怖主义行动往往带有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目的，其对社会和民众的心理影响要远远大于恐怖事件对受害者的伤害。一般来说，恐怖主义者的目标是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或制造有影响的恶性事件，但受伤害最大的往往是无辜平民。近年来，恐怖主义行动已具有媒体效应，恐怖分子总是企图通过传媒引起公众注意并使民众产生恐惧心理，这给社会和民众带来极大的恐慌。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恐怖活动由来已久，其产生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如古罗马的恺撒被刺、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等都带有一定的恐怖意味。但严格说来，恐怖主义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被压迫



阶级为推翻统治阶级而采取了大量的极端行动，并由此导致以血腥对血腥、以恐怖报复恐怖的恶性循环，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随着时代的发展，恐怖主义逐步演变成一种政治性的暴力活动。19 世纪后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推行殖民政策，埋下了许多民族仇恨和地域对抗的种子，这对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范围内有组织的“国际恐怖主义”开始出现。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恐怖分子的所属国、被害者的所属国、构成犯罪行为之目的的对象国以及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等因素，不限于一个国家内的恐怖活动的总称。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诸多矛盾激化的结果。20 世纪 6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很多殖民地国家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一些武装分子和组织误入了恐怖主义歧途，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武装组织应运而生。如北爱尔兰共和军等武装组织为了使北爱尔兰脱离英国，曾进行了长达 30 年的恐怖活动，致使 3 000 多人在武装袭击、暗杀和爆炸事件中死亡，3 万多人受伤。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恐怖活动开始迅速发展，但通常仍局限于暗杀、纵火、绑架人质、劫机、破坏和污染环境等传统的恐怖活动。随着“冷战”的结束，恐怖主义开始出现质的飞跃，各种恐怖活动不仅在规模上全面升级，而且在作案手段和方式上也日益现代化和科技化，成为当前人类面临的一大社会公害。如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仅一次事件就导致 3 000 多人丧生，酿成了恐怖活动史上最大的悲剧。

恐怖主义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迅速蔓延，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1）“冷战”后国际制约与控制力下降

在“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长期对抗、对峙，这使世界始终处于随时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紧张状态。两大阵营的存在简化了国际社会的矛盾，使国内矛盾服从国际矛盾、个别的民族利益也暂时服从于整体的集团利益。随着“冷战”的结束，长期被两极对抗格局掩盖和压制的各种矛盾迅速上升，国际制约与控制力下降，这为恐怖主义的迅速蔓延提供了条件。

（2）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指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缺乏有效的控制，致使一些恐怖势力掀起从不断扩大的黑市或从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材料的高潮，一些恐怖组织已具备了大规模毁伤人类的能力。研究表明，一架飞机在晴朗、无风的夜晚，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通过气雾剂喷洒 100 公斤炭疽孢子就能杀害 100 万至 300 万人，是这架飞机喷洒同量沙林毒气所造成伤亡人数的 3 000 倍。

（3）“冷战”结束后民族矛盾凸显

在“冷战”时期，民族矛盾一直处于被压制状态。“冷战”结束后，民族矛盾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深层次社会动荡的诱因。据英国警方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英国平均每年发生

900起左右的恐怖事件，其中大部分系爱尔兰共和军所为。1998年4月，英国、爱尔兰两国政府和北爱尔兰8个主要党派终于签署和平协议，但爱尔兰共和军仍然隐匿在英国社会各个角落，伺机进行恐怖活动。在俄罗斯，车臣分裂分子也频频制造绑架人质案，并在俄罗斯境内制造了多起爆炸。

（4）宗教矛盾及宗教势力的畸形发展

“冷战”结束后，一些宗教势力因教义或派别分裂，不仅把教派间或教派内部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矛盾推向极端，而且还衍生出新的宗教恐怖组织。目前，宗教恐怖势力相对集中于中东地区，而其他热点地区也并不少见。如发源于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冷战”后凸显的一股宗教势力，这股势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干扰中东和平进程。现在，原教旨主义不仅在中东地区有较大的市场，而且还扩展到中南亚和美洲地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恐怖性宗教力量。此外，新型邪教也快速发展。“冷战”后和平的环境与心态不仅使传统宗教急剧膨胀，而且也使一些邪教乘机泛滥。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6类邪教，其中不少是末日教派。法国近十年来各种非传统教派增加到170多个，而英国目前比较活跃的宗教团体已达500多个。宗教势力的泛滥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温床和庇护所。

（5）一些大国对恐怖主义的纵容和支持

早在“冷战”时期，出于东西方“冷战”对抗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雇用和训练了大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反政府武装组织人员。“冷战”结束后，这些人分散到世界各地，成为从事恐怖活动的核心力量。面对“冷战”后恐怖势力的猖獗，在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上，一些大国又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推行双重标准，这在客观上纵容和支持了一些恐怖势力。如美国常常把阿拉伯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反对以色列强行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行动称为“恐怖主义”，并将一些阿拉伯国家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而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暴力和暗杀活动视为是必要的“报复”与“防卫”。在伊拉克萨达姆当政时期，为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向伊拉克民族恐怖组织提供1 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支持其成员在巴格达等大城市从事恐怖爆炸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上，西方国家也公开支持阿尔巴尼亚族的分裂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以暴力手段谋求独立的野心，使科索沃问题更加复杂化。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的快速发展与以往相比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其一，恐怖活动全球化。“冷战”后，恐怖活动已超出原先恐怖事件相对集中的中东地区和一些亚非国家，呈现全球化趋势。近年来，西欧的恐怖组织开始与中东一些激进恐怖组织合作，共同从事恐怖活动。各国恐怖组织甚至还自发联合，召开国际会议，商讨跨国联合行动的办法，而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正以人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向全球一体化方向发展，这些都使恐怖主义成为一个跨地区、全球化的棘手问题。

其二，恐怖活动的组织更加严密。1998年夏天堪称“恐怖主义之夏”：北爱尔兰地区在经历了数百起骚乱后，8月又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8月20日，美国驻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炸弹袭击，死伤惨重。就在这两起爆炸案后不久，号称伊斯兰圣地解放军的成员宣称他们组织了这两起事件，而为取得这两次行动的成功，他们进行了缜密的组织策划，并在中东训练了数十年。

其三，恐怖活动的手段日益科技化和现代化。“冷战”结束后，恐怖手段的高科技化特征非常明显。1995 年 3 月，日本东京地铁发生了“奥姆真理教”分子投放沙林毒气事件，造成重大伤亡。事后，警方在奥姆真理教总部发现了足以使成千上万人丧生的沙林。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开创了恐怖分子利用生化武器袭击无辜的先例。1995 年 9 月 30 日，意大利核物理研究所的计算机系统被打开数小时之久，而且留下了自称为“长枪党武装”的恐怖分子的公报：“我们回来了！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信息系统……这是一场你们未曾料到的新的革命！”[①]美国和英国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计算机系统都曾被不速之客打开过。这些网络事故都带有浓厚的恐怖意味。另外，当今发达的大众传媒系统也有意无意地为恐怖分子所利用，有些恐怖组织甚至自己也拥有卫星接收站等发达的传媒设备。

其四，美国成为恐怖活动的主要目标。“冷战”后，由于美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他国内政，许多国家的“反美”、“仇美”情绪高涨，这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恐怖活动袭击的主要目标。有“恐怖大亨”之称的本·拉登在 1998 年 2 月 23 日成立“伊斯兰圣战阵线”时所发布的第一份伊斯兰教规中写道：我们呼吁所有穆斯林、所有愿意服从真主命令的虔诚的教徒们随时随地杀死和抢劫美国人。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有将近 40％的国际恐怖活动是针对美国和美国人的。进入 21 世纪，美国仍然是国际恐怖活动袭击的重点对象。

恐怖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国际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

首先，恐怖主义严重破坏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恐怖主义是一个有组织而又无政府的怪胎，其对国际社会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在特定条件下，恐怖主义者制造的一些流血恐怖事件就其规模和影响力而言，毫不亚于一场局部冲突甚至低烈度战争。

其次，恐怖活动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历史上的恐怖活动大多通过有选择的袭击来恐吓对手，或单纯用绑架人质作为筹码来达到一定目的，而现今的恐怖袭击规模愈来愈大，震撼力愈来愈强，恐怖事件造成的伤亡也愈来愈严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恐怖事件中，造成百人以上人员伤亡的事件屡见不鲜。这种以大量杀伤无辜平民的手段来扩大政治影响的恐怖活动，其严重后果令世界震惊。

再次，恐怖主义往往是地区冲突和国际危机的导火索。“冷战”后，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以恐怖手段谋求民族独立，分裂主权国家，制造了许多地区热点。如 20 世纪末，长期同政府进行恐怖游击战的土耳其游击队头目奥贾兰被捕，这激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

① 陈志良、黄明哲主编：《全球大视野》，177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库尔德人激烈的示威抗议活动，并引发了他们对相关国家的报复。1995 年 6 月 26 日，准备出席第 31 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遭到恐怖武装分子的袭击，引发了埃及与苏丹关系的高度紧张。两国剑拔弩张，几乎到了战争边缘。

最后，恐怖主义活动还经常引起外交纠纷。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反恐问题上美国按照自己的标准将一些国家列入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名单，甚至还开列出所谓“流氓国家”，这使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不和状态。1988 年 12 月，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班机在飞往苏格兰途中爆炸，机上 259 人无一生还。就涉嫌制造这起爆炸事件的两名利比亚人的受审问题，美国、英国和利比亚之间陷于一场持久的外交纷争。

面对恐怖主义的挑战，世界范围的反恐活动也迅速发展。由于日渐猖獗的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冷战”以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反恐斗争也随之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列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世界上许多国家已通过立法把恐怖活动定性为一种新的刑事犯罪，并以加强情报机构的力量、出台反恐法案、增强保安措施、加大经费投入、积极组建反恐特种部队和改革司法程序等措施加大反恐力度。1996 年 4 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反恐怖法案，并确定了在 120 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开展防恐训练，对驻外国机构的人员和军人也将进行为期一周的反恐怖训练。美国国防部也将防范恐怖活动的威胁和防止未来用计算机操纵战场列为军事研究的重点。为有效地对付国内的恐怖主义行动，许多国家成立或加强了专门的反恐部队。如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成立了反恐怖的特别行动队以打击国内的恐怖分子；俄罗斯对原安全局和反间局所属“阿尔法”别动队和“信号旗”别动队赋予了反恐怖任务，并增设了代号为“韦加”的特种反核恐怖分队。针对恐怖主义已具有跨国行动的性质，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难以遏制的特点，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曾先后于 1963 年、1970 年、1971 年制定了有关反对空中劫机的《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1995 年 4 月，联合国再次召开了世界性的反犯罪大会，这已是第 9 次世界性的把反对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列为重要议事日程的会议，世界上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47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组织参加。在联合国的积极协调下，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了反恐的双边及多边的国际合作。

当前，尽管世界各国在预防和反恐具体措施上有所不同，但在反对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原则上已逐步达成共识，主要包括：确认所有的恐怖主义行动都是无法容忍的犯罪行为，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应受到严惩；为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要采用一切有效的法律措施及手段；对恐怖分子的勒索绝不妥协和让步，以免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当公民在国外遭到绑架时，可要求主权国家政府依据国际法行使其保护领土上所有人员安全的职责；在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中，将与主权国家政府接近并保持密切联系，并将最大限度地提供情报和技术支援；以加强国际合作作为反恐怖行动的重要基础，建立并寻求一切旨在加强反恐力量的国际间的合作。

二、全球问题冲击下安全观的转变

方兴未艾的全球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安全性质的理论思考。安全困境论与集体安全观是过去关于安全性质的两种不同观点。所谓安全困境是指国家在缺少权威和存在敌对国家的自助国际体系中，无论增强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力量都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安全的进退两难的境地；集体安全观则是一种反对安全困境论的相对安全观，主张建立一种安全的相互保险体系，强调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和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责任与义务。这两种安全观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把国家视作安全的基本单元。安全困境本来指的就是国家的安全困境。国家不仅是安全利益的承担者和追求者，而且是安全价值的主体，讲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确切地讲是本国的安全，而其他国家则是本国安全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者。在这里，国家的轴心地位毋庸置疑。就此而言，集体安全的确表现出一种超越单个国家而趋向国际社会整体的倾向。然而集体安全所建构的体系是由国家组成的体系，集体安全所追求的目标本质上还是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所以，从特定意义上讲，集体安全是手段，国家安全才是目的。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无论是安全困境论还是集体安全观都难以对当代人类安全问题给以合理的说明，更拿不出有效的安全对策。全球问题要求全球安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安全观及其伴生物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其有效性。

全球问题使安全的单元多元化，尤其是突出了世界安全、人类安全，也就是全球安全的重要性。全球问题所显现的安全界限远远超出单个国家的界限。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全世界人民对安全的新关注点已聚焦于那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全球问题，因此，重新思考安全的性质时自然首先要强调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它与各国人民相关，人类正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另外，饥饿、种族冲突、恐怖活动、环境污染和毒品泛滥等不是孤立的，它们的侵害与影响波及全世界。由于安全界限超越国家，在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时，全球安全有着比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意义。当然，讲全球安全并不意味着要排斥或忽视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仍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重视全球安全也就是重视国家安全、人民安全，二者并不矛盾。

由上可见，全球安全突破了国家安全本位，这不仅是安全单元、安全主体的扩展，更是安全性质的重大修正。全球问题要求人们在思考安全问题时关注全球安全的需要，这无疑是安全观的一次飞跃。

（一）传统安全观的局限

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在前全球化时期形成和发展的关于国家安全主体、安全要素、安全威胁和安全手段等国家安全基本问题的系统化理论，具体说来，传统国家安全观，是指在前全球化时期形成的关于国家生存与安全的理论，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主权国家如何应对外来的

战争威胁和军事入侵。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一直是前全球化时期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而在前全球化时期以军事力量支撑的国家生存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这个时期的国家安全更多地取决于军队能否守护住国家的地理疆界,其基本出发点是: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自然安全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与他国的相对优势。

前全球化时期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为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和重要物质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所发生事情的影响。"①工业化大生产从两个方面启动了全球化进程: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交流与通讯手段的历史性突破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可能性,如1850年前后出现的铁路、轮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应用使人们的交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业革命后期出现的跨洋电报、无线电通讯技术为全球贸易和信息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是追求资本超额利润的最大化,使得工业化国家产生了对海外廉价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的强烈需求,同时也促使工业化国家将本国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把全球各国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世界市场,促进了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第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跨国组织和跨国公司,人和物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

正是这种新的时代特点,孕育和催生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工业革命既推动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也深刻改变了全球化时期国家的安全关系。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掠夺廉价的资源与产品销售市场,对落后国家进行控制和侵略,同时也因彼此之间广泛的利益冲突而经常发生冲突或发动战争。传统国家安全观正是反映了前全球化时期这种国家关系的本质,即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和普遍性。由于缺少一个凌驾于各主权民族国家之上的强有力的权威机构,工业国家的经济扩张表现在国家间关系上便是一种竞争冲突的关系,这样,少数发达国家外向扩张的特性逐步显现出来。为了掠夺和占有土地、人口、原材料等现代化大生产必不可少的要素,国家只能依靠自助方式维护与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表现为掠夺与被掠夺、侵略与被侵略、征服与被征服等情况,而战争与武力成了掠夺、侵略和征服的有力武器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有效手段。可以说,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观点,如重视国家的生存、追求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等,反映了在前全球化时期国家关系的这种残酷现实。

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与前全球化时期相适应,并为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信奉的安全理论,就其内容来说,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安全主体来说,国家是最基本的安全主体

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安全的最基本的主体,一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安全问题都要围绕国家这个中心。所谓安全首先是指国家安全。每一个民族国家的责任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提供自身安全。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必须保证自己的居民、领土和政权不受侵犯，保证自己能得到充足的生存资源，并持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可见，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以国家安全为本位的。

2. 从安全手段来说，军事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主要手段

传统国家安全观把军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主要内容，认为国家能否实现安全，或者说能否消除他国带来的威胁，最终取决于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权力或能力，而这种权力或能力的最重要体现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此，国家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除军事手段以外，传统国家安全观也把政治和外交手段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但由于传统国家安全观更强调冲突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因而更重视军事手段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和外交手段往往只是起一种辅助作用。

3. 从安全目标看，国家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利益

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在缺少国际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国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加强权力与安全。国家作为拥有主权的行为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享有对内的最高政治权威和对外的平等自主，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

4. 从安全性质来说，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不安全的

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由于在主权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因此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对别国来说都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安全，因为如果每个主权国家都以自身最高权威来维护其最大利益，都以别国无权过问的方式提出利益要求，并且都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理国际事务，那么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安全无法信赖、依托他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各国始终处于不懈地追求安全但又难以获得最终安全的恐惧中，从而最终陷入安全困境。

5. 从安全状态来看，国家的安全状态总是暂时的、相对的

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永远是一种相对安全状态，只要其他国家或对手存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有绝对的安全。这样的安全观使每一个国家都认为，如果他国是强大的，那么自己就是虚弱的、不安全的，只有将本国变得比对手更强大，才能获得安全感，因此，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不可能取得永久、绝对的安全。要维护国家安全，最可信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实力，扩大单边军事能力，以对付潜在的和现实的外来威胁，这导致了各国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

由上可见，传统国家安全观有以下几个明显缺陷：

第一，安全主体单一。传统国家安全观中一切安全问题都要围绕国家这个中心，至于其他安全主体，如个人、集体、地区和全球等则受到忽视甚至排斥。在多数情况下，即便这些安

全主体被提及，也只是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工具或附属物而出现。

第二，安全手段上过多地依赖军事手段。前全球化时期，武装力量的存在成为国际体系标准行为的核心原则，大多数国家为增强自身的安全，倾向于不断加强它们的军事力量。国家军事化成为一种目标，并被当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而使之合法化。

第三，安全内容狭隘。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主要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领土安全，拘泥于国土、国民的保护和政治主权的独立完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经济、科技、环境、教育文化等安全要素的重要性。从当今边疆概念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传统国家安全观对安全内容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

第四，安全共性不强。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民族国家是安全主体，国家利益、权力是安全的目的，武力则是安全的重要手段。这样，世界各国只追求单边安全而非共同安全，追求单赢而非双赢或多赢，各民族国家间缺乏共同的安全利益，互相猜忌、敌视和对抗，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安全困境。

（二）非传统安全观的安全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日益加深的全球相互依存等因素对传统安全观提出了挑战，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影响和作用由此开始显现，并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冷战”结束后，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多元、复杂而又不为人们熟悉的安全议题：从种族冲突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从人口激增到艾滋病的蔓延；从全球贫困到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从美国次贷危机到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凡此种种无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问题无法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来解释和解决，尤其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4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海啸灾害和2005年7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系列恐怖爆炸案、2007年8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等，更将非传统安全问题从实践的层面上提上各国的安全战略议程。约瑟夫·奈曾深刻指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法通过保卫我国边境以保卫我们的祖国。”[①]这些安全议题的出现，客观上需要人们以全新的视角来认识和对待它们，从而产生了与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的新国家安全观，即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与前全球化时期相适应的，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与现全球化时期相联系，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安全的主要特点和基本内容。

现全球化时期从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根据现全球化时期的内容与特点，现全球化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到“冷战”结束；第二阶段是从“冷战”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最终解体至今，是全球

①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化趋势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并日趋加快的阶段。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在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均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世界商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各国在经济、科技、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世界进入了以发展为主题的现全球化时期。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新的国际安全形势的客观反映。在新形势下，世界各国所面对的安全威胁虽然没有完全从军事威胁中摆脱出来，但关注的重心已有所变化。一般情况下，不同于侧重军事、政治安全的新的安全问题被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对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概念，目前尚无定论，原因之一在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反映了整个现全球化时期国家安全的特点，而现全球化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发展到现在，仅仅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人们对其概念还难有准确的把握。有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观强调的是除地理与政治上的国家实体外更广泛的安全，如地区安全、全球安全和人类安全，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威胁因素引起并影响各国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一国内部问题“外溢”或蔓延而引发别国和所在地区的不安全以及解决问题手段的多样性等[①]。具体说，关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首先，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反映了现全球化时期国家安全的内容和特点。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现全球化时期关于国家安全的新认识。处于全球体系中的国家过去关心的是国家的生存与安全，而现在则对自身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国家没有发展或倒退将会从根本上影响自身安全，也就是说，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在减小，而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的地位和影响在上升，国家经济上的贫困、政治上的腐败等原因有可能成为更大的安全威胁。同时，安全的关联性也在增强，出现了多个国家面临的同一威胁。如环境问题的加剧、疾病的传播、国际走私和贩毒、普遍的金融动荡等，这些新的安全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传统的军事因素的影响地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非军事因素比如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在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国家安全观对于维护和指导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实践显然已力不从心，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由此应运而生。

其次，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受自由主义安全观的影响很大。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在逐步加强，国际贸易在更大范围上把更多的国家纳入全球体系中，一个国家不考虑国际分工、独立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的经济体系是不现实的。经济纽带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在不断加大，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在不断增强，对抗和冲突不再是国家间关系不可避免的状态，合作越来越成为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存在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日益增强的社会相互依存会改变国际政治性质的自由主义开始复兴了。自由主义安全观

①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19～20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认为，在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正常的，也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合作对所有相关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不仅有利于经济利益，也有利于国家安全。传统国家安全观看重的权力与军事力量已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联系和合作的排斥。这对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萌芽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人们开始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国家安全问题。

最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目前是一种尚未成熟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产生的时间较短，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萌芽，而被广泛重视并开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则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关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还没有出现一套权威的理论。有关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观点或主张尚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人们对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确切含义和内容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当然，对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理论界还是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比如共同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和合作安全观等，这将对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完善起到积极作用。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作为发展中的安全共识，目前还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结合现全球化时期的特点和安全研究的新进展，我们可以对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有关内容作出如下概括：

1.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在现全球化时期，安全要素和议题不断增多，安全涉及的领域被拓宽

国家安全要素和议题的增多是与现全球化时期密切相关的。“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相对缓和，安全研究突破原有的军事安全框架，开始关注各种非军事威胁对国民生存、国家关系和各地区安全的影响，如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粮食和能源短缺、毒品交易、跨国犯罪、人口增长和非法移民、20 世纪末以来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等，这些被称为“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成为各国研究和寻求解决的新课题。在军事对于安全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军事力量受到了普遍质疑。“冷战”结束后，日益增多和广泛的多边合作已对把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工具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国家安全已不再限于军事、政治领域，而逐渐扩展到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生态等非军事安全议题逐渐被提上了世界各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日程。

2.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现全球化时期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共性与关联性在不断增强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在现全球化时期，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缓和与开放占据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一国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紧密联系，单一国家的安全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国家间的广泛联系和相互依存，安全主体的共性大大增强，传统安全的单一性、绝对性逐步被共性与关联性所取代，一国的安全常常受他国安全问题的影响，比如一国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恐怖主义的蔓延和渗透会使所有国家都有可能遭到破坏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世界各国的共荣共存，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安全。

3.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及其机制是实现安全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在国际政治领域,合作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在互动中自愿调整其政策的行为,目的是协调各方的立场、观点,以便达到一种共同得益的结果,实现共赢。合作需要通过谈判和政策协调将行为主体的行动统一起来。作为政策协调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安全政策被相关国家视为能够有助于或无损于它们自己的安全目标时,政府间的安全合作就会实现。在现今全球化时期,广泛的国家间的合作及其机制已屡见不鲜,没有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合作,任何国际社会行为主体都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无论这种目标是涉及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发展。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合作将成为主要形式,这对各国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至关重要。

三、中国的新安全观

安全观是人们对安全客观实体的一种主观认识,它与安全现实可能是吻合的,也可能是超前或落后的。从整体上看,人们的安全观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冷战"后的中国新安全观正是在不断认识和总结过程中形成的。

(一)中国新安全观提出的历史背景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和所处的安全环境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就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并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取代了"战争与革命"上升为时代主题。"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尤其是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更有利于遏止世界战争的发生。据此,中国政府在90年代末规划的2010年远景目标中,提出了"国际和平环境可继续保持"的论断。当然,世界并不太平,"冷战"结束后,"冷战"期间被掩盖的各种矛盾重新显露,内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导致地区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纠纷、资源争夺和贸易摩擦等。利益冲突使世界充满矛盾和斗争,其中大国的强权政治行为往往是激化矛盾、导致战争与冲突的重要原因,成为"冷战"后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其次,"冷战"结束后,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也有了新变化。

第一,中国短期内不会有外部入侵的危险。"冷战"期间,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外来军事入侵的危险中。"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总体安全形势大为改观。当前,具有入侵中国军事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而"冷战"后的中美、中俄双边关系获得较大改善,并处于相对稳定的良好状态。1996年中俄两国达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美中关系也在不断改善,两国都不愿发生全面的军事对抗。

第二,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佳状态。20世

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同邻国的边界进一步稳定，有关分歧也得到控制或解决。当前，中国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签署了边界协定，与印度也达成了减少边界驻军的协定。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呈现全方位发展的良好态势。

当然，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中国的国家安全目前仍然存在内忧外患。从现实看，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仍是较多的，甚至面临严峻的形势。如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台独”、“藏独”、“疆独”势力的存在，严重危害着国家的安全。此外，经济安全也备受重视。“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而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需要安全保护。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走私、海盗、贩毒、经济情报战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直接破坏中国经济建设外，海洋权益被侵蚀、海上通道安全、海外资源保证等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的安全问题。

针对“冷战”后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适时地调整和丰富了自己的安全战略。

其一，积极防御是“冷战”后中国首要的安全战略原则。“冷战”后，中国始终坚持安全战略的防御性质。在军事上，1994 年以来，中国的国防开支基本上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1.5%以下，中国军队的主要战略任务是为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的环境；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积极推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一贯政策，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图谋，而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在边界纠纷的问题上，中国坚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在核问题上，中国是有核国家中唯一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主动放弃第一次核打击的权力，这意味着中国的核武器只是用于正当防卫，中国的核战略也是防御性的。此外，中国还积极从经济上扩大国家的安全保障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既是中国在本世纪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不断增强国力，以维护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的根本保证。

其二，走精兵之路是中国安全战略的又一原则。“冷战”后，世界高科技的发展使现代军事力量越来越依赖于武器装备的精良。海湾战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武器装备的落后，使自己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目前，中国有 230 万军队，从数量上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但技术装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要用现代化的军事手段保障安全，中国必须走精兵之路，不断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和武器装备水平。为此，中央军委已决定要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真正提高部队的防卫作战能力。

其三，加强安全合作是中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原则。加强安全合作原则突出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国防建设的目标不单单要赢得战争，更重要的是要避免战争发生。这一原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对中国现代安全战略的影响。军事实力加上国家间的密切合作可以有效地防范战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军事领导人积极对他国尤其是周边国家进行访问，促进了双

边或多边军事交流。1993 年 1 月，中国参加了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建立亚太国家安全与信任措施”的会议，对建立多边地区安全机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5 年，中国发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军控与裁军白皮书，同时，定期发表《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以增强军备与安全方面的透明度。这些做法同中国安全观念的改变是分不开的。

（二）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和特征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格局明显变化、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国际秩序酝酿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根据自身战略目标的需要，重新认识安全问题，调整安全观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

中国的新安全观可分为对国际安全的认识和对自身安全的认识两大方面，即国际安全观和国家安全观。

在国际安全事务中，中国政府积极倡导新安全观，以改变传统的“冷战”思维。

1997 年 7 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第四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呼吁有关各国摒弃“冷战”思维，着眼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目标，根据亚太地区的现实和特点，平等相待、和平共处。钱其琛指出，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本地区各国应当有新的安全观。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1999 年 3 月 26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瑞士期间，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世界各国应该摒弃旧的安全观念，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江泽民指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的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①

在中国国家安全方面，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综合安全观”现在已被普遍认同。“冷战”后，安全的内涵越来越丰富，除传统的军事安全外，包括金融、贸易、科技、生态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及其他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国家安全演变为综合性安全的概念。国家安全除了要防止来自外部的威胁外，同时应在国家内部建立相应机制，因为国家安全是在开放的、动态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实现的，而且安全是与发展相关联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告诉我们，国家安全

① 江泽民：《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载《人民日报》，1999-03-27。

不能局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必须与国内的政策、发展和稳定相联系。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建立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国家安全才能更有保障。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产物，它给国际范围内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综合安全”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甚至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当前仍处在发展中的很多安全理论和主张，如“非传统安全”、“合作安全”、“经济安全”、“人的安全”等，都可归入“综合安全”的理论范畴。

“冷战”后，中国逐步形成的新安全观具有明显的特点：

1. 中国的新安全观属于综合安全观

“综合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概念、理论、战略和政策，最初是日本大平正芳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正式提出的，后来东盟国家对此作了新的发展。总的来看，“综合安全”的特性一方面体现在概念的内涵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实现安全利益或目标的方式和途径上，即它既强调安全内涵的综合性，也包括实现安全目标的方式和手段的多样性。

1996 年，由马来西亚、新西兰和中国为主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发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关于综合与合作安全第 3 号备忘录》指出，综合安全既包括军事方面，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问题。备忘录提出了“综合安全七原则”：综合原则、相互依存原则、合作和平安全与共同安全原则、自力更生原则、包容性原则、和平接触原则及好公民原则。中国政府重视综合安全，在关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军事安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能源、环保等新型的安全问题。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中国政府主张世界各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成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在经济领域，各国应加强互利合作，消除经贸往来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以建立全球和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

2. 中国新安全观强调共同安全

中国新安全观认为，安全是相互的、共同的。世界各国在谋求自身的安全利益时，不应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条件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要，最终并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共同安全、集体安全才是根本出路。“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已被证明不能营造和平环境。在新的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是有悖于时代潮流。要争取持久的和平，就必须转变安全观念，并寻求维护和平的新方式。实践证明，安全不能单纯依靠增加军备，更不能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依靠相互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对话与合作遂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冷战”后，中国在实践中积极贯彻新的安全观念和主张，以促进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努力改善同亚太地区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关系，发展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贸联系，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并为地区和全球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3. 在实现安全的途径上，中国新安全观强调内外并重

中国的新安全观在承认军事安全的适当地位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和

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把国家间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改善作为实现国家安全利益、谋求地区和全球稳定的主要途径。中国主张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的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认为这是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现实途径。

上述可见,“冷战”后的中国新安全观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强调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经济安全为重心,同时重视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利益,运用综合手段,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并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章小结

二战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世人关于安全问题的重新思考,非传统安全观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认识实现了对传统安全观念的突破。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中国在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和所处的安全环境,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

重要概念

全球性问题　传统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

思考题

1.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有什么局限?
2. 中国新安全观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下列问题中哪个不属于全球性问题?(　　)

A. 南北关系　　B. 生态失衡

C. 东南亚金融危机　　D. 国际恐怖主义

2.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认为实现安全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是(　　)。

A. 广泛的国际合作及其机制　　B. 实行广泛的结盟

C. 实现全面裁军　　D. 严惩国际恐怖主义

二、多项选择题

1. 当今全球性问题具有以下哪些特征？(　　)

A. 综合性　　B. 挑战性

C. 全球性　　D. 暂时性

2. 中国的新安全观包括哪两个方面？(　　)

A. 环境安全观　　B. 国际安全观

C. 能源安全观　　D. 国家安全观

3. 中国的新安全观有哪些特征？(　　)

A. 属于综合安全观　　B. 强调共同安全

C. 注重自身安全　　D. 强调内外并重

答案：

单项选择：1. C　2. A

多项选择：1. ABC　2. BC　3. ABD



力图称霸世界的美国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发展的状况，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及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变。

重点与难点

- “冷战”后美国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
- “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 21 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对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战后的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优势，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一直推行企图称霸世界的战略。“冷战”后，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实力依然十分强大，成为世界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愈加明显。美国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第一节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美国位于北美洲南部，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北接加拿大、南靠墨西哥及墨西哥湾。全境由东向西可分为 5 个地理区：东南部沿岸平原分大西洋沿岸平原和墨西哥沿岸平原两部分。这一地带海拔在 200 米以下，多数由河川冲积而成，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是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土质油黑，土壤肥沃。河口附近有一些沼泽地。位于这一地理区的佛罗里达半岛是美国最大的半岛。

阿巴拉契亚山脉位于大西洋沿岸平原西侧，基本与海岸平行，长约 2 300 多公里，一般海拔在 1 000～1 500 米，由几条平行山脉组成。内地平原呈倒三角形，北起漫长的美国与加拿大边界，南达大西洋沿岸平原的格兰德河一带。西部山系由西部两条山脉所组成：东部为落基山脉，西部为内华达山脉和喀斯喀特山脉，是旧褶曲运动后的产物。内华达山脉的惠特尼峰海拔 4 418 米，为美国大陆最高点，喀斯喀特山脉的雷尼尔山海拔 4 392 米，仅次于惠特尼峰。西部山间高原由科罗拉多高原、怀俄明高原、哥伦比亚高原与大峡谷组成，为美国西部地质构造最复杂的地区。大峡谷位于亚利桑纳州西北部，由一系列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山峡和深谷组成，气势雄伟、岩壁陡峭，为世界上罕见的自然景观。美国河流湖泊众多，水系复杂，从总体上可分为三大水系：凡位于落基山以东的注入大西洋的河流都称为大西洋水系，主要有密西西比河、康涅狄格河和赫得森河。其中密西西比河全长 6 020 公里，居世界第三位；凡注入太平洋的河流称太平洋水系。主要有科罗拉多河、哥伦比亚河、育空河等；北美洲中东部的大湖群。包括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总面积 24.5 万平方公里，为世界最大的淡水水域，素有“北美地中海”之称，其中密歇根湖属美国，其余 4 湖为美国和加拿大共有。苏必利尔湖为世界最大的淡水湖，面积在世界湖泊中仅次于里海而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的气候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和亚热带气候，仅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属热带。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纬 60～70 度之间，属北极圈内的寒冷气候区；夏威夷州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气候区。但由于美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地气候差异较大。

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不论是土地资源，还是矿产资源，都非常丰富，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美国农业用地（耕地和牧地）约为4.3亿公顷，占地球全部农业用地的10%左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粮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5，主要农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肉类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美国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铁矿石、煤炭、天然气、铅、锌、银、铀、钼、锆等产量均居世界前列，煤炭的总储量为35 996亿吨，石油总储量为24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为56 034亿立方米。美国拥有18亿公顷的森林，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1.5%左右，主要树种有美洲松、黄松、白松和橡树类。

美国所具有的上述得天独厚的资源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美国还是英国在北美洲的一块殖民地，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布成立。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后，英国承认北美13州的独立。从此，美国开始从一个前殖民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逐步成为世界强国。独立战争后，美国于1861—1865年又爆发了因两种经济体制相互冲突引起的“南北战争”，战争以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为资本主义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

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人口和土地面积仅占世界的6%，而工业产量、外贸出口和黄金储备分别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1/3、3/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商品出口、金融和资本输出国家。

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经济领先地位，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战前，美国是欧洲的债务国，共欠欧洲各国债务60亿美元，但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不仅还清了外债，而且变成了拥有100多亿美元的债权国。黄金储备额价值45亿美元，占世界黄金总储备的1/2，确立了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经济大国地位。战争期间，美国打着“中立”的旗号，利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火并，同时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大发战争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反法西斯国家联盟的兵工厂，美国各大公司在对外提供军事物资上获纯利600亿美元；1940—1945年，美国联邦政府全部军事采购支出为3 060亿美元；战时建设的全部新厂中，5/6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战争刺激了美国军事工业的发展，使美国的工业能力有了较大提高，而其他国家因遭受战争的巨大破坏，无法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匹敌。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3，出口额的1/3，黄金总储备的3/4。为确立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打下了基础。

其次，战后有利的国际国内市场。战后初期，美国面临着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就国外市场而言，战后的西欧和日本百废待兴，对美国商品和资本有着巨大需求，而朝鲜战争又带来了“战争景气”，这一切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几乎没有什么外部竞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就国内市场而言，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国内需求的增加，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国内市场，从而促进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逐年增长。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极推动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和维护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

战后的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一系列步骤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一，1944 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之间实行固定汇率的原则，使美元成为其他国家货币价值的标准。由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实行“加权表决制”，而美国拥有的股金最多，美国就拥有了最大表决权及在重大问题上的否决权。第二，1947 年美国通过与其他 22 国签订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建立了一个开放型的多边世界贸易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目的是“达成以切实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商务中的歧视性待遇为目标的互惠互利的安排”，从而在制度框架上基本完成了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构建。第三，迅速推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为实施新的制度安排创造外部条件和环境。从 1948—1952 年期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价值 131.5 亿美元的援助，帮助西欧各国在比较短的时间恢复了经济。上述三项措施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霸权地位。

最后，不断创新和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本动力。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其移民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世界移民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在开辟新大陆的艰苦过程中，来自各地的移民逐渐形成了独立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美利坚民族精神，他们崇尚变革创新、讲求实效、不拘一格、反对墨守成规，讲究效率和理性。正是美国人的求实态度和创新意识才使这块并非古老的土壤滋生了最能反映美国社会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而这种创新与求实的精神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美国的新经济及发展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一种新的状态：在经济结构上，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取代了传统的工业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在运行方式上，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经济增长持续时间长，到 2001 年，已达 10 年之久，是二战后最长的一个周期；二是“两高两低”，即经济的高增长率、高生产率与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传统的经济理论——失业与通胀反向相关对此已不能作出解释。1996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把这样的经济称为“新经济”，以区别于过去的旧经济。

对美国新经济产生的原因说法不一,争论也很大,目前基本达成共识的有以下几点:信息化、全球化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变革等。

第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美国经济结构大调整是"新经济"产生的第一要素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起源于1973年的世界性石油危机。石油危机的发生给当时处在汽车、钢铁时代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经济结构调整和新的产业革命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除此之外,在美国,当初被用来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进行"冷战"的"星球大战计划",后来成了新的信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以占领21世纪经济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为战略,强化了政府对信息化等高科技领域的干预和决策。美国政府还于1992年初解除了电话网不能传输电视娱乐节目的禁令,开放了地方电视网,1993年9月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之后又提出了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倡议,欲将各国的NII联结起来,组成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全世界信息共享;为此,美国政府还增加了拨款,以加强对高新技术开发的力度。

第二,以全球化为背景的资源优化配置是"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动力

美国善于利用全球资源的历史由来已久,从1803年购买法国的路易斯安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供应,到二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美元体系、廉价石油,再到里根政府的高利率政策等,都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克林顿政府更是一个高度介入和奉行经济全球化战略的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推动下,美国放弃了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的封闭政策,更多地考虑国外市场的因素,以全球化为核心的资源配置取向日趋明显。

第三,以政策创新为前提的宏观经济改革是"新经济"产生的良好基础

在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的基础是由里根政府奠定的,但大多数人认为克林顿政府宏观经济调整对新经济的产生功不可没。克林顿在2000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把自己8年来的经济战略概括为三条:严肃财政纪律缩减联邦赤字;对人力资源投资;推进经济全球化。

美国新经济造就了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使其在经济与科技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GDP总量在全球具有优势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美国GDP的总量是10.082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2.7%;2002年为10.480 8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2.5%;2003年达到10.985 5万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1%,加快0.9个百分点,占全球总量的30.4%;2004年美国的GDP的总量达到11.667 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28.6%,居世界的第一位。

第二,经济发展能力在国际社会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于2004年5月公布了2004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行榜。美国依然位居榜首,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从而保持了自1992年至今连续13年名列第一的纪录。

第三,企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活力,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

中，美国公司一直保持强大的竞争力。根据《福布斯》杂志2004年公布的“福布斯2000”显示，全球排名前十名的企业中，美国占有7个，并囊括了前四名，它们是花旗集团、通用电气、国际集团和埃克森美孚。据美国《财富》杂志2003年报告，2002年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最多，共有192家，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的日本，几乎相当于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公司的总和。总营业额占500强总数的39.5%，总利润占500强的42%，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第四，科技实力领先，教育水平高。为了保持第一强国的地位，美国政府在科学研究和开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据统计，2000年美国研究与开发经费达到2 640亿美元，占世界研究与开发投资总额的45%，相当于其他西方6个大国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总和。在世界公认的四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中，美国发表的论文数占到了总数的近40%。美国还是世界上拥有专利最多的国家。此外，美国的科研设备和科研手段、科研水平与潜力、高科技产业发展也均居世界领先地位。

2001年以来，美国新经济进入了调整期，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特别是“9·11”事件使美国经济的复苏受到了影响，但2003年美国经济开始恢复，2004年经济复苏强劲，2004年7月份的失业率降至5.5%，几乎是近3年来最低水平。2007年以后。美国经济再次进入发展缓慢阶段，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从全年来看，美国经济呈现先扬后抑的态势。2008年上半年美国经济依靠其惯性，以及前一阶段布什政府退税政策的推动，依然取得了可观的增长，第二季度GDP增长一度达到2.8%。但第三季度开始急转直下，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美国金融危机突然恶化，并升级为全球金融海啸，引发连锁反应。由于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联系紧密，救市措施并未有效地阻断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已成定局，2009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速在1%～1.5%之间。

随着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移，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预计200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将继续探底，下半年有望在大规模注资和经济复苏计划的推动下略有回升。但美联储已承认，2009年美国经济将“非常疲软”，随后的复苏步伐也将十分缓慢。预计2010美国经济全年将呈现负增长，但陷入20世纪30年代那样大萧条的可能性不大。为克服金融海啸的影响，向来强调市场作用的美国政府频频出手，采取了被美国媒体称为“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2009年已陆续出台超过4万亿美元的救市措施。无论是力度还是广度，都堪称20世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行动。从2010年情况来看，有几大因素有望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困境。首先，国民经济支柱依旧稳健，美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尚未伤筋动骨，军工业依然无可匹敌，美国企业的海外业务活力不减。其次，奥巴马经济复苏计划强化了对基础设施、教育和IT领域的投资，未来综合国力和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将得以提高。最后，美国政府多管齐下的干预效果将有所显现。此外，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和房地产业的衰退周期均有望在明年见底，对经济的复苏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美国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丧失，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第二节　美国的政治及其新变化

一、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

美国宪法是美国的最高法律。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和限权政府、法制而非人治、代议制、权力分立和制衡、联邦制、文官控制军队。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根据美国宪法，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掌管。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议员 435 名，按各州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确定该州在众议院的议员数；参议院议员 100 名，每州 2 名。参、众两院议员都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众议员任期 2 年，参议员任期 6 年，每两年改选全部众议员和 1/3 参议员。参、众议员均可连选连任，没有次数限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首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本州选举人（人数与本州国会议员人数相等），再由各州选举人同时在各州首府投票选举正、副总统。总统任期 4 年，连任不得超过 2 届。美国设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州法院及一些特别法院。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法弹劾总统和高级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在分权与制衡中，美国较好地避免了权力的滥用。

政党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宪法根本未提到政党，然而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政党在美国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是两党制国家，两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政治机构，操纵全国政治生活。两党的主要职能是操纵和包办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长期轮流执政。两党制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初步形成，南北战争以后牢固地树立起来。内战结束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着美国政治舞台，从未遇到强大的对手。两党不仅控制着联邦政府，也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曾经出现过从两大党分裂出的第三党和许多其他政党，但是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虽能长期存在但影响有限，都不能成为同两大政党分庭抗礼的全国性政治力量。

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一政治体制是服务于美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

二、战后美国政治的新变化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美国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二战后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断地调整，这种调整表现为多个方面。

首先，在保持三权相互分立、平行和独立的基本结构的同时，总统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权力中心，明显地取得对另外两个部门的优先地位。现代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也是武装军队的总司令。另外，总统还享有立法创议权和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的权限，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战后美国总统在行政、立法、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权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俨然成为所谓的"帝王般总统"。

总统行政权力的扩大首先表现为联邦官僚机构的扩大。现在美国政府一共有 13 个内阁级的部和数百个署和局，其中国防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设的。

总统行政权力扩大的另一种表现，是联邦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或是共和党政府，不仅继承了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措施，而且扩大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规模和内容，并使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由战前的针对严重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这种特殊条件下采用的非常手段，转变为经常性的制度，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全部机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总统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负责人。战后历届总统都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外交和国际问题上。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经常出国访问，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最高级会议，亲自领导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外交活动。由于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负责人实际上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和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其次，联邦司法和法院系统在权力制衡、维护和增强联邦权力、削弱州的权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即宣布某项法令违反宪法而使之归于无效的权力，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政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最高法院积极扩大行使司法审查权，在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使最高法院变为战后社会改革的工具。最高法院在积极行使司法审查权方面，正成为解决种族、民权、堕胎、立法机构席位重新分配、总统和国会的冲突等有关社会和政治重大问题的工具。由于战后国会与总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司法部门在保持三权分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不仅在解决总统与国会间争夺权力的纠纷中处于仲裁者的地位，有时甚至变成事实上的立法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院系统开始奉行司法能动主义，凭借自身拥有的司法审查权采取了积极的司法行动，将原属于各州权限范围的公民权利纳入了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在保障民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南方各州一直以民权属于州权范

畴为借口拒绝消除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高潮中,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采取了否定州权的立场,把民权置于了联邦的保障范围。

再次,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政党之间的政策进一步模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新经济的出现,使美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从业人数大幅度减少,而从事服务性行业的第三产业的人数大幅度增加,造成传统的产业工人大大减少。第二,以各种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为主体组成的中产阶级在当代美国社会迅速崛起,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动向和发展趋势的一支重要力量。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这种变化的进一步加剧,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两大政党之间的政治界限越来越模糊。第三,作为两个不同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观念、选民构成、政策主张等方面有所区别。一般说来,民主党长期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比较温和,较多代表产业工人和普通大众立场,倾向于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进行改革和调整,以促进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福利。而共和党则更多倾向于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比较强硬,主张维持传统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更多地代表有产阶级和大的企业集团,反对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但自克林顿政府时期,这种界限就越来越不存在了。1992 年总统竞选中,克林顿以“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为竞选主题。他说:“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生活在城镇乡村的美国人民,对左、右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陈腐话语,以及我们的政治代替了行动的言论不感兴趣。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正是这篇演讲使克林顿赢得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从而获得了大选的胜利。2000 年的大选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策主张因为没有明显的不同而导致竞选结果是当选总统的布什仅以微弱的票数获得竞选的胜利。第四,当代美国政党的作用在下降,各种利益集团的活动发展起来。美国的利益集团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很多利益集团组织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利益集团是美国民间具有共同利益的民众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自愿性组织,其主要目的是参与政府决策,使自身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以实现。利益集团多以行业和专业分类,主要通过宣传、游说等手段影响国会议员立场和政府决策。各利益集团通过从事院外活动,促进国会通过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立法。1979 年 11 月,石油院外集团通过游说活动,使参议院通过一项法规,对独立石油公司每天生产的头 1 000 桶石油免征暴利税,从而使大石油公司每年增加利润 100 亿美元。美国的对外决策主要表现为精英模式,但是,一些著名的对外政策集团组织,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外交政策研究所”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亦产生重要的影响。

最后,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上升。大众传媒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及近来发展迅猛的互联网。它们的成长与发展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着重大影响。

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诠释外交政策。大众传媒通

过向公众传递全球信息，编制新闻程序，从而影响外交政策日程的确定。二是大众传媒机构依靠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成为对政府、国会、法院三个机构行为进行监督批评的“第四个权力机构”。三是制造政治人物。随着 20 世纪 50 年“电视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制造政治人物的作用日益凸显。

大众传媒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并不止这些。它对社会舆论的控制与引导对政治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另外大众传媒对美国大众政治文化的形成更是贡献有加。大众传媒通过自己的方式将自身崇奉的价值观念传播给公众，帮助他们树立基本价值体系；通过对政治事件的报道使公众认识政府运作方式，确立民主观念。

三、“冷战”后美国的政治思潮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使美国面临的军事压力消失。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欧盟、日本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国内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毒品和枪支泛滥、犯罪率居高不下、暴力猖獗、种族歧视严重、道德沦丧、公共信任危机等社会问题，以及失业率高等经济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公众舆论更加关注国家安全和各种国内问题的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政治思潮频繁变化，新保守主义、新孤立主义、新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的政治思潮，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占据主导地位

新保守主义全然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它是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它缺乏传统保守主义尊重传统、文化、宗教的气质，缺乏维持现状的倾向，而具有崇尚理性、崇尚武力、追求激烈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等激进主义特征。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不应羞于运用其不可比拟的力量，必要时使用武力在全世界推广其价值。根据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布坎南分析，“新保守主义”发端于 1990 年代中期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新保守主义”从传统保守主义阵营脱颖而出，与传统保守主义分裂，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自 1990 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影响日增，形成一股有组织、有理论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的核心是 1997 年春季成立的“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roject)。该组织由年轻的共和党理论家威廉姆·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担任主席，其成员包括副总统切尼、前副总统奎尔、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维茨等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在布什竞选总统获胜后，该组织的 18 名成员中有 7 人进入布什政府担任要职。

这股政治力量在舆论界有巨大的影响力。它的核心刊物《旗帜周刊》、《新共和党》等成为主导美国政治舆论的著名政论杂志。此外，新保守主义的鼓吹者主导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报纸的评论专栏，他们的专栏文章成为左右美国舆论的风向标。

2. 新孤立主义(Neo-Isolationism)抬头

“新孤立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界中最保守，影响也相对小一些的外交思潮。该派

对美国国家利益持一种很狭隘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主义对美国是有其害，而无其利。“新孤立主义”对国际政治持最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即强调力量就是一切。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谁拥有威胁美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家安全的力量？他们的结论是，当今世界上谁也没有这种力量。他们认为：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各个主要大国之间已形成了力量均衡；倘若俄罗斯和中国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其他大国都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对它们进行遏制。而且，实际上俄罗斯与中国也会帮助其他国家对对方进行“遏制”。因此，在欧亚大陆，没有任何大国有能力征服所有其他国家，并聚结起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美国生活方式构成潜在威胁。他们还同传统的孤立主义者一样，认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使美国不可能受到真正重大的战略威胁：因为美国经济占世界 GDP 的 1/4 以上，是与美国经济力量最为接近的日本的两倍多；美国经济发展虽不能完全实现自给，但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更能走自我发展的道路；美国北、南两边的邻国在军事上太弱，并且未来很长时期都不会变化。因此，实际上美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也可以说，从战略上看美国是无敌的。美国不仅无须扩大对外结盟关系，而且应断绝所有同盟关系。如北约应交给欧洲去处理。波黑问题也与美国没有直接的物质利害关系，它是欧洲的问题犯不着美国去操心。美国也不应继续优先关注俄罗斯的经济、政治改革。中东应由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自己解决问题，美国不应在中间掺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应交给撒旦去收拾。朝鲜应由实际受到威胁的韩国人去承受。美国更无须插手干涉拉丁美洲和非洲事务。至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应仅限于救助自然灾害。如饥馑、流行病、地震和洪涝等。在国会中共和与民主两党中最激进的议员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共济会那样的运动的“新孤立主义”阵线。他们努力对美国在全球的交往做出限制，并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军队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摊子铺得都太大了。他们要求将国家的注意力尽快转移到国内问题的解决上，首先把国内的事务办好。

“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出现反映了美国民众在和平时期要求更多分享“和平红利”，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的愿望，得到了美国社会一些中下层人士的拥护。但是也遭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他们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是美国依然面临诸多的威胁和挑战，美国应当承担国际义务并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但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其政治纲领和施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接纳了孤立主义的一些观点。

3. 新帝国主义论(Neo-Imperialism)流行

“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基础是对国家类型的界定。它将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后现代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和日本也正在向后现代国家迈进。在后现代国家之间，已不存在安全威胁和安全困境，后现代国家已不再将武力征服作为一种获取安全和利益的可以设想(conceivable)的政策选择，而是以道德良知和普遍正义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其外交政策；第二类是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现代国家停留在主权的民族

国家的阶段，它们用“存在的需要”和非道德考虑的马基亚维利政治权谋术(the amorality of Machiavelli's theories of statecraft)来指导其对外行为，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安全利益是其首要的目标，传统的主权观念是其全力固守的指导原则；第三类是前现代国家(pre-modern state)，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等。这类国家的政府既没有合法的权威，也没有实现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在这些国家中，混乱、无序、战争是常态现象，国家的虚弱使其时常被恐怖主义组织所利用、操纵和控制，向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从而构成对后现代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威胁。在“新帝国主义论”的提出者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资深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的理论中，前现代国家是世界秩序的不稳定因素，现代国家所奉行的均势原则和主权制，已无法应对世界秩序所遭遇的挑战，后现代国家担负着解救前现代国家、拯救世界秩序的使命。而新帝国主义就是一种后现代国家必须采取的、为世界秩序所必需的应对方式。殖民的帝国主义曾在19世纪为前现代国家带来了各种现代化的技术和制度，维护并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殖民主义的药方可能仍然是灵验的，但在后现代国家、甚至在现代国家中殖民主义的行为已遭到彻底的摒弃。因此，帝国主义需要采取新的合法的形式：一种“依照自愿原则的、以带来秩序和组织为目标”的新型帝国主义，后现代的帝国主义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voluntary imperialism of the global economy)，这一模式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构为实施主体，对失败的前现代国家(failed pre-modern state)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治理；另一种是比邻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neighbors)，即对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的邻国进行及时的援助、介入和管理，以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蔓延到后现代国家。最后，库珀又提出了一种发生在后现代国家之间的无中心的、自愿的帝国形式——合作帝国(cooperative empire)，合作帝国内的成员自愿让渡其主权，获得在共同体中的平等的发言权，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帝国事务，代表“公意”的帝国官僚机构为共同体内的公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新帝国主义论”助长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美国注定要担当世界领导作用的“使命感”，与“9·11”事件后美国民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推动政府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国际和国内问题。

第三节　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

一、“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美国的国际声望大大提升。此时的美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在世界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在对外政策上，从战前的孤立主义迅速转向全球扩张主义，开始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纵

观“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全球战略的确立时期

这一阶段，美国依仗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实施了“四面出击，全球扩张”的基本战略，即采取一切手段，实现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一基本战略经历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届政府。杜鲁门继任总统后，根据战后初期变化了的国际局势，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以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为特征的全球战略。1946年2月，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为杜鲁门政府设计了“遏制理论”，为美国挑起“冷战”提供了理论依据。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应邀访问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在这种背景下，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美国对苏联“冷战”的全面展开。杜鲁门主义的战略目标是以欧洲为重点，争夺和控制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在亚、非、拉进行势力扩张，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继续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在政治上，用所谓更有力、更主动的“解放政策”来代替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在军事上，变“遏制战略”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并辅之以“战争边缘政策”。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提出“一手抓橄榄枝，一手抓剑”的和平战略，企图用软硬兼施的两手来达到全球战略目标。同时，在军事上提出“灵活反应战略”，发展多样化军事力量，以使美军能应付各种类型的战争。

战后到60年代末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主要目标是争当世界霸主。

2.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时期

这一阶段，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表现在尼克松时期及其“尼克松主义”。经过25年的侵略扩张和争霸活动，美国国力不足与战略目标过大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而苏联国力与美国的差距缩小，军事实力上更取得了对美均势。美国深陷越南战场不能自拔，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防御。如何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是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尼克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

针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尼克松总统上台后，被迫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了以“尼克松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把建立同盟国的“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鼓励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主要手段，通过对话和谈判制约苏联，以此维持美苏之间的均势；提出世界上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美国、苏联、欧洲、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由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能够利用中国制约苏联，开展均势外交确保美国立于不败之地；在亚洲实行有限收缩，实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和苏联进行重点争夺，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增强军事存在，阻止苏联的渗透和扩张。

尼克松主义是美国霸权主义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它是在美国处于守势和不利情况

下提出的，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1977 年 1 月卡特上台执政，他在对苏联执行"缓和战略"的同时，以人权外交作为反对苏联的武器。1979 年初，伊朗巴列维国王倒台和同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特政府被迫调整外交战略，改变了 70 年代以来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从而为里根政府实施以实力为后盾的对苏强硬政策打下了基础。

3.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前期，主要表现在里根时期及其"里根主义"，后期主要表现在布什时期及其"超越遏制战略"。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国内外都陷入严重危机。在国内，自 1980 年 2 月陷入战后第 7 次经济危机之中，国际上，美苏争霸，美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苏联入侵阿富汗，打破了美国想搞缓和的幻想；西欧、日本对美的离心力更加增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上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政治上要求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呼声高涨。正是在这种困境中，里根出任美国第 40 任总统。

1981 年 1 月 20 日，里根入主白宫，提出"扩军抗苏，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的全球战略。他认为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原因在于对苏政策过于软弱，主张强硬对抗苏联扩张，重新确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因而被称为"新遏制战略"。其主要措施是：制定并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求从根本上打破美、苏战略均势；推行里根主义，压缩苏联势力范围，扩大美国影响；对苏联实行实力遏制与谈判并重的灵活政策。

里根以强硬对抗苏联的外交战略恢复了美国的威信和自信，因而赢得了第二个任期。而这时苏联内外交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对苏联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重新夺回战略优势，因此里根在第二个任期开始与苏联对话，使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既对话又对抗的阶段。

1989 年初布什政府上台后，面临着进一步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主要是：东欧国家正酝酿着变革，戈尔巴乔夫当政以来推行的改革，使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突出，危机日益暴露，为美国提供了施加压力与影响的好时机；而美国在 80 年代里根政府执政时国力有了长进，这使美国在同苏联打交道中，可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迫使苏联做出某些让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对其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

布什"超越遏制战略"的基本内容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和平演变为灵魂，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时机，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非军事手段，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布什调整了对外政策，在确保美国军事优势的前提下，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融合"、"纳入"代替孤立和打击；调整与同盟国的关系，强化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提高第三世界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切实加强对付第三世界威胁的能力；对中国，推行既维持美中关系基本框架，又以"人权"为突破口的政策，对中国诱压兼施，以期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变化。1990 年 9 月借海湾战争之机，布什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作为美国在世界格局新旧交替时期调整对外战略的总目标，即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稳定而安

全"的世界,以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二、"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随着苏东的剧变,"冷战"宣告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这一地位,美国提出的它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是:在安全领域,要防止在美国之外出现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比其强大的地区和国家,以免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霸权地位,维护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经济上,调动和开发全世界的资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和领先地位;在意识形态等领域,推销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西方价值观,推动全球按照美国的标准,建立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新秩序。

1.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

1993 年克林顿上台执政,他提出了"冷战"后美国的第一个全球战略,即"参与和扩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和核心,是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确保 21 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它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即振兴美国经济、军事安全和扩展民主,力图从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实行总体外交,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在此基础上,1997 年美国提出了"塑造、反映、准备"的新战略构想。"塑造"是指建立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反映"是指按照美国的利益迅速处理和解决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危机;"准备"是指防止出现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严峻挑战的"新的全球性对手",并明确指出,"俄罗斯和中国都有这种可能",(2015 年后)对此,美国应早作准备。

克林顿把他的全球战略的实施,建立在东西两大基石上,即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亚用于遏制苏联社会主义的军事同盟——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不仅没有解体,反而进一步扩大和强化。1998 年,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领导北约东扩,第一批吸收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加入,将北约的军事边界向东推进了 650～750 公里。1999 年 4 月,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提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将北约的作用扩大到集体防卫之外,使北约可以在其成员国之外采取行动。1999 年 3～5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就是这一战略新概念的实施。美国和日本于 1997 年制定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它将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日本本土扩大到了日本周边地区,并确定日美可以联手对付亚太地区的紧急事件。美国通过扩大和强化北约及日美军事同盟,目的是加强它对世界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同时,通过扩大和强化北约及日美军事同盟,美国还完成了"冷战"后它同西方盟国关系的最初调整,并在调整后仍维持了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

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是要维护、巩固和发展美国在"冷战"后取得的战略利益和地位,保住和加强美国在世界的头号强国地位和霸主地位。克林顿外交战略取得了一定成就,实现了北约东扩,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宣告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并开始运转,推进中东的和平进程和解决波黑问题已取得成效。但美国在应付"冷战"后世界局势某些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和束手无策。

2. 小布什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

2001 年 1 月，共和党总统乔治·W. 布什入主白宫，在对国际形势进行新的判断基础上，确定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总体战略意图。主要内容有：(1)注重将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物质因素与意识形态的精神因素相结合，把发挥国家实力地位作用和推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相结合，以确保美国的单极地位。(2)强调巩固同欧、亚盟国的传统联盟关系，以此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3)处理国际事务时更倾向于使用实力和采用单边主义，态度也更为强硬。(4)在对华政策上，布什政府继续执行"遏制接触"战略。所谓"遏制"，就是要避免和防止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及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所谓"接触"就是要通过多边或双边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规劝、利诱、威逼中国走向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并利用中国的影响解决某些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

2001 年的"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重大调整：

第一，视本土安全为重中之重。"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国土安全第一"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布什多次表示，防止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进一步袭击是头等大事。2002 年 6 月，布什正式向国会提出组建国土安全部的建议。7 月，布什政府推出了经过 8 个月的反复磋商并咨询过数以千计的政界人士的"国土安全国家策略"。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此类文件，这个长达 100 页的文件提出三个主要政策目标：阻止恐怖分子在美国境内发动袭击；加强国家容易受到恐怖分子袭击的薄弱环节；一旦发生恐怖袭击后，将损害减至最小并加速复原能力。文件还列举了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再次袭击美国本土的种种措施，并具体讨论了建立国土安全部事宜。

成立国土安全部将使布什拥有更大和更广泛的权力，总统在发生危机时可重组联邦政府机构。原本处于竞争状态的各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合作和协调。相关的联邦和州法律将进行修改，扩大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引渡协议，以便更好地对付恐怖主义威胁所带来的新问题。

在内政改革的同时，美国军事部署也进行了大调整。2002 年 4 月，美国首次成立专门负责北美洲大陆安全的"北方司令部"，使之成为美军第五大战区司令部，辖区范围包括美国本土、加拿大、墨西哥。北方司令部在 2002 年 10 月 1 日正式运行，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从 2002 年开始，美国已经放弃了长期以来同时能够打"两场局部战争"的战略构想，将重点转移为能够同时对付美国所定义的"两个入侵者"。

第二，推出"先发制人"战略。2002 年 1 月，布什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以强烈的措辞抨击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把这三个国家称为"邪恶轴心"。从事态发展来看，这是布什日后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埋下的伏笔。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当即遭到一些美国政要以及西方盟国的批评。

2002 年 5 月，布什在访德时首次提到这一概念。6 月 1 日，布什在西点军校向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说："如果等到敌人的威胁已经形成，我们就来不及了。"美国的其他一些政要，也进行了类似的阐述。9 月 20 日，布什正式向国会提交了《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将改变其在“冷战”时期奉行的“遏制战略”，取而代之的将是对那些阴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和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显示了他推行这一战略的决心，并准备付诸实施。

第三，借反恐之机，谋求全球霸业。“9·11”事件后美国实现了在中亚的军事介入。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13个军事基地，驻军已突破6万人。美国曾声称它不打算在中亚长期驻军，但人们有理由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怀疑，因为这使人想起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没有撤出海湾地区，而是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6个国家修建了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人联想到世界岛学说，联系到“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使人不能不认为美国是以一种全球霸业的意图以军事介入中亚。中亚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又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冷战”时期，苏联曾为进攻阿富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仍然被赶出去。军事介入中亚是美国“冷战”时期都没有做到的，现在做到了。美国军事介入中亚使历来是苏联、俄罗斯一部分和势力范围的中亚五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并对中国构成合围。

美国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掌握对中东的控制权。关于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有各种分析，如，为了在中东推广美国式的民主、进一步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了美国的石油利益、为了打压欧元和欧盟经济，等等。世界质疑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又从中分析出各种理由，这一情况恰好说明，美国发动战争并不是为了单一的目的，而是有长远的考虑，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伊拉克是中东较大的国家，控制了伊拉克也就容易控制中东。当前看，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还不如东亚国家和欧洲，但如果它控制了中东，东亚国家和欧盟为保障自己的石油进口就摆脱不了对美国的依赖。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被称为“小布什主义”。

小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特点：

第一，单边主义横行。美国的单边主义是指，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共同体之上，用一国自身的力量解决国际问题。与此相对的是多边主义，既追求自己的利益，又尊重别国的利益，实现自己利益时采用国家合作的方式。

美国单边主义的表现：单方面退出世界各国花了10年的时间于1997年达成的旨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主要的理由是它将对美国的经济不利，引起全球公愤；单方面撕毁1972年同苏联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持消极态度，拒绝接受《禁止杀伤地雷国际条约》，使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限制受阻。最重要的是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抽掉了国际战略稳定的一个基石，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所指出的，“随着反导条约的消失，一切军控条约都名存实亡”。

美国的单边主义还表现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绕过了联合国批准的程序，不顾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在不经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使

国际集体决策体制遭到严重冲击。

第二，追求美国的绝对军事安全。突出表现在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NMD 是保护美国整个国家不受远程导弹的袭击。美国要建立保卫全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违背了 1972 年同苏联签署的有关条约。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 1972 年在莫斯科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条约规定，只允许美、苏双方按规定在各自的首都和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周围建立有限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一条约自建立之后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和安全的基石。美国为建立 NMD 在 2001 年底单方面退出了这一条约。

美国追求绝对的军事安全还表现在美国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开支上。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地位原本已经超强无比。在 2000 年，美国军费已达到全球总军费的 31%～36%。现在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军费，其军事优势将更加惊人。按照美国防务信息中心提供的数字进行计算，美国 2001 年度的军费大体上相当于排在其后的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军费总和。按照现在的预算计划，2003 年度美国的防务预算，将相当于排在其后的 27 个国家与地区军费的总和。

美国追求绝对的军事安全，不仅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引起世界的军备竞赛，也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美国用军事手段颠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权，但又带来了很多问题，消除恐怖主义遥遥无期，“伊拉克战争”胜利后，美国一直面临着伊拉克反对美国力量的攻击。目前，美国不得不宣布将政权早点移交给伊拉克人，变军事占领伊拉克为在伊拉克保持军事存在。为了制约美国在外太空的军事化，打破美国对外太空的垄断，2002 年欧盟决定建立伽俐略卫星定位系统。2003 年中国决定使用欧盟的定位系统。

第三，“先发制人”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有着将“武力政策”合理化和正当化的危险，表明美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更加倾向使用武力。2002 年 5 月以来，布什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谈到他的“先发制人”战略。9 月 20 日，布什正式向国会提交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将改变其在“冷战”时期奉行的“遏制战略”，取而代之的将是对那些阴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和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显示了他推行这一战略的决心，并准备付诸实施。这份文件称，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军事力量遥遥领先，美国的武装力量将足以强大到任何潜在的对手都不会抱有超越美国力量的企图。美国永远也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像在“冷战”时期一样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今后不能再允许敌人“先打第一枪了”。

美国媒体评论说，布什描绘了自从里根总统以来过去 20 年美国最强有力、甚至带有侵略意味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蓝图。布什这一主张等于宣告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美国奉行的“遏制”战略的终结。这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分水岭，将改变二战以后美国对外用兵的原则。这表明美国已经把“军事至上”主义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布什政府推出了“先发制人”战略，旨在增强美国对外采取军事行动和军事干预的合法性，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几率正在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先例一开，其他国家也可能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很可能在

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发新的动乱。

3.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全球战略

2009年1月1日奥巴马在美国面临严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陷于两场无望取胜的战争困境下就任美国总统。为了领导美国走出困境,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的奥巴马总统,遴选美国政坛的精兵强将,不惜招徕对手委以重任,组建了强有力的经济和外交团队,决心振兴美国的经济,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世界各国正密切注视并努力判断白宫易主后的美国外交的走向。其中有以下两点尤其引人瞩目:

第一,外交战略框架的变与不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把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分为三大类,即被冠以“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的“失败国家”或“无赖国家”,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对其领导地位的潜在挑战。因此,美国应对的外交战略框架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即坚持美国在全球、地区以及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现行联盟体系,使之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加强美国认定的民主国家伙伴乃至联盟关系,建立所谓的民主联盟。对其他新兴国家采取接触合作与防范牵制相结合的对冲战略,争取使之纳入现行体系,防范其对美国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危害。敌视和打击所谓的“无赖国家”,“更替其政权”和“改变其政策”两种手法交替运用,直至使用武力推翻其政权。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肢解南斯拉夫;在布什执政期间,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对其实行军事占领。

奥巴马的外交战略与布什的外交战略相比较,不变的方面主要是:奥巴马和布什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目标有明显的共性,即坚持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坚持盟国第一,加强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坚持促进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以及坚持对中国和俄罗斯推行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

变的方面主要是: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单边主义的外交已经行不通,因此与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将更多地推进多边外交,但坚持在多边框架内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将外交置于武力之上,不轻易对外动武。奥巴马尽管在其著作中声称“美国有权对那些准备破坏其目标的国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然而在结束目前两场战争之前美国再发动新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处理与非西方大国和敌对政权关系方面,强调以对话代替对抗,尽量争取以外交手段达到美国设定的目标。这些也就是希拉里推出的所谓“巧实力外交”的主要内涵。

第二,外交议程优先次序的调整。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议程的优先次序将出现重大调整。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奥巴马政府面临三大挑战,即应对迫在眉睫的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结束布什发动的两场战争,以及应对正在崛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面对国际国内严峻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大国均势与协调将会成为奥巴马外交的主要特色。

奥巴马根据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明显有别于布什的新的外交议程。其要点有三:

第一，全力以赴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复兴经济的最优先目标服务。2009 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日益严重，并且开始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以出口带动发展的中国经济也受到影响。振兴国民经济和保障国家安全是奥巴马就任后的两大要务，也势必成为其内政外交政策的重点所在。显然，对刚刚就任美国第 44 届总统的奥巴马来说，围绕应对金融危机，稳定金融体系，复兴美国经济和为此开展有成效的外交，是其政府的最优先议程。

在 20 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前夕，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电话时表示，解决当前金融危机需要各国政府更加紧密合作，希望美中两国在即将召开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加强合作。胡主席也强调，“为有效地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增强信心、加强协调、密切合作”。2009 年 1 月 30 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又通电话。胡锦涛表示，愿同美方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伦敦 20 国集团金融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促进世界经济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奥巴马总统表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中美两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美方期待着同中方在双边及多边场合进行合作，努力稳定世界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两国首脑都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与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相联系，在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奥巴马政府将会出台一系列新的政策和主张。在能源方面，他主张逐步实现能源自给，重点放在提高能源效益和新能源开发上，建议在未来 10 年投入 1 500 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同时给从事这类研究的公司提供税务优惠。奥巴马政府将会改变布什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积极参与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但仍会在多边协调的框架下坚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承担同等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将反恐战略重点转移到南亚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结束两场战争方面，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是，将通过逐步撤军结束伊拉克战争但不放弃伊拉克；在阿富汗战场上，将通过强化乃至扩大军事行动赢得战争。奥巴马认为伊战是个错误，应当结束这场战争。他批评布什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伊拉克战争上，削弱了美国的安全保障和国际地位。他在就任总统后，即指示军方就 16 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出美军制订具体计划。奥巴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我的伊拉克计划》一文，指出他不会把美国军队或美国资源作为在伊拉克保持永久基地这一错误观念的“抵押品”。但是，他也计划在伊拉克留驻部分部队，担负有限的使命，比如打击基地组织的残余势力和确保美国在伊人员的安全。他强调阿富汗局势严重，美应将阿富汗作为反恐主战场，增加美在阿兵力。奥巴马承诺，将把从伊拉克撤出的部分兵力，至少两个战斗旅派往阿富汗。

面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以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为基地对阿富汗境内目标进行恐怖袭击，奥巴马强硬地表示他会让美军不经巴方同意进入其境内打击恐怖分子。他的表态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哗然以及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谴责。布什政府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奥巴马

言出行随，就任总统后即下令对巴基斯坦境内疑似基地组织的目标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进行越境打击，结果造成10多名平民死亡，引起巴人上街抗议。

随着从伊拉克撤军，并把反恐的中心战场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主战场的反恐战争将得到强化。

第三，在多极框架下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2009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全球趋势：转型的世界》报告旨在为新上任的总统提供全球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报告指出，美国新总统面临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性挑战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全球地位的下降，世界正迈向多极，尽管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这两年来，美国国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多数人认为单极世界正在结束，美国必须面对新兴大国崛起的事实，采取合适的应对战略和政策。

奥巴马虽对世界多极化进程有所认知，但强调美国要在多极格局中发挥独一无二的领导作用，把重建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当作其外交战略的核心。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要应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自由的挑战以及像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为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奥巴马重视加强和将重建必要的联盟和伙伴关系，认为民主国家是最有价值的盟友。在亚洲，首先要维持同盟国的强有力的关系，要加深与像印度这样的关键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他称印度是“天然战略盟友”。他同时也提出加深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关系。他强调，“如果他能当选总统，我将把外交重心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除了由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态势，这里也存在许多美国外交政策需要面对的热点和潜在热点问题”。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特点

从“冷战”到“冷战”后，美国的霸权野心不断膨胀，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到在全球大力扩展民主与自由市场；从充当西方世界的盟主发展到确立“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并不时大肆动用武力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以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霸权战略并非美国所独有，但战后美国的霸权战略与历史上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美国特色。

第一，联盟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撑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同时美国维持联盟体系与在势力范围内施展霸权的方式别具特色，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和势力范围，形成一个包围对手的网络。

第二，美国竭力赋予其霸权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为自己的霸权扩张披上道义合法的外衣是几乎所有霸权国家所通用的手法，而美国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维护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成为其动员国内社会力量

支持政府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以及号令西方世界的大旗，而且凭借各项实力的巨大优势，以及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问题与挫折的反衬之下，美国所极力推广的价值原则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与制度成为规范国际社会的原则框架。尤其在“冷战”结束以后，道义的旗号与标准从具有防范意识的反苏反共转变为更加自信、自傲和更具进攻性的在全世界推广所谓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为其所谓的价值标准开道。同时，美国霸权战略的道义目标与道学面具绝非不计成本，现实利益与实力的算计始终是美国霸权战略中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把“促进民主”作为旗帜的同时，美国并不放弃现实主义外交，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仍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并将“双重标准”作为调和道义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手段。在“冷战”期间，遏制苏联的霸权战略基本上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共同要求。“冷战”后，如何实现“促进民主”和守护现实国家利益的统一，再次引起美国国内的广泛争论。

第三，文化战略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经济、军事强势不仅将其消费文化、娱乐文化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美国政府将对外文化宣传置于全球战略的高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既是“冷战”中为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需要以及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出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美国优越论以及美国应该拯救世界的救世主义传统。1948 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案”，强调通过新闻媒介加强对外宣传，并授权美国政府指导国际“情报、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1950 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冷战”纲领的著名的 NSC68 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为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期间，美国历届政府都重视利用国际广播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心理战，强调美国需要一个“更响亮的声音”，但它“不能吵闹、刺耳”，必须“保持富有人情、手法灵巧”的特点。同时，美国各大基金会、各种民间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对外交流活动一直是美国政府文化战略的得力助手。

本章小结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超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的确立具有特殊的条件和基础。20 世纪以来战争因素的拉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不断创新和奋发进取的精神、二战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战后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出现了自 1854 年以来美国经济最长的增长期。2008 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遵照分权制衡学说，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潮占上风，并对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发

展演变。“9·11”事件的发生加大影响了美国的传统安全观，美国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世界和其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并开始对全球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更加追求绝对安全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浓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构成新的挑战和威胁。

重要概念

美国新经济　三权分立　相互制衡　新保守主义　新孤立主义　新帝国主义　遏制战略　超越遏制战略　参与扩展战略　单边主义　先发制人战略

思考题

1. 如何认识“冷战”后美国社会出现的极端主义思潮？
2. “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21 世纪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冷战”时期，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战略是(　　)。
A. 和平战略　B. 解放战略　C. 遏制战略　D. 缓和战略
2. 美国最先提出遏制战略理论的是(　　)。
A. 亨利·基辛格　B. 兹·布热津斯基　C. 乔治·凯南　D. 卡尔·多伊奇
3. 美国最早正式提出“人权外交”的是(　　)。
A. 杜鲁门政府　B. 尼克松政府　C. 里根政府　D. 卡特政府
4. 美国总统制的特点是(　　)。
A. 总统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　B. 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
C. 总统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D. 总统由选举委员会任命
5. 1989 年美国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其核心内容是(　　)。
A. 放弃对苏联的军事遏制，停止核军备竞赛
B. 扩大自由国家大家庭，把苏联势力推回本土
C. 以实力为后盾，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
D. 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纳入西方社会体系

6. 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战略是(　　)。

A. 超越遏制战略　　B. 世界新秩序战略
C. 接触战略　　D. 参与和扩展战略

7. 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发动地面战争是在(　　)。

A. 艾森豪威尔时期　　B. 肯尼迪时期
C. 约翰逊时期　　D. 尼克松时期

8. 标志着“冷战”开始的事件是(　　)。

A. 八千字电报　　B. 铁幕演说　　C. 杜鲁门主义　　D. 北约成立

二、多项选择题

1.“尼克松主义”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其实质是(　　)。

A. 通过适当收缩、减轻国内外压力
B. 通过缓和对苏关系、扭转战略上的被动
C. 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加强对苏的制约
D. 通过牺牲盟友、延缓自身的衰落
E. 通过维持均势、确保美国的霸权

2. 与遏制战略相比,超越遏制战略的特点是(　　)。

A. 目标更大　　B. 空间更广　　C. 对象更多
D. 手段更多　　E. 主体更强

3. 克林顿政府对外战略的重点有(　　)等。

A. 实现和平、统一、民主的欧洲　　B. 建立稳定、繁荣的亚太共同体
C. 保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繁荣　　D. 维持强大的美国军事及外交能力
E. 应付核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跨国性挑战

4. 美国的人权外交手段主要有(　　)。

A. 对人权问题实行政府干预
B. 利用国际组织在多边外交中提出人权问题
C. 将人权外交与经济援助、制裁相结合
D. 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借口下,实施军事干预
E. 将人权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结合起来

5. 中国处理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是(　　)。

A. 坚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B. 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C. 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D. 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正确处理两国间的分歧
E.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特点是(　　)。
A. 联盟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
B. 始终把反恐放在首位
C. 文化战略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D. 竭力赋予其霸权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
E. 强调与联合国的合作
7. 2001 年的“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　　)三个方面的重大调整。
A. 单边主义横行
B. 视本土安全为重中之重
C. 推出“先发制人”战略
D. 追求美国的绝对军事安全
E. 借反恐之机,谋求全球霸业

答案:

单项选择题: 1. C　2. C　3. D　4. A　5. D　6. D　7. C　8. C
多项选择题: 1. ABCDE　2. ABD　3. ABCDE　4. ABCD　5. ABCDE　6. ACD　7. BCE



迈向一体化的欧洲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掌握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动因以及过程。了解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冷战”结束后，欧盟进一步东扩的动力以及扩大后欧盟面临的问题以及前景。

重点与难点

-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背景。
- 欧盟东扩的动力以及一体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
- 欧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欧洲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近代科学文化与技术发展最早的地区。从15世纪起，欧洲人凭借着"坚船利炮"，在世界各地侵略扩张，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居于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地位。但在20世纪不到50年的时间内，欧洲相继爆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把人类拖入了深重的灾难。欧洲从此也失去了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二战后，在新的国际秩序下，迫于当时政治与经济的需要，欧洲走上了联合自强之路。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欧洲一体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当今世界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尽管在一体化的道路还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境，但欧洲一体化是大势所趋。随着欧盟的扩大和深化，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欧洲的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迄今为止，经济领域的一体化程度最高。从最早的煤钢共同体到欧元的正式启动，欧共体/欧盟先后经过了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统一大市场和货币联盟，经济一体化逐步走向深入。

（一）从关税同盟到统一大市场

关税同盟是西欧经济一体化的基石。《罗马条约》第九条指出，共同体应以关税同盟为基础。关税同盟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内部工业品关税，统一对外关税。关税同盟的建立为成员国之间的产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从而为促进它们之间的专业化和协作，开辟了一体化的道路。

进入20世纪50年代，西欧各国经济步入迅速发展阶段，相互间贸易额增加。在东西方对峙和西欧各国海外市场缩小的形势下，西欧国家力图通过促进对本地区的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在原有的比、荷、卢关税经济同盟的基础上结成六国关税同盟，建立共同市场，扩大共同市场内部贸易，对保护成员国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生产率不一，自然经济条件差异很大，对建立关税同盟的态度不一样，西德对建立关税同盟最为积极。但是，战后西欧国家在恢复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现代化大生产需要广阔的市场。六国建立共同市场，就可以保护和促进成员国的工农业发展，免受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廉价商品的竞争，在这方面六国利益是一致的。欧共体的关税同盟就是在此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相互妥协，最终建立起来的。

为了实现关税同盟，欧共体采取了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办法，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取消内部关税。这是实现关税同盟的第一步骤。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关税同盟应从1959年1月1日起，经过12年，分3个阶段，每阶段4年减税，到1970年1月1日建成。《罗马条约》实施以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为加速增强成员国共同市场的竞争能力，于1960年5月决定加快削减内部关税的步伐，分别在第一阶段（至1960年12月31日）、第二

阶段(至1962年7月1日)实现了比原计划多减税10%的幅度。因此,第二阶段结束时,内部关税的削减达到80%,余下的20%在第三阶段中,分别在1967年7月削减5%和1968年7月削减15%。整个削减内部关税于1968年7月提前一年半全部完成,实现了六国之间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同盟。

第二,统一对外关税率。1968年7月,在取消内部关税的同时,共同市场原六国对非成员国工业品实现统一的关税已成为必然。因为在各国的对外税率方面,由于成员国间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关税保护。如果各国仍保持不同的对外税率,则非成员国产品势必通过卢、比、荷和西德等低关税国家进口,然后通过共同体内免税的条件再流入法国和意大利市场,因此《罗马条约》规定逐步实行共同的对外税率。为保护本国利益,各国都希望按照本国现行税率来制定共同对外关税。如果按照高税率国家的水平(如法国、意大利)制定共同对外关税,就会影响到低关税国家(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对第三国的贸易;如果按照低关税国家的水平(如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制定共同对外关税,则会影响高关税国家(法国、意大利)的国内生产。

经过讨价还价,六国最终达成妥协:采用兼顾各国利益原则来制定共同对外关税,即把当时的六国分为4个关税区(法、意、德各为一个关税区;荷、比、卢为一个关税区);将4个关税区在1957年1月1日实际实施的关税率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共同税率。成员国1958年1月1日的平均关税率:法国为22%,意大利18%,联邦德国11%,卢森堡、比利时、荷兰9%。法国、意大利两国原税率比平均税率高,便分阶段逐步调低,联邦德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原税率低于平均税率,则分阶段逐步提高。六国税率分三个阶段拉平。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内,将各自的税率与统一税率之间的差距各缩小30%,共为60%,余下的40%于1968年7月1日拉平。制定统一对外关税率比《罗马条约》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半实现。

第三,实行统一的对外差别关税。欧洲共同体根据商品种类和来源国分别采取了差别关税的做法。按照洛美协议的有关规定,欧共体对来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属于共同体联系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一般适用特惠税率;对来自自由贸易联盟、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品适用协定税率。1969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决议: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输入发达国家的商品,特别是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应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关税待遇。欧共体是西方工业国家中第一个响应并实施普惠制的。欧共体于1971年7月1日开始实施普惠制,最先适用于"77国集团"的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等国,之后陆续扩大到罗马尼亚、中国等。目前约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普惠制。1992年普惠制实施方案中,欧共体提出,鉴于新加坡、香港地区的发展水平,已不再给其普惠制。至此,六国关税同盟正式建成。

1973年1月,欧共体第一次扩大,作为新成员国的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三国之间,以及三国与原六国之间的关税,也按步骤分期减税。即:自1973年4月起,每年削减20%。到1977年7月1日,完全取消三国与六国之间的内部关税,建立九国关税同盟。1986年希腊也同九国实现了互免关税。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年1月1日正式加入欧共体后,这两国的

关税也从1986年3月1日起逐年进行调整，过渡期为7～10年。实际上，到1993年1月1日，两国就完全取消了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并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从而实现了十二国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的建立，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商品、人员、劳务、资本的自由流动，有效地抵御了外来经济的冲击和竞争，对成员国经济发展和西欧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西欧一体化，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主要有：

第一，促进了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发展。关税同盟逐步建立后，关税同盟的区域性和排他性表现在实行“内外有别”的贸易政策，对第三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扩大了成员国的出口市场，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使第三国同成员国的贸易受到排斥而削弱，所以关税同盟的建立加强了成员之间的相互贸易关系，促进了内部贸易迅速增长。

第二，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由于实行一致对外的关税，使共同体范围内的新兴产业免受外来竞争，为共同体成员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第三，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共同的关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影响生产领域。在共同体内部统一的商品市场上，失去了关税保护的各成员国企业，既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同时也为占领别国的市场提供了机会。因此，为了应付竞争，追逐更高的利润，各国垄断资本加速了集中和垄断。主要表现有：中小企业倒闭和企业合并的现象越来越多；企业联合的规模越来越大；欧洲跨国公司发展迅速，出现了巨型垄断企业。

第四，促进了经济增长及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在取消了关税保护的自由竞争中，各国被迫充分利用本国和世界的最有利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科学技术，进行专业化生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由于生产专业化的加深，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

早在1957年的《罗马条约》中就规定了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全面的关税同盟生效后，欧共体六国在1963年1月1日又开始实行共同农业政策，1968年实行农产品统一价格，1969年取消了农产品关税，欧共体内部的农产品也实现了自由流动。统一大市场的第一步目标业已实现。关税同盟和农业共同政策为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次石油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高失业率，使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趋于紧张，非关税壁垒再次成为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贸易发展的障碍，一些成员国在无法设置关税或配额的情况下，往往以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或对陷入困难的企业给以补贴等方式，限制其他成员国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并想方设法把本国商品打入其他成员国市场。在整个80年代，欧洲经济萧条、产业结构重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对欧共体的作用和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欧共体能否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共同市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一体化的步伐。

1986 年，共同体 12 国签署通过了对《罗马条约》作出多方面修订的《单一欧洲法案》，并于 1987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了正式峻工的最后里程。

《单一欧洲法案》致力于从经济发展和机构改革两大方面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包括金融自由化、竞争政策、统一税收、就业政策等许多十分重要的立法建议，并就统一市场内企业及个人的权利等问题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宣称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不仅要致力于形成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具有高度效能的经济实体，而且要使共同体内的生活质量达到更高的水平，后者包括实施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和共同的社会福利政策。

在机构改革方面，《单一欧洲法案》指出，必须赋予欧洲共同体建立富有实效的统一市场所必不可少的权力，逐渐改革共同体的机构设置和决策体系。这方面的措施包括：(1)赋予欧洲议会更大的发言权。1987 年欧洲议会获得了参与共同体立法过程的权力，可以更加充分地履行其在监督、咨询、修正法案和审议预算方面的权限。(2)建立更合理的决策机制，主要是针对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的决策方式和程序进行改革。(3)赋予欧共体执行委员会更明确、更全面的实施权限，以保证共同体达成的各项协议和已经制定的诸多共同政策切实充分的实施。

与 20 世纪 70 年代停滞不前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80 年代统一市场的建设可谓前进了一大步，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对《单一欧洲法案》所建议的完成统一大市场所需采取的 282 项立法措施，欧共体委员会在 1989 年底已对其中的 90%提出了具体建议。到 1990 年 6 月，185 项立法措施获得了部长理事会的批准，各成员国在将共同体措施转变为本国立法方面也落实了大部分。同时，各国也在加紧行政、经营、法律以至语言方面的人员培训和各种准备工作，以适应即将到来的统一大市场的需要。而此后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又在完善法律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1991 年确定的《欧洲联盟条约》规定，欧洲委员会有权对共同大市场的事务行使监督和管辖，并且可以对不服从条约规定的成员国实行财政罚款。该项规定不仅在法律上保证了统一大市场的顺利实现和运行，同时更有利于督促成员国尽快地将共同市场的有关法律条文转变为国内的法律，真正实现统一大市场。经过欧共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到 1993 年 1 月 1 日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如期建成。随着欧元的启用，统一大市场更加名副其实。欧盟在 2004 年实现东扩以后，统一的大市场也随之向东扩展。

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建成，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为欧盟货币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另外，从国际大视野来看，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增强欧洲的整体实力，加重与美、日竞争的砝码，使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向着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发展。

(二) 共同的农业政策的形成

共同农业政策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时就开始与关税同盟一起实施的重要政策，是欧

洲共同体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为成功的领域，也是争议最多的领域。农产品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各成员国对本国农业都给予高度保护和干预，并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和价格扶持。在这种条件下，要建立农产品的共同市场，就必须实行一项“共同的农业政策”，把各国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和干预变为共同的保护和干预，使任何成员国的农业不致因市场大开放而遭到重大破坏。

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在《罗马条约》第 39 条第一款中做了明确的规定：(1)促进技术进步，保证农业生产的合理发展，并最适当地利用生产的各种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以提高农业生产率。(2)保证农业人口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水平，主要是通过增加从事农业人员的个人收入达到这一目标。(3)稳定市场。(4)保证经常的供应。(5)保证对消费者合理的价格供应。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还对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组织机构、建成共同农业市场的措施和建立农业保证基金等作了具体的规定。《罗马条约》生效后不久，1958 年 7 月在意大利的斯特雷扎召开会议，六国代表专门研究了农业问题，对未来的共同农业政策提出了一些指导性原则。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共同体执委会经过近两年的准备，于 1960 年 6 月向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提出了关于拟定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原则意见。部长理事会也在当年 11 月通过了关于制定共同农业政策的原则意见。从 1961 年 12 月到 1962 年的 1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共同体农业部长理事会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确定了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单一市场的原则。在欧洲共同体建立以前，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农产品贸易的各种障碍，各自对农业实行的是不同的政策。所以首先要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农产品要在成员国间自由流通，每个成员国的农产品市场，均成为这个单一市场的地区性市场。协调农业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市场组织和共同政策，形成统一的农产品价格，形成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第二，共同体优惠的原则。由于世界农产品的价格大多低于欧盟农产品的价格，为了防止外来廉价农产品对本地市场的冲击，欧共体决定对共同体以外的国家实施共同的关税壁垒。在各成员国的农产品市场上，本地产品的销售可以得到优惠。

第三，建立共同农业基金原则。为了支持共同农业政策，欧共体设立了“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其核心职能是为共同农业政策提供资金保障。最初的设想是仅用农产品进口的关税来支持共同农业政策，但随着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和对外保护措施的加强，农产品进口大量缩减，导致关税减少，而农业保护政策的费用比原来预计的要高，使得欧共体不得不从各成员国筹集资金用于农业政策支出，自 1971 年起，共同农业政策的费用开始纳入欧盟的总预算，但具体支出主要通过“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来贯彻和落实。农业基金分“保证”和“指导”两部分，前者用于干预收购和出口补贴，占基金绝大部分。后者用于资助各国的农业结构改革。有关共同农业政策的财政收支，不论涉及哪种产品或哪个国家，均按

统收统支的原则通过这一基金处理。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自纳入共同体预算后，在整个共同体的预算中，一直是最大的开支项目。而农业基金的绝大部分又是用于保证部分，这样为共同体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欧洲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实施以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规定的主要目标已基本实现：各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农产品贸易的障碍，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农产品市场建立了起来；其保护价格制度成功运转，保持了市场的稳定和农业部门收入的稳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共同体不仅大部分农产品都实现了自给，而且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欧洲共同体从世界上最大的温带农产品进口者变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农产品出口者。

但是，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也有一些目标尚未实现，并且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例如，鼓励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到其他部门的目标未能实现；农业保护政策本身引起了农产品的大量过剩，竞争力下降；巨额的农业补贴，不仅加重了共同体的财政负担，而且引发了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共同体与农业大国——美国之间的矛盾。

（三）货币联盟的建立

1999年1月1日欧元终于诞生（实际启动的日期为1月4日），欧元的诞生是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最为重大的成果，也是继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内部统一大市场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大的飞跃。

20世纪60年代末，在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两项主要的一体化计划完成后，随着巩固和继续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解决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成员国之间货币汇率、国际收支、共同农业价格等一系列的新问题，欧洲货币合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69年12月于荷兰海牙召开的共同体首脑会议正式提出把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经济共同体的一项重要目标。欧洲货币合作由此进入开始时期。

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首先是发展共同体内部贸易和巩固关税同盟及共同农业政策的需要。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使得限制外来的商品、推动共同体内部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贸易方面，随着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扩大，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贸易顺差和逆差，逆差成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危机时，货币大幅度贬值，迫使它们采取进口限额措施抵制进口，从而使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发展受到影响。另外，在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由于各成员国货币汇率变动，导致农产品共同价格执行发生困难的状况。因此，共同体成员国认识到实行货币合作是促进内部贸易发展、巩固关税同盟、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保证。

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也是西欧国家为了摆脱对美元的严重依赖和美元危机的不利影响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美元危机的频繁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货币市场出现一片混乱。这也殃及到共同体国家的货币汇率，导致了法国法郎贬值和西德马克升值。因而为进一步摆脱对美元的严重依赖和抵制、转嫁美元危机，也迫切需要建立经济

和货币联盟,使西欧货币处于相对稳定。

此外,欧共体各国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其黄金和外汇储备部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为建立地区性货币体系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

1970 年 10 月卢森堡首相维尔纳领导的专家小组制定的"关于在欧共体内分阶段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维尔纳计划"正式出台。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对共同体的全面影响,要在 10 年内分三个阶段建立欧洲共同体经济和货币联盟,实现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四个流通。但是,到了 70 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爆发,欧共体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情况恶化,经济与货币联盟最终不了了之。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完全崩溃,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美元危机日益影响欧洲货币的稳定性。70 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美元危机不但招致欧洲货币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而且对欧共体成员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摆脱美元波动对它们经济的冲击,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便成为共同体国家的唯一对策。

第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了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也制约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促进各成员国贸易的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三,70 年代末期,各成员国经济情况开始逐渐好转,通货膨胀率有了一定减缓,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欧共体正式建立了"欧洲货币单位",形成一个货币稳定区。"欧洲货币单位"承担多种职能:确定成员国之间的中心汇率,设立埃居为统一货币的兑换单位并作为成员国货币的储备资产。

1988 年 6 月,欧共体首脑会议提出了建设经济货币联盟、发行统一货币的目标。当时的欧共体执委会主席德洛尔为首的"经济和货币联盟委员会"提出分三阶段实施单一货币的计划。

第一阶段,从 1990 年 7 月 1 日开始,目标是在成员国之间实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以稳定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合作。

1993 年 11 月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提出了经货联盟第二、三阶段建设的具体措施与时间表。《马约》规定第二阶段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目标是为统一货币作法律与技术上的准备,建立欧洲货币局,作为未来欧洲中央银行的过渡性机构,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同。欧盟正式运作后,1994 年 1 月 1 日,欧洲货币局在法兰克福正式成立。1995 年 12 月,马德里首脑会议决定于 1999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单一货币,并将统一货币定名为欧元(EUR)。1996 年 12 月,都柏林首脑会议确立了欧元的法律地位,决定欧元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成为欧元区的法定货币,并于 2002 年 1 月 1 日进入流通,与成员国货币并存,

成员国货币将于2002年7月1日退出流通。会议还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和《第二货币汇兑机制》两个法律文件。1997年6月，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正式批准了上述两个文件。1998年2月2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成员国经济趋同达标情况，除希腊外欧盟14国都基本达到了《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5月2日，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宣布，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爱尔兰、芬兰11国为首批"欧元国"。希腊因为经济没有达到标准而不能成为首批欧元国家，英国、丹麦和瑞典则主动留在欧元区以外，暂作壁上观。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并于1月4日进入外汇市场交易。全年总体运行正常，但对外汇率持续下跌，全年发行欧元债券6 022亿美元，占国际债券发行总额的45%，超过美元债券，居全球首位。2000年3月，希腊成为欧元区第12个成员国。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投入流通领域，取代了欧元区各国货币。货币联盟这一进程尽管充满着矛盾与困难，但毕竟使欧洲联合又前进一步，使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更加有力。共同体——欧盟逐步从生产、流通领域发展到更高层次的金融、货币领域，为进一步的政治联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已经建立起来，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和欧元的流通使用，赋予欧盟以强大的经济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使得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主权进一步向欧盟集中，这对欧洲以至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欧元的诞生必然增强欧盟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政治上来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及欧元的流通使用，使欧盟形成了联邦制式的中央银行体系和货币运行制度，使得各成员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欧元诞生以后，欧元区的经济实力高于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经济强国，同时欧元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因此，在欧盟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欧元无疑将会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和较高国际地位的货币。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深和发展，欧元的国际地位还会有所上升。欧元的产生对美元的霸权必将产生冲击，因为欧盟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欧元将成为一种强势货币。欧元在世界金融中的份额至少将会与欧盟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相等，从而逐渐地与美元的地位接近。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提高肯定会引起世界金融市场的震荡，比如国际投资从美元转向欧元就会导致汇率的波动，从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欧元的产生将刺激欧洲资本市场的发展。欧元对欧洲资本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欧洲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市场带来的变化上。一方面，欧元有利于成员国股票市场的整合与统一，进一步促进竞争。另一方面，各个交易所之间的差距缩小，加之技术手段的统一，会加快欧洲股票市场的联合以增强整体实力。

最后，欧元的启动还会增强欧洲企业的竞争力。欧元的使用，可以大大减少欧盟成员国

之间的交易费用，使欧盟成为一个统一的投资市场，为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提供有利的金融条件和环境，经营者在欧盟内部的贸易中不再需要期货市场上用套期保值的交易来避开汇率波动的风险，游客在欧洲旅行不必再多次支付换取货币的费用。欧元的使用，可以增大欧盟内部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效率水平，并增强欧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

二、政治一体化的进展

（一）欧洲政治联盟的形成与发展

欧洲的联合是从经济上开始的，但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追求政治上的一体化。1957 年的“罗马条约”虽然没有关于共同体政治一体化的条款，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早期设计者在 50 年代初筹划经济联合时，就把欧洲政治联盟看成是欧洲合作的最后阶段。共同体发起人设想了一条“首先通过经济一体化，随后政治一体化，最后军事一体化而达到欧洲的统一”的道路。六国外长在谈判和草签《罗马条约》时，曾达成原则协议：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到一定阶段时，即开始规划政治一体化，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不过，由于政治一体化涉及全面削弱和转让国家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一个主权仍然主导的当代国际关系中，欧洲共同体的政治一体化注定从一开始就步履艰难。

1960 年 7 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会晤时，提出加强欧洲政治合作，建设“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企图组成一个政治联盟，使西欧成为能抗衡超级大国的第三种力量。但由于法德两国的分歧，建立政治联盟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

在政治同盟问题上，法国和联邦德国同床异梦。法国力图充分利用它的国际地位，组织一个由它占主导地位、以法、德为轴心的政治联盟，使共同体在法国领导下，成为与超级大国匹敌的“第三种力量”。因此，法国希望建立一个“邦联”，而联邦德国则希望建立起一个“联邦”。联邦德国想借助于“联邦”自然而然地摆脱其战败国地位及其束缚，以便增强实力，把一个处于大西洋联盟内的“超国家”的“欧洲联邦”控制在手。而英国一直忌讳法国的领导作用。在英、法的暗斗中，都特别重视争取西德的支持。联邦德国希望借助于英国的加入来平衡法国的力量。在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欧共体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一体化仍无所建树。

1968 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震撼了整个西欧，使它们深感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同时由于美国深陷侵越战争泥潭，美国霸权地位急剧衰落。一方面，西欧感到单纯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难以维护西欧的安全，有必要加强政治上的联合。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的提前实现，也要求共同体加强政治上的一体化，来为进一步的经济一体化开辟道路和提供动力。于是，欧共体各国暂时避开“联邦”与“邦联”之争，而着眼于政治上的合作。

1969 年底，六国首脑会议达成加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决议，表示“决心为一个统一的欧

洲铺平道路”。六国外长于翌年10月开会发表了“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强调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决定六国外长每年举行两次定期协商以协调外交政策，使“欧洲能够用一个声音在世界上说话”。1972年10月的九国首脑会议决定把外长会议增加到每年四次，明确指出它是在“共同市场”范畴之外举行的，并具有独立于美国影响之外的性质。这次首脑会议的最大成就就是明确规定在70年代末建立“欧洲联盟”。

共同体扩大为九国后，在“欧洲联盟”问题上，形势更趋复杂。英国加入了领导权之争。但是，政治联合已是大势所趋，况且，共同体要进一步推进经济——货币联盟，协调有关财政、贸易与货币政策以及立法，都离不开政治同盟，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西欧政治联合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在建设统一的西欧方面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

1974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共同体首脑会议，是共同体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公报宣布将首脑会议定期化，后被命名为“欧洲理事会”。它是共同体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举行三次。会议还表明了尽快举行欧洲议会的直接普选和加快实现欧洲联盟的意图。

1976年9月，共同体就欧洲议会议员从各国议会指派过渡到直接投票选举达成协议。第一次普选于1979年举行，选出410名议员组成新议会。加强在外交政策上的协调和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这是70年代欧洲共同体政治一体化的重要进展。

正当欧洲一体化建设紧锣密鼓地展开时，国际形势骤变，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剧变的世界格局也向欧共体提出新的挑战。外在压力的减弱使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和尖锐化，美、欧、日在经济领域的激烈争夺成为90年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出于维护和加强自身地位的需要，欧共体势必要加速其一体化进程，密切成员国间的联系，以利于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这使得法国和德国都希望加强共同体的政治一体化。在法国和德国的倡议下，1991年12月在荷兰的一个小镇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欧洲共同体部长委员会上，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于1992年2月签署。

《马约》宣告，在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欧洲联盟即欧盟，同时，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及“司法与国内事务领域的合作”。将原来的欧洲共同体保留，加上“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及“司法与国内事务方面的合作”，构成欧洲联盟的主体。从此，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及“司法与国内事务领域的合作”成为欧盟的三大支柱。

《马约》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欧共体各成员国不仅把经济决策主权，而且把相当部分的政治主权让渡给超国家的共同体，使得欧洲联合又向纵深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虽然因为英国的坚决反对，《马约》没有用“联邦”的字样来表述联盟，而只是提出建立“成员国和政府间更紧密的联盟”，但是，从《马约》的精神看，欧洲联邦似乎是欧洲一体化的最终归宿。

1993年5月丹麦第二次公民投票批准经修改后的《马约》，《马约》因此而为所有欧共体成员国批准，欧洲联盟正式成立。1995年1月1日，奥地利、芬兰、瑞典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扩大为15国，人口增至3.7亿，总面积增至323万平方公里。

《马约》生效以后，为了解决欧盟扩大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1997 年 6 月，欧盟 15 个成员国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首脑会议，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对《马约》进行了修改，使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阿姆斯特丹条约》是继《单一欧洲法令》和《马约》之后为修订欧洲共同体各条约而进行的第三次一揽子改革。

随着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盟加大了内部政治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核心是推进民主化进程，赋予欧洲公民真正平等的跨国公民权，为此欧盟制订了《基本权利宪章》以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2001 年，欧盟尼斯首脑会议对欧盟机构的改革和调整方案的《尼斯条约》予以正式批准。《尼斯条约》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欧洲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成员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种合作机制，欧洲联盟的三大支柱之一。欧共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早开始于 1969 年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共同体海牙首脑会议上建议成立的欧洲政治合作，在此之前，欧共体有过 1952 年、1961 年的各方面的尝试。

尽管早期主张欧洲一体化的联邦主义者一直梦想有一个欧洲的外交政策，但是无论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还是《罗马条约》，在外交与防务问题上都是一片空白。作为共同外交与防务的尝试，1952 年的欧洲防御共同体计划与 1961 年的欧洲政治联盟计划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战后从政治意愿出发的欧洲一体化，尽管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硕果累累，但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却裹足不前。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终于使欧洲政治联合进程开始启动。成员国之间第一次产生了外交领域的政策协商形式——欧洲政治合作机制。1970 年，共同体海牙首脑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政治与外交合作问题。受共同体首脑会议的委托，比利时外交官达维农主持设计了一个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即所谓的“达维农机制”。它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举行外长定期会议协调成员国对世界某一地区或特殊议题的立场。外长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每年至少举行两次。部长理事会之下是外交政治代表会议，最初计划是 3 个月一次，但实际上每月一次，这一机构相当于欧共体机制中的常设代表委员会。欧洲政治合作机制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和协调制度。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欧共体成员国加强了协调与合作。在 1973 年 1 月举行的欧安会预备性会议中，欧共体联合提出了议程草案，从而在外交领域中首次采取行动。在促进 70 年代中期的东西方缓和的进程中，西欧各国协调立场，采取了大体一致的立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欧共体集体做出反应，对苏联予以严厉的谴责。1980 年 6 月，欧共体十国首脑发表了有关中东问题的《威尼斯宣言》，第一次公开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主张巴勒斯坦组织参加中东和谈进程，显示了与美国不同的态度。1987 年《单一欧洲法令》第一次把这种合作纳入欧洲共同体的条约框架。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特别是欧洲的种族冲突和海湾危机，使加强外交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成为摆在欧共体面前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欧共体/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加快了政治一体化进程。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特别强调“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确定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本框架。该条约使成员国在外交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法律依据和相应机制。在90年代以前，欧共体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始终停留在政治合作的基础之上，成员国在外交领域中交换信息，相互磋商，以求共同行动，使欧共体成员国“用一个声音说话”取得了一些成就，提高了欧共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种政府间合作的性质，缺乏共同行动的必要保障，缺乏必要的条约保障和法律保障，往往显得软弱无力。如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和前南内战中，欧共体最初的回应是果断的，但欧共体成员国发生了立场分歧，凸显了欧共体外交与安全政策协商机制和军事行动能力的缺乏。而此时的《马约》不但强调共同外交与安全，而且把一直被排斥在欧共体政治合作大门之外的防务问题作为尽快实现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取得进展以及欧盟整体角色意识的日益增强，加上即将开始的欧盟东扩，欧盟成员国关注如何在《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各成员国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不断反思的基础上，经过了1996—1997年的政府间会议和阿姆斯特丹会议，最终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其中对欧盟条约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相关条款做了新的修正和补充。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推动欧盟国家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反思，在2000年的尼斯欧盟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完善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如调整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它将负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与共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包括共同行动的组成(如快速反应部队)。

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共同外交与安全防务领域取得空前的成就，既有来自外部国际局势变化的压力，又有自身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动力。

首先，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两极格局崩溃，“冷战”以来欧共体一直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复存在，从而可以减轻对美国的依赖，进而拥有了发挥更大国际影响的有利机遇。欧洲乃至世界格局重组，中东欧国家纷纷向欧盟靠拢，欧盟(欧共体)在欧洲的核心地位凸显。加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一体化进展顺利，使欧盟增强了在欧洲乃至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信心。

其次，“冷战”结束以后，安全问题和军事力量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地位下降，经济和政治议程的重要性大幅上升，制约欧共体发挥更大国际影响的另一外部结构限制得以排除，欧共体作为一支巨大的经济力量和重要政治力量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作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一旦欧共体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合作体制得到加强，欧共体将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

再次，“冷战”后，欧洲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影响欧洲安全和稳定的是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纠纷引起的地区性冲突、恐怖主义袭击以及欧盟周边地区一些

危机外溢造成的难民问题，另外还有经济下降、基础设施的破坏和环境恶化等非传统的影响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欧洲不能也不应该再依赖美国，而要靠欧洲自己，由欧盟来解决这些问题被各国视为最佳选择。因此，欧盟有必要增强外交与安全事务方面的功能，加强防务建设，使欧盟具有独立解决地区性危机和冲突的能力。

最后，随着德国的统一，欧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盟各国人民迫切希望能加快政治合作的步伐。欧共体在"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危机中的笨拙表现加剧了人们的渴望。在处理前南斯拉夫危机的过程中，欧共体的表现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推动着欧共体各国对外交政策合作机制进行反省，审视其缺陷，寻找改革之路。

为了进一步加强外交与安全领域的能力建设，1999 年 6 月的科隆欧洲理事会要求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下发展独立的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2000 年 12 月尼斯欧洲理事会则批准建立理事会内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2001 年底，西欧联盟的某些职能将纳入欧盟框架之内，而到 2003 年欧盟将组建一支 6 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军的建立。

尽管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战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由于成员国在利益上的分歧。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具体的实施中往往是虎头蛇尾，或是仅有语言没有行动，尤其欧盟中的大国英、法、德大国各自有自己的考虑，英国长期在共同安全防务等问题上扮演消极角色，德国由于考虑到又自己单独实行一项外交或安全政策容易导致其他国家的顾虑和不安，因而倾向于推动共同外交或安全政策向超国家性质的共同体模式发展，而英、法则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上倾向于强调国家的控制权。这些因素导致成员国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态度、热情和行动不一致。例如在对待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上，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支持对伊拉克动武，而法、德则表示强烈的反对，欧盟陷于严重的分裂，出现了所谓的"新欧洲"与"老欧洲"。另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运作机制上也存在着缺陷，它的决策程序仍然为一致决定原则，这显然不能满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有效运行的需要。

（三）欧盟的司法与内务合作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欧共体/欧盟成员国在司法和内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也逐渐地发展起来。欧盟的司法与内务合作就是要促进各成员国的司法部与内务部及其机构在司法、移民、海关、警务这四个领域开展对话，相互支援、共同努力，实现合作。司法与内务事务合作是欧洲一体化中起步最迟、但很快被赋予欧盟三大支柱之一地位的政策领域。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欧共体内部的司法与内务合作就已经展开，但长期以来由于这方面事务的高度敏感性，它一直不属于共同体事务，有关这方面的合作都是通过政府间合作的形式展开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迫切的需要面前，欧盟和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将司法与

内务合作推向深入。

在 1992 年《欧盟条约》签署之前，欧共体在司法与内务合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初步的探索，其主要成果是特里夫集团和《申根协定》。

非正式的特里夫集团是在欧盟理事会的支持下，“于 1975 年成立，1976 年开始运作的欧共体国家内政和司法部长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贸易的一个非正式组织”。它每年举行两次会晤，组织结构分为部长级、高级官员级和工作小组级三个层次。后来它的功能逐渐扩大到在反恐怖、禁毒、打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等方面交流情报、组织培训、实施战略协调等，成为欧共体各国国内安全领域的主要合作框架。但由于特里夫集团“尚未建立在一个多边条约的基础上”，没有常设秘书处，脱离警务工作实际，它的作用很有限。

1986 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要求在 1992 年底以前完全建成欧洲统一市场，在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边境，使整个欧共体成为内部无边境的地区，实现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争取早日实施人员的自由流动过程中，德、法、荷、比、卢五国实行了密切的合作。早在 1985 年，这 5 个国家在卢森堡的小城申根签署了《申根协定》，1990 年上述 5 国又就具体实施问题签署了《申根补充协定》，在签署国之间取消了边境控制，建立了共同的电脑网络“申根信息系统”，协同管理移民、签证、庇护及实行警方合作，共同防范国际犯罪。

根据《申根协定》，所有欧盟成员国公民在《申根协定》国家可自由迁徙，非成员国公民在其中一国办理签证即可在所有《申根协定》国家旅行和居住。但直到 1992 年以前，欧盟成员国在内务事务方面的合作都是处在非正式框架下的，而且没有一个多边条约基础，签字国与欧盟成员国不一致，使得《申根协定》在欧共体内作用空间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因此，欧共体司法与内务合作远远落后于一体化程度，建立一个既以多边条约为基础，又纳入欧共体框架之内的司法与内务合作机制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2 年 2 月 7 日正式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盟条约》，将司法与内政合作作为欧盟的第三支柱，这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司法与内务政策上前进了一大步。《条约》第 7 条规定了没有内部边界的自由流动市场的实现，第 8 条引入欧盟统一公民权的概念，第 100 条规定了欧盟公民将使用统一的护照和内部免检，而第 K 条规定了其他与司法与内部事务合作相关的事项，如难民政策、外部边界进入、移民政策、第三国公民政策、打击非法进入与工作、打击毒品使用与国际欺诈、民事与犯罪中的司法合作、阻止与预防国际犯罪中的关税与警察合作。在决策机制方面，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依据辅助性原则和一致同意方式进行决策，但它们的会议得到许多工作组、常设代表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的帮助。另外，委员会也在第三根支柱的框架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4 年，理事会批准建立的欧洲毒品控制中心开始在里斯本工作。1997 年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将“申根机制”纳入欧盟机构体系，并将民事法律、避难和移民事项纳入欧共体决策机制。1999 年 7 月，欧洲警察办公室正式运作。

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希腊分别于 1990 年、1991 年和 1992 年加入了《申根协定》。

1995 年 3 月 26 日,《申根协定》在德、法、荷、比、卢及葡萄牙和西班牙正式生效。1995 年 4 月奥地利加入了《申根协定》;1996 年 12 月,丹麦、芬兰和瑞典以及非成员国的挪威和冰岛草签了加入《申根协定》的补充协议,并于 2001 年 3 月正式加入《申根协定》。在欧盟东扩之前,在 15 个成员国中,只有英国和爱尔兰没有实施《申根协定》。但英国在 1999 年上半年向欧洲委员会提出了部分参加该协定的申请,希望能参加在控制犯罪方面的警方和司法合作及申根信息系统。申根国家体系已经成为司法与内务领域合作的成功范例。

1997 年 6 月 16～17 日,欧盟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批准了新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阿约》明确体现了欧盟在司法与内务方面的一体化成果,主要有:指出司法与内政合作的目标是预防和抵制恐怖活动、毒品贸易、诈骗和其他刑事犯罪,其实施应当通过警察、海关和法律部门的合作以及扩建欧洲警务来实现,并最终建立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区域;将《申根协定》确定的安全体系纳入到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机构及法律框架之中;增强了共同体机构在司法与内务方面的权限,如欧洲议会的能力得到加强,欧盟委员会在共同体事务方面享有创议权,并且在警务和司法合作中与成员国共同享有创议权;扩大了欧洲法院的司法权限,赋予了欧洲警察署以新职能。这样《阿约》将司法与内务领域的部分共同体化,使欧盟可以在与欧洲公民利害相关的政策领域采取行动。《阿约》使欧盟在司法与内务合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9·11”事件后,欧盟在反恐合作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首先,进一步加强了在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合作。如欧盟十五国推出了恐怖组织“黑名单”,通过了欧洲统一逮捕令,达成对恐怖罪定义的共识,一致拒绝接纳恐怖分子及其同伙和资助者,加强各国警方的合作和情报交流,以及打击为恐怖活动服务的伪造证件和武器走私犯罪,对政治避难的申请者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不给任何恐怖分子到欧洲避难的机会。其次,推动欧洲“统一司法空间”建设。为进一步加强欧盟的反恐合作和司法建设,2002 年欧盟各国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强化欧盟各国法制,特别是在实行欧洲统一逮捕令、没收财产和相互承认司法裁决等领域加强协调;二是加强各国警方的合作,尤其是相互间的情报交流,成立共同调查组,加强欧洲刑警组织建设;三是扩大反恐斗争领域,包括打击洗钱犯罪、冻结财产以及互通金融情报等;四是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同联合国和美国的合作。这表明标志着欧洲“统一司法空间”的建设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2 年 6 月 21 日,欧盟首脑会议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开幕。欧盟 15 个成员国和 10 多个入盟候选国在欧盟范围内打击非法移民达成协议,还通过了加大打击网络犯罪力度的计划,该计划旨在打击以黑客袭击、病毒袭击、拒绝服务攻击等为主要方式的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欧盟虽然在司法与内务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成员国根深蒂固的主权意识和不同的公民权利理解,司法与内务合作方面的一体化比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要慢得多。而且,司法与内务合作还面临着如效率低下、“民主赤字”等问题的困扰。

三、欧盟的进一步扩大

（一）东欧国家剧变后的经济与政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在政局剧变之后，无一例外地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接受并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强烈要求摆脱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影响，开始了全面而又艰难的政治经济社会转轨。

东欧国家首先面临的是政治转制。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央集权制向议会民主制转变。这一阶段东欧国家纷纷宣布允许建立各种类型的政党，各国原执政党先后下野，共产党或主动改名或被迫重新建党，右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并宣布实行多党制。到1995年底，大多数东欧国家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并能够按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运转。从1996年开始，东欧国家进入多党议会民主制巩固和完善阶段。目前，东欧国家的西方式政治民主制度已基本确立，政治体制转轨大体上已告结束。但东欧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离成熟的“民主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进行政治转轨的同时，东欧国家也进行经济转轨，普遍进行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市场化转型。转轨初期，受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激进式改革建议，东欧国家大都选择了所谓的“休克疗法”，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价格自由化、紧缩性财政政策等措施，使国家从具体的经济生活中完全“脱身”，硬性切断同旧经济体制的联系。波兰、捷克等多数国家都选择了“休克疗法”，只有匈牙利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种“休克疗法”使东欧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1989—1993年各国经济大都处于危机状态，经济大幅度滑坡、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失业急剧增加、外贸状况恶化、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严重。有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被迫进行政策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始好转。近年来，东欧国家大都度过了这种混乱、衰退的最艰难时期，大多数国家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框架，价格、外贸实现了自由化，以私有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初步建立，产业结构得到调整，总体经济形势趋好。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东欧国家过去普遍忽视制度建设，随着转型触及深层次问题，大部分国家的转型进入攻坚阶段。在加入欧盟以前，东欧大部分国家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已步入正轨。

东欧剧变既是东欧国家人民对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抛弃，也是东欧国家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向往。因此，剧变之后，东欧国家在迅速摆脱苏联（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盟关系的同时，扩大和加强了同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关系，以图迅速“回归欧洲”，而“回归欧洲”的标志是加入北约和欧盟。在东欧国家看来，只有加入北约，才能彻底摆脱俄罗斯的威胁，保证自己的安全；只有加入欧盟，实现与欧洲的经济融合，才能跻身于世界经济中心，消除边缘化的危险，实现经济繁荣。

（二）欧盟的东扩及其影响

就欧盟方面而言，东扩符合其政治、经济，安全、环保等多重利益，有利于它开拓东欧大市场：加重与美国抗衡的筹码，加强在多极化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维护整个欧洲的繁荣、和平与稳定。具体来说，欧盟东扩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如下几个因素：

1. 维护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实现“大欧洲”的梦想

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国家改革，给欧盟向中东欧国家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提供了绝好的契机。而中东欧国家希望回归欧洲，恢复传统的西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通过欧盟东扩实现欧洲大陆的统一，圆大欧洲的梦想，使欧洲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促进和保障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是欧盟各国的共识。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欧洲各国“整体欧洲”的观念逐渐增强。然而，“冷战”使东、西欧分裂长达几十年，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经济上基本不相往来，分裂的欧洲处于不稳定和敌视的状态，欧洲统一似乎只能是一个梦想。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冷战”格局突然结束，“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和苏联的解体使欧共体国家处于极度的‘欧洲亢奋’状态”，本能地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统一机会，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的历史梦想，进行完整意义上的欧洲统一。从而将进一步东扩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2. 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实现欧洲的安全和稳定

东欧历来是大国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数次大规模战争均源自该地区，是欧洲乃至全世界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传统上，中东欧地区总需要一个外来力量来平衡，如果它长期处于战略真空状态则无疑意味着动荡与冲突。东欧剧变以后，对于在与苏联东欧集团较量近半个世纪，终于看到对手解体的西欧国家来说，自然不会让中东欧再一次纳入到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所主导的机制中去，而是要通过东扩，利用有利的地缘政治及传统联系，通过经济及政治渗透，把昔日对手吸收到自己所制定的框架中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彻底消除“雅尔塔体系”所造成的欧洲分裂状态，从而尽可能地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防范俄罗斯东山再起后对欧盟的严重威胁。

3. 出于抗衡美国、提升欧盟独立性和国际地位的需要

二战后，欧盟虽然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为资本主义的三大中心之一，但在安全、防务等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依然很深。在“冷战”结束后，继续面对美国试图主导欧洲事务、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推行以建立单极世界为核心目标的霸权主义的挑战。从此意义上说，欧盟与美国存在着利益冲突，但就目前实力而言，西欧大国均无法独自与美国抗衡，只有以欧洲联盟的整体力量，才能在世界新格局中，成为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努力扩大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建立统一的欧洲；二是在国际关系中，协调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用一个声音讲话，从而在对美国的关系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独立性。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欧盟的国际地位。欧盟东扩将不仅

吸收中东欧的资源，而且减少了欧洲安全隐患，为欧盟提供了加强自身政治经济力量的机会，加重了与美国抗衡的砝码。

4. 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

这是欧盟东扩的又一动力。中东欧和波罗的海 10 个候选国共有国土面积 121.8 万平方公里，人口 7 000 万人，分别占欧盟面积的 38%和人口总数的 18.7%。对欧盟而言，这是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资本和商品市场。多年来，欧盟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和投资额都在逐年上升。1997 年，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外贸出口已占其出口总额的 12.1%，进口占 9%，中东欧国家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中东欧国家也是欧盟投资的重要地区之一。中东欧与欧盟为邻，劳动力素质较高而相对劳动力成本却低于欧盟国家，社会消费水平高，因而是欧盟较为理想的投资场所，投资额现在已达数百亿美元。另外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私有化进程中所购买或投资的企业大多是有经济效益的企业，投资者从中获利不菲。可以预计，随着候选国入盟进程的加快，欧盟对中东欧投资的力度还会加大，从中所获利益将进一步增加。

从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状况来看，中东欧自然资源丰富，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及石油、天然气等储量较大，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工业技术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转轨时遇到较多困难，但由于进行了全面改革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再加上西欧援助，因而经济、社会状况稳定，因而，东扩后欧盟经济空间将得到极大扩展，有利于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再有，一些跨国性问题的出现也加快了欧盟东扩的步伐。如在欧盟内日益引起关注的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欧盟与邻国共同努力，通过制定共同的环境政策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由于俄罗斯自己在剧变后，也向西方靠拢，因此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扩态势。俄罗斯认为中东欧加入欧盟是大势所趋，欧洲的强大有利于制衡美国的一极独霸，并且欧盟东扩并没有像北约东扩那样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为了实现上述东扩的战略目标，欧盟在“冷战”结束后精心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循序渐进、先后有别的方式来推进东扩进程，以入盟为诱饵，对申请国的国内制度和对外政策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

第一，“法尔计划”。在柏林墙倒塌后，面对中东欧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欧共体国家并未立即提出东扩的问题，但在 1989 年 12 月的斯特拉斯堡关于中东欧问题的首脑会议上，各成员国表示，欧共体准备与苏联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在加强政治对话和增强所有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发展更加紧密和更具实质性的关系”，“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改革”。1990 年 1 月，欧共体启动了“法尔计划”，为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结构改革提供技术性援助。该计划的援助对象后来扩大到其他 9 个中东欧国家。这 11 国的总面积达到 110.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86 亿人。在 1991—1993 年间，这个被称为“现代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计划总

共为中东欧国家注入了33亿欧洲计算单位的资金。

第二，联系国协定(也称欧洲协定)。欧共体在苏东剧变后与有关国家先后订立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对合作伙伴提供贸易优惠待遇。1991年12月，欧共体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签订了联系国协定。1993年2月和3月，欧盟又分别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签订了联系国协定。随后，捷克和斯洛伐克(1993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1995年)、斯洛文尼亚(1996年)与欧盟都分别签署了联系国协定。随着联系国协定从1994年起陆续生效，各国也相继提出了加入欧洲联盟的正式申请。

欧洲协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联系国协定。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重要文件。它取代了原有的东西欧贸易合作协定，其目的是鼓励欧共体与东欧国家之间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使联系国逐渐融合到欧洲联盟的大家庭中。《欧洲协定》的目标是在2002年以前，实现工业品的自由贸易并为其他部门的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第三，制定入盟标准。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确认了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性，正式邀请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而且为申请国制定了严格的入盟标准：

(1)政治标准：建立民主化政体，国内政局稳定，实行多党制；建立总统、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力量平衡，总统权力不能过大；东欧剧变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不能在政府中起决定作用，要不断削弱它们的影响；尊重人权，尊重少数民族权利。(2)经济标准：实行有成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其经济要在将来欧盟统一大市场内有竞争力。经济要增长，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应下降，财政收支状况好转，银行业要私有化，进行农业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3)法律标准：改革原有的法律制度，修改原有的法律条文，建立适应欧盟国家的法律制度，并经得起欧盟官员的检验。条约法、信贷法、破产法、银行法等都要与欧盟需要一致，要按欧盟的法制标准履行权利和义务。(4)欧盟的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标准：同意《马约》规定的经货联盟和政治联盟标准，为未来实行单一货币和执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打好基础。哥本哈根首脑会议还明确宣布：“中东欧联系国将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一旦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状况具备入盟的条件，接纳工作将马上开始。”

第四，入盟谈判。1995年，欧盟马德里首脑会议提出入盟谈判应在政府间会议结束半年后开始。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2000年议程》，欧盟委员会认为，依据哥本哈根标准，欧盟应首先扩大到6个国家，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决定首先同上述6国进行入盟谈判。1998年3月，欧盟与6国的谈判正式开始。

1999年10月，欧盟又启动了与第二批候选国的入盟谈判，包括马耳他、立陶宛、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6国。欧盟虽然确认了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第五，缔结入盟条约。2002年12月，经过多年谈判，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终于签订了10个候选国加入欧盟的入盟条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谈判未能同期结束。2003年4

月，欧盟15个成员国与10个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签署正式的入盟条约。这10个国家从2005年5月1日起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又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成员国从25个增至27个，欧盟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规模”。

回顾历史，欧盟的每一次扩大都对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欧盟的扩大与前几次有所不同，一次接纳的成员数量之多为历次之最。这次东扩虽为欧洲统一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此次东扩吸纳的绝大多数国家乃是“冷战”期间与自己处在对立阵营的国家，即与欧盟老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长期敌对或相差很大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加入不免会对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面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大，欧盟的整套机制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境地。欧盟必须对现有的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欧盟将面临瘫痪的危险。在一个25～30个国家的欧盟中，全体一致决策将难以达到共同决策，半年一换的轮值主席国制度将变得“荒谬”，欧盟委员会委员人数太多而无法工作。在欧盟的体制改革中，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因为权力的分配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将是长期的，如果处理不当，将对欧盟的运作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二，对欧盟现行的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行的政策主要是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费用支出问题。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历来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又增加了新的矛盾。因为新的成员国大多数都是农业比重比较高的国家，东扩后农业方面的支出急剧扩大，但预算收入并没有相应地得到增加。结构基金是欧盟用于补贴落后国家的支出，新成员国都是落后国家，东扩以后，原来受益的国家所得的份额就得下降，因为欧盟必须增加对普遍贫穷的中东欧国家的援助。

第三，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挑战。欧盟东扩以后，欧盟成员国在外交政策利益和目标方面的分化有可能面临着进一步加剧的局面。每个成员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扩大后的欧盟越来越难以达成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法德为一方的所谓“老欧洲”就与以波捷为一方的“新欧洲”产生尖锐的对立。

四、欧盟的前景

（一）《欧盟宪法条约》的制定及其主要内容评析

欧洲政治家们从2000年就开始着手制定欧盟宪法条约，以对现行的体制进行修正。主要经历了“尼斯会议”、《拉肯宣言》、宪法起草、政府间谈判和成员国批准等阶段。2000年的尼斯高峰会议拟定了一条分三步走的制宪道路，被誉为“欧盟宪法条约的摇篮”。

2001 年 12 月根据《拉肯宣言》,成立了欧盟制宪筹备委员会,为欧盟制宪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在法国前总统、欧盟制宪筹备委员会主席德斯坦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在 2003 年 7 月正式出台。

2004 年 10 月 29 日,欧盟 25 国的领导人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欧盟宪法条约》,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欧盟宪法条约》共 448 条,由欧盟宪法正文、公民基本权利宪章、政策及运行机制和其他(规定、声明、附件)四大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决策机制上,对欧盟理事会沿用至今的一致通过原则进行了修正,代之以被称为"双多数"的有效多数表决制。任何决定只有在获得代表欧盟 65%以上人口的 55%以上的成员国同意时才能通过。对欧盟委员会,《宪法》改变原来由每个成员国推荐一个委员的组织结构,在 2014 年以后,它将由 2/3 的成员国的委员组成,并实行轮流制。(2)设立欧盟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交部部长职位。(3)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4)赋予公民立法权。不同成员国的公民在人数达到 100 万以上时,可请求欧盟委员会起草法案。(5)首次允许一个成员国退出欧洲联盟。它对欧盟以往众多条约进行了整合、简化和修改,同时赋予欧盟以法律人格,并对欧盟的决策方式和机构设置等进行了重大的变革。

(二)《欧盟宪法条约》的性质

欧盟宪法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国际组织的章程,具备了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属性,比如其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其形式和内容都具有主权国家宪法的一些特征。但是,欧盟宪法从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国家间条约的范畴。从国际条约法的角度来理解,归根到底,欧盟宪法仍然是一项国际条约。首先,从名称和制宪目的来看,《欧盟宪法条约》的主语是条约,而"宪法"不过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限定语。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条约的名称没有什么法律意义,而且,整体看来,条约的形式是没有什么法律意义的。其次,欧盟宪法制定、签署、批准和生效等一系列程序体现了国家间合意和条约属性。制宪的倡议和决定是由欧盟首脑会议于 2001 年 12 月 15 日以发表《拉肯宣言》的方式发起和作出的。换言之,制定欧盟宪法的正式动议出自成员国政府间的合意或一致,而这种共同的意志是产生国际条约的先决条件。采用政府间会议的形式来制定国际条约尤其是国际公约,是条约缔结的基本方式。就欧洲联盟而言,它赖于建立和发展的诸多基础条约都是通过专门的政府间会议予以谈判和缔结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宪法条约》与先前的基础条约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由此可见,欧洲未来宪法其本质上属条约的性质。

(三)《欧盟宪法条约》遭遇的危机及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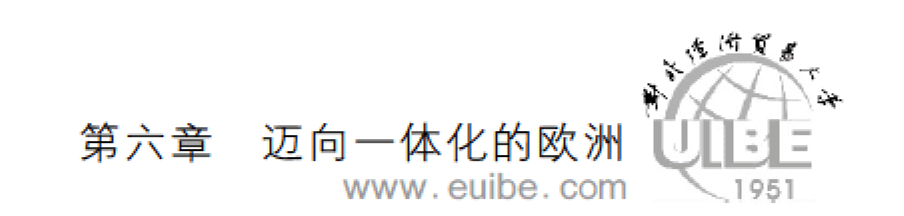
2004 年 11 月起,欧盟宪法草案交由各成员国批准通过,截至 2005 年 5 月 29 日,已有西

班牙、意大利、德国等9个国家批准了草案。但2005年5月29日，法国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否决了宪法草案，随后，6月1日，荷兰全民公决否决宪法草案。荷兰和法国均是欧盟的创始国，宪法草案在两国未获通过，这对《欧盟宪法条约》甚至欧洲一体化进程都是沉重的打击。尽管随后拉脱维亚和卢森堡两国批准通过宪法草案，欧盟第一部宪法的命运仍然笼罩着阴影。欧盟25国领导人经过讨论于6月16日晚决定，延长《欧盟宪法条约》的最后批准期，而且欧盟各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批准欧宪条约。《欧盟宪法条约》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欧盟扩大步伐太快，民众担忧自身利益受到社会变革带来的冲击，担心民族国家的主权会受到损害。同时，欧盟迅速扩大到25国之后，矛盾和问题明显多于以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更多不同声音。但是，透过宪法危机我们可以分析出制约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是所谓的"民主赤字"的问题。"民主赤字"是指，欧盟机构的政治领导人并非成员国民众选举产生，欧洲议会虽自1979年以来实行直选，但其职责与成员国议会不同，尽管权力有所增大，但是并不拥有立法权。因此欧洲民众认为他们缺乏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听不到他们的意见。近年来民众要求减少"民主赤字"，参与欧盟决策的呼声很高。欧盟也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在宪法条约中增加了增大欧盟机构决策透明度、扩大欧洲议会权力等内容。但所谓的"精英"与"草根"阶层脱节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次是经济不景气问题，二战后半个世纪的欧洲一体化的历程表明，经济形势好，实现一体化的阻力就小，反之就陷入停滞。

（四）欧盟的前景

自从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分别在法国和荷兰被否决之后，欧盟在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改革上基本上陷于停滞的状态。但欧盟无论新老成员国都认识到，没有一体化就没有欧盟的今天，同样，没有更深一步的一体化，就没有欧盟的明天。欧盟需要一个具体的成果来打破这种僵局，改善欧洲在世界上的形象，并且使欧盟民众相信欧盟能够将新的理想和信念带给他们。2007年12月13日，欧盟成员国首脑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签署了欧盟新条约——《里斯本条约》，取代已经宣告失败的《欧盟宪法条约》。《里斯本条约》基本保留了宪法条约对欧盟体制所进行的各项改革。《里斯本条约》相继获得了欧盟各国的批准。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从长远来看，欧盟的性质问题仍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像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的治理体系，其发展的方向究竟是传统意义上的联邦还是邦联，或许并不需要定论，但寻找到适合欧盟发展的运作机制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有人认为，现代联邦制结构比联邦制与邦联制的混合更有利于欧盟的发展，但在现实情况下，建立一个欧洲联邦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欧盟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组织，它的发展需要在探索中进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战后欧洲走向一体化的历史、动因以及过程。重点介绍了作为欧盟一体化重要内容的共同货币以及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冷战”结束后，欧盟进一步东扩，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欧盟一体化虽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如欧盟宪法危机，但一体化仍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重要概念

欧洲共同体　欧洲联盟　欧盟三大支柱　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欧盟宪法条约》

思考题

1. 简要叙述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脉络。
2. 分析战后欧洲出现自强联合的历史动因。
3. “冷战”后欧盟为什么要启动新一轮的东扩？欧盟东扩后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宣告建立欧洲联盟的条约是(　　)。

A.《布鲁塞尔条约》

B.《罗马条约》

C.《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D.《阿姆斯特丹条约》

2. 标志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的重要文献是(　　)。

A.《欧洲煤钢联营条约》　　B.《罗马条约》

C.《布鲁塞尔条约》　　D.《欧洲一体化文件》

3. 西欧经济一体化的基石是(　　)。

A. 关税同盟　　B. 共同的货币政策

C. 共同市场　　D. 西欧国家内部加强贸易

4.(　　)标志着西欧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了正式竣工的最后里程。

A.《罗马条约》　B.《布鲁塞尔条约》

C.《单一欧洲法案》　D.《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5.(　　)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大的飞跃。

A.《欧洲宪法》的诞生　B.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

C.《申根条约》的签定　D. 欧元的诞生

6. 决定把欧洲共同体改名为欧洲联盟的条约是(　　)。

A.《欧盟宪法条约》　B.《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C.《申根条约》　D.《阿姆斯特丹条约》

7.“冷战”结束后,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树立了新的里程碑的条约是(　　)。

A.《欧洲宪法条约》

B. 1997 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的《2000 年议程》

C.“法尔计划”

D.《申根条约》

8. 欧盟目标成员国的数量是(　　)。

A. 25 个　B. 22 个　C. 27 个　D. 20 个

9. 欧盟宪法在欧盟成员国(　　)第一个遭到了全民公决的否决。

A. 德国　B. 法国　C. 荷兰　D. 西班牙

10. 欧元启动后,因经济不达标而不能成为首批欧元国家的是(　　)。

A. 法国　B. 意大利　C. 希腊　D. 西班牙

二、多项选择题

1. 欧共体创始成员国有(　　)等。

A. 法国　B. 德国　C. 英国　D. 西班牙　E. 意大利

2. 当今世界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是(　　)。

A. 东盟　B. 欧盟　C. 非洲统一组织

D. 北美自由贸易区　E. 亚太经合组织

3. 1995 年 1 月 1 日,(　　)三个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扩大为 15 国。

A. 奥地利　B. 波兰　C. 芬兰　D. 西班牙　E. 瑞典

4. 在 1992 年《欧盟条约》签署之前,欧共体在司法与内务合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初步的探索,其主要成果是(　　)。

A. 特里夫集团　B.《申根协定》

C.《欧盟宪法条约》　D.《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E.《欧洲一体化文件》

5. 为解决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欧共体国家(　　)首先采取了行动，签订了《申根协定》，实行了密切的合作。

A. 德国　　B. 法国　　C. 荷兰　　D. 比利时　　E. 卢森堡

6.“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的原因有(　　)。

A. 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

B. 出于抗衡美国、提升欧盟独立性和国际地位的需要

C. 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实现欧洲的安全和稳定

D. 维护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实现“大欧洲”的梦想

E. 东欧国家本身强烈的要求

7.“冷战”结束后，欧盟首先接受的东欧国家有(　　)。

A. 波兰　　B. 匈牙利　　C. 捷克

D. 斯洛文尼亚　　E. 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

8. 欧元启动后，主动留在欧元区之外的国家是(　　)。

A. 英国　　B. 丹麦　　C. 瑞典　　D. 希腊　　E. 卢森堡

答案：

单项选择：1. C　2. B　3. A　4. C　5. D　6. B　7. A　8. C　9. B　10. C

多项选择：1. ABE　2. BDE　3. ACE　4. AB　5. ABCDE　6. ABCDE　7. ABC　8. ABC



梦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建立在政治经济基础上日本外交，掌握“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以及为实现该目标而展开的联合国外交。

重点与难点

- 日本战后经济立国。
- 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以及联合国外交。
- “冷战”后日本的经济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经济立国"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日本不仅很快恢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而且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与此同时，日本政治也进入了转折期，政坛重组，内阁变换频繁。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已不仅仅满足于经济大国，开始积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进入21世纪后，日本加快了对政治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战后日本政府一直未能对二战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国内的政治日益右倾保守化。在世界格局转换中，日本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大国，已经引起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

一、一个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国家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其一是恢复期；其二是高速增长期；其三是稳定增长期；其四是持续萧条期；其五是持续而缓慢的复苏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

1. 经济恢复期（从日本战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监督下，实现了"经济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日本的经济恢复乃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吉田茂内阁推行了一整套"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国家战略。为了加快恢复经济，日本政府成立了"经济安定总部"（简称"安总"），负责战后经济政策的"最高设计和管理"，将执行经济政策的各有关部门都归并"安总"。"安总"集中了经济界人才，如永野重雄、大来佐武郎等。为控制通货膨胀，曾经采取冻结银行存款、冻结过剩货币购买力的极端措施，同时制定以煤炭和钢铁为"超重点"的"倾斜式"生产投资的紧急对策。使日本经济复兴开始走上了正轨。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开始、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美国变削弱日本的政策为扶植日本的政策，放宽了对日本的限制，支持日本复兴。因此，美国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并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名义，提供23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另外，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向日本供应原料，日本恢复工业生产的资金和原料得到解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地。美国的巨额军事订货，为日本工业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使日本获取大量外汇，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兴。1950—1953年，日本为美国提供24.7亿美元的军需器材和给养。外汇收入的增加使日本能进口必需的原料和能源，促使经济加速运转起来。此时美国忙于战事，出口能力减弱，西欧各国加入"冷战"体制，也加强军备，扩大进口，世界市场一下子成了卖方市场。这又为日本扩大出口创造条件。

到1955年日本经济指标几乎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基本完成。

2. 高速增长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

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这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10%,1968年便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在这个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日本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生产名列前茅,产业结构实现了高级化,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3. 稳定增长期(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

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1973—1991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4.1%。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提高油价,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世界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了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日本经济被迫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稳定增长。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开始突出强调"技术立国"方针,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发展节能型产业,开发"短、小、轻、薄"型产品,扩大电子产品、汽车等出口,基本上克服了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上升。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32.2%,1990年则达到60%,占世界的13%。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1989年,日本又成为"政府对外援助大国"。1987年,日本的经济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4. 经济衰退期(1992年至2002年)

所谓"泡沫经济",一般是指在中央银行贴现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和土地等行业,从而引起资金过度膨胀。1985年9月,美、英、法、西德等国与日本达成降低美元汇价的《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冲击,日本政府采取放宽财政、金融政策的方法刺激经济回升。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5次调低公定利率,致使大量的过剩资本投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业,带动了股价和地价狂涨,使日本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1985年至1989年,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由1 000万亿日元跃为2 300万亿日元,四年间增加1.3倍;同期股票市价总额由241万亿日元猛增到630万亿日元,增加2.6倍。地价和股价的暴涨带来了"财富效应",私人消费急剧扩大、企业增加投资、工资上升、物价上涨,经济明显出现"过热"。

为抑制经济"过热",日本银行在1989年5月放弃了自1985年秋以来实行的"超缓和"金融政策,开始收缩银根。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连续5次上调公定利率,使之由2.5%上升到6%;1990年3月底又推出对不动产融资的限制措施。日本央行这种急刹车式的紧缩政策直接影响资产收益率,引发股票价格和地价暴跌。1989年底,东京股票市场上股票平均价格高达38 915.87日元,股票市值总额890万亿日元;而到1992年4月,股票平均价格跌至17 000日元以下,年底股票市值总额只有401.7万亿日元,下降一半有余。土地总价值也由1990年末的2 388.7万亿日元跌至1993年末的1 855.1万亿日元。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长达十余年的"复合危机"时期。到2002年初,日本经济跌入谷底。

据统计，1991—200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只有1.3%，1997—1998年连续两年度负增长，分别为－0.1%和－1.9%，这是战后以来的第一次。2001年负增长为0.3%。这期间日本经济萧条的主要表现是：

（1）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日本自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持续低迷，到2001年为止，平均增长率仅0.9%，其中有七年时间经济增长率低于1%。1995年、1996年虽有短暂的恢复，实际GDP增速分别达2.5%和3.4%，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GDP增速又跌落到0.2%，1998年下降到0.6%，1999年和2000年只分别增长了1.4%和0.9%。2001年又受到美国"9·11"事件和美国及全球经济放缓的拖累，GDP增长率更低。

（2）通货紧缩空前加深

由于经济不景气，日本物价20世纪90年代一直平稳，自1992年到2001年6月，消费物价指数仅上涨了2.9%，年均上涨率只有0.3%。1999年到2003年，物价连续5年出现了负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按照国际经济机构有关的定义，连续两年物价负增长，即意味着该经济体遭遇通货紧缩。通货紧缩致使从生产、流通到销售的各行各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致使工业生产和效益下降，甚至出现"生产越多，亏本越多"的现象。据统计，日本制造业在2000年的生产还不及十年前的水平，2000年比1990年下降了4.5%，矿业下降了4.8%。利润形势恶化波及到了大型企业。在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企业不但数目在减少，利润也很低，营业收益率仅1%左右，其中1998年还为净亏损，不仅低于亚洲2%左右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美国185家企业6%的水平。

（3）内需萎缩不振

日本内需对GDP的贡献率，1997年以来的4年里都是负数。设备投资曾经是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设备投资持续不振，1992—1995年连续3年下降，1996年、1997年有所增长，但1998年、1999年又分别下降了5.2%和1%，2000年略有反弹，2001年一、二季度又分别下降了0.9%和2.8%；政府公共投资也在缩减，1994年以来有5年下降，其中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下降了0.7%和6.1%；2001年第二季度下降了4.1%。民间消费增长迟缓，1997年以来分别增长－1.2%、1.3%、1.5%和0，2001年上半年也只增长了0.5%。

（4）出口形势严峻

日本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日本自1992年以来平均出口增长速度仅为2.3%。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了日本经济，1998年、1999年分别比上年下降了1.3%和6.1%。2000年出口比上年有所增长，但受世界经济再次减速的影响，日本2001年出口形势急剧恶化，成为日本经济再次步入萧条的重要原因。贸易顺差自1999年以来连续下滑，1999年和2000年分别减少了1.7兆日元和1.6兆日元。2001年贸易顺差进一步减少。

(5)失业率逐年上升

由于经济不景气和雇用制度的改变，日本私营部门就业人数不断减少，失业率逐年上升。就业人数由1997年的6 557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6 455万人，净减少102万人。2000年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失业率则从90年代初的2.2%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4.9%和2001年8月份的5%。目前，失业人数已达338万人，与1990年相比，增加了204万人，增长了1.5倍。据估计，政府减少不良债权可能还将增加100万失业人口。这样，两年后失业率估计将达6.5%以上。

战后，日本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这其中主要的经验是：

第一，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优先发展经济。战后初期，日本从吉田茂内阁开始，采取与美国结盟的“轻军备”政策，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市场和先进的科技优势，打破日本“资源小国”瓶颈，靠一流产品质量和信誉谋求生存与发展。

第二，引进大量先进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吸收、消化、创新。日本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资金实现了现代化。

第三，实行政府指导、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税收等手段加强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对重点产业和出口产业实行指导、监督、扶植和保护，将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益最好的部门，使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倾斜。优先发展“生产型”社会基础设施和东京、大阪、神户等太平洋沿岸经济地带，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保证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四，实施富有日本特色、符合本民族特点的经营管理体制。日本大部分企业实行职工的终身雇用制，培养员工与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企业的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五，重视科技、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提出“技术立国”方针，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以保持国际竞争优势。1995年日本政府又提出“科技创造立国”的新口号，要以科技为龙头，为日本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日本历来十分重视教育，用已故吉田前首相的话说，战后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是靠长期培育起来的“日本人的素质”，是“教育给予日本人以巨大的力量”。

第六，勤奋、守纪、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民族特性。战后，日本人民在战争的废墟中，身负沉重的战败国压力，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们毫无怨言，勤奋工作。日本人民时常有一种紧迫感，由此形成了一种时不我待、不甘落后的紧张节奏。

5. 持续而缓慢的复苏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2002年初至现在)

日本经济在2002年初曾一度跌入底部，之后经历了持续而缓慢的复苏，然而，从2007年末开始日本经济又出现了新一轮下滑迹象。

进入2007年之后，在日本经济自身累积的矛盾和世界经济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现象，实际经济增长率2005年、2006年分别为2.4%和2.1%，2007年则下降为1.7%。2007年底到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出现了更为乏力的情况，长

期持续的景气扩张期进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2008年初、中期开始，日本各项经济指标不断下滑，特别是中期以来政府发布的各月度经济报告显示，景气度减弱加速、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向下调整。从2008年8月份开始，日本经济又一次进入衰退期。2008年底，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日本出现了战后以来的最大的GDP负增长。

（二）“冷战”后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

日本在战后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正当人们对其津津乐道时，日本陷入了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困境，而且持续的时间长达十多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出现如此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呢？

1. 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一再失误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财政政策，1992年10月至2000年12月，政府共追加了11次补充预算，金额达130兆日元，致使日本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自1996年以来，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8%，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日本以赤字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明显启动经济，反而累积了巨大的财政金融风险，使宏观调控基本失去了回旋余地。

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量增加。对于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日本政府先是掩盖和拖延，认为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特别是不动产价格的上升，不良债权问题会得到自动解决。1995年以后，不良债权问题恶化，一系列大银行、证券公司相继倒闭。由于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始终不敢动用公共资金解救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直到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日本政府才痛下决心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同时在存在大量不良债权的情况下，银行为了防止风险，出现了严重的“慎贷”现象，这对以间接金融为主的日本来说，无疑堵塞了货币传导机制，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困难；再加上风险投资不发达以及股市不旺，直接融资难度也在加大。投资需求不旺和传导机制堵塞导致利率杠杆失灵。货币只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进行“体内循环”，而企业却得不到所需的资金。其结果是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传递不到经济部门，货币政策严重失灵，降低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另外，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政权的更迭极为频繁，导致调控政策的不连贯和朝令夕改，也损害了市场的信心，使得政府的调控效果失效。

2. 日本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日本在完成经济赶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所谓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即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行政导向、主银行制度、“株式会社”制度、经营者主宰企业制度、终身雇用制、企业内工会制等。随着日本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日本战后设计的这套制度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否则成功的因素就会演变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如终身雇用制极大地阻碍了人才流动；企业间相互持股使日本的市场经济

扭曲成大财阀垄断的畸形市场经济；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经济链条，使小企业经常面临破产的威胁；"护航舰队"式金融行政、间接金融、主力银行制度难以抵挡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日本政府对国内市场的过分保护和日本的产业团体造成的实质性的垄断局面使得日本经济和日本企业失去了竞争能力，市场也就失去了活力。日本政府对这种严重的"制度疲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把经济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3.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本政府在重大政策选择上出现了决策失误，没有抓住机遇，从宏观上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竞争力，而是在急功近利驱使下，在国内大炒房地产和股票，对外掀起所谓"购买美国"、全球出击的狂热，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不但引致了泡沫经济，而且影响了产业升级。1987年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国民对余暇的需求将迅速增强，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促使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这一选择的第一大恶果是使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涨，形成了泡沫经济。第二大恶果是没有及时促进产业升级。由于没有找到新的主导产业，以至日本的产业结构至今仍是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工业为主，没能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而同期美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在促成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过程中，日本的引进科技政策功不可没。技术引进使日本的科技实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先进国家，但这一成功的政策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即原创能力不足。政府研发经费只占全部科研经费的20%，导致了重应用轻基础研究的短期行为。这一缺陷在赶超任务完成、后发优势消失后，变得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能够起主导作用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虽然确立了"科技立国"的方针，强调培养日本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但仍然忽视基础科学的研究。由于长期强调技术，强调应用型研究，忽视基础性科学研究，导致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日本在竞争中输给了美国。

（三）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世界各国高估了日本经济实力。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日本将成为全球超级经济大国，有人甚至预言21世纪将是"日本世纪"。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日本经济大国衰落成了新的话题，有人又认为日本经济将从此一蹶不振，最终沦为像英国那样的二三流世界经济大国。但事实上，日本仍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流强国，仍然拥有摆脱危机，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

首先，日本拥有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资金储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显示，2003年日本GDP为43 018.23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GDP的11.9%、美国的39.15%。



2003 年日本人均 GDP 为 33 719.74 美元，虽然低于美国的 37 756.11 美元，但仍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分别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人均 GDP 的 1.15、1.18、1.12、1.32 和 1.23 倍。第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2003 年底，日本外汇储备达到 6 735.29 亿美元，而美国同期外汇储备只有 231.41 亿美元。2004 年 6 月底，日本外汇储备又创新高，达到 8 179.51 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第三，是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1998 年，日本资本纯输出高达 1 325 亿美元，其中长期资本纯输出为 1 177 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各发达国家资本纯输出和长期资本纯输出的总和。相比之下，1998 年美国则是世界最大的资本纯输入国，资本纯输入高达 2 375 亿美元，其中长期资本纯输入为 2 372 亿美元。到 2000 年底为止，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为 346 兆日元；约合 32 046 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当年 GDP 总额的 67.42%，并占全球海外净资产的 5 成以上。另外，在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中，除去 13 280 亿美元为金融债券等投资外，剩下的 18 766 亿美元都是直接投资于制造业和不动产等各类产业。

其次，日本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资本、技术和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由于日本继续保持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和海外纯资产大国的地位，所以从资本方面看，日本经济的发展依然是很有潜力的，在技术和人的因素方面，日本基础雄厚，优势明显。第一，发达的教育和人才优势。日本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也是一个教育发达的国家。1997 年，日本高中教育普及率已达 95%，大学升学率也高达 49.1%。其中，大学升学率虽然低于英国的 67%，但已接近美国的 51.4%，明显高于德国的 29.9%。因此，日本不仅过去成功地培养了高速发展所需要的大量人才，而且今后也不乏人才的优势。第二，庞大的科技队伍。1998 年，日本全国科技开发人员数为 70.5 万人，在企业从业人员中，每万人的科技开发人员数为 555 人，其中，电气机器工业为 1 221 人，精密机械工业为 1 091 人，化学工业为 1 075 人，软件开发业为 1 153 人，其比例之高，是世界各国企业所没有的。第三，巨额的科技投入。日本研究开发费占 GDP 的比例多年来一直是世界最高的。1990 年和 1997 年分别为 2.96%和 3.08%，到 2000 年又增为 3.18%，均高于美国和德国。企业研究开发费占销售额的比例也一直是世界最高的。在科技资金投入总额方面，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由于美国科技投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军事目的，所以在产业应用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一。第四，科技研究开发成果居世界领先地位。1995 年，日本现有专利数为 681 459 件，虽尚不及美国的 1 110 357 件，但新申请和新登记的专利数各为 388 957 件和 109 100 件，都已超过了美国的 235 440 件和 101 419 件。在商标权方面，日本的新申请权力数和新登记权力数也居于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在信息领域，日本在“蓝牙技术”、移动电话技术、存储芯片技术、电动汽车技术等方面有望取得新的突破。第五，重视技术引进。尽管日本在科技和研究开发方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科技和研究开发成果，但仍继续重视从外国引进先进的技术。1997 年引进的技术为 2 685 件，虽低于 1990 年的 3 211 件，但技术进口额为 11 634 亿日元，比 1990 年增加了 33.1%。

由于日本在资本、技术和人才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以，只要通过经济、社会改革，解决好困扰日本经济的严重课题，那么日本经济在21世纪将会继续实现新的发展，日本仍将是亚洲和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克服各种经济危机和摆脱长期萧条，日本对经济政策、结构和体制进行了调整与改革，尽管进展得比较缓慢，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但一些基本的改革已经实施。主要有：(1)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日本政府不仅注入了巨额公共资金，冲洗金融机构坏账，敦促银行提高自有资金充足率，而且建立了股票收购机构，将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股票从银行转移至私人，以改善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在金融体制改革中贯彻自由化、公正性和国际化三项原则。(2)改变以往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重点用于充实信息通信、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新社会资本；实施永久性减税，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和法人实际税率降至欧美国家的水平。(3)调整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除相互持股，以加强股东的力量，使企业内部形成有制约机制的决策体系。引进联结决算新会计制度，并将资源集中投入到营利部门，提高企业的资本效率。(4)改革就业制度。通过提前退休和中途录用等方式，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同时采用“能力主义”原则，提高工资中职能工资的比重，或引进年薪制，实行个人能力短期内与报酬直接挂钩的制度，并提拔有能力的年轻人从事管理工作。(5)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试图在现有的产业结构及制度框架内谋求发展的做法，确立IT、生物工程、新能源、环保等产业为主导产业，提出产业竞争力战略，力争实现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6)排除国内各利益集团的阻力，在相关领域放宽各种规制，构筑更加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经济制度的国际化，以有效地应对经济全球化。

二、从军事帝国到民主国家的发展与变化

（一）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

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美国对日本总的战略举措是：消除军国主义的基础和削弱封建财阀的政治经济实力，进一步控制日本，防止日本再度成为美国敌手，将之纳入美国的总体战略，并按着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原则来改造日本。从1945年9月起到1948年，美国占领当局，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在日本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解除日本武装、惩办战争罪犯、取消特务警察、撤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取缔右翼法西斯团体。在军事方面，占领军总部在1945年下半年连续发布指令，命令日本军队立即缴械投降和迅速复员，废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大本营、元帅府、军事参议院、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陆军省、海军省等军事机构；同时指示日本政府废除了日本兵役法、义勇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军用资源秘密保护法、要塞地带法、国家总动员法以及战时



紧急措施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长期向国民灌输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并强迫国民实行军事训练的退役、预备役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也被解散；另外，占领军总部还下令禁止与军事有关的生产和科学研究，并拆除战争工业设备，“消除那些主要用来准备战争的指定的工业或生产部门”，让渡那些“不是和平经济或为供应占领军所必需的产品的现有资本装置或设施”，作为对盟国有关国家的赔偿。自 1945 年 9 月起到该年底共逮捕战犯 127 名，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处。1946 年 1 月开始政治整肃。第一指令规定取缔所有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政党、法西斯社团组织，共 147 个。接着第二指令“解除公职令”颁行，命令日本政府解除帝国主义政党、社团领导人和法西斯军队职业军官的公职，包括一些内阁阁员、要员，内阁因此宣布改组。1947 年 1 月为整肃第二阶段，整肃对象扩及地方政府官员、经济界财界的头面人物。据盟军总部报告，到 1948 年整肃结束时为止，受到调查的对象为 717 415人，受到整肃的有 201 815 人，其中军官 11 万人，经济界受整肃的为 1 535 人。整肃对象被规定不得出任公职。1951 年解除整肃。

第二，实行“农地改革”，消除社会生活中的封建残余。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未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故直到二战前日本农村的生产关系还是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据 1945 年 11 月统计，占人口 3.2％的地主却拥有全国耕地面积的 49.6％。经过战争的洗劫，广大佃农、自耕农更是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生产难以为继，抗税、抗征粮斗争迭起。在美国推动下，1945 年 11 月和 1946 年 12 月两次进行“农地改革”。第一次改革不甚成功。第二次改革规定：政府强制性收买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村地主一公顷以上的土地，优先转售给租种这些土地的佃农。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大约 200 万公顷的土地从地主那里转到佃农手中。结果，出租土地的比例从改革前的 46％下降到 10％，自耕农的比例也从改革前的 30％上升到 70％。这次“农地改革”是明治维新 80 年后在特殊条件下完成的，可谓是日本土地制度史上最重要的改革。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也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国内商品市场。

第三，解散财阀，铲除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在“解散财阀”方面，1946 年 8 月，占领军当局指令日本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通过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分散财阀企业股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措施，对以十大财阀为中心的巨大家族企业进行分割经营，并禁止原有的财阀家族成员担任该企业领导职务。为防止垄断资本的再次出现，占领军当局指示日本政府在 1947 年 4 月制定了《禁止垄断法》，确保公正、自由的经济竞争，以此达到民主经济的健全发展的目的；同年 12 月国会又通过了《过度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用以消除非财阀大企业的垄断现象。但是，无论是解散财阀措施，还是《过度经济力量集中排除法》，不仅都没有加以彻底实施，而且也均没有触及金融业。

第四，实施“劳动民主化”，缓解劳资矛盾，保持社会相对稳定。二战前，日本工人阶级的

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工资极低，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甚至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工人运动在战争期间完全被取缔。资产阶级还把封建关系和宗法制度运用到资本主义剥削中去。这一切使得劳资矛盾十分尖锐，日本工人阶级中间蕴藏着长期被压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占领日本后，为了防范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安抚工人阶级，进而在日本确立现代劳资关系，既利于美国占领当局的统治，也有利于日本统治阶级执政，因而推行“劳动民主化”改革。1946 年 10 月盟军总部提出“关于人权的五大改革”，鼓励成立劳动组合（工会）和禁止使用童工。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令下，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劳动组合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内容包括禁止警察干涉劳资纠纷、从劳动部门开除旧官僚的公职、设立劳资协议会，保障争议权，给予言论、出版、广播的自由等。因而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会组织的迅速增加。据统计，1946 年 1 月，全国工会数为 11 779 个，会员为 90 万人，到 1949 年 6 月发展到 34 688 个，将近 666 万名会员，并成立了全国性工会组织劳动组合总同盟和产业组合。日本工人阶级第一次获得了团体交涉权和争议权。

劳动民主化改革虽然并不彻底，但基本上扫除了封建性劳务条件，工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得到了法律保障。工会的普遍成立，壮大了工人组织的力量，提高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生活福利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第五，社会民主化改革。在实现政治民主化方面，日本还进行了司法改革、教育改革，扩大公民权利。规定国家与神道、神社分离，规定废除学校教育中神道、武士道教育等。这一系列的社会民主改革，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场全面性冲击，使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个人主义得到发展。

总之，这场民主化的改造，涉及领域广泛，其性质是一场反封建、反军国主义、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从此，农业上的地主制，社会上的封建等级、父系家长制，思想上的神道、武士道精神，都受到极沉重的打击。这是日本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的大变革，它为日本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扫除了封建障碍，为日后日本经济起飞准备了前提条件。但是，由于改革是在美国的占领下进行的，不可能是彻底的。特别是 1947 年以后，美国开始扶植日本，来为它的全球战略服务，不少改革措施未能贯彻始终。

（二）日本“55 体制”的破产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民主改革，解除党禁，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原则，在日本实行多党政治。1945 年 11 月，日本社会党、自由党、进步党（1947 年 3 月改称民主党）先后建立。12 月，日本协同党成立（1950 年 4 月并入民主党），共产党重建。日本政党政治在经历短暂的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后，在 1955 年 10 月，出现了重大转折，分裂的两个社会党，即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重新统一，拥有了众议院 467 个席位中的 156 个。这对保守政党构成了较大威胁，因为执政的民主党只有 185 个席位，自由党也只有 114 个席位。在财界的推动下，民主党与自由党在 11 月实现了合并，由此形成了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

力与以社会党为中坚力量的革新势力相对立、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五五体制”。

1993 年 7 月，日本众议院大选揭晓，自民党只获 511 席中的 223 席，未过半数，丢失了一党单独执政的法律依据。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时代结束，自民党第一次沦为在野党。这标志着 1955 年体制彻底崩溃。日本政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引发这场变动的直接原因是 1993 年 6 月在野党对宫泽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宫泽内阁不得不宣布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在竞选中，一部分自民党议员脱离自民党，组成新生党、新党魁党、新党等，导致自民党所获议席不够半数，失去一党组阁执政机会。8 月 9 日，新党领袖细川护熙任首相的七党联合内阁诞生。

1955 年体制结束与日本政坛的变动改组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直接反映。

第一，美苏对立结束导致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冷战”时期，日本官方强调苏联的“威胁”，民众支持自民党的联美抗苏政策，社会政治生活相对保守。为了扶持日本，美国也采取支持亲美保守的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自民党，打击日共及其他进步势力的政策。“冷战”结束后，外部威胁下降，日本民众不再因为惧怕苏联共产主义“威胁”而将选票投给自民党，相反对自民党几十年政治僵化表示厌倦。而且美国也支持日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自民党长期以来的政治腐败。在战后日本政治发展中，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典型的“金权政治”，即金钱与权力相勾结。自民党上台执政后，其政客们同政府官僚特别是企业界结成了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形成了“财界—官僚—政界”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所谓财界是指金融、实业界上层，它们每年要向自民党提供大量的金钱，以获取各种照顾与好处。自民党有了足够的经费支援后，用金钱和实惠收买选民，扩大派系以巩固自己地位，并指使官员给予特定企业好处。这种财—官—政的“铁三角”关系导致日本政治受贿丑闻不断出现，许多自民党政客和议员采取各种手段，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到 90 年代初，日本国民和新闻媒介从未间断对自民党的批评，自民党却一直没有制止住“金权政治”腐败案件。“金权政治”使国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动摇了其政权的根基。

第三，自民党内派系斗争严重。自民党是由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党合并成立的。在自民党内部，一直是党中有派、派中有系，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内讧和倾轧，最终导致分裂。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号称“八大师团”的八大派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五大派，演变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三家派，小渊派、小泽派、羽田派等。各派围绕着本派在自民党的权力和在党内的地位彼此争斗，不断分化组合。这种争权夺利的派系争斗引发多次震惊国内外的丑闻，也引起民众极大反感，日益显示出对其政治的不信任及对以自民党为首的现存政党的不满。随着自民党内部矛盾的加深，年轻议员对党内元老当政、密室策划以及论资排辈极为不满，他们对外要求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内要求改变以元老为中心的领导体制，打出“根除腐败、彻底改革”等旗号，脱离自民党，另立新党。

“55 体制”崩溃以后，自民党历时 38 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日本各派政治力量开展了重新

组合，从此，日本政坛进入动荡时期。

1994年4月8日，细川首相宣布辞职，4月25日羽田孜被推举为新首相，社会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羽田内阁执政不足两个月后又被迫辞职；6月30日，由社会党、自民党、新党魁党三党联合组阁，社会党首领村山富市被推为首相，1996年1月5日，村山首相宣布辞职；1月11日，自民党的桥本龙太郎以过半数票当选为日本首相；1998年7月24日，小渊惠三当选为自民党第18任总裁，7月30日正式出任首相并于当日组阁；1999年10月5日，小渊同自由党和公明党经过政策协商，实现三党联合执政，并改组内阁；2000年4月3日，小渊突患脑血栓，不能理政。4月5日，日本国会投票选举森喜朗为新任首相，当日自民党与公明党、保守党组成联合政权。由于经济没有起色，政界没有生气，且贪污腐化事件不断发生，2001年4月26日森喜朗宣布内阁总辞职；同晚，自民党的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新一任首相。

2006年9月26日，自民党党魁安倍晋三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领袖出任新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然而，不到一年，安倍突然宣布辞职。2007年9月23日，自民党总裁福田康夫接替安倍晋三。2008年9月1日，福田康夫又突然宣布辞职。2008年9月24日，麻生太郎当选日本首相。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2009年9月16日，在任仅358天的麻生内阁宣布集体辞职。2009年9月16日，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以327票当选为日本第60任首相，并组建了由民主党、社民党和国民新党三党联合执政的新一届内阁。从细川内阁算起，经羽田、村山、桥本、小渊、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到现在的鸠山由纪夫内阁，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换了10任内阁首相，说明了日本政局的不稳定性。

三 、政治大国的梦想与行动

（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日本的战败国地位决定了它在国际社会的三流地位。战后日本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国内政治体制的重建和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再建设。为此，日本制定的国家目标为：重建家园，发展经济；建立自卫力量，保障安全；重返国际社会，争做世界大国。与战前相比，战后的日本外交活动基本上是以“经济外交”为主，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变化和重点。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基本主线是与美国结盟，具体政策则根据形势变化有过几次调整变化。

1. 依附、追随美国的“小国外交”（从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总部指令停止日本外交职能，一切外交活动和对外交涉均需通过美国占领军当局来办理。在外无国权、内无实力的境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重返国际社会。政治上，日本要想早日结束美国的占领，摆脱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就必须重返国际社会。经济上，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其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严重依赖国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以军事手段进行资源与市场的掠夺了，这就决定着日本必须尽快以其他方式恢复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日本政府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日

本就无法重返国际社会。因此，日本采取“亲美一边倒”的对外战略，成了美国庇荫下的“政治侏儒”，企图用在战略上支持美国的办法来换取美国对它重返国际社会的支持。而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对日战略的变化则使日本实现重返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有了可能。

为了重返国际社会，日本在战后初期采取了以下措施：全盘接受美国在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配合美国的“冷战”与“遏制”政策，参加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禁运，并且积极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不顾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反对，于1951年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签订和约，恢复了主权国家地位；为了适应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在1951年和1954年同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和《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使驻日美军进一步合法化，并组建日本防卫力量，分担美国在远东的防务；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在美国的操纵下，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了“和约”；积极谋求恢复同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为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日本要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首先要发展对外贸易。由于战败后近7年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恢复独立后重返国际社会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课题之一。实现，是力争早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组织，积极发展多边经济关系，获取最惠国待遇及其优惠政策。在美国的竭力支持下，日本于1952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1952年，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请求被苏联否决，直到1956年日、苏关系正常化以后，日本才得以加入联合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制定的重返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

2. 经济外交(20世纪60年代)

日本外交的第二个阶段是“经济外交”。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但是日本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经济发展与原料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同时，由于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欧美国家的种种排挤和限制，日本面临的生产与销售市场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如何扩大出口，确保日本经济发展有稳定的资源，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当务之急。为了确保日本经济发展有稳定的资源，1957年，日本岸信介政府发表了战后首次外交蓝皮书，提出了“经济外交”的口号。“经济外交”是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尚不能离开美国的情况下，以所谓“和平的经济力量”作为主要手段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日本“经济外交”的重点是在东南亚。20世纪50年代，日本打入东南亚的主要手段是战争赔偿。从1955年到1959年，日本先后与缅甸、印度尼西亚、南越等国签订了5～20年的赔偿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通过“经济外交”，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不断扩大，1958年的出口金额达到6.49亿美元，比1953年增长将近1倍，占其出口总额的22.6%。日本还积极向东南亚投资，主要采取提供日元贷款的形式，截至1959年12月，日本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的日元贷款金额共达6 400万美元。60年代，日本更加紧了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1978年，日本同东盟五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86.43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额。与此同时，日本还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经济交往，其出口商品逐渐从纤维、杂货等轻工业品，转为

机械、钢铁等重工业品，收录机、摩托车、电视机、汽车等打入了美国市场。1971年日本的工业品在对美出口总额中达到94%。1964年以前，日本在日、美贸易中一直有逆差，从1965年起发生了变化，1965—1971年的贸易顺差累计达81.4亿美元。日本还加强了同欧洲的交往。1962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出访西欧七国，提出了“自由世界三大支柱”的口号，即北美、西欧和日本是“自由世界”的三大支柱，加强三方的合作关系，将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池田还提出应该“加强同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合作”，“在欧洲和日本之间铺设一条与日本和美国一样的通道”。1963年3月，日本与英国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同年4月与法国签订了《日法通商条约》，并同其他欧共体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通过这些活动，日本逐步打入了欧洲市场。

3.“多边自主外交”(20世纪70年代)

日本外交的第三个阶段是“多边自主外交”。20世纪70年代初，有若干重大国际事件对日本震动很大。一是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二是“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冲击；三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在与苏争夺中从战略攻势变为战略守势，而苏联则步步紧逼。同时，西欧、中国、第三世界力量有较大发展。日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改变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采取了“多边自主外交”。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说，“日本跟着美国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多边自主外交”的基本内容是：(1)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2)借助中国，抗衡苏联。日本“多边自主外交”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同中国的邦交。战后，虽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但是日、中民间贸易往来开展得很活跃，从1960—1970年，日、中贸易总额从2 340万美元增加到8.23亿美元，猛增34倍。贸易差额从1 800万美元逆差，变成了3.15亿美元顺差。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了中国，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恢复了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同年8月，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974年，三木内阁在中、苏之间提出了“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但是，由于北方领土问题长期悬而不决，日、苏关系进展缓慢。(3)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70年代，“石油危机”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日本政府认识到发展同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因而改变了过去一味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做法，制定了“新中东政策”，同阿拉伯国家进行对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承认以阿拉法特为领袖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支持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到70年代末，日本对中东的贸易已达其出口总额的10%和进口总额的30%。在东南亚，为了消除当地国家由于日本经济力量迅速扩张而产生的“恐日”情绪，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话，争取列席并进一步参加东盟首脑会议。1976年，福田首相提出了“福田主义”三原则，即保证“不做军事大国”、同东盟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任关系、“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此外，日本还加强了同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

总之，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田中内阁推行的“多边自主外交”，还是福田内阁的以日、

美合作为轴心的“全方位外交”，无论是恢复日、中邦交，还是扩大同东南亚、拉美的联系，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都显示了日本外交自主性的进一步增强，表明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已经开始从双边性或区域性格局向全球性扩大。这一时期是日本开展积极外交，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前奏。

4. 谋求政治大国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加强，日本各届政府都把改变“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现状，争做政治大国当作主要目标。1981 年 5 月，铃木首相访问美国时宣布：“日本正开始第三个新的起点，即要从被动的受益者成为积极的创造者。”这个讲话被认为是日本“第三次远航”（又称“第三次开国”）的标志。紧接着，中曾根内阁公开举起“要做政治大国”的旗帜。以后各届政府在提法上略有不同，但目标都是一致的。

（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努力及前景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佐藤内阁就曾提出“过渡到政治大国”的口号，因条件不具备而被搁置。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美、苏争霸世界的斗争中，美国处于守势，为了对抗苏联，美国要求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国内的“大国意识”明显提高，日本领导集团顺势提出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把谋求政治大国作为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日本历届内阁都表示了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意愿。根据日本历届政府的言行，其政治大国目标的基本含义包括：(1)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以日、美、欧体制为基点，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发挥作用。(2)立足于亚太，以亚太合作为杠杆，确立日本在亚太的主导地位。(3)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积极扩大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影响。(4)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作用，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5)在综合安全保障的原则框架内，适度增强军事力量。总之，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目标就是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地位，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迅速成长为政治大国，迎接 21 世纪“以日本为中心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国际局势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流动状态之中。“冷战”后国际政治出现的这种空前的权力真空状态，对于“大国主义”志向空前膨胀的日本来说，是谋求政治大国的绝好机会。为此，日本加快了争做政治大国的步伐。

1. 推出新防务计划，向军事大国迈进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因受宪法“非战条款”的制约，只设自卫队，国家防务依赖美国。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日本曾宣布“无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即不向共产党国家出口武器、不向联合国决议规定的禁运对象国出口武器、不向国际争端当事国和可能参与争端的国家出售武器。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实行低军费开

支，奉行“专守防卫”的方针，关心的区域基本上限于本国和周边地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努力中，日本放弃了战后坚持多年的“重经济、轻军备”的路线，开始大力扩充军事力量。2002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分别是《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并提交国会审议。三法案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为日本走向军事大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日本防卫方针从以往的“滩头歼敌”转变为“海上歼敌”，从“固守待援”向打击对方基地转变；从据点防卫型向前方展开型转变；从维护国内体制型向保护海外利益型转变；从国土防卫型向国家利益防卫型转变；自卫队从被动防御型向实践型、外向型国防军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在防卫思想、战略、体制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军事大国”倾向，适应了走向“政治大国”战略的需要。

2. 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大国外交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如果说政治大国的很多指标无法衡量的话，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政治大国的一个共认的标志。因此，“冷战”结束后，日本明确地提出了“联合国外交”的口号，以其雄厚的资金为后盾，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成为政治大国。为此，日本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联合国外交。

3. 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加快谋求政治大国的步伐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界、学界很多人撰文，大力宣传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必要性和改革联合国的合理性。据权威调查，1991年日本72%的国民主张日本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64%的日本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对者仅16%。这就成为日本开展联合国外交的民意基础。

首先，在人员和资金两方面做准备。在资金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交纳的联合国会费与日俱增，到目前为止，日本是联合国会费的第二大出资国，承担的比例近达20%，使日本成为联合国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在人员方面，日本积极争取当选联合国所属机构的高级职务。日本政府认为，由日本人主持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工作，有利于扩大日本在世界各国中的影响，可以为进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准备。例如，原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主席明石康、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等。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工作，日本外务省特别成立了“国际机构人事中心”，该机构以各种形式派遣日本人到国际组织任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日本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工作的日本人增加了近60%。

其次，对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地区性大国开展了“争取支持外交”，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推动改革安理会的国际舆论和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日本还注意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利用自己世界首屈一指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资金，以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长期以来，亚洲是日本的外交基地，亚洲国家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占日本对外援助的60%左右，一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最大受益者。东南亚各

国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近年来，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大幅度上升，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最大官方发展援助国。日本已经成为对非洲大陆最有影响的外部力量之一。

最后，推动安理会改革。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必须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日本政府认为，联合国会员国已从创建时的51个增加到现在的近200个，但安理会的构成却没有变化，现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能担负更大责任的国家，所以必须以反映世界现状的形式改组安理会。1992年开始，日本就积极推动安理会改革，并认为安理会新成员的资格标准应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能对全世界施加影响"。日本关于改组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是，一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应以均衡的方式按照其经济实力和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财政贡献确定，即按财力划分权力。目前，日本主张把现有席位从15个增至24个，其中包括5个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达国家2席、发展中国家3席、与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一样都拥有否决权）、4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过去美国反对日本这一立场，主张把安理会扩大到21席。但2000年以后美国态度有所变化，2000年4月3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表示，美国同意把安理会扩大到21席以上。

4. 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人"的贡献

海湾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国际社会部分国家对日本"只出钱不出血"的指责，于1992年6月15日，在国会强行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合作法》和《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修正案》，突破了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政治禁忌，完成了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而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立法程序，使日本迈出了军事力量重新走向海外的第一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利用一切可乘之机，不断突破法律限制，制定了一系列架空"和平宪法"的法案，如《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简称《PKO合作法》），标志着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走出国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进行了"重新定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三法案，使日本自卫队可以跨出国门向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大规模的后方支援。尤其是2001年的"9·11"事件后，日本借"协美反恐"为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提出并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项援助美军行动的相关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出动了3艘军舰前往印度洋，开创了战后日本历史上首次在战时出兵的先例。

2003年7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旨在向伊拉克派兵的《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这意味着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政策出现了两个转折：一是可以在联合国框架外以及在未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下派兵；二是突破了根据特定事态的有时限的派遣自卫队的法律限制，日本政府迈出了制定永久性的派兵法律的步伐。

5. 通过联合国在新的全球性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

"冷战"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很难说还是主导性的作用，况且依靠军事力量发挥作用还受到国内体制和国际社会舆论的限制。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的地位现在看起来一时还难以实现。因此，日本在积极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试图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在诸如环保领域、难民救援、军备控制和裁军等“软领域”，通过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方式，在其他新的全球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国际地位。

首先是环保领域。环境问题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新问题，有关的制度、规则和框架都有待建立，日本在这个领域正可以大显身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日本的环境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1989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第一次将环境问题作为日本外交课题之一对待。为此，日本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参加全球有关环境问题的活动和公约，通过资金和技术合作，努力为解决环境问题做贡献。目前，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环保援助国家。

其次是难民问题的救援活动。绪方贞子曾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她的积极活动为扩大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援助阿富汗的东京会议的成功召开，与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

最后是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总体趋于缓和，但同时一些地区性冲突和武器扩散的问题却显得比较突出，构成了对国际社会新的威胁。在过去的“冷战”时期，军备控制与裁军问题主要围绕美苏两国及其控制的北约和华约来进行，其主导权完全掌握在美苏两国手中。“冷战”的结束使得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建立一种多边协调管理机制成为可能，联合国因此在军备控制与裁军领域开始发挥比过去更大的作用。

为了配合联合国的行动，同时也为了通过联合国能够使日本也参与进这一过去难以参与的领域，日本对此给予了积极协助。1991 年 5 月，联合国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裁军大会，这是“冷战”后联合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裁军会议。联合国选择了日本，可见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在大会上，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发表主旨演说，提出增加常规武器透明度、设立武器进出口申报制度的建议，表明日本将为此提供经费和人员，为推动国际裁军与防止武器扩散发挥积极主要的作用。这一建议已在 1991 年联合国大会上由日本等国提出议案并获得通过。此外，日本还试图参与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核管理体制。日本从唯一核武器经受国及非核大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先进国与经济、技术大国等立场出发，认为日本应该而且可能参与“冷战”后将以联合国为中心形成的新的国际核管理体制。为此，日本开始积极参与有关核武器的国际谈判和防止核扩散的活动，如反对核试验、促成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通过。在朝鲜半岛的核开发争端中，日本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关注，与美国、韩国共同商讨如何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将朝鲜接受核设施检查作为日、朝建交的先决条件。总之，日本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有关核问题的处理，并试图将这一问题也纳入联合国管理范围内，日本在其中发挥作用，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和平形象，增大在“冷战”后的联合国中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最终实现自己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目的。

除了日本政府自身的积极活动外，还鼓励更多年轻人以非政府组织（NCO）的形式到海外去参加体现国际主义的活动。据统计，目前活跃于国际合作机构的日本 NGO 有 400 多个。特别是近年来，在对科索沃、阿富汗的援助活动中，日本的 NCO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他们的活动形式也从过去的运送援助物资、对难民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到医疗、保健卫生、开发教育等领域。日本外务省与 NGO 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轨道，从资金上给予帮助和支持，使日本的 NGO 在国际社会越来越活跃，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例如，虽然它对联合国出资甚多，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联合国的职能和作用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而遭到损害，日本对联合国作用的期待也开始变得冷静。一方面，由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尚未删除、日本的联合国会费比例过高等因素，日本政府对联合国抱怨甚多。“联合国绝没有公平地对待日本，应该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另一方面，“联合国既是战胜国任意支配的机构，同时也是小国也能拥有一票的唯一场所”，“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抑制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等方面，又是唯一的有效机构，所以，日本应该继续尽力为联合国提供合作”。

20 多年来，日本全力实施政治大国战略，开展“积极进取”的“全方位”外交，国际地位已有显著提高。从现实状况看，日本具备成为政治大国的许多有利条件。它是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强国，经济规模占世界 GDP 的 18%，相当于美国的 60%～70%。它是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在联合国任职的高级官员很多，在安理会中任非常任理事国的次数最多。是参加西方大国首脑会议的唯一亚洲国家，是唯一列席北约和欧安会的亚洲国家。介入的国际热点较多，在一些问题上的作用仅次于美国。美国在“冷战”后对日本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要求更加强烈。由于日本处心积虑地活动，在大国中，美、英、法、俄都已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不少中小国家受过日本的“恩惠”，也持赞成态度。现在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主要障碍在于巴西、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也提出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要求，这样有可能造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范围过大的情况，联合国一时无法决定。如果安理会在扩大成员国的数量和新的常任理事国是否享受否决权问题上，各方能达成妥协，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日本有可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进而成为一个政治大国。

但是，在面临一些有利条件的同时，制约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因素依然存在。

（1）国内制约因素。

第一，日本国内政治仍未走出“冷战”后的调整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还在进行中，在宪法问题上，估计日本至少要经过 5 年以上时间的酝酿、讨论、逐步进入修宪的法律程序，最终修改第 9 条，彻底解除对战败国的制约，真正实现所谓的“普通国家”目标。

第二，日本经济恢复和再兴尚需时日。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经济的回升乏力，对日本扩大对外影响、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产生了一定的副

作用。

第三,要成为世界级军事大国还较遥远。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的军事实力会进一步增强。武器装备将向高技术、远程化方向发展;指挥通信和后勤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整体协同作战水平及战斗能力会迈上新的台阶。但是,日本军事发展模式是在防御基础上的“遏制”,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拥有核武装。因此,日本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级军事大国。

第四,日本对外政策难有较大突破。日本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和新保守派的日益得势,不利于日本冷静而理智地选择未来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从而有可能使日本政治的本国战略误入歧途。

(2)国际制约因素

第一,日本对历史问题态度暧昧,亚洲国家对日本始终保持警惕,在没有取得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安全信任情况下,日本很难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军事作用。

第二,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多次向海外派兵,其真正目的受到质疑。虽然日本有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的良好愿望,联合国也要求日本如此,美国也已经默许和支持日本修改宪法,但是,日本如此迫切地要做出“军事贡献”,往往使亚洲国家担心日本是否已经背离和平主义的发展路线,重蹈历史覆辙。

第三,美国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防范。日本在重大问题上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利益,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在美国的合作和支持下发挥作用。这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会产生很大制约。

第四,联合国改革困难重重,日本实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梦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随着联合国改革的深化,如果在安理会扩大成员国的数量和新的常任理事国是否享受否决权问题上,各方能达成妥协,那么日本最有可能会和德国等其他国家一道成为新的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这会使将来日本的大国地位大打折扣。

总之,国际、国内因素决定日本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如果能够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方面做出更多贡献,它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前景才会更加光明。

(三)日本政治趋向右翼保守。

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中,由于在“冷战”条件下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不彻底,以及由此又衍生出了日本自身对历史缺乏正确的认识。从而导致日本国内一直就存在着一股右倾势力,常常影响到日本政治,并且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膨胀而不断增长。“冷战”后日本政治趋向右倾保守化的主要表现如下:

1. 否认侵略战争历史

在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否认侵略战争的逆流。尽管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言行遭到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舆论的谴责,但日本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接受教训,反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否认更加频繁和升级，主要体现在不断制造“教科书事件”，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早在 1982 年和 1986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就掀起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的修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波澜，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对侵略史实的态度缓慢地有所进步。如 1993 年 8 月，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首次承认日军参与了“随军慰安妇”之事，并就此表示谢罪。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逐渐得到改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写进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史实，如“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731 部队”、强抓劳工以及屠杀东南亚居民等战争罪行。1997 年 1 月，日本右翼学者成立了拥有一万余名成员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认为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宣扬“自虐史观”，丧失了民族尊严。2001 年 4 月 3 日，8 家出版社提出的在历史记述上普遍严重倒退的书稿全部被文部科学省放行。尤其是其中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公民》两本教科书书稿严重歪曲历史，鼓吹侵略有理，激起了第三轮“历史教科书”波澜。小泉纯一郎在教科书问题上，声称不会更改已经审查通过了的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2004 年 11 月 27 日，在审查完下一轮的教科书时，日本文教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赞扬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减少使用“慰安妇”和“强迫劳役”等涉及军国主义暴行的词语，指出日本教育体系不能对日本以往做的事具有“自责”概念，要让日本新一代具有民族和历史“自豪”感。日本媒体为右翼势力发表否认侵略历史和侵略罪行、宣传“皇国史观”的言论提供了广阔的传播渠道。对于亚洲遭受侵略的邻国的谴责，日本媒体指责为“抓住历史问题不放”，是“另有企图”，认为中、韩应该反省对日本的态度。日本政府面对亚洲邻国的批评，以“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为理由来搪塞。然而对于反映真实历史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却加以阻挠，如禁止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发行，反映侵华日军残酷暴行的《东史郎日记》也遭到了起诉。

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政要们美化和否认侵略战争的又一举动。1985 年 8 月 15 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冷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里，许多日本政客经常以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来拉选票。从 1997 年桥本龙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右翼势力进一步谋求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和“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化”。小渊政权上台后于 1999 年又提出了旨在使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的“分祀论”。2000 年 1 月，自民党党代会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活动方针。2000 年，森喜朗迫于内外压力，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但他提出的“神国论”、“国体论”与“皇国史观”一脉相承。2001 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连续 4 年参拜靖国神社。与此同时，国会议员参观拜靖国神社成风。2004 年 10 月，79 名国会议员和 81 名地方议会议员组成庞大的议员代表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2. 纵容右翼势力抬头

1945 年日本战败后，曾经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二百多个右翼团体

全部被勒令解散，但不久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政策发生变化，逐渐放松对右翼势力的整肃，致使日本的右翼团体又死灰复燃，并且在日本社会不断增加其影响。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统计，日本全国在自治省登记的右翼团体已达 1 900 多个。虽然这些团体规模大小不一，其活动手法各异，但其追求的目的却基本一致，即鼓吹天皇崇拜和国家主义，拒绝承认侵略历史，反对战争道歉，要求修改宪法，扩充日本的军事力量，试图再现战前大日本帝国的“辉煌”。当然，这些右翼势力目前在日本社会还构不成主流，他们的主张还难以得到国家政策的认同，但从感情上来说，这些主张却迎合了一部分日本政治家们的心理需要，说出了这些政治家们想说而又不便于说的话。尤其是 90 年代日本保守政党进一步占据绝对优势的体制使得过去制约右翼势力的左翼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不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对右翼势力都采取了较之过去更加宽容的态度。

3. 革新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右倾保守势力占据上风

1993 年 7 月以后，日本政界发生激烈变动，政治力量进入大分化、大改组阶段，各种政治力量趋向右倾保守。原属保守党的自民党分裂后，从其中又分化出了新生党和先驱党两个代表新保守主义的政党。1994 年，新生党、日本新党、公明党、民社党以及从自民党分离出来的派别等“新保守势力”组成新进党，旋即分裂成自由党、新党魁党、太阳党和民主党等 6 个小党。从政治力量改组的情况看，力量较强的自民党、民主党和自由党，都是保守主义政党。原来的革新势力、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在大选中遭到惨败后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党纲中的社会主义原则，承认自民党的对外政策，且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共产党也不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主张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作为革新政党领导的社会运动的主体——“总评”、“同盟”、“中立劳联”、“新产别”四大工会组织纷纷解体，并相继加入 1989 年 11 月成立的政治意识比较保守的全国性工会组织“联合”。原属中道政党中的公明党和民社党都曾加入保守的新进党，以后公明党又与保守的自民党组成联合政权。因此，这些原来属于革新或者中道的政治力量也都走向右倾化。2003 年 11 月，在众议院选举中，众议院里形成了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由于民主党的成员基本上是从自民党内分化出来的，其政治倾向的主流仍然是保守的。因此，21 世纪初，保守政治力量在国会中处于从来未有过的优势地位。

4. 出台右倾色彩较浓的政策法案，计划修改宪法

日本修宪的目的与实质是要修改早已被日本政府视为阻碍其向外“发展”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和平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修宪问题最早可以追溯至 1957 年，岸信介内阁设立“宪法调查会”，试图修改宪法，由于反改宪的势力较为强大，只好作罢。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的削弱，日本的修宪议论再次升温。一些政治家公开提出修改宪法，并且日益被日本国

民和社会舆论所理解和接受，未出现过去那种激烈抵制的现象。目前的日本宪法第九条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

5. 极力发展军事力量，妄图充当军事大国

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特点是“少而精”、“内涵式”、“质量型”，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攻防能力兼备。

“冷战”结束后，日本连续 10 年保持军费总额世界第二、人均军费世界第一的状态。2000 年 10 月，日本政府公布 2002—2005 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 5 年内突入 25.16 亿日元的国防预算，用于提高海军和空军的远洋作战和进攻能力。2003 年度日本的“防卫费”已高达 4.93 万亿日元。同时，日本在军事战略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部署，防卫对象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即由防卫苏联变为应付周边事态和国际恐怖主义；自卫队活动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即军事活动由国内转向海外；防卫战略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卫”，增强日本军事攻击能力。为了提高军事实力，一方面加紧与美国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2003 年 12 月，日本政府决定花费 1 万亿日元从美国购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加快自己研制新型、高科技武器的能力。2003 年 3 月，日本用一枚 H2A 火箭发射两颗间谍卫星，以加强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监测。目前，日本自卫队已发展成世界上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重要武装力量。日本自卫队的在编人数虽然只有二十几万，但其官兵比例为 7∶3，这保证了战时日本能够迅速把自卫队的规模扩充到现有的数倍以上。在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还设立机构对军事情报和实战问题进行研究。另外，日本虽然暂时不拥有核武器，但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并且储藏有制造核武器的原料。日本从没有向国际社会承诺过在任何情况下也永远不制造核武器。

“冷战”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难以改变日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国内反右倾化的力量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本右倾化的警惕和制约，加上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理想，使日本不可能重返军国主义的老路。因此，对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既要看到其危害性，又要看到其局限性。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当今日本的经济衰退。战后日本实行了政治改革，形成了“55 体制”。随着“55 体制”的崩溃，日本政坛进入了动荡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开展了“联合国外交”，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

重要概念

经济奇迹　联合国外交　55 体制　政治大国

思考题

1. 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在各个阶段经济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特征是什么？
2. 日本战后国内政治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
3. 日本争取政治大国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进行了哪些努力？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战后，(　　)内阁推行了一整套“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国家战略。

A. 吉田茂　　B. 小渊惠三
C. 田中　　D. 中曾根

2. 日本政党政治在1955年10月，形成了以(　　)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以社会党为中坚的革新势力相对立。

A. 自由党　　B. 自民党
C. 新党魁党　　D. 新党

3.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在外交上推行(　　)。

A. 政治外交　　B. 经济外交
C. 多边外交　　D.“联合国外交”

4. 20世纪80年代，日本把谋求(　　)作为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

A. 进入联合国　　B. 政治大国
C. 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　　D. 同西欧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

5. 战后公开举起“要做政治大国”的旗帜是(　　)。

A. 田中内阁　　B. 铃木内阁
C. 福田内阁　　D. 中曾根内阁

二、多项选择题

1. 战后日本民主改革的内容有(　　)。

A. 解除日本武装，惩办战争罪犯
B. 实行“农地改革”
C. 解散财阀，铲除日本财阀的封建统治
D. 实施“劳动民主化”，缓解劳资矛盾

E. 社会民主化改革

2.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采取的措施是(　　)。

A. 积极争取建立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B. 极力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C. 立足亚太，逐步确立与美、欧抗衡的势力范围

D. 进一步扩充军事实力，加强海外军事活动

E.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3. 在 1951 年和 1954 年同美国签订(　　)，使驻日美军进一步合法化。

A.《日美安全条约》

B.《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C.《自卫队法修正案》

D.《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

E.《日美互助条约》

4. 日本政治右翼化的表现有(　　)。

A. 否认侵略战争历史

B. 纵容右翼势力抬头

C. 革新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右倾保守势力占据上风

D. 出台右倾色彩较浓的政策法案，计划修改宪法

E. 极力发展军事力量，妄图充当军事大国

5. 2002 年 4 月，日本政府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分别是(　　)，这些法案的通过为日本走向军事大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A.《关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合作法》

B.《武力攻击事态法案》

C.《自卫队法修正案》

D.《关于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修正案》

E.《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

6. 政治大国目标的基本含义包括(　　)。

A. 日、美同盟为轴心，以日、美、欧体制为基点，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B. 立足于亚太，以亚太合作为杠杆，确立日本在亚太的主导地位

C. 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积极扩大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影响

D. 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作用，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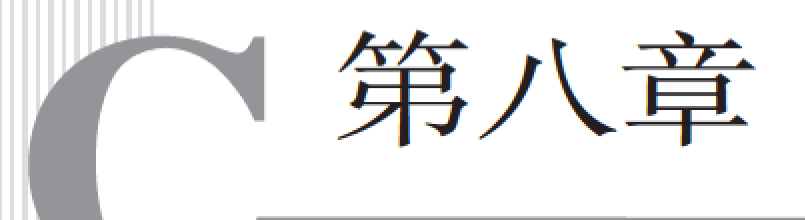
E. 在综合安全保障的原则框架内，适度增强军事力量

7. 田中角荣首相推行的“多边自主外交”的基本内容有（　　）。
A. 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轴，谋求同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
B. 重点发展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C. 借助中国，抗衡苏联
D. 在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进行平衡外交
E. 重点加强同美国的关系

答案：

单项选择：1. A　2. B　3. C　4. B　5. D

多项选择：1. ABCDE　2. ABCD　3. AB　4. ABCDE　5. ABC　6. ABCDE　7. ABC



从转轨走向复兴的俄罗斯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把握苏联建立与解体的原因，正确认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苏联所带来的影响，全面了解把握俄罗斯经济转轨、政治转型的特点，俄罗斯外交的调整与战略目标的确立。

重点与难点

- 苏联解体的原因。
- 戈尔巴乔夫改革对苏联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 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政治转型的特点。
- 俄罗斯外交的调整与战略目标的确立。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继承了它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成为独立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主权国家。俄罗斯独立后，经济制度向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转轨，政治制度向多党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过渡。在经历了长期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后，俄罗斯于世纪之交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政治的基本稳定，走上了复兴之路。作为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家，俄罗斯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一、苏联的建立与解体

（一）苏联的建立和发展

1917 年前的俄国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地跨欧、亚两大洲，约占有 1/2 的欧洲土地和 1/3 的亚洲土地。在末代沙皇尼克拉二世统治时期，俄国的版图已达到 2 280 万平方公里，其领土面积超过全球陆地面积的 1/6。在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版图之内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共有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民族，其中俄罗斯人约占 44.3%。沙皇政府对其他民族实行残酷的统治。

“十月革命”打碎了民族压迫的枷锁，各民族仿效俄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也称苏维埃共和国。从 1917 年 12 月到 1921 年初，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苏维埃共和国在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中，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建立了统一的军事指挥部和经济管理机构。1920 年秋到 1921 年初，俄罗斯联邦先后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签订条约，将对外贸易、邮电等部门合并，进一步密切了彼此之间的关系。1922 年 8 月，俄共(布)中央成立了由斯大林领导的委员会，研究把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统一整体的问题。列宁建议所有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愿联合又保留其平等权利的基础上，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22 年 12 月 30 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联邦(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4 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会批准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公约，规定各共和国是平等平权的，它们自愿参加，也有权自由退出。大会选举出了以加里宁等 4 人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联盟人民委员会。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从 1925 年起，不断有新成立的共和国加入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一共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

苏联的建立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它不仅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联的建立也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面貌。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列宁在经历了“直接过渡”和“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找到了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



义的思路的。推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从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采取迂回方式或者说改良主义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在重病期间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构思和改革设想，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路展开的。不幸的是列宁逝世过早，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展他的新思路，使之更加成熟和系统化。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又很快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晚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未能在实践中得到持久的贯彻执行。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实践中也一度遵循列宁的思路和方法，贯彻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但是，斯大林同苏联党内许多人一样，对新经济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临时性措施。斯大林出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从巩固和维护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发，提出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高速推进工业化的方针。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的问题。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小农个体经济已无法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二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利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他据此提出了全盘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中止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必然中断列宁晚年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并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曾为苏联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绝对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动员基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这种模式被当作后起而又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和追求理想社会的样板而广泛发生影响。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就是政治上集权过多、民主不足，以至于造成破坏法制、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经济上束缚和压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使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

1953 年 3 月 5 日，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逝世，经过激烈的权力角逐，赫鲁晓夫于 1953 年 9 月 7 日正式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取得了在苏联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苏联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工作重点转向改革与建设。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主要措施有：降低农业税，鼓励发展个人副业；减少或停止下达生产计划，扩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自主权，国家控制采购量，下达采购计划；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集体农庄的义务交售制；增加国营农场，合并集体农庄，以推进农业机械化。在农业改革的基础上，从 1957 年开始，苏联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试验，撤销了 25 个中央和共和国的部，建立了 105 个经济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工业、建筑业部门所辖企业下放给各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在政治方面，赫鲁晓夫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的解放，苏维埃的立法职能和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有所加强，安全机构和干部的特权有所控制。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起到了反思传统模式，寻求新的发展的思想解放作用。但是这次改革总的来看是局部的，缺乏准备，措施欠稳妥，而且政策朝令夕改。因此这次的改革不仅半途而废，而且遗留下不少隐患。

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当政 18 年。这一时期，苏联经历从国力上升到顶峰直到完全衰落的转变。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否定和取消了赫鲁晓夫过激的改革做法，执行较为稳妥、保守的方针。政治上，加强集体领导，规定党政最高职务永远不得兼任，使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化，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改进政府工作，加强法制；经济上，逐渐推行以改进计划工作、加强对企业经济刺激、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秩序良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在 1972 年大体同美国形成核均势，成为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超级大国。但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仍然没有冲破原有体制，许多深层次问题仍未解决。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由于苏联领导人思想日趋僵化保守，安于现状，苏联改革陷入停顿，原有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仍然十分突出。与此同时，苏联对外积极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进行全球侵略扩张。这不仅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被谴责和被孤立的地位，而且沉重的军费负担拖垮了国内经济，社会危机达到全面爆发的临界点。

（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解体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苏联社会发展陷于停止，经济、政治领域积累了许多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势在必行。1982 年 11 月 10 日，勃列日涅夫逝世，12 日，安德罗波夫继任苏共总书记，执政 15 个月，于 1984 年 2 月 9 日逝世。13 日，契尔年科继任，执政仅一年。这两位领导人因执政时间很短，没有进行全局性的变革。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对苏联进行了一场全方位的改革，经过 6 年零 9 个月的时间，彻底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国和当代超级大国，彻底葬送了建党 90 多年的苏联共产党，他自己也以完全失败的结局下台。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他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提出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经济改革的主张。次年 3 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加速社会经济发挥战略"同时决定进行经济政治改革。改革适应了客观需要，人民群众寄予厚望。苏共通过的文件和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讲话均强调，苏联改革的目的是在加速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地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充分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的一切优越性。但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推行下去，加速发展战略未见成效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以 1988 年 6 月苏共第 19 次全国代表会议为界限，苏联的改革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首先，"外交新思维"发展为"改革新思维"，把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标准"作为社会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戈尔巴乔夫认为，在"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价值观"即一般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等标准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趋于接近"。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新品质应该是"民主和人道主义"。在实际做法上，戈尔巴乔夫则采取了在经济和政治体制



上完全采用西方制度的行动。至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新思维"化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完整系统的"行动纲领"。

其次,改革的任务由"完善社会主义"变为"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大厦"。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对苏联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其真实的含义:一是彻底否认苏联过去所有那些年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二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建立以"新思维"为指导的结构。这样,戈尔巴乔夫便引导国家和社会力量走上了一条全面破坏社会结构、"彻底打碎行政命令体制"、摧毁所谓的"官僚主义政权"的道路。

再次,社会"公开性"和"民主化"变为"舆论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听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势力泛滥成灾。戈尔巴乔夫一上台便喊出"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一开始的意思是让人民群众和舆论工具公开讨论"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避免政策和工作的失误。当时这两个口号有一定的界定,即"公开性"、"民主化"的限度是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不许利用公开性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改变指导思想的时候,"公开性"、"民主化"就没有了任何界限。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后,苏联的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苏联陷入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怪圈,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发生了急剧变化和动荡。在政治方面,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改变苏维埃体制,建立新政体;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改变联盟体制,削弱联盟中央权力,极力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使苏联陷入全面危机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86—1988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降到2.8%,1989年为2.4%。从1990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同1984年相比,国民收入下降4%,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3%,工业产值下降1.2%,开创了战后经济严重滑坡的先例。1991年经济继续严重滑坡,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消费品全面短缺。1991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3。

第二,反共势力猖獗,共产党面临瓦解,政治局势失控。多党制实行后,苏联成立了一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政党和数百个反共团体。反共势力策划组织了一系列反共活动,逼共产党交权。他们占领了大部分舆论阵地,恶毒咒骂马列主义,污蔑"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历史。苏共内部矛盾尖锐化、公开化,党内派别有数十个,而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大批政治代表人物均在党内占据主要阵地;各级地方组织实行"自主",对中央处于半独立状态;广大党员思想混乱,政治上消沉或变质。1991年初,苏共中央修改党纲、党章,又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方向演变。1990年后,苏共在数个加盟共和国沦为在野党,在几十个大城市和工业城市丧失政权。到"8·19"事变后,苏共被取消,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

第三，联盟国家面临瓦解，民族矛盾与冲突日趋尖锐和激烈。早在1986年，阿拉木图便发生群众骚乱，敲响了民族问题的警钟，自“公开性”、“民主化”无限制实现后，民族问题全面激化。1988年2月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数十起大规模民族武装冲突。1989年5月，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要求独立，联盟国家中央无法控制。紧接着，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议会也宣布脱离苏联。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带头发表主权宣言，声称本国法律至高无上，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主权“优先于”联盟的主权，其余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面对这种分裂浪潮，戈尔巴乔夫以“新联盟条约”签订为对策，避免国家的分裂。但是，“新联盟条约”规定的各共和国主权，也远远超过了联邦中央，除了与共和国共享外交和军事权力外，联邦中央便无任何权力，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各共和国则实际上独立于中央。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大打“经济封锁战”，经济分立主义导致联盟财政体系的破坏和经济市场的分割。所以，在“8·19”事变之前，苏联实际上已经处于解体的边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呼吁苏联公民支持该委员会，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努力。该委员会同日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这项包括16点内容的命令说：为了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国家的领土完整、恢复法制和克服危机，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无力确保实施紧急状态的机关将被停止活动，而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任命的专门全权代表负责；立即改组不按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行事的政权机关、管理机关和军事组织；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不符合苏联宪法和法令的法令和决定一律无效；停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的活动；公民和团体非法拥有的武器必须立即交出；禁止集会、游行，必要时可实行宵禁；对新闻进行监督。命令还要求苏联内阁采取措施保障居民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等。此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8·19”事件发生后，苏联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发布了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走上街头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他甚至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并号召群众进行总罢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优柔寡断、未能果断肃清议会大厦的反对派，在叶利钦的鼓动下，情况发生逆转。20日晚，议会大厦前已聚集了数万名示威群众。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



誓死保卫议会。21 日下午，苏联国防部命令军队撤回驻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放弃了行动。21 日晚 8 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22 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苏联首都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颁布了废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全部决定，解除其成员的所有职务的命令。至此，“8·19”事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8·19”事件失败后，苏联解体的形势已无法逆转。24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联邦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这两个共和国分别于 8 月20 日和 22 日宣布独立。同一天，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独立。将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乌克兰在苏联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而在这以前，立陶宛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已先后宣布独立。

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三国领导人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在一项声明中说，由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走进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并建立独立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三国领导人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调机构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同其宗旨的国家均可参加。1991 年 12 月 21 日，俄罗斯等 11 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922 年 12 月 30 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夜，19 时 25 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19 时 32 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的国旗开始降下，19 时 45 分，俄罗斯的三色旗升起。12 月 26 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它历史上最后的会议，完成了最后的“法律手续”。

二、俄罗斯经济与政治的转型

（一）俄罗斯经济的转型与经济政策的调整

关于俄罗斯的经济制度，俄联邦《宪法》规定：“平等地承认和保护私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第 8 条第 2 款），“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可以以私人、国家、地方或其他所有制形式存在”（第 9 条第 2 款）；“私有权受法律保护”，“每个人都有权拥有私有财产，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掌管、使用和支配这些财产”（第 35 条）；“商品、服务和财政资源的自由流动、竞争和自由经济活动必须在俄罗斯联邦得到保证”等。从宪法相关条文来看，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型经济制度。私有经济是俄罗斯经济

的主体，其他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公有经济允许存在。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俄罗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俄私有化进程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指商业、服务业及小型工业、运输和建筑企业的私有化，其主要方式有拍卖、招标、租赁赎买和股份制。小私有化于 1992 年开始，1993 年基本完成。大私有化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主要通过股份化实现。大私有化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92 年 7 月至 1994 年 6 月底的“证券私有化”。1992 年俄政府确定了将数万家国有和地方企业通过私有化证券的方式进行无偿私有化的总体方针，力图通过向公民发放私有化证券，将苏联 70 年积累的社会资产进行估价、等分，向公民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1992 年 10 月 1 日起，俄政府开始向每个公民发放一张面值为 1 万卢布的不记名、不挂失、可出售、可转让的私有化证券。该证券可用于购买职工所在企业或其他企业、股份公司的股票，购买由政府或私人建立的投资基金的股份(投资基金将收集的私有化证券投资于私有化企业股票)，私有化证券也可出售换成现金、赠送亲友或用于住房私有化等。证券私有化阶段，股份化的企业将大部分股份以低价出售给本企业职工，小部分出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私有化第一阶段结束后，俄工业、农业、科技部门应实行股份制的 3.016 9 万家企业中有 71%的企业注册了股份公司，商业、餐饮和服务行业中企业的私有化率分别达到了 75.4%、66.3%和 76.4%。

第二阶段是从 1994 年 7 月至 1996 年 12 月底的“现金私有化”。这一阶段，用现金形式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其中心任务是转让已私有化企业中仍保留的国有股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企业私有化由第一阶段多半采用无偿转让方式转为按市场价出售的方式，出售的股份可占企业注册资本的 10%～15%，本国及外国的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参加竞购。由于缺乏原始资本，1995 年起还采取了国有股份抵押贷款的办法(也称“贷款换股份”)，既可通过私人贷款来购买企业，又可根据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该办法实行后，部分人利用对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大量廉价收购国有资产，极大地促进了俄金融工业资本的积聚和扩张，一些私人财团得以迅速膨胀，使金融寡头完成了资本集中的最后过程，形成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少数寡头阶层。同时也造成了“私有化寻租”的腐败现象泛滥，大量资产被非法地转移到了海外。经过第二阶段后，俄私有企业的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0%以上。

第三阶段从 1997 年开始，转入“个案私有化”。即停止大规模的私有化，改为有选择地、部分地、经过仔细研究地进行国有企业的资产拍卖和重组。这一阶段的私有化发生了重要变化：其重点从平均分配国有资产转为将投资与改造相结合，注重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其范围进一步扩大，拓展到燃料动力部门和军工部门，扩大到设施领域，如不动产和所占地面；其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招标、租赁、拍卖均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其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减少了对本企业集体和领导人的优惠；加强了国家对其过程的监督。



俄罗斯农村的土地私有化自1993年开始，国家将土地按份额分给农民，有1 200万农民陆续得到了土地，仿效西方推行私人农场的经营模式，大多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变成了私人农场或各种股份公司。目前俄已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的农业结构，国家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已不到10%。目前俄共有农用土地4亿多公顷(其中一半为耕地)，30%为农民个人所有，1.6%为法人所有，其余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所有。

2001年10月和2002年7月，俄议会分别通过《土地法典》和《农用土地流通法》，规定了俄城市和农用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均可买卖，结束了苏联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和俄罗斯独立后土地关系"非公非私"的产权模糊状态，开创了俄土地关系史上的新时代。《土地法典》主要调节占全俄面积2%的城市用地流通，规定城市用地允许买卖；外国人同样享有买卖土地的权利；已分给公民的宅旁园地、果蔬园等地块归个人所有，可租可买；企业、商店等生产经营设施下的地块可长期租赁(期限最长为49年)或买卖，优先租卖给建筑物所有者；空地租售采取招标方式；资源地、林地等只租不卖，外国人可通过竞标取得开采权(无所有权)；边境地区土地不得卖给外国人。《农用土地流通法》调节占俄面积13%的农用土地流通，允许其买卖，但不得用于非农业目的；已分给农民的份地(1亿多公顷，占俄农用土地近30%)为其私产，可租可售。外国人无权购买，只能承租，期限最长为49年。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方面，俄罗斯实施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措施。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第五次人代会上提出了俄罗斯的激进经济改革方案。他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同时，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原来拟定分阶段做的事情现在需要一次性进行，因此俄罗斯必须立即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根据叶利钦为改革定下的基调，以第一副总理盖达尔(后为代总理)为首的政府班子于1992年2月制定和通过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俄罗斯联邦经济政策备忘录》，对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方案的内容做了具体规定。

为了进行激进经济改革，俄罗斯聘请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休克疗法"创始人杰佛里·萨克斯担任顾问。此前萨克斯曾任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经济顾问，指导这些国家进行了"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但是"休克疗法"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通货膨胀恶性发展，1992年通胀率高达2 510%；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5%(而1991年下降5%)，工业产值下降18%(−8%)，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9.7%(−15%)；对外贸易继续下降，外汇空前短缺，卢布汇率狂跌不止；人民生活急剧恶化，1992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47.5%，贫困线以下人口增加到1/3。

鉴于"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后果，切尔诺梅尔金接任总理后即开始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随后的基里延科也基本上推行这样一条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路线。在此前提下，他们进行了局部调整，如抛弃了激进的改革方针，进行渐进改革的探索；注意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把稳定生产放在首位；部分放松了经济紧缩措施；适当关注社会保障，以消除人民的不满；放慢私有化速度，加强对私有化的规范和管理等。他们强调私有化不单是要改变所有制关系，

更是要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刺激投资和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造。

“休克疗法”和脱离俄罗斯国情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路线，以及从苏联继承的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转轨过程中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俄罗斯与东欧各国以及与独联体各国原有传统经济联系的中断等，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是经济长期处于危机之中。1992—1998 年，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 40%，工业生产下降 50%，消费价格上涨 6 168 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 55%，国有资产经过私有化后，集中到少数投机者中，产生了一批可以左右俄政治的金融寡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0%最富裕的居民与 10%最贫穷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由 1992 年的 7.2 倍扩大到 1997 年的 13.5 倍。

1998 年 8 月，俄罗斯爆发了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形成以金融危机为尖锐表现的多种危机交织的局面。这场危机使长期衰退的俄罗斯经济又遭受了灾难性的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俄罗斯“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先后出现三届政府，即普里马科夫政府、斯捷帕申政府和普京政府。普里马科夫政府受命于危难之时，面临五大难题(生产下降、债台高筑、工资拖欠、卢布贬值和通货膨胀)和五种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结构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因此决定对经济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斯捷帕申政府和普京政府基本继承了上届政府的主要政策，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普京政府提出“强国富民”的目标，探索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新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这样，就形成了从普里马科夫政府到普京政府的新政。

普里马科夫主张俄罗斯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主张走一条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稳定财政与发展生产相结合、所有制变更与经营机制转变相结合的新的改革道路。其重点是：

第一，转变改革模式。明确提出改革道路再选择问题，坚决放弃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计的、以“休克疗法”和货币主义为主要标志的“野蛮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果断地转向社会市场经济改革。

第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明确提出“在当前严峻时期国家的作用是整顿经济秩序”，使国家在摆脱危机方面做出重大决策。

第三，稳定金融体系。包括重新调整银行系统的结构，重组国家债务，完善预算程序，适当增加货币发行量。

第四，扶持发展生产。强调政府将致力于发展生产，“宏观经济应该为产业部门的发展服务”。

第五，调整私有化政策，对资产进行重新登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国产资产管理效率。

第六，积极开展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努力争取该组织提供俄罗斯急需的贷款，

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跪着求人”。提出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要求为此尽快通过有关法律，简化外商投资手续。

第七，强调改革必须面向社会、面向人民，加强居民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的生活。

1999 年 5 月普里马科夫被解职后，随后担任总理的斯捷帕申和普京基本延续、执行了普里马科夫所制定的经济政策。

1999 年 12 月 31 日，叶利钦辞去总统的职务，普京担任代总统。2000 年 3 月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政俄罗斯后，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困难。他指出，在 90 年代，俄罗斯的 GDP 几乎减少了一半，总量只及美国的 1/10，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投资大幅度减少，居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普京强调，首先要对 90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针对过去几年瞎碰瞎摸的做法，制订长远的经济发展战略来保证俄罗斯在世界上高度发达、繁荣和伟大的国家的地位。在肯定前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绩的基础上，坚持渐进的和平衡的原则，实施进一步的经济改革。

第二，建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统一体系。这虽然不是恢复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系，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制订游戏规则并监督市场主体对规则的遵守。如今的俄罗斯要求国家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更大程度上加强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干预。

第三，实行最适合俄罗斯具体条件的改革战略。简单地照搬外国教科书上的模型和公式是行不通的。俄罗斯当前最重要的是，依靠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双管齐下的方法提高投资积极性，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第四，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优先发展科技进步领先行业，通过积极的信贷、税收和各种优惠杠杆刺激对先进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国内需求。还要支持非原料部门的生产，加强高技术产品、燃料、能源和原料部门的出口能力。

第五，要建立有效的财政体系，提高财政预算的效率，改革税收制度，消除三角债，彻底清理易货交易和其他非货币结算，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维护卢布汇率的稳定。要建立规范的金融市场作为融资的主要途径，对现有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造，严厉打击影子经济，肃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第六，为了进一步加快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国家积极支持各种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 WTO。

第七，前一阶段的经济改革忽视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之下降到了极限。俄罗斯政府将努力改变这种局面，在保证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的基础上提高福利水平，克服一切困难，加强国家对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符合俄罗斯实际，加之政局稳定和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等原因，俄罗斯经济进入了恢复增长阶段。1999—2003 年俄罗斯 GDP 累计增

长29.9%，其中，2003年GDP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 652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合人均3 200美元，若考虑到公认的超过25%影子经济情况，则俄罗斯的人均实际GDP在4 000美元之上。在衰退过程中受打击最重的工业部门近年表现出了较强的复苏势头：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27%，2003年工业增长率达到了7.3%，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近5年农业产出年均增长4.3%，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 108亿美元，同比增长25.3%，顺差596亿美元，增长28.7%。国家预算状况良好，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财政稳定基金，为偿还内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2003年，俄罗斯在支付了173亿美元外债之后，黄金外汇储备由2003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亿美元，俄外债余额也从1999年高峰时的1 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 190亿美元。卢布稳定，对外币汇率升值，12年来首次出现卢布不跌反升的现象，仅2003年卢布对美元汇率升值就达18.9%，卢布实际增值5.3%，俄罗斯居民从多年来一直拼命将卢布兑换成美元以保值的状况开始改变，美元存款减少，卢布存款增加。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近几年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在2000—2003年的4年里4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0%，2003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14.5%，为同年GDP长率的2倍，全国居民平均月工资由1999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3美元，居民银行存款总额在2003年一年内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国失业率下降了近40%，失业人数由1998年857万人下降到2002年510万人。自信和尊严重新回到俄罗斯人中间，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

俄罗斯的经济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但进入2008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受全球油价下跌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滑严重。根据俄罗斯政府官方网站2009年18日公布的“2009年宏观经济预测报告”，俄罗斯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经济下滑，2009年上半年仍将可能持续，政府反危机措施的积极效果在2009年第二季度末才会显现。

2009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4～5个百分点，投资可能下降15%～18%。在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出口量减少的情况下，2009年俄罗斯商品出口额将减少45%。报告说，2009年俄罗斯工业生产将减少7.4%，制造业将下跌9.7%。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有建材生产、机械制造、木材加工、纺织皮革生产及造纸等行业。食品加工业受影响较小。

经济发展部预测，2009年俄罗斯石油开采量为4.82亿吨，比2008年减少1.1%，出口



量为2.37亿吨，比2008年减少2.5%。天然气、煤炭、油品及电力的开采和生产也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报告指出，2009年俄罗斯总失业人口将达到600万，失业率为8.2%。全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3%。

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俄罗斯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反危机措施。在这一阶段，反危机政策主要针对金融信贷行业，以阻止危机向其他经济领域迅速蔓延，引起社会经济基础的震荡。在俄罗斯政府提出的计划中明确了七点优先工作方向，将保障社会稳定、支持民生、扩大内需和发展本国商业作为重点。计划指出，俄罗斯政府将完全履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将增加居民社会保险，扩大和改善社会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促进就业，实施失业人员再培训计划。政府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基础，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部因素的依赖，尽最大可能提供国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危机情况下，国家投资和国家定购将在促进内需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进稳定住房、本国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稳定。俄政府承诺，将减轻商业发展的行政阻碍，包括打击腐败。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俄政府鼓励居民存款，提高投资吸引力，建立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努力降低通货膨胀，保持汇率平衡，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必要的条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2009年3月31日发表的报告认为，2009年俄罗斯经济没有好转的可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5.6%，经济表现在“金砖四国”中将排名最后。

（二）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确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逐步转轨，从苏联的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向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转变，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俄罗斯政治转轨的过程中，各种矛盾激化，曾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现在，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基本确立，社会矛盾趋于缓和，政治形势好转。

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轨，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开始。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政治民主改革，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总统制。俄联邦的政治制度也随之由以往的一党执政、党政融合、议政合一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渡到以总统制、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尽管当时的政治制度已经转轨，但俄罗斯的政权体制并未理顺。过去已作过多次修改的宪法，本身包含许多矛盾，总统与议会之间的职权划分很不明确。例如，当时的宪法一方面体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又有对行政机关强有力的监督权；另一方面又规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拥有领导国家的大权。比较而言，当时议会的权力比总统还要大。这种权力结构引起的后果，就是每逢在经济改革等方面出现分歧的时候，总统与议会便展开激烈的斗争，出现“双重政权”局面。为结束两个中心的局面，俄决定制订新宪法。在制订新宪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俄是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还是实行总统制的争论。叶利钦主张在

俄实行总统集权制，议会领导人则主张俄应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由于矛盾的激化，就发生了1993年10月“炮打白宫”的流血事件。通过“十月事件”，叶利钦摧毁了议会，镇压了反对派，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初步形成“总统集权”的局面。1993年12月，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这标志着“总统集权制”的正式确立。

俄罗斯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是国家元首，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四年，只能连任一届。竞选的条件是年龄不低于35岁，并在联邦境内居住时间超过10年。联邦委员会可在杜马提出弹劾总统案并经过联邦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裁决确认的基础上罢免总统。总统任命总理，总统向杜马提出俄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候选人，向联邦委员会提出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及最高检察院院长的候选人。组织并领导俄联邦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联邦安全局局长、国防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对外情报局局长、俄联邦紧急情况灾部部长、原子能部部长、科技部部长。总统有权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有权签署并颁布法律、发布命令，有否决国家杜马通过的联邦法律、解散杜马的权力等。

俄联邦立法机关为联邦会议，由联邦委员会（上院）与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国家杜马由450名议员组成，任期四年。国家杜马对总统提出的总理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决定对政府信任问题，任免中央银行行长，依照权限通过联邦法律和命令。联邦委员会由89个俄联邦主体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共计178个席位。主要职能为：批准俄联邦主体边界的勘定；批准关于宣布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决定俄联邦武装力量的境外派兵问题；决定俄联邦总统的选举；弹劾总统；任命俄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院长；任免俄联邦总检察长。

俄联邦的司法权力体系由俄联邦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组成。宪法法院。俄罗斯宪法法院解决各类、各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俄联邦宪法的案件。最高法院是民事、刑事、行政等一般司法法院管辖范围之内的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仲裁法院领导俄联邦各级仲裁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

俄罗斯联邦政府是最高执行机关。它制定并向国家杜马提出联邦预算，实施统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管理联邦财产，实行对外政策措施，保障法制及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等。

首先，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其中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联邦直辖市、1个自治州、10个民族自治区。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政治局势的显著特点是动荡不安。首先，总统、议会、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叶利钦时期政局不稳的主要表现。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始终困扰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矛盾，曾引起总统“炮打议会大厦”，1994年12月至1996年11月，俄议会两院对总统抛开立法机关独自决定车臣战争的做法极为不满，多次通过反对叶利钦的决定。此后围绕总理的任命和频繁更换，议会和总统矛盾十分尖锐。

其次，中央政权与地方之间，包括与以少数民族居民为主的联邦主体之间的矛盾，是俄



政局动荡的另一个主要问题。俄罗斯独立后，联邦中原有的16个自治共和国均自行升格为共和国并获承认，原来的5个自治州中有4个也宣布并争得共和国的地位，它们仍在不断向联邦政府要权力，其中一些共和国在闹独立。车臣、印古什、达叶斯坦、北奥塞梯等地因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运动而成为冲突热点地区，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些地区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虽然，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解和控制措施，但民族矛盾和其他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

再次，政权机构与金融寡头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俄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叶利钦时期在总统支持下靠巧取豪夺巨额国家资产起家的金融巨头，依赖资本力量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决策。由于金融寡头在叶利钦的总统选举中，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因此与政府建立了紧密联系，以至于有舆论认为这种关系已"达到令人难以区分政府机构和私人集团的程度"。金融寡头的这种政治参与扭曲了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导致形成一种狭隘的圈子，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

最后，多党政治不成熟，政党不断分化组合，缺乏可以稳定国家政治局势的政治党派。叶利钦执政时期，俄政党数目繁多。其中大多数政党人数很少，组织涣散，纪律松懈，而且不稳定，分化组合频繁。直到1993年底，俄政党主要斗争方式是"街头抗争"，集会、罢工、游行示威不断，经常发生流血冲突。

2000年普京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打击地方分裂势力，打击政治寡头势力，强化总统的权力，使俄罗斯的政局逐步稳定，国家政治生活走向稳定、有序。

首先，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加强总统垂直强烈系统。为此：(1)建立七个联邦区，实现全国政令统一。2000年5月13日，普京发布总统令，将全国划分为七个联邦区，并派驻总统全权代表。此举之目的在于约束地方，打击各联邦主体的分离倾向。联邦区的设立对联邦主体形成取代之势，这有效地警告了地方，体现了联邦总统的权威。此后，除车臣共和国外，各联邦主体的分离主义迅速收敛，与联邦中央的分歧多集中在权限划分和财政划分等事务领域。(2)改变联邦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剥夺地方官员直接参与中央决策的权力。(3)修改法律，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总统有权对地方行政长官提出警告、解除或临时解除他们的职务，有权要求地方政府限期修改、废止与中央立法相违背的法律，总统还拥有解散地方议会的权力。(4)从经济上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制约能力。将中央与地方税收的分配比例由51%∶49%，改为63%∶37%。地方对中央的财政依赖程度加强，制约了地方领导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能力。

其次，打击寡头势力，解决寡头干政问题。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金融寡头的权势极度膨胀，严重干扰了社会政治进程。为解决这一问题，普京上台后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表明立场，2000年6月28日普京接见21名最有影响的实业界人士时说，政府应该为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保障，但不能容许他们干涉国家政治；二是杀一儆百，以涉嫌侵吞国家财产为由逮捕了寡头之一的"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总裁古辛斯基，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鉴

于古辛斯基“不思悔改”，利用所把持的“独立”电视台继续在车臣等国内外政治问题上与政府唱反调，2001 年 4 月，有政府背景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以“独立”电视台拖欠债务为由，运用法律程序，强行对它进行重组。同时政府再度逮捕了古辛斯基，并再度因证据不足加以释放，迫使他逃往国外。此后，俄政府又把矛头对准曾任叶利钦总统顾问、独联体秘书的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逼迫后者逃亡。经过这一系列行动，寡头势力受到重创，寡头干政问题得到解决。

再次，实现中派联合，建立议会多数，压制俄共。1999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结果，在国家杜马 450 个席位中，俄共占 113 席，为第一大党；支持普京的中派“团结”竞选联盟和“祖国—俄罗斯”竞选联盟分别占 72 席和 66 席，为第二和第三大党。俄共利用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控制了从议长到议会主要委员会领导职位。2001 年初，俄共反对政府预算草案，在议会发起倒阁活动。俄共坚决反对通过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新《土地法典》，成为普京经济改革战略的最大阻力。2001 年末，在普京政权的授意下，两个中派党“团结”和“祖国—俄罗斯运动”合并为“团结—祖国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俄罗斯 10 年历史中议会首次出现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2002 年 3 月，“团结—祖国运动党”提出按政党议员比例重新划分议会各委员会领导权的议案，迫使俄共及其盟友农业党从议会一些重要委员会的领导岗位退出，同时导致俄共的分裂。俄共丧失了对议会的控制。

最后，坚决打击车臣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努力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叶利钦时期，虽然对车臣分裂势力实施了坚决的打击，在 1994 年发动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但由于俄军指挥不当，导致损失惨重。1996 年底叶利钦被迫结束“车臣战争”，于 1997 年与车臣分裂主义分子签署了相互关系条约，给予车臣“准主权国家”的特殊地位。普京主政后，对车臣分裂分子采取强硬政策，针对车臣分裂分子在俄罗斯各地制造恐怖活动，普京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反车臣分裂分子的首要任务。普京的强硬态度尽管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指责，但得到了俄罗斯全社会的支持。

2008 年 5 月 7 日，俄罗斯顺利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5 月 8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梅德韦杰夫对普京出任政府总理的提名。至此“梅普组合”正式启动。“梅普组合”能否长久，俄罗斯是否会再现“双重政权”、两个权力中心的政治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政治力量格局对未来发展的影响。普京担任总统的八年里，俄罗斯始终保持着政局的稳定，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格局。普京大力推进的富民、强国方略以及一系列政策深得民心，强化政权体系的措施成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有力保障，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使得普京本人以及国家政权享有很高的社会支持率。“梅普组合”的出现使得原先唯总统马首是瞻的“政权党”因普京总统的卸任、普京总理的上任而发生微妙的变化：普京担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职务，被奉为精神领袖，无疑增强了普京和普京政府对总统的牵制力、威慑力，当然这并不一定是现实的、消极的。



第二，政党政治与国家权力体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2007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不仅保证了“政权党”的胜利、印证了多数选民对普京治国方略的拥护和支持程度，而且从制度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即向着形成较为完备的政党制度的方向发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国家政治体制、权力体制的变化。

普京担任总统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改革政治体制，整顿政治秩序，规范政党活动，使俄罗斯实现了从“乱”到“治”、从“治”到“兴”，政治局势始终保持着稳定。普京充分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运用法律手段、通过行政系统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逐步形成了一种保持民主形式、实行总统统一领导的权力体制和管理方式。随着普京总统的卸任，新总统的上任，原先那种以个人威望为基础的总统集中管理模式能否延续下去，成为政局稳定、国家安定的关键。

经过 2007 年国家杜马选举，俄罗斯政治体制显现出向以议会多数派政党组阁方向发展的迹象。普京曾经多次提出要加强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明确提出建立议会多数派为依托组阁的设想。这一发展方向显然是基于俄罗斯政治力量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支持现政权的力量日益壮大，反对派力量日渐萎缩。而这一发展方向必然对未来的国家权力结构、对“梅普组合”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三，未来政治发展趋势。与上一次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相比，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叶利钦执政时期的混乱、衰败与普京执政时期的稳定、振兴形成鲜明对照。显而易见，普京时期对于叶利钦时期而言是扬弃多于继承。普京时期探索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尝试是成功的，普京执政近八年来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调整、改革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并因此而受到主要党派以及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由此也使得普京的继任者将更多的是继承：延续普京的路线、普京时期的“既定方针”。

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保持了执政的精英集团、干部队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为“梅普组合”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基础。梅德韦杰夫是普京团队的重要成员，与普京合作多年，而且在普京支持下当选了新一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当选俄罗斯总统、“梅普组合”的形成实质上是执政的精英集团的一次“内部分工”。

普京政府与历届政府的区别在于，普京政府的权重发生积极变化，有可能成为高效的政府。这首先是由于普京的个人威望。其次，普京拥有在自己任总统期间积累下的政治资源。普京的总理任期有可能是长期而稳定的，因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在解决许多问题时立场一致。他们两人最近在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面的表述上虽有不同，但只是侧重点上的差异，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三、俄罗斯的外交调整与战略目标的确立

（一）叶利钦总统的外交政策及其调整

俄罗斯独立后最初的外交战略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外政策的继续。它不仅继承了

苏联的大国地位及其各种权利和义务，而且也继承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与西方国家大规模合作的方针。“融入西方文明世界”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最初目标。其目的，一是获取西方国家对俄的经济技术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二是保持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因此，它选择了向西方“一边倒”的“西方化”战略，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给予西方国家以积极的配合。1992 年 2 月 1 日，叶利钦同美国总统在戴维营会晤，发表了两国关系的声明。此外，还同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国领导人签署了国家文件。这些文件都宣布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92 年 6 月 16—17 日，叶利钦正式访问美国，两国总统签署了确认俄美伙伴和友好关系的《华盛顿宪章》和关于大规模削减两国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但俄、美双方实际上并未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各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仍很严重，摩擦和斗争经常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按西方价值观办事，如取消对古巴、朝鲜的援助，接见古巴反对派代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一些国家的内政等；在制度转轨和经济发展上，向西方学习，请求西方给予经济援助，俄罗斯政府要员一再呼吁西方对俄实行“新马歇尔计划”和扩大投资，声言如果俄罗斯改革中断，共产主义就会再次占上风，那时国际社会将不得不付出远比现在援助俄罗斯高得多的代价；在地区热点问题和非西方大国的问题上，迎合西方的意愿，配合西方的行动。1992 年 9 月，俄政府宣布从苏联盟国古巴撤出军事教练旅，继而公开抨击古巴的人权状况，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基本停止。在朝鲜半岛，俄继续实行戈尔巴乔夫时期与两个朝鲜关系的模式，积极推进与韩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与朝鲜的关系则持续恶化，对朝鲜的各种援助以及国家间的互访和政治接触几乎完全停止。俄外交部指出，“必须远离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科济列夫在 1992 年的一项声明中指出，俄罗斯愿意向合乎俄意愿的国家出售武器，但朝鲜除外。印度与苏联有着传统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非常密切。但 1992 年的俄、印关系却处于停止甚至倒退状态，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锐减，经济联系削弱，贸易额急剧下降。在与其有传统利益关系的热点地区，俄罗斯也追随西方政策，积极配合西方国家的行动，如支持对南斯拉夫的制裁，参与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等。

俄罗斯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并没有给它带来它所希望的结果。由于俄罗斯的改革没能满足西方对其援助所附加的种种苛刻条件，在 1992 年除了人道主义援助和食品外，西方的援助协议和承诺几乎均未兑现，依靠西方援助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基本落空。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的外交空间大大缩小，特别是由于西方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并加紧向独联体国家渗透，对俄罗斯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92 年下半年开始，俄罗斯领导人开始谈论俄罗斯作为欧亚国家的特性，“一边倒”外交政策逐渐演变为“双头鹰”的外交政策。从 1992 年末至次年 1 月，叶利钦相继访问了韩国、中国和印度三个亚洲国家。他表示，俄罗斯“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东方政策”，“要实行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在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俄罗斯开始改变对西方亦步亦趋的姿态，在某些问题上小心翼翼地表示不同于西方的立场。例如，在“波黑冲突”中俄罗斯开始重新担当起塞尔



维亚与南斯拉夫支持者的角色；对美国插手苏联地区冲突的企图进行了抵制，强调俄罗斯在这一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在武器出售问题上也向西方提出了异议；对西方大国经济援助不力和消极对待俄加入大国俱乐部如“西方七国集团”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但是，“双头鹰”对外政策总体上仍然保留了“亲西方”的性质。

随着俄罗斯同西方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激化、随着俄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亲西方“激进民主派”的变化，以及俄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认识的深化，“一边倒”政策最终被修正直至被抛弃。

1996 年 1 月 5 日，叶利钦解除了科济列夫外交部长的职务，任命普里马科夫为新任外交部长。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1996 年 1 月底，叶利钦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应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修正了过去关于“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普里马科夫也强调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应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下，俄罗斯开始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这一战略集中体现在 1997 年叶利钦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

俄罗斯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对世界的认识与俄罗斯的自我定位。这是俄罗斯确定外交政策的基础。俄罗斯认为，当今的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加强，各种政治力量在不断成长，这种趋势为俄罗斯确立其世界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美国致力于建立单极世界，特别是美国利用俄罗斯综合国力的下降及“俄罗斯在解决国际生活中涉及本国利益的根本问题上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的现实，削弱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地位。因此俄罗斯在新的世界面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基于这样的判断，俄罗斯认为必须积极的推进多极化，使俄罗斯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也是俄罗斯国家利益之所在。

第二，外交战略目标的定位。俄罗斯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实现大国作用，建立全方位的伙伴关系。首先，俄罗斯要坚定不移的维护国家利益，这是俄罗斯外交中最重要的原则和目标。俄罗斯认为，国家之间发展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是否发展彼此的关系，而应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安全态势、地缘政治处境等因素，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国家关系。其次，俄罗斯要努力恢复大国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的作用。俄罗斯认为，恢复大国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凝聚人心，同时，也只有恢复大国地位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再次，建立全方位的伙伴关系。俄罗斯不仅要同西方大国搞好关系，而且要积极发展同其他大国和力量中心的关系，俄罗斯不同任何大国对抗，通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

第三，外交战略重点的定位。首先，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国家是俄外交战略的第一个重点。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现状决定了俄罗斯必须将独联体地区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重中之

重。叶利钦与1995年9月批准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中强调，与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俄政策中居于优先地位，俄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体，以集体安全条约和双边协定为基础建立独联体安全体系和防御联盟，并在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和协调行动。其次，西方大国依然是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点。因为无论从解决经济困难，还是从未来全面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来看，俄罗斯都离不开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合作。再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是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点之一。1995年开始，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保证俄东部边界的稳定和安全；为俄进行市场改革建立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俄特别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积极加入地区一体化进程创造先决条件。为此，俄罗斯积极发展同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全方位外交”就是要使俄罗斯以大国的形象在世界各个地区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由于战略目标定位过高，同时由于俄罗斯综合国力的不足，因此，这一外交战略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普京总统的外交政策

2000年3月，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从而揭开了俄罗斯历史的新篇章。普京上台后，对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世纪之交的国际环境进行了全面地分析后，对叶利钦时期的全方位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制定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俄罗斯务实、灵活的全方位的外交政策。普京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正确认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俄罗斯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定位更加准确。普京认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认识到，俄、美综合国力对比悬殊，俄罗斯已无力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抛弃“冷战”思维，发展俄、美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更加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和国家利益。因此，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保持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谋求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拥有同西方国家同等的发言权，强调要在国际社会中获取与俄国实力相称的地位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量力而行，不过度关心和介入远离自己甚至与己利益无关的国际问题，集中力量搞好自己的事情，解决诸多国内问题，并且强调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为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国内的发展目标高于国外发展目标，改变了俄罗斯外交与国内发展目标脱节的状况。

第二，奉行全方位、平衡、与他国不结盟、合作的外交政策。普京在总结四年来的外交工作时指出，俄罗斯四年里没有跟任何国家结成特别的联盟，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争吵过或发生过对抗。因此，俄罗斯既重视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又注重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关系。而俄罗斯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也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平衡性。俄罗斯认为这样的政



策有助于俄罗斯同其他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助于俄罗斯进行内部经济改革，也有助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自主的、有影响力的力量中心。

第三，更加强调世界多极化，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俄罗斯认为，两极世界不复存在，新体制还没有形成，世界仍在为新体制的形成斗争着。美国企图主宰世界，建立单极格局，但世界不可能建立单极格局，一方面是美国的这一努力将遭到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反对，同时世界上存在着成堆的问题，单靠美国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要合作。俄罗斯认为，多极世界的形成，首先要有多国参与，其次要在国际机制的帮助下，特别是在联合国的主导下，通过谈判和对话等方式解决国际问题。

八年来，普京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在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俄罗斯外交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俄美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俄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俄罗斯认为，改善俄美关系，利于改善国际安全环境，有利于俄罗斯国内的经济改革进程，有利于借助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发展俄罗斯经济。“9·11”恐怖事件后，俄罗斯对美国的反恐行动给予了积极支持，并默许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亚国家。俄、美在反对共同敌人——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中迅速靠拢，双边关系迅速升温。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俄、美准备在国际反恐斗争与核不扩散领域加强安全合作。此外，两国在政治、能源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明显进展。

第二，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和北约关系也出现了积极变化。俄罗斯同欧洲大国关系继续发展，同欧盟关系进一步密切。普京通过频繁的首脑外交，密切了俄罗斯同欧洲大国以及同欧盟的关系。欧盟和美国还先后承认了俄罗斯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为俄罗斯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扫平了道路。俄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北约理事会20国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新变化，使无力抵挡北约东扩的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拥有了北约成员国的“平等伙伴身份”。

第三，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关系日趋务实。发展与独联体所有国家的睦邻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几年来，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同里海沿岸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同乌克兰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实现突破性进展。

第四，俄罗斯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两国发展彼此间的睦邻友好、互利协作的关系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21世纪的战略协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中俄在国际事务中一致行动是解决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总之，普京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表现在同西方关系上是以退为进，以妥协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目的在于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发展俄罗斯的经济，为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而创造条件。在实践上，普京的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俄罗斯发展经济，开创了外交的新局面。普京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是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退让和妥协是在国力衰弱的情况下的一种务实的选择，也是符合俄罗斯国家的长远利益的。

（三）梅普组合外交战略的新构想与外交政策走向

2008年7月1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批准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新版《构想》”），三天后新版《构想》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颁布的第一份外交政策指导文件，它系统地阐述了新一届政府对当今世界和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俄对外政策的目标、原则和优先方向的看法。

新版《构想》指出，俄罗斯奉行公开、可预见和务实的对外政策。其基本目标是确保国家安全，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为俄罗斯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促进旨在建立公正和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全球进程，构建同各国的友好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俄罗斯对外政策遵循平衡性和多维性原则，俄愿意同有关国家协同解决共同任务，也可能根据国际法独立行动，但不会卷入包括新一轮军备竞赛在内的冲突。俄罗斯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优先方向是：建立新的世界体制，维护国际关系的法律至上性，加强国际安全，开展国际经济、生态、人文合作和信息交流。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将与独联体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人文和安全合作；同欧洲国家建立开放、民主的全欧集体安全与合作体系；将俄美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状态；深化同中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发展与日本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推进同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合作关系。

俄罗斯新外交政策的实施将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版《构想》强调通过多边外交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体系，为此，主张加强联合国作为国际事务治理和协调中心的作用，建立由大国集体领导的自我调节的国际体系。俄罗斯将抵制美国的单极霸权图谋和遏俄战略，致力于同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而共建没有分界线的“大欧洲”，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和俄、中、印三边合作，加强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原则、集体原则和多边原则。崛起中的俄罗斯越来越自信地承担起世界大国的责任，同时将以其特有的实力和文明促进公正民主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家利益分歧和对外战略矛盾等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美两国未必能够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因为近两年俄罗斯反美论调不断和对美外交趋硬而认为俄美正在走向新“冷战”的观点也是不切实际的。俄罗斯奉行独立的和非对抗的对外战略、实施的是“可控的反美主义”，而美国在诸多重要领域对俄罗斯存在战略合作需求，因此未来俄美关系很可能继续延续目前双方既合作又斗争的特点。

本章小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绝大部分战略遗产，是苏联唯一法定继承国，与独联体成员国建立了主权平等的新兴国家关系。经济上，十多年来俄罗斯已经建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经济发展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治上，俄罗斯确立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总统集权制；外交上，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对外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最终确立了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过程，是逐渐认识国际形势和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作用的过程，是俄罗斯外交逐渐抛弃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过程。

重要概念

休克疗法　独立国家联合体　“一边倒”外交　双头鹰外交　全方位外交　总统集权制

思考题

1. 俄罗斯经济转型为何会出现长期的危机？
2. 比较普京时期与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政治局势的异同并说明原因？
3. 如何理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苏联解体的时间是(　　)。

A. 1990 年 12 月　　B. 1991 年 8 月
C. 1991 年 12 月　　D. 1992 年 2 月

2.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政治路线是(　　)。

A. 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　　B. 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C.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D. 全面完善社会主义

3.“8·19”事件爆发的直接动因是(　　)。

A. 车臣武装分子的分裂活动　　B. 签署新联盟条约
C. 波罗的海三国宣告独立　　D. 总统大选

4. 1991年12月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决定成立独联体，所签署的重要文件是(　　)。

A. 阿拉木图宣言　　B. 明斯克协议

C. 俄白联盟宣言　　D. 新联盟条约

5. 独立国家联合体是(　　)。

A. 国家的一种形式　　B. 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实体

C. 非常松散的国家之间的联合形式　　D. 设立权力有限的中央政权机关

6. 俄罗斯建立初期叶利钦奉行的外交政策是(　　)。

A.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B. 双头鹰的外交政策

C. 全方位的外交政策　　D. 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多项选择题

1. 激进的"休克疗法"经济转型方式的基本内容为经济的(　　)。

A. 自由化　　B. 私有化　　C. 稳定化　　D. 市场化　　E. 国际化

2. 普京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

A. 正确认识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B. 奉行全方位、平衡、与他国不结盟、合作的外交政策

C. 更加强调世界多极化，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D. 积极发展对华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E. 重点地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3. 苏联剧变的教训主要有(　　)。

A.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B.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接受群众的监督

C.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改革，改革又必须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方向

D.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和渗透颠覆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懈地与之开展有效的斗争

E.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紧密结合

4. 普京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体现在(　　)。

A. 俄、美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B. 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和北约关系也出现了积极变化

C. 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关系日趋务实

D. 俄罗斯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E. 俄罗斯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答案：

单项选择：1. C　2. D　3. C　4. A　5. C　6. A

多项选择：1. ABD　2. ABCD　3. ABDE　4. ABCD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认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

重点与难点

- 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标志。
- 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
-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问题和改革。
- “冷战”后的南北关系、南南关系。
-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的头等大事，对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第三世界的形成及其意义

（一）第三世界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第三世界是指那些在历史上受过殖民统治和剥削，独立后经济落后，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基本上处于无权、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地位，在地域上多数位于南半球的亚非拉国家。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第三世界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国家或南方国家。这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类型国家的称呼。第三世界是指它与第一、第二世界的关系，是指在二战后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条件下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一支独立的中间力量，是国际政治层面的定义；发展中国家是和发达国家相对而言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是经济层面的定义；民族独立国家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强调的是这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共同拥有过的从殖民者手中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历史；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地理上大多位于南半球，与北方的发达国家相对，因而也被称之为“南方国家”，因而“南方国家”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

1952 年，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索维发表题为《三个世界，一个星球》的文章，首次提出“第三世界”的概念，指出在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对抗世界”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上处于被剥夺、被忽视、被鄙弃的境况，其地位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因此被命名为“第三世界”。后来，《第三世界》杂志在法国问世，“第三世界”一词由此就传开了，并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第二世界，在这两大阵营之外，还存在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刚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第三世界。1973 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正式把“第三世界”的概念写进会议发表的《政治宣言》中。

1974 年 2 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对第三世界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第三世界。

同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理论与西方流行的三个世界理论存在巨大的差别。前者从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划分三个世界，后者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它们都把“中间地带”、“中间力量”、“不结盟国家”、“发展中国家”称为“第三世界”。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第三世界的概念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也为国际组织广泛应用。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不少人认为,苏联已解体,三个世界理论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第三世界”业已消亡。例如,1990年7月18日罗伯特·塞缪尔逊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第三世界完了》,文中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术语原先反映的是全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工业化民主国家)、第二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其余的全是第三世界。共产主义集团的破裂,使得这种地理政治算术已不复存在。1991年5月9日英国《卫报》发表梅尔文·韦斯特莱克的文章《第三世界》,宣称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概念已经灭亡。1999年11月美国学者马丁·刘易斯在《现代史》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三世界存在吗?》以史学家的口吻总结道,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第一、第二世界已不复存在,因而第三世界也不存在了。他主张按贫富划分世界,将第三世界改称为“世界贫穷国家”。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也认为“第三世界不再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而存在。”

第三世界果真因苏联解体而不复存在了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首先,从上面第三世界概念产生发展的过程来看,第三世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作为一个客观整体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不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第一、第二世界的对抗,而是由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本质特征和它们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第三世界的基本特征有:(1)共同的历史遭遇。它们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均曾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剥削最重,反对奴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也最为强烈。(2)落后的经济状况。它们在独立前极端落后、贫穷,独立后经济虽然有所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绝大多数国家仍是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经济发展很落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3)共同的现实任务。它们在战后均取得了政治独立,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但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4)共同的国际立场与对外政策。第三世界各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大都执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反对外来干涉和强权政治,主张推进南北对话,发展南南合作,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第三世界就是因为这些基本特征而联合为一体的。虽然两极格局不存在了,但是第三世界这些基本特征并没有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就消失了,所以,那种认为“苏联解体”了,第三世界就不存在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两极格局解体后,第三世界的组织机构并没有解散,第三世界的声音和行动没有停息,第三世界运动仍在不断向前发展。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分别是代表第三世界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组织。两极格局解体后,尽管第三世界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不仅没有解散,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大。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已由1961年的25个扩大到现在的115个国家。“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不结盟运动又召开了四次首脑会议,“77国集团”成员国也已由1964年的77个扩大到现在的132个。“77国集团”在1991年、1995年召开了第七次和第八次部长级会议,2000年还举行了南方首脑



会议,“77 国集团”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在新的形势下。第三世界依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第三世界并没有消亡。

再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只要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就不会消亡,它仍然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两极格局瓦解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也没有消除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矛盾。相反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了新的发展,西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第三世界的趋向增大,它们把经济援助与“人权、民主”相挂钩,公开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强制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模式,致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局激烈动荡,地区冲突此伏彼起,不断蔓延。此外,由于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恶果以及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除东亚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日益严重。所以说,政治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经济上争取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是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只要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基于共同历史、共同利益、共同要求形成的第三世界就不会消亡。综上所述,第三世界仍将存在,而且会在 21 世纪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第三世界崛起的三个里程碑

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社会主义的鼓舞,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第三世界就是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20 世纪 50 年代的第一次亚非会议、60 年代“不结盟运动”和“77 国集团”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第三世界崛起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标志。

1. 亚非会议

随着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亚非地区已经有近 30 个民族独立国家,但是这些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却面临着新老殖民主义颠覆的巨大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共同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独立自主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迫切需要联合起来。第一次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由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旧称锡兰)五国发起的,有亚、非 29 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由于这次会议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在这次会议上各国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讨论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帝反殖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方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经过充分的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主要内容是:“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任何国家不

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这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包括了 1954 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第一次亚非会议是亚非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主召开的，自己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会议。表明了亚非国家开始独立自主地商讨和处理自己的事务和问题，标志着西方国家主宰亚非国家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亚非国家的民族自信心，从此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亚非会议是第三世界崛起的里程碑。“万隆会议”的胜利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地体系瓦解的进程。“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增进了亚非各国的相互尊重和了解，消除了彼此间的疑虑和对立，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反帝、反殖和反霸的斗争，促进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

2005 年 4 月 22 日至 24 日，“亚非峰会”也称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这是亚非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次亚非会议胜利召开 50 年后的又一次聚会。此次“亚非峰会”由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联合主办，参加会议的国家共有 105 个国家，其中非洲 53 国、亚洲 32 国，另有 18 国的观察员列席，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亦有出席。此次“亚非峰会”除了纪念“万隆会议”之外，也旨在探讨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促进亚非团结与合作的方向、领域与规模。会议的主题是恢复万隆精神的活力，致力于建立亚非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会议通过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发表了《亚非领导人关于海啸、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联合声明》。这次会议对促进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及亚非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峰会对万隆精神的重振，以及亚非国家建立的伙伴战略关系，可望为亚非国家在世界格局中重新谋求与确立新的地位，以及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团结的表现。第一次亚非会议后，在万隆精神的推动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许多国家相继独立。这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在面临两极对峙的现实中，为了维护自身独立，决定选择走和平、中立、不结盟的道路。1961 年 6 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联合提出不结盟运动的设想。9 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召开，有 25 个国家参加。不结盟运动正式创立。不结盟运动从创立以来不断的发展，成员国已从 25 国发展到 115 个成员国(2004 年 5 月 19 日，塞浦路斯退出不结盟运动)。不结盟首脑会议也已经举行了 13 次。

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与原则；支持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



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文化和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及霸权主义；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是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结盟运动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推动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不结盟运动为提高中小国家的国际地位，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不结盟运动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军备竞赛，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为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结盟运动积极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推动了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为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地位、改善南北关系、促进南南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一贯重视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与不结盟运动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于 1992 年 9 月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

两极格局解体后，在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不结盟运动面临着严峻的现实，不结盟运动及时调整了运动的重点，在继续坚持原有的原则、宗旨和内容的同时，更多的关注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谋求其经济发展仍是不结盟运动的主旋律。

3. 77 国集团

“77 国集团”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如果说，不结盟运动是第三世界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那么“77 国集团”的建立则是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实现团结的主要标志。

“77 国集团”形成于 1963 年。在第 18 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召开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会议时，75 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了《联合宣言》，由此形成“75 国集团”。1964 年 4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75 国集团”增加为 77 个国家和地区，并以《77 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的名称发表了 1963 年 75 国提出的联合宣言，其目的在于增进彼此在经济上的合作，打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控制和掠夺，“77 国集团”由此得名。以后，“77 国集团”的成员国人数不断增加，到 2005 年已增加到 132 个国家，包括了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但“77 国集团”的名称仍然沿用至今。

“77 国集团”的主要宗旨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内采取新的态度和新的做法，扩大国际合作范围，争取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关系；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贸易和经济发展问题上确定共同的目标和制定联合的行动纲领；采取集体谈判策略和共同立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推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77 国集团”组织松散，不设总部、也无常设机构，没有章程和财务预算，议事时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但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都有它的组织。每届联大和贸发会议举行之前，该集团通常举行部长级会议，协调立场，研究对策。部长级会议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77 国集团”成立 30 多年来，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推动南北对话和国际经济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贯支持“77 国集团”的正义主张与合理要求，作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同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今后，中国与“77 国集团”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

（三）第三世界兴起的重大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的积极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崛起，对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1. 第三世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奠定了两极格局的基础。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引起国际政治结构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不断冲击着两极格局。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为反对美苏为首的两个军事集团的尖锐对峙，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70 年代以后，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第三世界国家起到了牵制美苏的侵略行为、打破美苏的战争计划、消耗美苏有限的实力、动摇美苏的霸权地位的作用，最终促使两极格局解体。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有着共同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强烈的团结合作愿望的整体力量，在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重要位置。

2. 第三世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了世界和平。第三世界国家为了避免卷入大国军事集团，它们选择了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主张和平共处，反对军备竞赛，以谋求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从“万隆会议”公报到历次不结盟会议宣言，第三世界国家无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奋斗目标，都把反对战争、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和平共处、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写进会议公报或宣言中，例如第一次不结盟会议《宣言》的第一部分，就是反对战争，“努力寻找稳定和平的可靠道路”。而且强调，世界人民在战争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宣言》指出：“与会国政府坚决反对关于战争——包括‘冷战’——是不可避免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反映了一种无能为力和绝望的情绪，是同世界的进步背道而驰的。”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家还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干涉和霸权，反对由此引发的一切战争，主张和平共处，不干涉和干预他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撤走一切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基地。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家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军备竞赛，主



张进行裁军、禁止核试验、建立无核区。这些做法都是长期世界和平得以维护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从崛起之日起就作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碍。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

3. 第三世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深刻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

联合国是二战后成立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成立之初有 51 个成员国，包括 13 个亚、非国家。本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是联合国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美苏争霸的场所，没有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办事。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大量涌现，联合国成员国队伍也不断扩大。现在，联合国成员已达 191 个，其中第三世界国家 160 多个。这种状况不能不使联合国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名额得以增加，联合国宪章的某些条文得到修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地位得到保障，开始在联合国内享有公平的政治权利。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能够通过联合国大会多数表决，做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愿望的决议。如：1960 年联合国通过了 43 个亚、非国家提出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该《宣言》的通过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内取得的第一次辉煌胜利，它加速了殖民体系的崩溃；在 1971 年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上，正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终于冲破了美国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压倒多数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大大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重要职位的选择上，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联合斗争的力量。到目前为止，已有 7 任联合国秘书长，其中 3 个来自发达国家，4 个来自发展中国家。每届联合国秘书长易人，都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后三任秘书长，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中当选的。在第三世界的支持下，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推动裁军、促进发展，以及解决争端等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联合国还不能完全反映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意愿，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面貌已大为改观，成为一个伸张正义、反对强权、维护公理的不可替代的国际组织。今后，发展中国家仍需继续努力，使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反映它们的意愿，维护它们的利益。

4. 第三世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成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力量

发展中国家独立后，主要任务就是发展民族经济，用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因此，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活动中的首要任务。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的表现。殖民体系瓦解后，发达国家仍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力图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基本特征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的商品交换；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

融体系。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来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在这种秩序下，发展中国家仍未摆脱被剥削、受奴役、遭掠夺的地位。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是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债务负担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只有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从战后 60 年代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运用自己的资源、市场优势，创造了石油战、资源战、海洋战等，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了持续不断、规模宏大、卓有成效、震动世界的斗争。1974 年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77 国集团”提出的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主张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应建立在“公平互和、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基础上。使发达国家开始重视改善南北关系。与欧共体签订了四个《洛美协定》，成功召开了多次“亚欧会议”、“非欧会议”，加强了南南合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处境更加困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起来，世界经济，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很难有大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继续斗争，尽管任重道远，但仍然坚持不懈。

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问题

在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后，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探索和制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 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经济恢复和低速增长阶段（1945—1965 年）

在这个阶段，为了给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发展中国家对内实行了土地改革；对外收回了经济主权，开展了国有化运动。前者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清除了障碍，后者为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创造了条件。这一阶段，一些非洲国家采取的是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大多数拉美国家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在此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同时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国家和地区已开始进入起飞阶段。

（2）高速增长阶段（1966—1980 年）

这一阶段，一些国家开始由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外贸迅速扩大，经济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56—1960 年，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9％，1961—1965 年为 5.1％，1966—1970 年为 5.6％。1971—1975 年为 6.6％。同时，



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1973 年，石油生产国联合起来以石油作武器，进行了维护资源权益的斗争。石油输出国获得巨额石油收入，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失当和西方经济滞胀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货膨胀加速，外债迅速增加，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各国发展不平衡加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

(3) 停滞阶段(1980—1993 年)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本身政治形势、发展战略等问题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尽如人意，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损失的十年”。这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通货膨胀、债务过多；初级产品价格猛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整个 80 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只及 70 年代的 1/3，只有 1.5%。除东亚保持高速增长外，普遍陷入困境，拉美增长率为 1%，非洲大陆为 1.4%。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4) 调整和好转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新技术革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分别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1990—1996 年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年均 5%以上的速度向前发展。虽然 1997 年的金融危机给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影响，但从 2000 年开始东亚各国的经济已迅速恢复。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也在加剧。少数国家与地区已经跻身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的国家与地区的行列，但是绝大多数国家还属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2. 经济状况的五个层次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其规模和水平出现了五个不同的层次：

(1) 石油生产和出口国

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卡塔尔等波斯湾周围国家，其国土内部蕴藏着全世界约 67%的石油储量和 31%的天然气储量，拉美的委内瑞拉等国亦如此。这类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依靠大量出口石油，赚取了大量“石油美元”，石油工业发展迅速，国家日益富裕，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对抗发达国家的胜利。但是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水平不高，经济没有得到全面发展，只有石油开采业的畸形发展，经济类型单一。

(2)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以“亚洲四小龙”和以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为代表。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即改善出口商品结构，逐渐以工业制成品出口来替代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以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为代表的拉美发展模式，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即优先发展本国急需的制成品生产，用国货取代同类进口产品，也相应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加速发展经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收入处于中上等水平，有些国家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已达到1万～2万多美元。

(3) 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00美元～3 0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这一类。这类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有的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它们的产业结构还未根本改变,许多为农业国,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4) 加快发展的某些大国

如中国、印度等具有很大潜力的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起,被称为"未来世界的十大新兴市场",经济规模庞大。但经济发展尚存一些结构性矛盾,缺乏社会公正,人均仍处于低收入行列。

(5) 最不发达国家

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这类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增长很快,债务负担沉重,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其中不少国家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1995年初世界银行把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尼泊尔和不丹列为全球最穷的国家。其中卢旺达年人均收入仅为80美元。

3. 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战略调整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了一些成就,它创造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畸形的、单一的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在增大,地位也在上升。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1) 粮食危机严重

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落后,加上产业政策的失误,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尤其是粮食生产增长不快;另外人口增长率高于粮食的增长率,结果粮食严重短缺。再加上目前,发展中国家由于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水资源的浪费、耕地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每况愈下。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说:目前,全世界有31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共有8亿多人口仍然处于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其中有2亿5岁以下的儿童缺少足够的食品。

(2) 债务危机加剧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由于国内资金和积累不充足,吸引外资和举借外债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如果债务过重,超过了本国的偿债能力,则会发生债务危机。截至2002年9月25日,全球有28个国家无力偿还债务,包括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1991年为7 940亿美元,2001年则高达21 500亿美元。为了偿债,发展中国家需要支付大量资金,许多国家还债资金占了其出口收入的一半。此外,由于旧债利息居高不下,许多国家的债务越还越多,1980—1989年的十年间,发展中国家对长期债务就支付了

近 5 000 亿美元的利息。面临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之中。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3）人口压力问题严重

1 000 年前，世界上仅有 2 亿多人，19 世纪初，全世界人口才达到 10 亿人。到 1974 年，世界人口达到 40 亿人。2000 年增至 64 亿人，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85 亿人。世界人口增长多数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每位妇女终生平均生育 6.5 个孩子。1999 年 10 月 12 日世界人口达到了 60 亿人，这 60 亿居民中，发展中国家占了 47.4 亿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65.5%升至 79%。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使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粮食问题、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压力更大，减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缓慢；另一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上升，这就越发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将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

（4）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突出

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通货膨胀、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日益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社会整体上的不满情绪和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世界经济改革浪潮的冲击，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

第一，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战后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以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为目标。积极探索实现经济振兴的道路。战后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这是一种内向型的战略，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多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原材料和技术。生产本国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其核心是通过保护政策，发展满足本国市场所需要的制造业，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从实践效果上看，很多实行这种战略的国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增长成就，一些现代化和半现代化的国内企业建立起来了，但是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对资本品进口需求增加，加剧了城乡矛盾，压抑了社会经济中企业和居民的自主经营活动，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该战略以比较利益为原则，充分发挥本国自然条件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力量，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出口工业，以工业制成品代替农矿初级产品的出口，争取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工业化的实现。出口导向战略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增强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资本、劳动力、商品等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企业的应变能力，提

高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资金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许多实行此战略的国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济迅速发展,“亚洲四小龙”就是典型代表。但这一战略也有弊端,容易引起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外部条件恶化时,往往会加剧国内经济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充分暴露了此战略的弊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各有利弊,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战略的融合,着眼于开辟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第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独立后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国有化,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打击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排斥市场经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在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 10%左右。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推动工业化进程、提高民族经济的自主能力,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管理不善、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对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调整了经济政策,实行市场经济,推行私有化,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放松价格管理,更多地发挥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将一些严重亏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将一些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私营;积极发展私营部门。印度、阿尔及利亚、埃及等一些过去强调国家干预、发展国有经济的国家,转而放宽了私人资本在大型工程和工矿业的投资限制,并通过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措施,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中小企业,以增加生产,扩大就业。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从以前强调发展工业为重点转向重视工业和农业相适应的发展,注意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第四产业(科技、信息业),实现工业、农业、能源、交通、金融、服务等各部门的均衡发展。同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多样化,改变过去那种只能单纯依靠农产品或初级品生产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向发展以电子等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经济调整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仍然很多,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

(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其问题

1.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多样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少数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极少数国家继续维持着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制度,呈现出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主要呈现以下几种模式:共

和制政体、君主制政体、军人政权、政教合一制、党政合一制。

(1) 共和制政体

共分两类。一是议会共和制。即以议会为国家政治的中心，政府向议会负责。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目前实行这种制度的有印度、新加坡、土耳其、津巴布韦等。二是总统共和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掌握行政权力。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非洲的埃及、突尼斯、赞比亚等；亚洲的菲律宾、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叙利亚等均实行这种政体。

(2) 君主政体

这类政体可分为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君主专制政体。是以君主为国家元首的政权形式，君主拥有国家全部的最高权力。实行这种政体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与阿曼等国。君主立宪政体。是既有君主又有议会，以君主为国家元首，但君主的权力受宪法不同程度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类政体又可分为二元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前者中，君主为国家元首，议会为立法机构，内阁向君主同时又向议会负责，但国家实权主要掌握在君主手中。如尼泊尔、约旦、科威特、摩洛哥等。在议会君主制中，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内阁由议会产生，向议会负责，君主虽是国家元首，但不掌握实权。实行这种政体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西萨摩亚、毛里求斯、牙买加、斐济等国。

(3) 军人政权

军人控制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也就是国家政权不是掌握在人民选举的代议机构和公职人员手中，而是掌握在军人领袖手中。它一般是由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建立起来的。它是不发达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的反映。在非常的形势下，这种政权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其专制集权的性质与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的历史潮流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大多数军人政权在20世纪兴起的民主化浪潮中倒台。

(4) 政教合一制

政教合一是发展中国家为数不多的一种政治制度。指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或政府首脑兼掌宗教大权、或宗教领袖兼掌政府权力。在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朗1979年的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并提出总理人选。但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总统，而是宗教领袖。该领袖或领袖委员会主持国家事务，拥有军权、任免权等重大决策权。

(5) 党政合一制

通过宪法把执政党确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缅甸等实行这种政体。

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名目繁多、派别复杂，在政坛上极为活跃。按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划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类型。所

谓一党制，就是在一个国家中，按宪法法规，执政党是唯一的合法政党，其他政党则被禁止存在；一党优势制，就是在一国内，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但其中只有一个政党能长期执政，垄断政权。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印度国大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两党制，就是国内两个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其他政党因力量薄弱无力与之抗衡。如哥伦比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乌拉圭的红党和白党；多党制，在国内众多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能够通过选举单独执政，只能由政党联盟联合执政。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有土耳其、泰国和阿根廷；无党制，国家在法律上或传统上取缔政党，禁止政党活动。这是发展中的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如沙特阿拉伯。

发展中国家经过二战后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多党制。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的浪潮遍及亚、非、拉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苏联剧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去受苏联、东欧影响较深的非洲国家受到的震动最大，普遍发生了要求民主的骚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被迫接受多党制。西方国家则借机把提供援助和实行多党制联系起来。但实践表明，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里多党制往往徒有其表，或者演变为实际上的"一党优势"制；或者变成部族主义政党制，有些还不时为军事政变、兵变、内战所打断。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领袖素质、政治倾向、部族传统以及二战后世界种种政治思潮等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2.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治思潮

(1) 民族主义思潮

发展中国家是高扬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旗帜而赢得国家独立的。二战之后，在反抗统治，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民族主义成为在第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其中亚洲的尼赫鲁主义、苏加诺民族主义，非洲的纳赛尔主义、拉丁美洲的贝隆"民众"或"正义"主义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些民族主义思潮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纲领大体相同。它们把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理论核心，不仅要赶走帝国主义，而且要维护经济主权和经济独立，用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它们反对封建主义，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正义的自由社会，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它们奉行反帝、反殖的独立外交政策，强调要加强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这些民族主义思潮成为动员和组织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推动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为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外来干涉和控制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及泛民族主义在化解民族纷争、促进民族国家联合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有消极的影响，民族主义在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中，容易发展为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导致国家关系恶化、冲突频发，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

发展中国家的另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冷战"结束、苏东剧变之后。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以民族分离运动为主要内容。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七。由于苏联

解体，导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体系的崩溃。在旧的国际体系不复存在，新的秩序尚未产生之时，许多地区出现了权力和信仰的真空状态，原先被意识形态和“冷战”压制着的民族主义要求在这样的状态下纷纷兴起，以填补真空。

（2）社会主义思潮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曾是仅次于民族主义的第二大思潮。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歌猛进，国际社会一度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格局。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产生了一股“社会主义浪潮”，50 多个国家都宣布自己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国家约占战后新独立国家总数的 59%，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政党约有 100 个。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将国名定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埃及的纳赛尔把自己领导的党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世界上出现了“非洲社会主义”、“乌贾马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时髦的词汇和思想。但是这些国家所选择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非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低谷，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悄然退潮。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因为某些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是为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是其建设国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不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指导原则和路线，更不是一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制度。因此，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它可能因政府的更迭而更迭，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

（3）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以中东为中心的西亚和非洲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主义思潮。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主张回到早期伊斯兰教，不允许对《古兰经》进行任何解释，反对非穆斯林文化的异端邪说，号召全面实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冷战”结束后又有新的发展，表现为伊斯兰国家从各方面加强联合与合作，政治上加强协调行动，经济上创建和扩大经济合作组织，文化上加强伊斯兰统一大家庭的联系。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加入了伊斯兰世界的行列，无疑更促进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盲目反对西方进步思想，倡导复古倒退，特别是某些领袖提出的输出革命理论和个别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无助于伊斯兰各国的稳定和发展，也有碍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3. 发展中国家政治文明面临的问题

（1）政局不稳

政局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政局不稳定，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军事政变频繁是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的主要表现。仅仅在非洲，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年代，就发生过240多次军事政变，其中成功的70次。90年代以来，非洲又发生了数十次政变和兵变，有的还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内战，给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在亚、非、拉地区，据统计，从1960年到1976年，约有30个国家发生了4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在拉美地区，除墨西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过军事政变。军事政变是传统、落后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军队不但没有成为主权的护卫者，相反却成为政权的争夺者，给国家政局带来不稳。"冷战"后，发展中国家政局动荡表现为民主化运动中的进步与反动、革命与保守两股政治势力复杂的政治较量所带来的政治动荡。菲律宾、巴拿马、阿根廷等国经历了文官政府与军事政变反复较量后，才走向稳定。在非洲，某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只不过是用新的集权代替旧的专制，另一些国家因民主化引发的社会骚乱和内战至今还未平息。

（2）民主化进程尚未完成

发展中国家建立政治独立的国家政权，是民主化进程的起点；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使其民主化进程上了新的台阶。但是，极权统治、专制主义和军人暴政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萨达姆统治时期，反对派和异己人士被大批杀害，甚至在镇压国内库尔德人起义时使用了毒气。与此相对的是，独裁者制造出了在1999年大选中萨达姆以99.6%的高票当选，在2002年民意测验中100%的人民支持萨达姆的丑剧。所以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仍然很艰巨。

（3）局部战争频繁

发展中国家间由于存在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从而引发了发展中国家间爆发了冲突甚至战争。"两伊战争"、"印巴战争"、"巴以冲突"都属此列。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巴双方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争执不断，曾经导致三次"印巴战争"。1975年2月，印度宣布克什米尔印占区为印度联邦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对此提出抗议。印巴克什米尔争端至今尚未解决，成为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随着旧有的两极格局解体，国际间矛盾斗争激化，"冷战"后的世界局部战争更加频繁、武装冲突不断，特别是中东、巴尔干，更是一度成为热点地区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4）民族问题严重

在"冷战"时期，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民族问题主要是西方国家推行新、老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国家发生的民族利益矛盾。"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跨国性民族问题所产生的泛民族主义以及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问题凸显出来，有的还发展成民族冲突甚至民族战争，其负面影响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包括欧亚大陆新月形边缘地带，近东的土耳其经海湾国家、伊拉克、伊朗、沿印度、巴基斯坦一直到斯里兰卡、不丹、缅甸等国。在这条漫长的地带，民族问题不断影响着有关国家的政治稳定，其中有整个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为争夺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有存在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库尔德民族问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有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图谋独立而进行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在非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民族问题则表现为极端复杂的部族矛盾和部



族冲突。如1991—1992年索马里部族冲突升级为全面内战，1994—1995年在卢旺达爆发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大规模的种族大屠杀，在肯尼亚、多哥、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塞内加尔等国都曾发生和正在发生部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由民族问题而产生和引发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影响了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5）宗教冲突激烈

宗教冲突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发展中国家是多种宗教、多种教派共存的。由于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存在，使宗教矛盾难以避免。如果矛盾解决不好就可引起宗教冲突和战争。宗教冲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另一种是同一宗教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伊斯兰教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由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多民族国家，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常常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两伊战争”、“阿以冲突”的国际化，都有宗教矛盾在其中起的作用。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宗教冲突频繁发生的国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47年印巴分治中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1984年因印军攻占阿姆利则金庙而引发的锡克教与印度教的大冲突、大仇杀，并导致英迪拉·甘地总理被其信奉锡克教的卫兵刺杀身亡。1992年12月6日，数千名印度教徒摧毁了位于印度北方邦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暴力冲突，使一度趋于缓和的印度政局又出现动荡，在这场冲突中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引起了伊斯兰国家的抗议。

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也成为令人关注的世界问题。所谓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是指伊斯兰教中要求遵守伊斯兰基本教义，并用它来规范和约束穆斯林社会和生活的思潮。它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依靠国家政权来实现伊斯兰教的统治；在社会方面，主张全盘伊斯兰化，反对世俗化、反对西方。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对加强伊斯兰国家的团结，打击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也有消极的作用。其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国家，违背了历史发展方向；其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直接威胁着有关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人民生命安全，如2001年9月，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劫持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几千人死亡，造成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其极端组织对地区冲突的介入、渗透和干扰，使地区冲突雪上加霜；其极端组织的活动为西方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提供了借口，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和世界和平的。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诸如：法制化任务相当艰巨、政党制度难题颇多、领土和边界冲突此起彼伏等问题需要逐步解决。

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

（一）南北关系

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都位于北半球，所以国际上通常用“北方”代表发达国家。发

展中国家大多数位于南半球，被称为“南方”。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北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

“冷战”时期，南北关系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领域里的对抗与对话，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冷战”结束后，南北关系的实质并未改变，但南北关系也发生了某些新变化。

1. 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后，南北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民主和人权的斗争上。

首先，北方国家把改善人权和实行民主作为实施援助南方国家的条件，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权问题也逐渐被纳入国际关系而国际化了，并成为南北关系问题的重要方面。北方国家认为人权高于主权，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权报告”来“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欧共体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从 1989 年 7 月到 1995 年 1 月欧洲议会发表了 394 项人权决议，其中 304 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北方国家还把改善人权和实行民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良好的维护人权措施；欧盟提出援助应以促进这些国家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条件。凡是达不到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北方国家的援助，即使是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也会受到停止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惩罚。例如美国对古巴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的经济封锁，对古巴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北方国家还打着保护“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对南方国家不惜动用武力进行内政上的干涉，如美国 1989 年 12 月出兵巴拿马，擒拿诺列加，其借口之一就是说他实行独裁、违背人权。1999 年 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更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不顾《联合国宪章》、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和馆舍严重毁坏，这是对中国主权的野蛮侵犯。它们的所谓“人权”、“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个借口。北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敦促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其次，北方国家利用大众传媒、一些基金会和发达的信息网络，宣传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思想上的文化渗透，促使南方国家发生内变。“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BBC)”，“欧洲自由电台(FE)”、“马蒂电台”等大众传媒都是专门从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广播的电台，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的宣传，力图促使南方国家接受北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渗透。它们还利用一些基金会，如美国的“富布



赖特奖学金计划”，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熏陶。成为亲西方的人士。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 2000 年财政年度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 600 万美元。特别是由于北方国家在科技、网络方面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它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

2. 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北经济“数字化鸿沟”加大，南北矛盾更加尖锐，并出现了新的特点。

首先，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悬殊。“冷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南北差距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主要表现在：(1)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加。1971 年联合国确认 25 国为最不发达国家。1981 年最不发达国家增至 39 国。1990 年又增到 42 国。当前为 49 国。1971 年最不发达国家占当时发展中国家总数的 20%，当前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 30%以上。(2)南北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 GDP 来看，1980 年发达国家的 GDP 为 7.7 万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 2.1 万亿美元的 3.6 倍。2001 年，发达国家 GDP 为 24.1 万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排除东欧、独联体国家)5.865 万亿美元的 4.1 倍。从人均 GDP 来看，1960 年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差距为 30∶1，1997 年扩大到 74∶1。美国、欧洲最富有的 3 位亿万富翁的财产竟超过 49 个最不发达国家 GDP 之和。人类 20%的富有者享受着 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人口 1/5 的最穷者只享受着世界财富的 1.3%。(3)南北经济结构与质量差距扩大。发达国家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相继走向知识化、信息化，逐渐建立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未实现工业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南北工业化差距尚未抚平，目前又遭遇“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只有发达国家的 4.793%。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网民人数占全球网民人数的 61.82%。北美洲、欧洲网民人数分别占到全球网民人数的 31.29%、28.83%。非洲的网民人数只占全球网民人数的 1.34%。(4)南北差距扩大呈加速发展之势。发展中国家如果想缩小南北经济差距，它们必须创造超过 4 倍以上的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只相当发达国家的 1.9 倍。所以南北差距扩大呈加速发展之势。

其次，债务危机加剧，南方国家发展经济资金短缺。1988 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为 13 750亿美元，1996 年增至 21 000 亿美元，2002 年又增至 22 000 亿美元。拉美和非洲地区是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发展中国家外债不仅数额大，而且越还越多。例如 1982 年至 2000 年，墨西哥还本付息一共偿还了 4 780 亿美元的外债；但它欠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外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增加。1982 年墨西哥欠外债 570 亿美元，20 年后的今

天，它的外债是 1 520 亿美元。也就是说，每个墨西哥人刚一出生，他就欠外债 1 570 美元。据世界银行、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数字，拉美近 20 年来还本付息总共 1.4 万亿美元，是其原来外债本金的 5 倍，但今天的债务还是其原来债务的 3 倍多。整个第三世界加上东欧国家同期偿还外债达到 4 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还债的钱是原来本金的 6 倍。而它们现在的负债额平均是其原来债务的 4 倍。债务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南方国家的债务已对国际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烈冲击，既影响了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

最后，南方经济、贸易不平等加剧。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程度也越来越高。北方国家需要南方国家的资源、市场，南方国家需要北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践证明，南方发展不起来，北方也无法繁荣。但是南北方国家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平等的，北方国家在南北关系中占有优势。北方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和先进营销方式、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它们可利用这些优势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垄断，主宰世界贸易，使南方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经济全球化又给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使商品和服务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对于产品质量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发达国家，自然会得到很多的利益。南方国家则刚进入工业阶段，存在着经济体制落后，技术设备陈旧，资金短缺的问题，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产品的质量缺乏国际竞争力，再加上北方国家人为的市场阻碍，新贸易主义的抬头，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服务不能顺利流入国际市场。而且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社会问题。因此这种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必将导致南北差距和分歧进一步扩大。

3. 环境保护问题上的矛盾

全球化的发展已日益表明国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随着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面临着诸如废气排放过量，导致臭氧层日益稀薄；植被破坏造成大量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工业垃圾的排放对空气和水质造成严重污染等问题。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都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保护人类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21 世纪议程》和 2002 年召开的以“拯救地球重在行动”为宗旨的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并通过了《执行计划》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目前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北方国家已进入信息化社会，以获取和生产大量的信息及开发相关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跨越了需要大规模消耗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因此，它们更有条件在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南方国家要消除贫困、改变落后，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且有的发达国家在利用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又向南方国家转移污染工业和倾倒有害物质，却反过来指责南方国家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因此，南北双方围绕严重的环境问题，斗争也很尖锐。

4. 区域内部的南北关系逐渐升温

由于北方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南北全球对话陷于“瘫痪”。自 1981 年“坎昆会议”后，全球性的南北高级对话再未举行。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区域化促使同一地区内的南北对话日益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它们不同于欧洲联盟，它们是由该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这种同一区域内南北国家就经济贸易合作等进行对话，由于地缘经济等因素，比全球性的南北对话更容易达成一些共识。全球性的南北关系将演变成区域内部或集团内部的南北关系，这表明南北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而有效地参与新兴全球经济的办法之一。南南合作是南南关系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的关键步骤，是促进南北谈判的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具有相同的历史遭遇、相似的现实环境和相同的国家目标，在现实斗争中更加感受到了团结的可贵，只有彼此加强合作，互相支援，才能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消除发达国家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剥削。

南南合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合作的范围来看，有全球性合作，如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和“15 国集团”所进行的合作；有区域性的合作，如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进行的合作；有次区域合作，如中美洲、东非、西非、北非小区域进行的合作；还有跨区域合作、国家间的多边合作以及国家间的双边合作等。从合作的领域来看，有政治合作，包括建立双边的友好关系、协调对外政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等；有经济合作，包括原料和能源合作、粮食和农业合作、资源开发利用合作、运输和工业合作、贸易和金融合作、科技合作、环保合作等；其他领域合作，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合作等。从合作方法来看，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合作，有一般协调性的合作，有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合作，还有联盟或集团性的合作。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南南合作出现了新的特点。

首先，地区集团化趋势加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浪潮推动下，发展中国家一体化进程重新恢复活力和生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其中发展得较好，较有影响力的区域合作组织有：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冷战”后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接纳了越南、缅甸等国，形成了“十国大东盟”，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在 2003 年还建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促进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非洲经济一体化，1991 年非洲 51 国在非洲统一组织第 27 届首脑会议上，签署了《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95 年，该条约开始实施，非洲一体化开始起步。2001 年 3 月，建立了非洲联盟，这是新形势下非洲联合自强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拉

美,1991 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等四国建立了南锥体共同市场。几年来,四国多次举行会议,加紧宏观经济调整步伐,求同存异,消除分歧,协调政策,从而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条件。1995 年,南方共同市场正式启动,成为仅次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第四大区域性经济集团。

其次,不结盟运动和“77 国集团”调整战略,继续在国际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在政治领域,不结盟运动坚持反帝、反殖、反霸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的原则,促进了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及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的斗争;在经济领域,“77 国集团”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改革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推动南北对话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冷战”后,作为整体南南合作载体的不结盟运动和“77 国集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冷战”后,不结盟运动被置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一度队伍思想混乱,拉美大国阿根廷退出了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方面的作用也有所减弱。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77 国集团”在处理重大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都缺乏权威性和主导性。但是,不结盟运动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如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捍卫民族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斗争;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仍合乎时代的潮流,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主张,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大的现实意义。“77 国集团”在联合中协调行动,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于 1992 年、1995 年、1998 年和 2003 年分别召开了第 10 次、第 11 次、第 12 次和第 13 次会议,这些会议反复认真地讨论了不结盟运动的命运,批判了“取消论”、“无用论”,达成了不结盟运动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共识。同时,面对现实对不结盟运动提出的严峻挑战,在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和宗旨的基础上调整了战略重点,确立了今后前进的方向。首先,将运动的重心转移到经济领域,把“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愚昧和落后”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其次,继续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宗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大国干涉内政,为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使不结盟运动成为一支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生力军。2003 年 2 月,第 13 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专门就当前的全球热点问题——伊拉克危机、巴勒斯坦问题和朝鲜核问题表明了态度。这次会议还吸收了新成员,使其成员国达到 116 个。

不结盟运动还与“77 国集团”共同确立了“冷战”后时期的具体目标,即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反对将多数发展中国家排斥在世界经济主要决策之外,要求实现国际经济关系的民主化;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强调通过和平协商形式解决种族、宗教、政治和社会争端,特别是历史性争端;在裁军问题上,主张全面无歧视地实现裁军;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强调发挥联合国作用的重要性,特别是重视贸发会议和工业发展组织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合作中的作用;在人权问题上,反对将人权作为政治施压的工具,强调各国人民生存权和



发展权的重要性;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提出建立以和平、公正、平等、民主和完全尊重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无缺陷、无担忧、能兼容并蓄的世界新秩序。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77 国集团”不仅与不结盟运动共同制定了上述目标,而且还调整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其内容是,把实施同发达国家建立“相互依存”关系的灵活政策,与加快全球化趋势下的南南合作进程结合起来,以促进南北对话取得更有效的成果。2000 年 4 月,在“77 国集团”主持下,举行了首次发展中国家首脑会议,就如何应对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进行了商讨。

再次,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的霸权政策。“冷战”虽然结束了,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推行新干涉主义,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平等的首要任务。“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限制了发达国家控制世界的企图。如 2001 年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就取得了对美国斗争的胜利,迫使美国失去了在本组织中的席位。

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必然会带来它们之间在政治、外交上的一致性,这对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将产生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团结、精诚合作,可以壮大这些国家的力量,提高它们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南南合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现象加剧,经济差距拉大的现象将会日益突出。再加上宗教、领土、民族等矛盾的存在,南南合作还存在许多障碍,但是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之间同大于异,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团结合作是可以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的。

本章小结

发展中国家也称为第三世界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的第一次亚非会议、60 年代“不结盟运动”和“77 国集团”是第三世界崛起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标志。第三世界的崛起,对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充满对立和斗争,又存在依存与合作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称为南北关系,其实质是北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获得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是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而有效地参与新兴全球经济的办法之一。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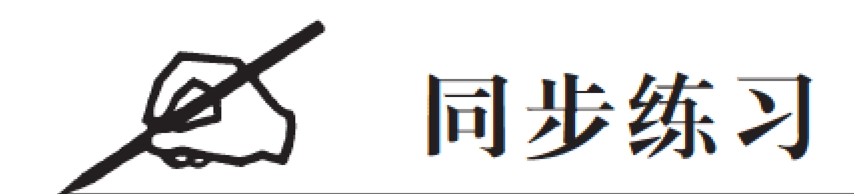
力量。

重要概念

发展中国家　不结盟政策　77 国集团　南北关系　南南合作

思考题

1. 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标志什么?
2.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面临哪些问题?
3."冷战"结束后南北关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4. 20 世纪 90 年代南南合作出现了哪些新特点?
5. 战后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6. 为什么说发展中国家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发起独立召开的国际会议是(　　)。

A. 开罗会议　　B. 万隆会议
C. 日内瓦会议　　D. 卢萨卡会议

2. 南南合作的主要机构是(　　)。

A. 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B. 石油输出国组织
C. 南方首脑会议　　D."77 国集团"
E. 西非经济共同体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困扰世界的中东问题,其核心是(　　)。

A. 宗教问题　　B. 水源问题
C. 石油问题　　D. 巴勒斯坦问题
E. 民族问题

4. 促进人类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而发展问题的核心是(　　)。

A.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　　B.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C.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D. 占世界产值多数的少数大国的发展
E. 全球经济的发展

二、多项选择题

1. 第三世界崛起的里程碑是(　　)。
A. 万隆会议　B. 欧佩克的建立
C. 不结盟运动的诞生　D. "77 国集团"的建立
E. 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

2. 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模式主要有(　　)等类型。
A. 议会共和制　B. 总统制
C. 绝对君主制　D. 军事专制统治
E. 政教合一制

3. 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有(　　)。
A. 历史上有着共同的遭遇
B. 它们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
C. 绝大多数国家处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地位
D. 共同的国际立场与对外政策
E. 不与强国结盟

4. 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是(　　)。
A. 反帝、反殖、反霸　B. 独立
C. 发展　D. 和平、中立
E. 不结盟

5.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有(　　)。
A.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B. 经济结构得到调整
C. 民族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D. 经济自主性不断增强。
E. 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大

6.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将发展中国家分为(　　)类型。
A. 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　B. 高收入的石油出口国
C. 次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D. 中下等收入国家和地区
E. 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

答案:

单项选择:1. B　2. D　3. D　4. C
多项选择:1. ACD　2. ABCDE　3. ABCD　4. ABCDE　5. ABCDE　6. ABDE



坚持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掌握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发展；认识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重点与难点

- 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发展。
- 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 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越来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冷战”前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一）从1949年建国到50年代末，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建国之初，新中国外交面临的中心任务是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国内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基于这一任务，在国际上美苏“冷战”、两大阵营对立，而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苏联积极支持、援助新中国的形势下，我们在外交战略上选择了“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首先，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且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决定了在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三大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自动继承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不承认国民党统治时期外国派驻中国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而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新中国并不急于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请外国代表到中国来，而是先要把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影响肃清后，再根据各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分别同它们建交。

“一边倒”就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结盟，抗衡美国。在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下，新中国当时的主要敌人是美国，于是中国采取了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新中国将发展同苏联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放在了首位，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并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同家。1949年10月2日，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先后同我国建交。新中国成立后，南斯拉夫立即予以承认，但由于受到“情报局事件”的影响，中南两国直到1955年1月才正式建交。中苏建交后，为巩固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即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用条约把中苏友谊固定下来。之后,中国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些条约对中国保障国家安全,放手进行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意义重大。

其次,中国积极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关系。鉴于当时国际上一些国家仍然支持国民党集团或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阿拉伯也门、尼泊尔、柬埔寨、斯里兰卡等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特别是亚非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中国同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经过谈判于 1951 年相继建交,并与英国、荷兰两国互派代办,建立“半建交”关系。

再次,围绕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和抗美、台湾问题中国同美国进行了斗争,挫败了美国的战争阴谋和军事威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的政策,从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中国台湾三面同时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企图扼杀新中国。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同时派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台湾海峡,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尽管新中国刚刚成立,困难很大,但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新中国以顶天立地、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与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奋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对越南给予了人力和物力上的一切必要援助,应邀派出的一批顾问协助越方组织了一些重要抗法战役并获胜;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中国立场鲜明,坚持斗争,迫使美国于 1955 年 8 月开始同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通过朝鲜、印度支那、中国台湾三条战线同美国的反复较量,大显国威,粉碎了美国针对中国的侵略计划,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进行和平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鼓舞了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信心。

最后,中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为恢复印支和平,增进亚非团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54 年 4 月至 7 月,周总理率团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在会议上,周总理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代表一起,克服美国的阻挠,签订了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1955 年 4 月在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周总理深刻阐述了亚非国家的共同经历和任务,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同与会国代表一起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亚非会议”的图谋与活动。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为进一步发展同亚非各国的合作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总之,在这个时期,新中国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了中国的崭新形象。

（二）20世纪60年代，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进入60年代，美苏两极对抗的政治格局已经开始变化。苏联逐渐走了霸权主义道路，同美国激烈争夺世界霸权，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构成了对中国新的威胁。而这时的美国仍坚持其反华政策，对中国的威胁并未解除。这样，中国始终处在战争，包括核战争的威胁下，腹背受敌、形势严峻。对此，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弃了“一边倒”的战略，由联苏反美，转而采取既反美又反苏，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即人们称之为“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

一方面，中苏关系全面、彻底的破裂。5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并严重影响到两国关系。苏联打着“社会主义团结、合作”的旗号，采取了一系列侵犯中国国家利益的做法，致使两国间分歧的鸿沟不断加深。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了有关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样有损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的要求，并对中国炮击金门横加指责。进入60年代，中苏分歧加剧。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在一个月内将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并撕毁已经签字的各种经济合同，大量减少对中国供应成套设备以及关键的零部件。同时，还逼中国还债，企图让中国屈服。从1962年11月起，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双方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公开的、激烈的论战。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礼仪性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遭到中国方面拒绝。从此，中苏两党关系完全断绝。随后，苏联不断在中苏、中蒙边境增派军队，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边界冲突事件，尤其是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开始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作为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美国仍然继续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孤立和包围的政策，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中印边界冲突事件中，与苏联一道袒护印度，攻击中国；同时，从1964年8月开始，美国逐步卷入“越南战争”，从最初的提供金钱、武器、顾问，发展到由美国军人直接参战的“特种战争”、“品部战略”，并多次派飞机入侵中国的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领空，从而从南面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针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中国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运动，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大量的援助，而且从武装人员上也给予援助。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几十个协定，向越南无偿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向越南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先后达到32万人之多，最高年份达17万人，使得越南人民军得以抽调大批部队到越南南方作战。中国的这些支援部队直到1970年7月才全部撤回国。

这样，由于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由于美国采取继续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中美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中国在坚决顶住美苏两国压力的同时，与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关系有了新发展。1964年，中国同法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同西欧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沉重打击，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日关系则由民间往来，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为了更好地进行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斗争，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积极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近独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扩大影响、增进友谊，坚决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支持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从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周恩来总理连续访问了非洲10国、亚洲3国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共14个国家，历时72天，行程10万里，所到之处，均受到隆重欢迎。这无论是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罕见的，充分表明了这个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重点之所在。

总的说来，60年代中国的外交工作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加强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能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上，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主要就得力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反对美国的政策，虽然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但确实是中国的国力很难承担的，并导致中国处于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不可能长期实行。

(三) 20世纪70年代，实行“一条线”战略，侧重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再次调整了对外关系，放弃了“两个拳头打人”，提出了联合美国反对苏联的“一条线”战略。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在霸权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世界上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苏联成为我国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首先在70年代初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分成三部分、三个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争取实现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美苏两霸之中，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当时，美国军队由于深陷越南战争，在与苏联争霸中逐渐处于下风。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力图通过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来使美国摆脱困境，借助中国，以抗衡苏联。与此同时，中苏两国在东北和新疆发生了边境冲突，西方国家还盛传苏联打算袭击中国的核基地，中国面临来自苏联的直接威胁。而且，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已经变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也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需要

结束与美国长期对峙的局面。

所以，毛泽东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联合“一条线”、团结“一大片”，建立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所谓联合“一条线”，是指建立从中国，经日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到西欧，北美洲的加拿大、美国，大洋洲的新西兰、澳大利亚这样两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线；所谓团结“一大片”，是指要团结这“一条线”周围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这样，中国的外交战略就同时反对美苏，转变为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在这个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首先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 1971 年 4 月的“乒乓外交”拉开序幕，到 7 月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访问中国，再到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迈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随后，经过几年的谈判，在卡特政府任期内，美国才最终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断交、撤军、废约），于 1978 年 12 月发布《建交公报》，宣布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时，中美关系的解冻、正常化，还消除了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障碍。1972 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中国几乎同所有的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总共有 75 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比新中国成立后 20 年内的建交总数还多 1/2。尤其是 1971 年 10 月 9 日联合国第 26 届大会以多数赞成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苏联在 70 年代全面扩张，谋求世界霸权。它不仅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继续反华，而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以常规战争和核打击威胁中国的安全。同时，苏联还竭力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在南线，支持越南反华并侵略柬埔寨；在西线，直接出兵阿富汗，从而完成了从南、北、西三面对中国的包围态势，导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双方形成了激烈而持久的对抗局面。鉴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苏同盟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中国于 1979 年 4 月宣布 1950 年 2 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 1980 年期满后不再延长，从而正式结束了两国的同盟关系。

总之，“一条线”战略的实施，在当时对于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对外关系的大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一条线”战略本身有其明显的缺陷。它与“一边倒”战略一样，以战略关系划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使我国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以苏划线”的偏向使我们同一些国家的关系长期僵化，正常的、必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往也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这一战略容易被霸权主义所利用，使某一方通过打某国牌来增强与另一方对抗的筹码，从而损伤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

（四）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全面调整了对外政策，彻底改变了 70 年代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采取了“真正不结盟”战略。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国内建设的需要，中国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包括：

第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这是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时代主题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希望的、可行的。1985 年邓小平对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主题作了进一步判断和概括，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另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字。

第二，对国际战略力量划分有了科学的认识，对国际力量构成的不同分析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全方位影响。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态度从以往否定性批判转向建设性介入与参与；国际斗争方式由以往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转向不当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对建设国际安全机制的认识由以往的认为国家间只要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能够维护和平，只有奉行霸权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够挑起世界大战，其他小的区域性战争我们也将它纳入两极争霸的框架中的认识，转向世界大战打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虽然威胁着和平，但不一定必然导致战争。中国开始致力于建立某种安全对话机制，与不同国家保持经常的信息沟通，争取互相理解，并最终建立互相信任。

在这些新思想、新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更加明确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合作，面向世界，促进共同发展；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等等。正是有了这些调整，才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首先，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经过多年的谈判，苏联在消除中国提出的改善两国关系三大障碍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改变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于是，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首脑会晤，签署联合公报，实现了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同时，由于中苏关系的解冻，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苏联解体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同独联体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并很快建交。比如苏联刚解体，中国政府代表团就访问了莫斯科，中俄双方同意由俄罗斯继承苏联同中国的关系。

其次，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在改善和发展同它们的关系上，



www.euibe.com

努力寻求共同利益，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于彼此之间的分歧，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反对进行制裁或者以制裁相威胁。尤其是在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经济制裁，导致关系的严重倒退后，我们在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有理、有节的斗争，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同西方关系又缓慢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近几年来，通过高层互访，中国已分别与美国、日本、欧盟确立了面向21世纪发展双边关系的目标和指导方针。

再次，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使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目前，中国同所有邻国都已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政治上友好往来，经济上互相合作。与少数几个邻国的边界谈判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漫长的边界线基本上平静无事。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问题上，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和平解决"的主张，得到了有关国家的普遍赞同。这些都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和平的、稳定的周边环境。

最后，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我们继续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和捍卫政治独立、维护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个方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权益。尤其是1989年以来，我们先后10次挫败了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战略意义。

二、"冷战"后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一）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全方位外交的新格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巨大压力。这时期，中国外交的突出任务是打破西方对华制裁，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同时有所作为。经过努力，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打破了西方的对华制裁。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确立了全方位外交的新格局。

首先，发展了大国伙伴关系。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成功互访。两国领导人决定中美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中俄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同欧盟也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和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

其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睦邻政策和睦邻外

交一直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睦邻政策有了新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主要表现在：(1)同一批邻近国家如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的友好关系，得到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同一批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越南、蒙古、老挝、印度等，恢复了正常的国家关系；同一批亚洲国家如新加坡、韩国、文莱等，建立了外交关系；(2)同绝大部分有领土接壤的国家，通过和平协商，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华侨问题等。(3)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解决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柬埔寨、阿富汗等问题，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

再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更趋密切。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问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途径，取得显著成效。

最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多边外交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外交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创造出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主客观条件，在许多全球和地区的重大问题上，中国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二）21 世纪中国的和平外交

进入 21 世纪，首先国际局势呈现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征。这个特征在 21 世纪头 20 年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其次，虽然进入了 21 世纪，但是世界主题并没有发生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各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竞争又合作，都注意避免发生直接对抗，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未露端倪。再者，美国分化、西化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但是在“9·11”事件后，美国要应对的难题越来越多，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集中精力对我国加以大的干扰。

这样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于是中共“十六大”制定了未来 20 年的发展规划，就是要紧紧抓住机遇，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是要服务于这个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一个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环境、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也应有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

于是，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新时期的中国外交突出了和平外交，几乎做到了“只交友、不树敌”，在国家交往中突出了“双赢和共赢”。并且对新时期中国外交进行了总体布局，党中央明确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

1. 大国是关键

大国综合国力强，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作用和影响大，所以我们要继续改善、发展同大国的关系，妥善解决分歧，营造一个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这样对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非常重要。

首先，发展好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



www.euibe.com

稳定,有助于我国改善和发展同其他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利于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一定要妥善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它关系到能否维持中国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大局。中美两国在反恐、朝核问题和经济领域有着共同的战略合作基础,但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并没有改变,双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摩擦是不断的,因此,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中美双方必须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战略观点来看待双边关系;(2)应当增进了解、加深互信;(3)要承认和尊重差异与分歧是存在的,关键是要缩小分歧、扩大共识、寻求和扩大双方利益的共同点;(4)要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方必须信守承诺,妥善地处理台湾问题。

其次,重视发展中俄关系。俄罗斯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邻国,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96 年,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 年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 21 世纪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俄在维护各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方面相互支持,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富有成效,经贸关系迅速发展。2004 年两国边界问题彻底解决,充分体现了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不为敌”的伟大战略构想。使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再者,积极发展中欧关系。中国已与欧盟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与欧盟高层交往频繁,双方在经济、贸易方面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双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历史最高点。欧盟是当今世界重要的一极,进一步加强中、欧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符合中欧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最后,妥善处理好中日关系。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世界经济强国。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分子极力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订历史教科书。同时日本在二战遗留问题、台湾问题上的错误举动,严重影响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共同利益就是发展和振兴亚洲。亚洲的发展和振兴,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合作。中日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不符合亚洲的利益,也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不符,所以一定要妥善处理好中日关系。

2. 周边是首要

中国有两万多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与 14 个国家接壤,有 1.8 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与多个国家隔海相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意识形态各异,历史积怨较多。因此,周边形势的好坏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抓住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大事情。所以,党中央把周边外交放在了外交全局的首要地位。提出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在政治上,建立互信。中国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原则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经济上互利合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猛,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中国愿与周边国家一道，继续携手共进，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在安全上，以全新的安全观代替传统安全观。新安全观以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核心，是一种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合作安全，它有助于中国同周边国家增加信任、减少对抗，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在外交上，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应当承认，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崛起心存疑虑。对此，中国必须坚定的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需要同周边国家增信释疑，加强沟通。

3.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多年来，正是由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越自身实力的重要影响。在新时期，发展中国家仍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国特色的大国作用的重要基础和稳定的战略依托，是支持中国反对和遏制"台独"、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有利于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扩大外交斡旋余地，增加谈判筹码。

4. 多边是重要舞台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多边外交日益重要。多边机制已成为处理国际事务、调节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牵动国际形势变化的重要因素。当前各国都非常重视多边机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中国也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多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展示形象、发挥作用、维护利益、施加影响的重要舞台。

联合国是我国多边外交的核心，是我国参与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的重要场所，因此，我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开展了多边外交。在裁军方面，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主张真正的裁军，并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核裁军与常规裁军建议，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的裁军活动。中国在联合国还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正义要求，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国还十分关注涉及全球的社会发展问题，积极支持并参加了一系列有关社会领域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在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残疾人利益、禁毒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问题中的中国因素和国内问题中的国际因素比重同时增大，中国加强国际合作的需要和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相应增多，更积极主动的利用联合国为国内建设和外交全局服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增强。中国应更为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事务，旗帜鲜明的倡导多边主义，

中国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符合国际形势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的，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和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提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主张真正的裁军。为了推进国际裁军的进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1985 年至 1986 年，中国裁军 100 万。后来又裁军 50 万。

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削减常规军备。1992 年，中国正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3 年又签署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中国还反对以军控和军售为手段干涉别国内政，赞成美苏（俄）两国达成的中程导弹协议及削减战略核武器、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监督与检查地下核试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议。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决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者以任何借口侵占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进行地区争夺的战略部署，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地区冲突政治解决。

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国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中国一贯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了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国之所以极力主张维护世界和平，是因为中国人民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侵略和压迫。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政府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

（二）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们一直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略、干涉和威胁作为自己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凡属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能由中国人民自主决定，决不允许外国干涉；对于一切重大的国际问题，应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由中国独立地作出判断，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为别人所左右。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我们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和欺侮。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世界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

立场。这就告诉人们,新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表现为在国际上争取中国的真正独立、平等的地位,保障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本质是不结盟,尤其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不同任何大国建立战略关系。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谁在什么地方搞霸权我们就反对谁。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失去独立就只能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那就意味着受压迫和被掠夺,意味着贫穷和落后。中国人民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只要世界各国互相尊重,世界和平就能得以维持。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我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不断丰富,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多次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5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在与印度政府代表团商谈两国边界问题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同意,并写进了 1954 年 4 月 29 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954 年 6 月 28 日,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和次日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确立为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之所以主张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基于的理念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应加强团结合作,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有差别的国家应求同存异,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国家关系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得将其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发展双边关系时,不得损害第三国利益。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和基础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主权独立和



领土完整是任何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各国之间平等交往必不可少的条件。各国之间只有彼此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有可能达到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就是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而不是用武力去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互不干涉内政”就是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反对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平等互利”，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损人利己。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平等合作、互惠互利；“和平共处”是实现前四项原则的出发点和归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缺一不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原则已经为众多国家和国际文件所接受和遵循，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原则高度概括了当今国际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丰富和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0 年 9 月 28 日钱其琛外长在第 45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国际政治新秩序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第一，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第二，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第三，国家之间应当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第四，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五，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世界的事务。”这一讲话扩大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历史已经证明：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各国就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促进发展；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之间就可能产生对立，甚至发生冲突。因此，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斗争的风云变幻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的一员。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是中国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它们为发展民族经济而展开的斗争。努力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积极促进同它们之间的团结。

中国之所以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因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苦难经历，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的独立和解放，都进行过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今天，它们又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提高国家实力的共同任务，这都需要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因此，中国的命运是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和第三世

界国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仅符合中国人民与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

战后以来，中国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坚决支持它们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的正义斗争。中国长期致力于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就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原则，即：援助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赐予；对外提供援助决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我们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它们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发展民族经济作为中心任务。中国倡议把加强经济合作的重点转移到以互利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并提出“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它们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科学技术合作。近年来，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层互访增多，合作领域拓宽。中国还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国际性、区域性组织的政治经济合作。1992 年，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标志着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为促进这一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主张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矛盾。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长期存在，引起第三世界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中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应尽可能采取协商方式加以公平合理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存在将影响第三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所以，有关各方应以和平大局为重，求同存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中国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好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看作“可信赖的朋友”。随着友好关系的发展，合作成果的显著，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的世界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落后地位。1949 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 20 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使占世界人口 1/4 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缩小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使社会主义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在亚洲的一个侵略基地，而且是给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勇气。

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力地冲击了旧殖民统治，为正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决心，促进并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高涨、最终摧垮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新中国以和平民主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时，雅尔塔体系正在加快实施，美苏背着中国在雅尔塔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利益的秘密协定，划分了势力范围。新中国的诞生，粉碎了美国控制中国的图谋。苏联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也不得不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冲击和突破，打击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促进了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1. 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综合国力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对国际事务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

在现今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再是单纯地看它的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而是要看它的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有多大。正确的评估现今中国的综合国力，是正确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

对中国而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明悠久，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都是衡量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土、资源是构成国家实力的自然物质基础，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必备条件。人口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难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丰富的物力、人力资源，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但人口多少必须有一个限度，当一国人口超过生产力所能承担的界限时，国家又会因为负荷沉重而使国力变弱。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优良传统，早已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是形成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但是，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变化的最主要的指标之一是经济实力的变化。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中国人民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建立了一套比较独立的、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0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亿美元，位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之后，位居世界第七位，2009 年上升至第三位。20 年来，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率高 6.5 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 7.3 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的名次不断前进，工业中的煤、钢、水泥、布、电视机等 80 种工业品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农业中的谷物、棉花、油菜籽、肉类等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对外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7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十位的贸易大国，2002 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在世界排位又跃居第五位，2009 年成为第一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不断上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消费水平已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农村居民在 1990 年前后开始由温饱型消费结构向小康型消费结构转化。从 1978—2002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4 元增加到 7 793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33.6 元增加到 2 476 元。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城镇由 57.5%下降至 37.7%，农村由 67.7%下降至 46.2%。

科学技术力量是衡量综合国力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科技突飞猛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数学、理论物理、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领域已居于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已形成一支素质高、实力雄厚的科技队伍。国富而后兵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已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拥有了自己的国防工业、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无线电工业，形成了专业门类基本齐全、科研生产手段基本配套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能够自主研制、生产各类先进武器装备，是世界上五个公认的核国家之一。

2.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2%。因此，中国发展上去了，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里，各国经济、贸易、资金、技术的往来日益频繁。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既要参与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进程，又要在区域化和一体化进程中影响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正是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众所周知，当前人类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造成南北差距的拉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发展。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一个大国，陆地领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3 亿，地广人多，市场巨大。因此，中国的发展与否不仅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发展。正如蒙古国总理宾巴苏伦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所指出的，“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大因素”。

的确，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已成



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发达国家需要中国的初级产品、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需要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及投资市场；中国则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及资金。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中国的技术、资金及市场。展望未来，中国将更加开放、更加富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将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中国的发展使全球受益。

第一，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规模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扩展。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五位。随着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市场潜力将进一步得到发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继续增长。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以及中、西部地区招商开发，中国需要引进的外资数额会不断增大。在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国市场的扩大，不仅推动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更将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繁荣和兴旺。

第二，中国在出口方面为世界提供了商品和技术。中国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继续保持我国出口第一大类产品的地位。对外贸易向多元化发展，不仅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不断增加，而且对拉丁美洲、非洲的出口额也迅速增长。这表明，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在不断增加。无论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技术转让等方面来看，我们同发展中国家都有广泛的合作领域。这种合作将促进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第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投资额与投资领域都有所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紧密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对中国台湾、东盟及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都有投资。这对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近几年来，我们的投资领域又进一步扩大到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及金融、债券等领域。作为发展的大国、开放的大国，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3. 中国是当代世界的重要力量

中国在当今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经历了由两极到多极的演变过程。中国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实力急剧上升，形成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其他国家力量相对较弱，未构成影响世界格局的力量。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壮大了人民民主和平力量，维护了世界和平。在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也由于教条化地信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原则，我们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改革开放前，我们同外部的联系极少。虽然1971年中国就恢复了联合国缔约国地位，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那时中国还没有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远不如今天这样重要。当今的世界格局已由两极演变为多极，这里所谓“极”，是指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所说的，常被人们用来描述具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和充当世界格局主角的国家和国家集

团。中国一贯认为,多极比单极好,多极对世界和平有利,不能想象拥有约200个国家、60多亿人口的世界由一个国家来领导。当前世界舆论所公认的五极是指美国、欧洲联盟、俄罗斯、日本、中国。中国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五大力量之一,成为五极中的一极。由此看来,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35 353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位,预计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中国是五个核心大国之一,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积极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健康发展。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毋庸置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然而,我们深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4.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特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首先,在联合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遵循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做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联合国各种会议为讲坛,不断阐述中国政府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在裁军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完全彻底地裁军,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备竞赛。在联合国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裁军主张,并付诸于自己的实际行动,率先贯彻自己在联合国所宣布的裁军方针。在维护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谋求解决国际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以促进第三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其次,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稳定世界局势,发挥平衡作用。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日益增强,要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和战略平衡,没有中国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与亚太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过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冲突问题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推动柬埔寨问题公正、合理的解决,为缓和与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中国积



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积极发展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为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正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一份对华政策报告中所言：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很明确的政治文化实体，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有影响的作用，我们应当把中国看作在亚洲，而且某种程度上正在全世界出现的复杂的均势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国。”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同样有着巨大的贡献。在当今形成的美、欧盟、俄、日、中几支力量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国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正如德国前总理科尔所言：“中国对世界政治稳定的意义无论怎么突出强调也是不够的。”

再次，在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的侵略行为；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捍卫民族尊严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好评。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世界形势处于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开展了务实、灵活、全方位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标地位不断提高，并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本章小结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外交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发展经历了 50 年代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60 年代“两个拳头打人”和 70 年代“联美反苏”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外关系有了大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越来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重要概念

第三世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综合国力　独立自主　一国两制　求同存异

思考题

1. 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是怎样发展的？
2. 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3. 怎样看待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同步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　　)。

A. 1999 年 5 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　B. 西藏问题

C. 台湾问题　D. 知识产权问题

2.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　　)。

A.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B. 同发达国家发展加强经济合作

C.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D. 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

3. 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会晤,是由(　　)。

A. 俄罗斯倡议　B. 中国倡议

C. 美国倡议　D. 英国倡议

E. 法国倡议

4.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在(　　)。

A. 1960 年 15 届联合国大会　B. 1965 年 20 届联合国大会

C. 1971 年 26 届联合国大会　D. 1974 年 29 届联合国大会

二、多项选择题

1. 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是因为(　　)。

A. 沉重打击了美国战后企图独霸世界和远东的狂妄野心,打乱了它的战略部署

B. 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变化

C. 给亚、非、拉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以巨大鼓舞,增强了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心和力量

D. 在亚太地区率先打破了"雅尔塔体系",从而打击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E. 中华民族从此开始崛起

2. 中共中央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决定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方针,其中有(　　)。

A. "另起炉灶"　B. "一边倒"

C.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D. "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E. 积极推动世界革命

3. 请指出中国是以下哪些国际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

A. 联合国　B.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C. 不结盟运动　D. 亚太经合组织

E. 亚欧会议　　F.“77 国集团”

4. 确定中、美关系原则的三个重要公报是(　　)。

A.《中美北京联合公报》　　B.《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C.《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D.《中美八·一七公报》

5.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二十八字方针”包括(　　)。

A. 坚持斗争　　B. 决不当头

C. 韬光养晦　　D. 有所作为

E. 善于守拙

6.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　　)。

A. 确立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

B. 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

C. 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D. 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E. 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

答案:

单项选择:1. C　2. C　3. B　4. C

多项选择:1. ABCD　2. ABCD　3. AD　4. BCD　5. BCDE　6. ABCDE